

战后西欧国际关系

1945—1984

陈乐民著



战后西欧国际关系 1945—1984

陈乐民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邝明生
责任校对：王桂琴
封面设计：式　一
版式设计：王丹丹

战后西欧国际关系
Zhanhou Xiou Guoji Guanxi
陈乐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25印张　360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3.500 册
统一书号：3190·066　　定价：2.95元

前　言

西欧在世界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西欧是产业革命发祥之地，在一百多年当中，多数的第一等世界强权国家都出在西欧。旧中国是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它的：自从十九世纪中叶起，所谓“西学东渐”大半是指欧洲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向中国的传播，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渴望从西方得到知识，主要是到西欧去留学，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旧中国也正是从欧洲列强对它的宰割、侵凌和控制结识了西方帝国主义。

近四十年来，无论是世界和西欧，都迥然不同了。今天，西欧早失去了列强地位，而且在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时代，已经成为制约战争和维护和平的重要因素。西欧同外界的关系也根本不同了。例如，中国与西欧的关系就已完全改观，展现了历史上所没有的新面貌。不管社会制度何等不同和意识形态何等歧异，中国和西欧各国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近似的语言；在经济、技术领域里，中国和

西欧之间正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着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合作关系。

总之，今天的西欧已不是过去的西欧了。我认为，这该是西欧在国际政治上最有意义的变化。我在这本书里想要作的，归结起来，就是抓住一条主线，即根据西欧战后四十年来在国际政治中地位的变化，特别是它在东西方关系中的处境，通过各种重大国际事件探究其独立发展的脉络和遇到的问题。这是西欧各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决定政策的最重要的客观依据。我以为，脱离开战后出现了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这一基本时代特征，就无法说清楚今天西欧之何以然和所以然。因此，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国际关系史；我希望这本书能为总结战后西欧国际关系的某些发展规律，作些微薄贡献。

在写法上，我试图作一次史论结合的尝试；既照顾到事件的时间顺序，更要以“史”为基础或线索来探讨问题。因此在取材方面，悉以对问题阐发之所需来决详略、定取舍。对于一些问题，我写了自己的分析和看法；对于另一些问题，如果循事情本身的发展逻辑必定会得出某一论断，结论不言可喻，我即不再加蛇足之语。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确实困难。在动笔时，我每每感到，既要把事情条分缕析地讲明白，又要力避简单化之弊，确非我功力之所能及；且史料浩瀚，也时有难以驾驭之苦。疏漏、偏颇以至谬误之处只好待方家匡正，以俟来日再增补、删削了。例如，本书比较侧重了西欧处在两大国之间的“共性”，各国的“个性”虽有涉及（如英、法、联邦德国等大国），但却未作充分展开。本书的任务原就是着重于西欧在政治上的“同一性”（IDENTITY）。

在本书基本定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曾经举行了一次书稿论证会，来自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外交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西欧研究所等单位

的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使我受益良多。西欧研究所的同志们经常给我以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冉隆勃同志对欧洲统一问题提供了一份初稿，为我起草有关章节提供了基础；周荣耀同志为本书编写了《战后西欧国际关系大事简记》。刘燕清、马燕、赵健等青年同志曾作了部分搜集和整理资料的工作。在本书行将付梓的时候，谨对所有给我以支持和帮助的同志，表示深切的感谢。

最后，我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邝明生同志仔细地通读了全部书稿，使它避免了一些明显的失当之处。没有他们的努力，这本小书的问世是不可想象的。

陈乐民

一九八五年九月三十日于北京

目 录

第二部分
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的西欧国际关系

第三部分
七十年代以来的西欧
国际关系

绪　论

一、欧洲历史的简要回顾

西欧，作为一种地理概念，一般地说只是与欧洲东半部相对而言的；但是本书中的西欧却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从地理上看，它除了欧洲西半部如法国、英国等国家之外，还包括联邦德国、奥地利等中欧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南欧国家，位于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属于本书所论述的西欧范围之内。这些国家大多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有些国家则执行中立的政策，没有参加任何联盟集团；但是它们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同属于一个政治、经济体系。所以书中的西欧是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代特点的一个政治概念，是在东西方对峙的局面下形成的。

马克思曾经说过："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

时期相比较。”①下面将对欧洲的历史作些粗线条的回顾，用意只在于提供一个欧洲历史发展的轮廓，这对于从历史延续性的观点来了解今天的西欧是怎样发展过来的，或许不无好处。

欧洲的各个地区在历史传统上和文化传统上有许多共同的渊源。例如，它们都程度不同地继承或接受了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的文明。我们在研究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史的时候，终归会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恩格斯曾经把古代希腊在政治、科学和哲学方面的成就誉为“现代科学理论的出发点”②。而罗马帝国的远征则把罗马的先进的生产技术、政治体制和文化带到了西北欧各个角落，使那些还没有开化的地方受到了罗马文化的洗礼。

基督教在欧洲地区的影响就更有普遍意义了。在基督教传入罗马帝国以后，起码西欧的历史同基督教的历史结了不解之缘。罗马天主教会甚至成为西北欧封建制度的中心，神权与封建统治结合得那样紧密，“它把整个封建的西欧(尽管有许多内部战争)联合成一个大的政治体系”③，神权凌驾于国家之上，支配着一切。新生的资产阶级为了冲破神权的束缚，不得不花几个世纪的努力。起初还只是在宗教改革的名义下进行斗争，十六世纪爆发的宗教革命便是西欧封建社会后期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突出表现，实际上已是一场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了；教会实行“大一统”的局面开始发生崩裂。十七世纪的“宗教战争”席卷了西、北、中欧的许多国家，先后混战达三十年之久，预示着欧洲政局正在酝酿深刻得多的变化。差不多就在同一时期，同宗教革命交织在一起的文艺复兴运动，作为“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④，已在表明欧洲的西半部正在走出中世纪，开始叩资本主义新纪元的大门了。然而，直到一七八九年，资产

---

①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5页。

阶级才第一次完全抛开了那件“宗教外衣”，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把资产阶级的革命进行到底①。

在这时期，国际关系也相应发生了对欧洲史有深远影响的变化。标志着三十年战争终结的一六四八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重新划定了各有关国家的国界，国家观念的重要性从此空前突现出来，逐渐取代了教权一统天下的观念，新旧教之争愈来愈让位给国家之间的政治斗争。就象英国历史学家赫·乔·韦尔斯说的，“列强”观念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渐渐地出现了。韦尔斯把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形势作了非常形象的描绘，他说：“象瑞典、普鲁士，更甚的象波兰和奥地利这样的国家，假如我们在一系列的历史地图中注意观察，就看到它们在缩小、扩大、突出伸张、而且在欧洲地图上游动，好象显微镜下的阿米巴那样……”②。

欧洲列强之间你争我夺，说到底是为了竞相扩充实力，争夺势力范围，欧洲地图确实象“阿米巴”那样不停地游动。马克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英国在所谓“光荣革命”之后怎样为了扩张自己在北欧的利益，大搞“远交近攻”，不惜勾结正处心积虑寻找出海口的俄国，背信弃义地同它分割瑞典帝国。马克思把这一笔交易看作是“开创国际政治近代史纪元”的事件③。后来欧洲几个大国为反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结成了反法军事联盟，把战争强加给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紧接着，拿破仑战争震撼了整个欧洲，列强为了争夺欧洲的霸权又进行了十多年的战争。拿破仑溃败后，欧洲便出现了标志列强势均力敌的所谓“维也纳体制”：英国、普鲁士、俄国、奥地利和法国等几个大国分庭抗礼，形成了某种“均势”。但是，“均势”不均，十九世纪后半叶欧洲大国间的战争仍然连绵不断，著名的俄、英、法的克里米亚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等等，都对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5页。
② 〔英〕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04页。
③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页。

洲的形势产生巨大影响；俾斯麦终于以铁和血的政策实现了欧洲国家视为威胁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谁也不能容许别人的实力超过自己、从而突破“均势”。换句话说，谁都在争取压倒别人的优势。十九世纪的欧洲格局是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今天许多西方学者在分析当前形势时还不免参照和比较上个世纪的欧洲形势。

欧洲列强在为争夺欧洲霸权而进行尖锐搏斗的同时，还仗着经济的和军事的实力残酷地掠夺和强占欧洲以外的广大地区，直至悍然发动侵略战争。英国和法国刚刚打完克里米亚战争便勾结起来向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们这个行星上未被占领的土地都霸占完了”[1]的时候，这些国家便先后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并且在世界范围内积极进行更大规模的再分割。欧洲已处于大战的前夜。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在不到半个世纪当中，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欧洲分成两个对立的政治、经济体系、两个对立的军事联盟；美国和苏联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的超级大国；从前的第一流“列强”都普遍被削弱了，失去了它们昔日在世界上的地位；旧的殖民体系很快土崩瓦解，在广大亚非拉地区，殖民地纷纷成为民族独立国家。在东西方对峙下的西欧面对着的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局面，带着种种新问题迈进了本世纪的下半叶。

二、战后西欧国际关系变化概述

在战后国际关系中，西欧有着十分重要的特定地位。要了解当代世界局势的特点，就不能不研究西欧国际政治在战后四十年来的发展和变化。

---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97页。

前面说过，西欧在新形势下遇到许多新问题。而任何一个问题都莫不同(西)欧、美、苏关系密切相联。西欧和苏联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历史的延续性；但是在同美国的关系上却出现了许多与战前大不相同的问题。其特点是，在对苏战略一致的大前提下，西欧和美国既互相依赖又相互矛盾，形成了复杂的情况；欧美关系在整个西欧国际关系中一直占据着非常引人注目的地位。

从战争结束到五十年代末，西欧基本上处于对美国的依附地位。西欧无论在防务上，还是在经济上都需要美国的支持；而美国为了同苏联对峙也需要同西欧结成联盟，于是美国便成了西方联盟的当然“盟主”。

然而，即使在那个时候也绝不意味着西欧甘心于这种处境。法国和美国之间很早就已经出现了龃龉。还在战争期间，戴高乐因罗斯福迟迟不肯承认“自由法兰西”并与“维希政权”保持外交关系强烈不满。在筹组法国临时政府时，戴高乐一再明白表示法国必须参与大国对战后格局的谈判与安排。但是实事上法国却总是被排除在许多重要国际会谈的门外，只能接受美、苏、英的安排。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虽然力争修好法国，但法美关系并无根本好转。法美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上的分歧是很明显的。曾身受德国法西斯之害的西欧国家对于美国借朝鲜战争之机、以防“共产主义扩张”为由，坚持把联邦德国武装起来，是忐忑不安的，不同程度地同情法国观点，只是反应不及法国那样强烈。一九五四年杜勒斯亲自到巴黎向法国施加压力，要法国迅速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未果，当时西方报界认为这是法美关系在战后产生的第一个政治性分歧。对于致命的奠边府战役，美国曾经扯了法国的后腿，美国觊觎印度支那，由此已见苗头。在一九五四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美法分歧表现得十分尖锐。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付出了重大代价，但与法国处境不同，在战后局势的安排问题上，比法国的发言权要大些，但是今非昔比，英镑一再受到美元的打击，大英帝国在亚洲、中东

的地盘也受到美国的排挤。英国的旧殖民体系正处于瓦解之中。战后的英国只能在大西洋联盟中占居第二把交椅。美国政府对于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一九五六年发动侵埃战争的态度完全暴露了美国的用心；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和苏联代表一起投票迫使英法军队撤离苏伊士；第二年，美国便打出"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旗号进入中东，"填补"了英法老牌殖民主义留下的"真空"。美国对自己的伙伴寓控制于"保护"，惯于乘人之危，西欧人是懂得的。问题是西欧还很虚弱，对美国这一套，也只好吞下去。

六十年代是西欧局势发展的关键年代。因为它是从所谓"冷战"过渡到所谓"缓和"的重要变动年代。在这期间，各种力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苏联的核战略力量经过五十年代的发展正在赶上美国；美国不仅对苏联失去了核垄断的优势，在西方盟国中也不是独此一家了，而且美国由于陷身越战等原因，力量相对下降。西欧一方面在政治上还要顺从美国的战略要求，但另一方面则在积极探索同东方接触的可能性和途径；特别是西欧经济已经走出了战后最困难的阶段，不仅无需再依靠"马歇尔计划"，而且已开始"起飞"，并且走上了联合发展的道路。在这种新形势下，西欧要求调整"两极"格局、谋求自身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发展、要求以"缓和"代替"冷战"，已是事所必然了。

在法国，戴高乐在第五共和国成立后的头几年，第一件事就是卸掉阿尔及利亚的沉重包袱，解决法国的非洲殖民地问题，随后腾出手来全力争取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地位"，并以此为法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

戴高乐是西欧向美国在大西洋联盟中的"绝对领导"进行挑战的第一人。他强调，在全局战略与美国基本一致的前提下，法国必须实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他提出了"缓和、谅解、合作"的对苏政策方针；勾画了以法国为核心的排除美国控制的"欧洲建设"蓝图。他认为，法国要争取独立的大国地位，首先必须打破美国的核垄断，掌握自己的核武装。戴高乐一九五八年上台后不

久，向艾森豪威尔发出了备忘录，提出了在大西洋联盟中以美英法“三头领导”取代美英“两头领导”的建议，到一九六六年进一步正式宣布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的军事一体化组织，法国军队不再受北约的约束，美国驻军也被撵出法国领土。戴高乐还公开抨击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呼吁”美军撤离亚洲，甚至到加拿大和美国后院拉丁美洲游说。法国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和苏联、东欧的关系迅速发展，出现了转折。

至此，萌芽于战争期间的戴高乐主义便有了较完备的涵义和内容。戴高乐在国内有不少“政敌”，但恢复和争取在国际上独立的大国地位、发扬法兰西民族的“伟大”和“光荣”，却能广泛地激发起法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感情，成为戴高乐以后蓬皮杜、德斯坦以及密特朗在对外政策中的指导方针。

联邦德国对外政策发生的变化，同样具有长远影响。德国问题在战后一直是东西方斗争的焦点。美国、英国和法国虽然有时有不同想法，但是要把德国的西部稳定在西方，不使它“偏离”航道而为苏联所乘，则是一致的。德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在战后头几年，联邦德国只能唯美国马首是瞻，执行与东方隔绝的政策，即所谓哈尔斯坦学说：拒绝与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建立外交和其它关系（只有苏联是一个特殊的例外）。然而时至六十年代，哈尔斯坦学说显然已不合时宜。德国统一更是遥遥无期的事，而联邦德国在西方联盟中的地位和作用却随着经济实力的加强而日益增强了。为了彻底改变“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这种地位，一九六六年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期间，基辛格政府已着手修改这种“自我孤立”的政策，试探打开与东方交往的可能性。特别是经过社会民主党几年时间的关于对外政策指导思想的讨论，一种新的联邦德国对外政策思想，即新东方政策便酝酿成熟了。维利·勃兰特在一九六九年正式宣布联邦德国政府新的东方政策以后，几年当中便迅速打开了同苏联和东欧的关系，一个“封闭”的联邦德国成了“开

放”的联邦德国，特别是同苏联的关系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新东方政策”是联邦德国版本的“缓和、谅解、合作”政策。反之也可以说，“缓和、谅解、合作”政策是法国的“东方政策”。

法国的戴高乐主义和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既是政策实践，也是有时代特点的政治思潮，在整个西欧都有深刻而广泛的基础，所以其影响和反响超越了法、德国界。戴高乐和勃兰特的成就，在于集中概括地反映了西欧要求独立发展的政治倾向。法国和联邦德国在六十年代发生的上述变化，使西欧出现了新局面。尤其是联邦德国，因其与东欧接壤的前沿地位，成为西欧的屏障，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更加引人注目。

西欧的这股潮流和苏联向西方推行的“和平攻势”，表明了东西方都有了调整政策的需要，于是在欧洲上空出现了一股强大的“缓和”气流。进入七十年代，西欧的气氛显然与十年前大不相同，柏林协议使自“柏林墙事件”以来的紧张局面得到了松弛，从此在东、西德和中欧地区出现了战后所少见的和缓空气。到一九七五年举行赫尔辛基欧安会时，“缓和”势头便发展到了高潮。在这期间，以欧洲共同体为主要体现的西欧联合也有了明显的进展。

今天，欧洲仍面临着严峻的局势，至今仍是两大军事集团直接对峙的地区，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重点。因此，欧洲在国际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欧洲——东欧和西欧——人民都迫切要求在涉及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上掌握自己的命运，希望东西方关系真正能够缓和、东西欧关系得到发展，强烈要求超级大国停止军备竞赛，切实进行裁军，以利于维护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

西欧联合，是战后西欧政治中的具有时代特点和适应时代要求的产物，是不会倒转的历史潮流。在八十年代乃至本世纪内，西欧联合的进程，虽然还面临着种种困难，还要经历种种曲折，但是总的趋势是会向前发展的。

第一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五十年代中期的西欧国际关系

内容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上的战事于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而告结束。事实上，战争的后半期——一般地说，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取得胜利之后——反法西斯盟国已开始根据战局的进展酝酿和讨论战后欧洲的安排。战后，美国和苏联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欧洲国家或者沦为战败国，或者虽是战胜国，但却在战争中大大削弱；在战后它们分别成为美国和苏联的盟国——使德国一分为二，使欧洲一分为二，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于焉成立。东西方处于“冷战”的局面之中。

同时，西欧正处于旧殖民体系解体的前夜，美国则先后进入了东南亚和中近东英、法的传统势力范围。

对经济恢复和政治振兴的迫切要求，推动了欧洲联合的进程，催生了欧洲“一体化”思潮的第一个体现物——西欧六国共同市场。

·第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欧洲战局和东西欧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个法西斯轴心国的彻底失败而结束。战前曾是第一流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和法国大大地被削弱了；尤其是法国——它的大部地区在战争期间沦陷在法西斯侵略者手里——损失更重，到战争结束时精力已经消耗殆尽了。只有美国和苏联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战前几个强国之间的那种力量对比不见了，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相对立的局面。在战后欧洲格局中起突出重要作用、“发言权”最大的，当然只能是实力最强的美国和苏联；美国基本上控制着西欧，苏联基本上控制着东欧。

这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形势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战争结束时实力对比的一种反映。一般地说，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欧洲战局的进展，对于欧洲战后格局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所以有必要把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的欧洲战局作一番简要的回顾。

从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苏联继打退法西斯德国对莫斯科的进攻之后，进行了举世闻名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在这次战役中，苏联红军击溃了德国法西斯势力对苏联的疯狂进攻，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首先是苏德战场）发生了根本变化，迫使希特勒从战略进攻急转直下，进入战略防御。所以人们把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转折点。对于这段欧洲战局，概括得最扼要而准确的，莫过于毛泽东，所以在开始时将多引用一两段。毛泽东对于斯大林格勒战役曾作过如下概述：

"……自从八月二十三日德军全部渡过顿河河曲，全面地开始攻击斯大林格勒，九月十五日德军一部打入该城西北部工业区，至十月九日苏联情报局宣布红军突破该区德军包围线为止，共计进行了四十八天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空前苦战。这一战终于胜利了……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①

为什么说，斯大林格勒之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呢？战局的客观发展足资证明。毛泽东追述了希特勒从一九三九年发动战争以来的过程：

"希特勒在西线胜利以前，他似乎是谨慎的。攻波兰，攻挪威，攻荷、比、法，攻巴尔干，都是注全力于一处，不敢旁骛。西线胜利后，他就冲昏了头脑，企图在三个月内打败苏联。北起摩尔曼斯克，南至克里米亚，向这个庞大坚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举行了全面的进攻，这样就分散了他的兵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86页。

力。”①

一九四二年十月，德军进犯莫斯科失败，苏联红军从此在全线大举反攻，希特勒在退却中搜索欧洲军力，连在北非作战中的一部分飞机坦克也用上了，妄作孤注一掷之举，企图在南线给苏联最后一击。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格勒之战便成了关系德国法西斯势力生死存亡的战役，因而具有转折意义。这一战，希特勒是彻底被打败了。还是如毛泽东说的："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②

对于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的战局的发展，毛泽东当时作过这样的预测：

"希特勒面前遇着的，是三个强大敌人：苏联、英美及其占领区的老百姓。在东线，是屹立不动的红军壁垒和整个第二冬季以及连续下去的红军反攻，这是整个战争和人类命运的决定的力量。在西线，即使英美还采取观望和拖延的政策，但等到有死老虎可打的时候，第二条战线总是要建立的。希特勒还有一个内部战线，就是德国、法国及欧洲其他部分正在酝酿着的一个伟大的人民起义，只待苏联举行全面反攻和第二条战线炮响，他们将以第三条战线出来响应。这样，三条战线夹击希特勒，就将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的伟大历史过程。"③

后来欧洲战局的发展，确实证明了毛泽东的预测和分析是正确的。

---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第886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第889页。

先看东线苏德战场的进展情况。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取得胜利后，立即乘胜扩大战果，于七月在库尔斯克再次告捷，为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冬季大反攻打下了基础。在冬季的反攻中，苏军解放了敖德萨和克里米亚，越过普特河，苏德战场上的战线开始西移。一九四四年一月起，苏军进入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进而越过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以前的苏波边界。三月二十九日，苏军攻占了比萨拉比亚；八月三十一日抵达华沙附近的维斯瓦河。苏联红军在向西挺进的过程中于九月至十月先后与罗马尼亚、芬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签订了和约。一九四五年一月，苏联军队从维斯瓦河再次发动猛烈的攻势，攻占华沙，直捣奥得河。苏军进入波兰后继续向德国本土进攻，二月进入德境，距离柏林只有一百英里之遥。苏联红军四月十三日克维也纳，三十日下午三时半开始进攻柏林，五月二日占领柏林。在这期间，南斯拉夫也从法西斯的占领下解放出来；苏联红军解放了捷克东部，并于五月九日解放了布拉格。

再看西线英美反希特勒战线的情况。一九四二年十月，英国军队在埃及阿拉曼战役中取得胜利；十一月初，美国和英国联军在阿尔及利亚奥兰登陆，至一九四三年五月西方盟国的军队控制了北非海岸。这时大体相当于苏德战场上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时期。美国著名外交官查里斯·波伦描写当时东西线战况时说："在我就任俄国处处长不久，事情发展很快。盟国的军事局势有了光明的前途，因为第一，美英在北非的战役中取得了胜利；第二，苏联在斯大林格勒重创德军；第三，俄国人随即在库尔斯克的主要战役中粉碎了德军的反抗，只是这次战役世人知者不多。"① 美国和英国军队在控制北非海岸后便向意大利进军。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美英军队登陆西西里岛；七月二十五日，意大利发生政变，墨索里尼被捕，巴多里奥政府成立。九月三日，美

① 查里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年》，纽约1973年，第126—127页。

英军队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八日，意大利向英美联军投降，意大利法西斯覆灭。第二年六月四日，美英军队进入罗马。六月六日，美英法军队在诺曼底登陆，在西欧开辟了酝酿已久的第二战场；八月十五日，法国和美国军队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登陆；同年八月二十五日，巴黎宣告解放；九月上旬，解放比利时，冬季解放荷兰南部，法军攻入阿尔萨斯。一九四五年在苏军向柏林挺进的同时，美、英、法军队先后打入德境，三月初抵莱茵河；三月底、四月初，美国军队进入德国重工业区鲁尔地区，很快拿下法兰克福，直逼靠近威悉河畔的卡塞尔和帕德博恩。德国军队在西线迅速瓦解。反法西斯盟军的东西两线日益接近合拢。美国和苏联军队最后于四月二十五日在易北河托尔高会师，英国军队和苏联军队也在卢卑克附近会师。

苏联红军于五月二日攻克柏林后，德国军队最高统帅部于五月四日命令所有在德国西部和北部、丹麦和荷兰境内的德国军队向英国和美国投降；五日，奥意边境和德国南部的德军也向英美军队投降；八日，德国元帅凯特尔等三名陆、海、空将领，由邓尼兹授权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到柏林城郊的卡尔霍斯特苏军总司令部，在苏、美、英、法四国代表面前签署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书"。至此，欧洲战场上的战争基本结束。

在回顾苏、美、英、法反法西斯盟国对德、意法西斯共同作战的大致过程时，我们不应该忽略战争后期反法西斯盟国间的复杂关系：主要是美英和苏联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交织着丘吉尔所说的西方盟国内部所谓"侧重点上的分歧"。[①] 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对于战争的进程，乃至战后欧洲的安排，都有其影响。下面围绕三个问题回溯一下欧战后期的盟国关系。这三个问题是：（一）关于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二）在意大利境

---

①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十二：胜利和悲剧》，1964年伦敦版，第122页。

内的德军试探向美英单独媾和；（三）在战争临近结束时，丘吉尔力主西方抢占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

第一，关于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从前面的叙述已经可以看出，当苏德战场上战火正酣的时候，美英并没有把主要力量摆在欧洲，苏联在欧洲几乎独力支撑着战局，英美只是对德国进行了空袭轰炸。因此，苏联切望英美早日在西欧大陆对希特勒发起进攻，以便和苏联军队对希特勒形成东西夹击之势，从而减轻苏联承担的军事压力。但是，美国和英国的表现是十分迟疑的：它们一方面不能放弃西欧大陆，在西欧登陆是必定要做的；另一方面又以各自的理由观望、拖延，不想在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开辟第二战场。对美国来说，自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以来，它必须在太平洋战区保持相当大的兵力，在这个时期接连进行了几个大战役，这不能不影响它在西方战场上的决策和部署。而在丘吉尔的脑子里，从意大利到地中海以东，直至巴尔干这条战线占据着很大地位，因而对“横渡海峡”表现不积极。横渡英吉利海峡需要相当的人力和物力准备，要有较大的伤亡。丘吉尔认为，在法国北部的登陆可以缓一缓，但意大利和巴尔干一线则要在北非战役以后抓紧，因为，这关系到西方盟国（当然首先是英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西方在东南欧占一席地，就可以保证“西方力量——而不是俄国力量——成为南欧和中欧（特别是希腊、南斯拉夫、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的解放者和占领者”①，从而增加西方日后同苏联争斗的筹码。对于丘吉尔的这种想法，罗斯福本来也是赞同的，但是罗斯福不能不看到，开辟“第二战场”，关系到战略大局，也涉及能否争取苏联早日参加对日战争，势在必行；因此认为，西方在地中海以东只能卷入一定程度，力求不致影响终归必须进行的“横渡海峡”。

---

① 赫伯特·费斯：《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他们进行的战争和探求的和平》，普林斯顿1957年版，第262页。

几经磋商，美国和英国最后确定了一个折中的登陆日期，即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左右，这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一九四三年魁北克会议上才定下来的。

斯大林则一直认为，美英应该尽可能早地开辟“第二战场”，如一九四二年或一九四三年，以便更有效地配合苏德战场的军事行动。所以斯大林对于美英的迟疑不决多次表示了强烈不满，并且主张，西方盟军应同时从法国南部登陆，以对西欧之敌予以南北夹击。斯大林还指出，美英在北非攻势稽迟，已经牵延了时日，致使苏联负担加重，付出了很大代价①。

罗斯福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德黑兰三国首脑会议上，终于以他和丘吉尔两人的名义正式通知斯大林，“横渡海峡”战役计划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付诸实施，不过仍然说，美英在开始这个战役之前还要在地中海作战，所以大规模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也许还会推迟一个月、二个月或三个月②，地中海作战行动的目标可能是“意大利、亚得里亚海、爱琴海和土耳其”③；而且“打算在亚得里亚海的顶端采取一次可能的军事行动，以便同铁托领导下的游击队会合，然后向东北推进到罗马尼亚，同从敖德萨地区前进的苏军会合”④。罗斯福这些话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丘吉尔十分坚持的主张。但是，西方的打算没有实现，战争的进程没有给美国和英国以深入巴尔干的机会，因为在苏联红军对法西斯德国的战略反攻中，东南欧大部地区都处于苏联军队的军事行动范围之内，已是势所必至了。

第二，在意大利的德国法西斯军队试探与美英单独媾和。一九四四年末，战局更加紧张了，对希特勒的东西夹击之势已经形成，希特勒已是瓮中之鳖，法西斯德国的覆灭已指日可待。在这种关键时刻，苏联和英美任何一方的举动都会引起另一方的注意

---

① 《罗斯福和丘吉尔战时秘密通信集》，纽约，第321—322页。

②③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5页。

④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0页。

和警觉。

例如，一九四四年冬季，苏联红军在北线截断德军退路，使其背向波罗的海；在南线贝尔格莱德解放后，苏军向多瑙河进发，陈大军于波兰中央一线，这时苏军突然引而不发，没有连续进攻。这种情况曾使西方感到疑惑不解。艾森豪威尔十二月二十一日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希特勒似有把东线兵力西移迹象，应该尽快弄清苏联的“战略和策略意向”①。丘吉尔二十三日电罗斯福，说他与艾森豪威尔有同感，主张派人去莫斯科了解情况②。间日，罗斯福通电斯大林，提出将于近日派高级军官去苏③，艾森豪威尔的代表、空军元帅泰德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去莫斯科面见斯大林，斯大林保证苏联红军将保持攻势，绝不使德国转移兵力，美国这才松了一口气④。事实上，苏联红军已于一月十三日发动了冬季攻势。

在这之后不久，德国在意大利的党卫军首脑卡尔·沃尔夫将军试探单方面向美英投降一事，又使苏联焦灼不宁，以至在苏联和美英之间出现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九四五年三月，沃尔夫派出的代表同美国战略情报局在瑞士的代理人进行了秘密接触；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头子艾伦·杜勒斯马上向美英政府以及西方盟军驻意总司令部作了报告。负责意大利战区统帅亚历山大（英国）随即派了副参谋长莱姆尼茨（美国）和参谋长助理艾瑞（英国）到瑞士与沃尔夫晤面。美国和英国通过各自的驻苏大使向苏联通报了这件事；但美英方面表示，在投降问题谈妥后苏联可以派人参加受降，但不打算让苏联插手谈判。苏联的反应当然是迅速而强烈的，坚持德国必须无条件全面投降的原则，坚决反对单独媾

① 《罗斯福和丘吉尔战时秘密通信集》，第636页。

② 《罗斯福和丘吉尔战时秘密通信集》，第636—637页。

③ 赫伯特·费斯：《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他们进行的战争和探求的和平》，第480页。

④ 赫伯特·费斯：《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他们进行的战争和探求的和平》，第482页。

和；早在一九四三年十月英、美、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上就曾相互作出保证，任何一方都不得单独与三国的共同敌人谈判和平。美英和苏联领导人函电来往，气氛紧张。莫洛托夫写信给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要求立即停止同德军的谈判，怀疑美英正同德国进行某种秘密交易。斯大林在三月二十九日给罗斯福的信中指出，德国正以谈判为烟幕，捉弄盟国，事实上在谈判进行当中，法西斯德国已把三个师的兵力从西线调到苏德战场①。斯大林四月三日给罗斯福写了一封措词更加强硬的信，说根据苏联得到的情报，美、英、德在瑞士的谈判已经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德军将为美英东进让出一条通路，美英则答应对德放宽投降条件。斯大林还指出，事实上西线德军已停止对美英作战，但东线的战争却一直在进行。罗斯福和丘吉尔分别给斯大林回信，一再解释，说只有一些接触，否认进行过任何这类谈判，更无违反德国必须全面无条件投降之意；如果真的要同德国谈判，苏联一定会被邀请参加；至于苏联得到的情报，罗斯福说更是子虚乌有；说当胜利在望之际苏联对英美如此缺乏信任，真是"历史的莫大悲剧"云云。②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法西斯单独媾和的企图就此告吹了。

后来杜鲁门追述说："为了避免与俄国人发生进一步摩擦，在丘吉尔的敦促下，盟军在意大利的司令亚历山大陆军元帅接到训令停止谈判。我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指令瑞士的战略情报局停止与德国人接触。"③

这些活动不能说不是谈判；虽然没有搞出什么具体结果，但是发生在欧洲战场结束战斗的两个月以前，不能不对苏联和美英

---

① 赫伯特·费斯：《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他们进行的战争和探求的和平》，第583—590页。

②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十二：胜利和悲剧》，1964年伦敦版，第100—113页。

③ 《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中译本，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11页。

之间的关系增加一层厚厚的阴影。在战争结束前夕，希姆莱再次试探单独向英美投降，企图挑拨苏联和美英的关系，美国和英国干脆拒绝了。

第三，在战争临近结束时，丘吉尔力主西方抢先攻占柏林、维也纳、布拉格。丘吉尔说，当联合起来进行的战争越是临近最后关头，就越要考虑政治因素，① 说由于德国军事力量行将被摧毁，结成联盟关系的唯一依据马上就要消失，苏联和西方盟国的关系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② 为此，双方都竭力争取在对自己有利的地方把战争停下来。

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以后总结出了几个“在战略和政策上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其中有：苏联已变成“自由世界的一个致命危险”；西方应立即为抵制苏联“向前推进”建立一条“新的战线”；这条战线应该尽可能地向东靠；柏林应该是英美联军的“首要的和真正的目标”，美军进入布拉格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方在奥地利的权益至少应与苏联相等，等等。③ 这些意见从实质上看，与后来丘吉尔一九四六年三月发表的著名的反苏反共演说——富尔敦演说——是完全一致的。丘吉尔就这个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电报给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还抱怨艾森豪威尔在跨过莱茵河、攻克鲁尔区以后，不应该分兵南下沿卡塞尔，莱比锡至德累斯顿对付南德之敌，而应集中兵力，直接东跨易北河，抢在苏联的前头占领柏林。

战局进入四月份，苏联军队和美英军队越来越接近了：苏联红军于四月十三日从东到南控制了维也纳，并沿多瑙河向林茨挺进；美军打到了莱比锡，于四月十九日进入捷克境内。四月二十五日，苏军以强大兵力包围了柏林，同一天，美军前头部队从莱比锡抵易北河西岸托尔高与苏军会师，德国被切成了两半，德军

---

①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十二：胜利和悲剧》，第114页。
②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十二：胜利和悲剧》，第115页。
③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十二：胜利和悲剧》，第115页。

土崩瓦解。

柏林被苏联红军攻克后，德境战局即基本结束。在奥地利境内，美军于五月五日沿多瑙河南下临近林茨与苏军会师。

在捷克境内，苏军和美军也日益靠拢。五月初，美军开到比尔森一带。四月三十日，丘吉尔打电报给杜鲁门，说美军如占领布拉格和捷克西部尽可能多的领土，就可以使捷克的战后局势"完全改观"，还可以影响捷克的"邻近各国"①。五月七日，丘吉尔再次电促艾森豪威尔进军布拉格②。但是，艾森豪威尔还是按原订计划在易北河以西停下来，进入捷境的美军也大体停在比尔森一带，大约相当于一九三七年时的捷克边界。五月九日，苏联红军解放了布拉格，两天后捷克政府全面投降。

对于美军是否应该抢先攻入柏林和布拉格，本来美英间并无实质性分歧。例如美国国务院也曾觉得如果美军逼近流经布拉格的乌尔塔瓦河，西方在奥地利占领区问题和捷克战后安排问题上就可以取得比较有利的地位③，可以加强西方同苏联谈判的资本。但是，美国同时却不得不考虑战争的全局，特别是希望苏联在对德作战结束后如约出兵远东，对日宣战，所以终于没有接受丘吉尔的意见。苏联对于美军在捷克的动向也十分敏感，及时警告美军不得再向东进。④

杜鲁门在回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说："丘吉尔经常催促我们尽可能在欧洲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他希望在欧洲大陆上尽可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以便与俄国的大量军队相抗衡。然而，我们必须考虑到，在击败德国之后还有日本存在。要使日本投降，那就需要把许多军队调到太平洋地区去。不错，我同意丘吉尔所说

①②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十二：胜利和悲剧》，第158页。

③ 赫伯特·费斯：《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他们进行的战争和探求的和平》，第610页。

④ 赫伯特·费斯：《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他们进行的战争和探求的和平》，第611页。

的，占领柏林、布拉格和维也纳是一件称心的事，但事实是，这些城市，正如东欧的国家一样，是在俄国的控制之下或行将落入它的控制之中。”①他还说：“我体会到丘吉尔的意思，并且完全同意他对未来问题的看法。但是在方法上，我不能跟着他走。”②美国当时只好不去作那件“称心的事”，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日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杜鲁门的信中又重提了这段经历，也证明了美国因有求于苏联而与英国有不同的考虑。艾奇逊说：“由于与苏联的战时合作及代价高昂的对日战争，遂产生了雅尔塔协定。美国政府与人民都以异常焦灼的心情，等待对日本本土的攻击，这场攻击恐怕得以死伤达一百万美国兵员的代价，才可以把日本征服。那时原子弹还不是事实，若不进行这样的进攻，远东战争似无结束的可能。所以，如何使苏联能早日及时参加对日之战，便成了美国政府当务之急了；因为这样才可以使满洲的日军不致在战争严重关头，调回日本本土。”③

自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德黑兰三国首脑会议起，美国一直希望苏联在对德作战结束后早日出兵亚洲，这在战时美国的对苏政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当太平洋战争吃紧、美国军队面临重大牺牲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所以，杜鲁门决定不在欧洲刺激苏联，而命令在德、奥、捷境内的美军退回到三方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已经达成协议的占领区去。④具体地说，从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起，美英军队开始撤离德国境内的苏占区，苏联军队进驻莱比锡、魏玛、埃尔富特等城市。同时，美、英、法军队进驻柏林西部各自的占领区。当然使盟国产生摩擦的问题并不止此，这里只

---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129页。
② 《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130页。
③ 《中国白皮书——1949年8月》，斯坦弗德大学出版，1967年，第VIII页。
④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十二：胜利和悲剧》，第165页。

谈及与当时战局关系直接有联系的问题。

总括前面所说的，不外是两个问题。第一，从战争后期形势总趋向看，战后欧洲的东西对峙局面在战争进行当中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浮现出来了；欧洲的一分为二，是大势使然。丘吉尔说，一个战后的欧洲正在战争当中形成。① 阿登纳也说："西欧……和东欧截然分开，这是一个事实。"② 从此，欧洲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第二，由于种种交错复杂的因素，战后欧洲东、西对峙的形势图只能这样来勾勒：欧洲的东西两半，谁也不可能从战争结束时形成的这条接壤线向前推进一步或后退一步，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正象恩格斯给约·布洛赫的信中说的："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③

反法西斯盟国打败德意法西斯，在欧洲现代史中，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大事；它使战后的欧洲格局发生了与战前完全不同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各种因素的相互冲突、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将继续按照事物的历史辩证法，影响和推动战后欧洲的局势。战后的欧洲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

①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十一：胜利的潮汐》，第63页。
② 《阿登纳回忆录》一，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7页。

· 第二章 ·

战后德国

弗朗索瓦·密特朗在谈到德国在欧洲的地位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欧洲的形成和解体都是围绕着德国进行的。"① 意思是说，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起，德国在欧洲这个群雄并立的大舞台上，一直是主角之一；德意志民族无论处于分裂状态，或是成为统一的帝国，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当时的欧洲国际关系。进入本世纪以来，欧洲在头五十年内两次遭到起于德国的战祸。所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的时候，反法西斯盟国首先考虑的便是怎样处置这个战败者，怎样剥夺德国侵略势力再次肆虐的条件。

战后的德国问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随着战后形势的发展，处于欧洲心脏地区、曾是东西方反法西斯武装力量碰面会师的前沿地区的德国，很快就人为地、但也是必然地分成两个国家。若干年后，两个德国分别加入了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于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其特殊敏感的

① 弗朗索瓦·密特朗：《稻草和谷粒》，法国普隆出版社，第182页。

战略地位牵动着欧洲局势的每一根神经，成为东西方政治斗争的焦点地区。

（一）四国占领

实际上，从欧战开始之日起，对于战后欧洲的安排就已经开始酝酿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英国的安东尼·艾登出任丘吉尔内阁外交大臣，他在访问苏联时，斯大林曾对他说，波兰的版图应当以德国为代价向西移动，其它被希特勒占领的国家应当恢复它们原来的边界；奥地利应该恢复，莱茵兰、乃至巴伐利亚，也应该从德国分割出来。这是肢解德国的最早的议论。艾登当时表示英国对于分割德国的问题原则上不持异议。① 丘吉尔很快就把斯大林同艾登的谈话通报给了罗斯福。从那时起，作为反法西斯主要盟国——苏联、美国、英国——便已酝酿战后德国的安排问题。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在整个一九四二年都在研究分割德国的种种方案。一九四三年三月，艾登访问华盛顿的时候，罗斯福已有了一些十分笼统的想法。②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举行三国外长会议，为即将在德黑兰举行的三国首脑会议作准备。在这次三国外长会议上，赫尔提出了九点原则方案，其中重要的有：（１）德国应当全面无条件投降；（２）德国应当接受英国、苏联和美国的军事占领；（３）所有纳粹分子应当从德国政府中清除出去；（４）德国政府应当释放所有政治犯，把所有被指控为战争罪犯的人移交给联合国家；（５）德国武装部队应予解除武装，等

① 《艾登回忆录·清算》，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05页。

② 约翰·贝克：《分裂德国的决策》，1978年版，第19页。

等。① 莫洛托夫和艾登表示同意这些原则。艾登建议成立由三国代表组成一个“欧洲咨询委员会”，常设班子设在伦敦，任务是研究法西斯德国及其附庸国的投降条件，并向三国政府提出分割德国的具体建议。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在德黑兰举行首次首脑会议。在德国问题上，三国领导人一致的意见是，绝对不允许德国再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国家。罗斯福说可以把德国分成五个自治地区，即：东普鲁士、汉诺威和德国西北地区，萨克森和莱比锡地区，里森、达姆施塔特、卡塞尔和莱茵以南地区，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地区。另外两块地区：基尔运河地区、不来梅、汉堡和卢卑克另外形成一种自由贸易区，置于国际共管之下；鲁尔和萨尔交付国际托管。丘吉尔也提出了一个方案：普鲁士从德国分离出来，德国南部各邦如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等纳入所谓多瑙河联邦。斯大林没有提出具体方案，但不赞成把德国的任何一个部分纳入一个大的联邦当中，因为这会给德国以控制这个联邦、以图东山再起的机会②。在德黑兰会议上，三国领导人只一般地交换了意见，确定了分割的原则主张；至于如何分割和占领，在当时的条件下还不可能很具体，会议决定由欧洲咨询委员会进一步研究。

成立欧洲咨询委员会是英国提出来的，本意是把它搞成一个很有权威性的、研究一切三国有共同兴趣的欧洲问题的独立机构，借以提高英国在欧洲问题、尤其是在德国问题上的发言权。英国派了外交部次长威廉·斯特朗作英方代表，艾登自己也经常过问其事。但是美国认为咨询委员会不能讨论包罗万象的问题，

---

① 赫伯特·费斯：《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他们进行的战争和探求的和平》，第220—221页。

② 赫伯特·费斯：《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他们进行的战争和探求的和平》，第274页。

只能限于就德国问题提出建议。罗斯福甚至曾经认为用不着搞这样一个机构。美国和苏联都只派了各自驻英大使怀南特和古谢夫当代表。据当时担任了一段美国代表团顾问的乔治·凯南的回忆，美国政府对这个委员会的工作确实不怎么热心。英国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四日的第一次委员会会议上就提出了一个分割德国的方案。苏联在十八日做出了反应，在东西分界上大体与英国意见差不多。而美国国务院却在几个月内没有片言只字指示自己的代表团，使在伦敦的美国代表感到十分尴尬①。

美国为什么迟迟不对英国方案表态呢？

英国的方案是，从波罗的海的卢卑克南下，占全德领土的百分之四十，人口百分之三十六和生产资源的百分之三十五的东部地区属于苏占区，即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湾、勃兰登堡、萨克森—安哈特、图林根及其以东地区，大体上相当于今日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版图。以西属于英美占领区（当时法国占领区还没有提上日程）。

对于这个东西分界，美国本来是有自己的算盘的。据说，罗斯福在从开罗去德黑兰的途中曾经顺手在一只旧信封上画了一个草图，把东西界线划得比英国后来提出的方案向东移过去一大块，按照这张草图，只美国占领区便将占整个德国的百分之四十六，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一，这在苏联是不可能接受的。这个罗斯福信手画的草图曾被当时美国官员认为是总统的决策意图，但由于它没有形成政府的指示，所以美国代表团没有在咨询委员会上提出。后来又拖延了一些时候，直到5月1日，美国国务院才指示怀南特同意了英国提出的东西分界方案。

此外，美国对于英国方案中关于西方占领区内英、美两个占领区的划分问题，也有保留意见。

根据英国的方案，德国的西北部地区，包括重工业区鲁尔和

---

① 乔治·凯南，《回忆录1925—1950》，第164、166页。

基尔海湾，属英国占领区；德国的南部地区，包括与法国、瑞士、奥地利接壤地区，属美国占领区。但美国想要的却正好是德国的西北地区，因为按照英国的方案，美国就被排除在鲁尔之外，而且美国占领军不能与北海保持直接交通联系。当时罗斯福正在盘算着同英国交换占领区的问题①。后来经过英美双方的磋商，美国作了让步，基本接受了英国的方案。英、美、苏三国代表于一九四四年九月拟定并签署了“关于德国占领区和大柏林管制的议定书”，作为欧洲咨询委员会提交三国政府的关于“德国无条件投降书”报告的一个附件。议定书划定了苏联、美国和英国的占领区，地处苏联占领区的大柏林市也划分为三个占领区。

一九四五年二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去雅尔塔途中举行马耳他会议，商定在拟定的西方占领区的基础上作两点调整：（1）把萨尔和法尔茨靠近法国边界的莱茵河左岸划归英占区，黑森—卡塞尔划归美占领区；（2）美国占领军有权通过英占区和使用不来梅等港口。这就满足了美国的要求。

一九四五年二月五日，美苏英三国领导人在雅尔塔会议上通过了欧洲咨询委员会关于德国占领区划分和大柏林管制的方案。雅尔塔会议通过的议定书关于《德国无条件投降书》中“分割德国”一条写道：

“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对德国拥有最高权力。为行使此种权力，他们将采取这些步骤，包括完全解除武装、非军事化和分割德国，因为他们认为，此乃未来和平与安全之所必需。”

议定书规定，关于分割的程序将由艾登、怀南特和古谢夫组成分割委员会研究，并决定邀请法国参加占领，并规定“该地区将从英国和美国占领区中划出，其范围由英、美同法兰西临时政

---

① 乔治·凯南：《回忆录1925—1950》，第171页。

府协商决定"①。

对于德国的分割和占领以及对地处德国东区的柏林的分割和占领，到雅尔塔会议就基本上定下来了。不管西方占领区内部怎样划分以及西方盟国之间有何分歧，东、西德的界线的划定，由于基本上是以战争后期东西方军事行动的进展情况为依据的，反而没有费很大周折。从此，东、西德形成面面相对之势；东德领土内的东、西柏林也形成面面相对之势。在欧洲心脏部位，出现了欧洲历史上空前复杂和充满尖锐矛盾和斗争的局面。

（二）法国的方案

法国对于战败的德国，除了要求参加盟国的占领之外，还有自己特殊的顾虑和想法。集中到一点就是害怕德国"死而复生"。自从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起到一九四五年，在短短七十五年间，法国和德国之间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战争。普法战争只打了六个月（一八七〇年七月十九日至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普鲁士军队便侵占了法国领土的三分之一，迫使梯也尔签订了城下之盟，法国被迫割地赔款，《法兰克福和约》使普鲁士拿走了法国的阿尔萨斯全部和洛林的一部，掠走了五十亿法朗的赔款。四十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作为战胜国从德国手里收回了失地，但在战火中却遭到了比普法战争更加严酷的蹂躏。再过了二十多年，法国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就沦亡在希特勒法西斯的魔掌里，在法国国土上出现了背叛祖国的维希政权。戴高乐在国外领导了"自由法兰西"和"战斗的法兰西"的抗敌武装斗争，国内也展开了如火如荼的地下抵抗运动和武装斗争。法国在被占领的情况下蒙受了亡国之痛，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法国的贡比涅森林曾是法德

---

① 英文文本参阅《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普林斯顿，1948年版，第八卷，第921页。

在本世纪两次交战的见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元帅福煦在这里的行军车上接受了德国的降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法西斯德国则把贡比涅建成了一座转运法国"政治犯"的集中营。

所以，法国认为，在怎样处置战败后的德国问题上法国是最有发言权的。戴高乐在战争后期，尤其是在法国临时政府期间，不止一次地强调法国参与世界大国解决德国问题的主张。戴高乐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二日在夏乐宫发表演说强调说，在讨论德国命运的时候，不能没有法国参加，因为自从两千多年以来，没有哪个国家比法国更加对德国的形势感到利害攸关。他说："把主要当事人撇在一边去搞无论什么事情都是徒劳的。"他说没有法国参加而决定任何有关欧洲的事情，都会酿成大错①。

法国对于处置德国的主张，简言之就是经济上高赔偿和政治上分割或肢解，使德国不可能再形成统一的整体，限制它的工业发展水平，剥夺它足以发动战争的实力基础。

概括起来说，法国的方案的基本点就是：分离莱茵兰，鲁尔地区实行国际共管，萨尔经济上与法国合并、政治上与法国保持特殊联系。这三个问题是法国在战后一段时间内抓住不放的问题，戴高乐主持临时政府期间坚持的是这些立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成立后，皮杜尔、舒曼在四国外长会议上坚持的也是这些立场。核心是保持德国的被分割和被占领状态。所以当美英提出西方占领区在经济上合并以及成立西德地区的政府机构等建议时，法国都持反对和抵制的态度。这种情况虽然在一九四七年"马歇尔计划"以后开始逐渐地有所变化，法国的立场在德国问题上开始向美英靠拢，但是西方盟国仍时有不谐之音。

为什么法国在战后特别重视莱茵兰、鲁尔、萨尔问题的处理，如果得不到有利于法国的解决，就不能释然呢？因为，这三个地区与法国本身的利益是直接相关的。

---

①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拯救》，普隆出版社，1959年版，第355页。

所谓莱茵兰地区，泛指莱茵河左岸以西地区，战略地位重要，物资丰富。戴高乐曾说，这里是德国侵入其西方邻国的必由通路①，实为德法历来冲突必争之地。普法战争期间德法双方军队都集中在莱茵兰；开始时法国军队侵入德境和后来普鲁士军队侵入阿尔萨斯都通过莱茵兰。所以戴高乐曾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十日，对伦敦《泰晤士报》驻巴黎记者提出，莱茵兰需永远脱离德国，交由法国、英国、比利时和荷兰四国共同监督，要使那里的居民认识到，"他们的未来不在德国"。莱茵河也应国际化，以利于"西欧的合作"②。他还认为，在若干世纪曾分成几个地区的莱茵兰应保持各自文化上的独立性，而后每一地区可逐渐恢复其自治地位③。但是，法国的这个意见一直没有得到美英的支持，法国终于在一九四八年美、英、法、荷、比、卢西方六国讨论建立西德国家的伦敦会议上放弃了这个主张。

鲁尔区在西德中部，主要部分在莱茵河右岸支流鲁尔河下游和利珀河中下游之间，属今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包括科隆和波恩。

鲁尔当时是世界最大军事工业区之一，从十九世纪中叶起，鲁尔就已成为德国的重要工业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里集中了德国煤钢生产的三分之二，是德国大垄断资本如克虏伯、曼内斯曼等大康采恩的集中地区，被视为"德国工业的心脏"，法西斯德国的强大军事工业主要依靠鲁尔，所以在战争期间，鲁尔区成为"纳粹的兵工厂"。直到今天，鲁尔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工业集中地区之一。

由于鲁尔具有如此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地位，因此战争结束时各反法西斯盟国在讨论战后德国的安排时自然便集注意力于鲁尔。从理论上说，如果要使德国法西斯不再死灰复燃，就非剥夺

---

①②③ 夏尔·戴高乐，《战争期间演讲通信集》，普隆出版社1970年版，第656、657页。

它的经济命脉不可；从实际利益上讲，集中了象埃森、杜塞尔多夫、多特蒙德等这样成群的工业重镇的地区，加上莱茵河航行运输之利，自然是非常之有吸引力的。美国、英国和苏联三国首脑曾在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期间讨论过把鲁尔从德国分离出去单独成立一个“政治实体”，置于国际管制之下的计划；在讨论波茨坦议定书草稿时，苏联还提过国际管制鲁尔的意见。但是，德国的占领区划分方案已经为三国原则通过，鲁尔划入英占区，苏联的意见就不予考虑了。至于美国觊觎鲁尔的利益，便属于英美之间的交易问题。到美英双占区合并后，鲁尔煤钢工业实际上由美国接管。

法国则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坚持戴高乐关于鲁尔“国际化”的主张，直到一九四七年四国外长会议上，法国外长皮杜尔还主张对鲁尔的工矿业尽早实行共管，并坚持“即使在占领期间”也应实行国际共管。皮杜尔说，鲁尔地区具有欧洲其它地区所没有的特点，因为它在有限的面积上密集了那么多的工矿资源，换言之，这等于是一种相当大的“战争潜力”，所以必须对之实施“某种特殊的经济和政治体制”①。

鲁尔问题后来仍然是西方有关国家讨论的问题，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美、英、法、比、荷、卢六国在伦敦就鲁尔问题达成协议，发表了鲁尔问题法规，宣布设立鲁尔问题国际管制机构；第二年四月，六国协议成立了鲁尔国际管制局。一九五一年，法国提出舒曼计划，签署了“欧洲煤钢联营集团”条约，鲁尔法规才失去了实际意义，国际管制局也宣告解散。至此鲁尔问题才告结束。

萨尔问题是法国同样关心的问题，它在历史上长期是法、德垄断资本集团争夺的对象。

萨尔位于德国西南部，西靠卢森堡，南与法国毗邻，今天是

① 〔法〕《世界报》，1947年3月22日。

联邦德国的一个州。萨尔地多丘陵，资源丰富，是著名的煤钢产地，煤的储藏量和产量都占联邦德国第二位，利用从法国洛林和卢森堡进口的铁，发展了钢铁和机械工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曾规定萨尔由国际联盟托管十五年，实际上由法国占领。一九三五年，希特勒凭借武力，以"全民投票"方式夺回了萨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坚持要合并萨尔，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用关税壁垒办法把萨尔和法国的其它占领区分开，把萨尔看作与法国保持政治上和经济上一体的特殊地位，不单纯是一个被占领区。对此，美国和英国为了争取法国在西方占领区合并、同苏联对抗，采取了容忍迁就的态度。一九四七年，美英同意把萨尔的煤矿开采权给予法国；一九四八年一月，法国政府承认萨尔自治，任命了法国的高级特派员；同年二月，美、英、法签署协议，把萨尔的经济合并于法国。萨尔实际上成了西德领土上的"国中之国"，因此，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后，萨尔问题便成为法德之间长期的争议问题。（直到一九五九年七月，萨尔才正式归属联邦德国。）

法国对德国的态度特别严厉，既有两个比邻民族传统历史上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利害因素；这些情况是美国所感受不到的。英国虽然是欧洲国家，但它同德国的利害冲突不如法国那样直接，在战争期间也不及法国受害之深，英国在战争结束时的自我感觉还是一个"世界大国"，眼睛看的首先是怎样发展东西方关系。所以英国和美国在战后很快就明确把德国问题从属于同苏联抗衡的战略，不赞成法国和苏联的高赔偿政策。认为把德国搞"穷"了，从战略上是失算的，而且一个穷困的被占领的德国反会给占领者带来负担。丘吉尔早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在下院就说过，象英国这样的"小岛"尚且需要进口粮食，怎么能够设想对占领区人民的生活作出贡献呢？① 美国放弃把德国变成"农

① 丘吉尔：《演讲全集》第七卷，1974年纽约版，第7217页。

业”地区的“摩床索计划”，也是出自这种考虑。

阿登纳对于法国的态度更加不以为然，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法国战后初期的对德政策时常啧有烦言，认为法国害怕联邦德国重新强大起来。要求采取肢解德国的政策，是完全没有根据的。①

当然，法国的对德政策在一九四七年以后便逐渐有所调整，随着形势的发展，法国和西德的关系也有不同于战后初期的发展，而有新的时代特点。

（三）分道扬镳

德国法西斯全面无条件投降以后，苏联、美国、英国三国首脑在波茨坦会议上决定设立“外长会议”，其秘书处设在伦敦。每个国家的外交部长由一名高级助理及少数技术顾问随同参加会议，高级助理在外长缺席时执行会议工作。外长会议在德国方面的任务是“负责准备对德和约，待符合此项目的之德国政府成立时，由该政府予以接受”。波茨坦会议通过的公报和议定书，还就战后德国的经济原则和政治原则，战争赔偿等问题作了许多繁琐的规定。

直到两个德国成立之前，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确实根据波茨坦会议的决定开过好几次，②只是越来越谈不拢，每次会议都以失败而中断。美、英认为，根据波茨坦会议的精神，首先应该实现各占领区的“经济统一”，他们认为，英占区拥有全德百分之三十的人口，百分之七十五的硬煤蕴藏量和钢产量，但是非常缺少粮食；苏占区生产粮食，但钢铁工业需要英占区提供

---

① 《阿登纳回忆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3页。

② 几次外长会议是：伦敦外长会议（1945年9月11日—10月2日），巴黎外长会议（1946年4月25日—7月12日），莫斯科外长会议（1947年3月10日—4月24日），伦敦外长会议（1947年11月25日—12月25日），巴黎外长会议（1949年5月23日—6月20日）。

原料和半成品；美占区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工业多数是轻工业，也缺少粮食；法占区（包括萨尔区）一般可生产百分之十七的硬煤和百分之十二的钢，只拥有全德人口和战前德国资源的百分之十。所以，如果不实现各占领区的“经济统一”，各占领区的经济情况都将产生严重问题①。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巴黎四国外长会议上提出建立德国管理机构，把四个占领区作为“一个经济单位”进行管理，以便在占领区之间“交流食品、交通乃至思想”②。针对美国关于“经济统一”的建议，苏联则提出必须首先建立全德中央政府，认为只有先实现德国的“政治统一”，才有可能解决其它问题。在战争赔偿问题上，苏联坚持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的对苏赔偿费一百亿美元，美国则说后来波茨坦会议上没有再规定赔偿数额，波茨坦会议已取代了雅尔塔会议，原议赔偿费二百亿美元（其中一半归苏联）不再成立。一九四六年五月，美国占领区副军事长官克莱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公然宣布将不再从美占区向苏联提供一切赔偿③，这自然是违反波茨坦会议关于“苏联除在苏占区获得赔偿外，尚可自西部占领区取得赔偿”的条款的④。美国在战后已决定从限制德国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所谓“摩根索计划”转变为把战败的德国迅速扶植起来的政策，英国也持同样主张，指责苏联有意通过索取高额战争赔偿把德国彻底搞垮。法国则专注于鲁尔、萨尔等问题，对这些争端表态不多；在高赔偿问题上，法苏的调子每每相通。

但是，德国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会议桌上，会议上无论怎样讨论，提出什么方案，都掩盖不住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即然德国分成了几个占领区，就必然会形成几个不同的政治、经

---

①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八卷，1948年版，第187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八卷，1948年版，第209页。
③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八卷，第188页。
④ 《国际条约集》（1945—1947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第78—93页。

济实体；而西方几个占领区的合并，首先是英美两个占领区的合并，从占领区存在之日起就已开始酝酿了。就象克莱说的，"德国的政治重建"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西方各占领区内建立起各自的"政治生活"；第二阶段是美英双占区的建立；第三阶段是西德政府的建立，三个占领区合而为一。①

西方对战后德国的政策，是同整个形势的发展分不开的。一般论者都把丘吉尔一九四六年三月富尔敦讲话作为英美对苏联持对抗态度的起点，丘吉尔发表这篇反苏反共的讲话时，杜鲁门陪同在场，"铁幕"之说即从此开始。此后，美国对苏态度与罗斯福时期不同，公开趋于强硬。与此相联系，美国的德国政策也发生变化，希图把德国（西方占领区）变成与苏对抗的一支重要力量，其标志则是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九月六日在斯图加特的讲话。贝尔纳斯说，不应该把德国变成一座"贫民救济院"，应该促进德国的"经济统一"，使德国人"承担起处理自己事务的首要责任"。②在贝尔纳斯讲这些话以前，美国政府已经指示克莱就德国形势问题起草报告和建议，着手筹备美英双占区经济合并问题。七月十八日，英国占领区军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在德国西部建立了一个大州"，阿登纳立即赞扬说，这是"一个政治上明智的和具有深远意义的决断"。③七月二十九日，美国国务院宣布，英国"原则上同意"贝尔纳斯提出的关于美、英两个占领区合并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建议。很快，美英双方协议双占区在经济上合并，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贝尔纳斯和贝文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日签署的"德国美占区和英占区经济合并协定"正式生效，决定成立由德国人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会。同年五月，双占区又在法兰克福成立了经济委员会，不仅负责双占区的经济事务，而且享有某些立法权，实际上具有一定的政府职能。

---

① 克莱：《对德国的决策》，1970年版，第172—173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八卷，第210—218页。
③ 《阿登纳回忆录》(一)，第103页。

经济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基督教民主联盟占多数，社会民主党占少数，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党体制开始建立起来。显然，无论是“经济统一”，还是占领区合并，都已不单纯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

关于美国在战后对德政策的变化，艾奇逊在回忆录中有过这样一段话："由于我们对德国问题的分析深化了，我们对于主要目标的观念也随之起了变化。起初，我们曾经讨论过，感到把头等重要地位放在全德的重新统一上，或者放在西德的统一和巩固上，是有相对价值的。然而不久我们终于相信，我们最主要的注意力应该是欧洲的未来，而不应该把德国的重新统一本身看作最高目的。显然，这(指德国的重新统一)需要苏联的合作，因为它占领了三分之一的德国领土。如果把重新统一德国放在第一位，那么，为了取得苏联的合作而相应付出的代价必定是高昂的。然而，如果把欧洲的未来放在首位，又如果苏联对于重新统一德国的要价使欧洲未来的前途受到威胁或损害，那这笔代价就不应该付。"① 艾奇逊认为，这笔代价可能是在欧洲出现“军事上的不稳定”、德国可能会被“赔偿所挤干”，或因“苏联的否决权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陷于瘫痪”，这就会加重“苏联对东部占领区经济的控制”，从而“必定使欧洲的未来受到损害”。艾奇逊说，美国的这些想法很快就通报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和法国外长舒曼。② 立意如此，再开多少次外长会议也是无济于事的。艾奇逊这番话说明美国在战后德国问题的决策，是同与苏联对抗的战略方针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是对苏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四七年是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对苏战略方面进一步协调的一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出笼，起了把西欧各国团结在美国周围的作用。法国虽然在对德政策上比美国和英国余

①② 迪安·艾奇逊：《在创世的现场，我在国务院的岁月》，纽约，1969年版，第291页。

悸大得多，但是在同苏联对抗方面又终归有共同利益，特别是在经济上不可能不依靠美国的援助。就在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讲话之前，法国还从美国控制下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获得了二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马歇尔计划”发表后，法国是最积极的支持者，和英国联合发起了落实“马歇尔计划”的国际会议。这种情况推动了法国在对德政策上向美英立场靠拢，从双占区合并向三占区合并的条件正在成熟起来。这年九月，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宣告成立，苏联提出两大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概念。西方国家同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对立之势在这种条件下便进一步形成了，以至象艾奇逊说的，在十一月在伦敦召开的四国外长会议上，“三个盟国终于能够结成一条坚强的阵线来对付俄国人了”。①

伦敦四国外长会议的破裂更加促进了西方三个占领区的合并和德国最后分裂的进程。

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至八日，美、英占领军当局在法兰克福开会，决定使双占区行政机构“政府化”；三月底，美国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把三个占领区的经济纳入“欧洲经济复兴计划”范围内；同年三月十七日，在美国的推动下，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五国签署了“布鲁塞尔条约”，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开始筹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美国和英国倡议：从二月二十三日至六月一日分两段举行有美、英、法、比、荷、卢六国代表参加的伦敦会议。这对于西德国家的成立是一次十分关键的会议，也是西方各国在德国问题上协调立场的会议。二月二十三日至三月六日为会议的第一阶段（比、荷、卢三国自二十六日起参加会议）；从四月二十日至六月一日为会议的第二阶段。伦敦会议的中心议题实际上就是建立西德政府。会议结束时发表了会议公报，通过了召开西德制宪会

① 迪安·艾奇逊：《在创世的现场，我在国务院的岁月》，第260页。

议、成立西德临时政府等文件，统称“伦敦协议”。“伦敦协议”内容十分琐细庞杂，但最主要的内容是如下三点：

第一，于九月一日召开西方占领区德国的制宪会议，起草宪法，准备于一九四九年成立西德政府。

第二，鲁尔的煤和钢由美、英、法、比、荷、卢和西德等七国共管；另外签订关于管理鲁尔的法规。

第三，在对西德的全面军事占领结束后，西方盟国继续占领鲁尔和莱茵河。①

在这三点中，最主要的又是第一点，因为，实现了第一点，德国就完完全全地一分为二了。第二点体现了西方各有关国家在鲁尔区这块“肥肉”上“利益均沾”的原则，也满足了法国对鲁尔的要求；苏联从一开始就要求鲁尔地区实行国际共管，“伦敦协议”则完全排除了苏联。第三点是因为法国害怕德国再起而制定的，带有安抚法国的意义。法国在伦敦会议上也作了让步，放弃了分离莱茵兰的主张。

“伦敦协议”通过以后不久，美、英、法占领当局在六月十八日宣布三日后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所谓“*B*”记马克，在西占区流行。十二月五日，柏林的美、英、法三个管理区举行了西柏林市政选举。

到这个时候，西方国家就这样在德国法西斯投降后，大体上用了三年的时间，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完成了在西方占领区建立西德国家的准备工作。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加紧分裂德国的同时，苏联并没有处在静观状态。一九四七年六月，苏占区成立了德国经济委员会；同年十二月六日，伦敦四国外长会议开始不久，苏占区在柏林召开了第一次德国人民争取统一和正义和平代表大会，大会选出了主要由德国统一社会党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会议还对美英双占区合并

---

① 《纪事年鉴——1948》，第8卷，1949年纽约版，第174页A1。

和萨尔在经济上并入法国提出了抗议。一九四八年三月，苏联对美英双占区合并作出强烈反应，苏联参加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代表在会议进行当中退出会场；同年同月，德国人民争取统一和正义的和平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由四百人组成的人民委员会。四月一日起，苏联占领军当局对西占区与柏林间的陆路交通实行限制措施。四月十五日，人民委员会决定在全德以“德国统一和正义的和平”为口号举行公民投票，西方占领区当局加以抵制。六月二十四日起，苏联对柏林实行全面封锁，西方只能依靠“空中走廊”保持同西柏林的联系，封锁柏林达一年之久，东西对峙，气氛紧张。同年八月和十二月举行了第三、第四次代表大会，也起草了德国宪法，规定德国应该是“人民共和国”。十一月三十日，柏林苏联管理区建立了柏林政府。同时紧跟着西方占领区“币制改革”，苏联也于六月二十三日宣布决定在苏占区和大柏林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所谓“*D*”记马克。

至此，在苏占区建立起与其他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相同政体和社会制度的过程已经完成了。换言之，在苏占区建立国家的准备工作也已完成。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苏联政府宣布，如果西方国家同意就德国统一问题重开四国外长会议，苏联可以撤销对柏林的封锁。五月十二日，柏林封锁解除；二十三日四国外长在巴黎恢复会议。

以上类似流水帐式的简要叙述表明，东西德分势已定，明白如话。东、西德已各有自己的体制，各有自己的经济制度。在东德（当时的苏占区）起领导作用的政治力量是一九四六年由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在西德（当时的西方占领区）起主导作用的政治力量，从一开始就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东、西德的分道扬镳已是不可挽回的既成事实。颇有些讽刺意义的是，在柏林封锁宣布解除的当天，美、英、法军事长官在法兰克福批准了

“基本法”，公布了“占领法规”。在四国外长巴黎会议开幕的当天，西德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西德“基本法”正式生效的活动。

在这样的形势下召开四国外长会议，其命运如何，未卜可知。在会上，苏联继续提出建立全德国务会议，作为全德的经济和政治机构的中心，四国联合提出对德和约草案。西方则主张建立“最高委员会”，东占区接受波恩“基本法”与“占领法规”，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全德联邦政府，等等。双方依然各执一词，南辕北辙，讨论毫无结果，会议不到一个月于六月二十日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这时离开两个德国正式宣告成立只不过三个多月了。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四日，西占区举行联邦议院选举。九月七日，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正式成立。十二日，自由民主党的特奥多尔·豪斯出任总统。十五日，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康拉德·阿登纳出任联邦共和国总理。二十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

在苏占区，德国人民委员会于十月七日在柏林召开全体会议，通过“成立临时议院与组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决定，人民委员会作为临时人民议院，行使最高立法职权。这一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十月十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威廉·皮克当选为总统，奥托·格罗提渥出任部长会议主席。

至此，德国正式分为两个国家，东、西欧之间的分野也于此最后完成。法国《世界报》早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即“马歇尔计划”宣布以后不久曾说：“德国的最后分裂，终于不可避免，但或许不失为德国问题最彻底的解决方案”。[1] 德国的分裂在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一页，是战后大国对峙的必然结果，对于德意志民族是痛苦的。同时，由于德国处在欧洲的正当中，地位格外敏感，它的分裂不仅关系着德意志民族的命运，而且牵动

---

① 〔法〕《世界报》1947年7月1日社论：《两个德国》。

着整个欧洲局势的发展，瓦尔特·哈尔斯坦说："德国的分裂是欧洲分裂的一个部分"。[①] 这里的神经一紧张，就马上会传到整个欧洲，使欧洲的神经也跟着紧张起来，从而影响东西方关系。战后几十年来欧洲形势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点。

① 瓦尔特·哈尔斯坦：《形成中的欧洲》，第305页。

· 第三章 ·

欧洲的“集团化”之一——所谓“冷战”

（一） “冷战”的开篇

战后在欧洲政治地图上发生了两件影响世界格局和欧洲命运的大事，这就是德国的分裂和东西方的对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表明西方已经完成了与苏联对抗在组织上的部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对立，把欧洲划分为相互对立的集团，东西方走上了“集团化”的道路，因此是东西方对峙的重要标志。它说明，从雅尔塔会议以来逐渐形成的集团对立的格局是无可挽回地“定型”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全人类是一次空前的浩劫；劫后余生的欧洲人很自然地最关心怎样防止德国法西斯复活。这在战争以后无论是东欧，还是西欧，都是心同此理的。与二十多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样，列强们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怎样解除战败国的武装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一九一八年以后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美国站到了列强的前列，门罗主义向世

界范围扩展；英国和法国为要维持在欧洲的新均势，也需要借重美国的力量；美国作为国联的创始国虽然由于国会的否决而没有参加，但在事实上已处于左右欧洲局势的地位。东方的苏维埃俄国则在帝国主义的围攻中成为欧洲的一个巨人。当时的西方，一支眼盯着德国，另一支眼紧盯着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愈来愈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看作必欲扼杀之而后快的猛兽。但战败的德国则在一九二五年洛迦诺公约以后迅速喘过气来，一步一步地摆脱了种种束缚，很快又成为一个强国，为进驻莱茵兰作好了准备：一个包括复兴了的德国在内的列强争雄的欧洲在三十年代便形成了。这时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不过十多年，再过几年光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一九四五年以后，防止德国法西斯再起又是必然的课题，而且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验，都认为应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代替巴黎和会的是三大国或四大国之间反复磋商和争吵；代替国际联盟的是更广泛的联合国组织。但是，不同的是，欧洲列强争雄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德国分成了两半，不可能重复从魏玛共和国以来的历史道路。尤其重要的是，苏联不再是二十多年前的新生儿，它已是一个有全球分量的庞然大物，它的西部是一大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西方视为"缓冲地区"的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并且联合成了一个以苏联为首的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相平行、相对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阵营。这在苏联的安全战略中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样的东欧对于西方则意味着失掉战前的"势力范围"，因而被看作是西方影响的削弱。于是，欧洲分成了两半，美苏对峙局面日见明朗，人们称之为"两极"格局（当然这种格局不仅限于欧洲）。

战争结束之前和之后，丘吉尔、罗斯福、杜鲁门等曾竭力企图阻止事态的发展，以保持西方在战后的欧洲对苏联的优势地位，但是没有成功。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在战后（主要是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很快完成了从防止德国法西斯再起到对苏联实

行“遏制”政策的战略转变。

美国学者斯蒂芬·E·安布罗斯概括西方观点时这样说："关于'冷战'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问题，谁也说不出一个恰当的日子，但是'冷战'之所由产生并成为早期的那种样子的争端，可以肯定是在东欧。"① 他还说，西方对于东欧在战后出现的形势是不甘心的，希望东欧仍"保持战前的社会结构"②。换言之，就是幻想在这个地区重建亲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继续象战前那样把苏联包围起来。然而要实现这一点纯属非非之想。

其实英国和美国早在战争开始时就已想到战后的安排问题。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二日丘吉尔和罗斯福会谈后发表了《大西洋宪章》，规划了战后政策的"共同原则"，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两点：第一是战争结束后各国领土边界不予改变；第二，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即社会制度。苏联看出这是安了一颗"钉子"，因此一方面对《大西洋宪章》原则上表示支持，另一方面则提出了保留意见："具体履行这些原则时必须符合各个国家所处的条件、需要和历史特点。"③

东欧地区的国家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西方徒然地试图加以阻止或改变，于是东西方形成对峙之势，"冷战"就是从这里开篇的。

（二）战后欧洲的历史必然

1. 丘吉尔、罗斯福对战后东欧的觊觎

前面说过，"冷战"局面导源于战场上的形势，触发点则是西

① 斯蒂芬·E·安布罗斯：《上升为全球主义——1938—1980的美国对外政策》，纽约，1980年版，第92页。

② 斯蒂芬·E·安布罗斯：《上升为全球主义——1938—1980的美国对外政策》，纽约，1980年版，第94页。

③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切尔西出版社，1973年版，第4页。

方对于战后东欧的政策。当时只有英国和美国有条件考虑欧洲的问题，所以从丘吉尔和罗斯福未能实现的有关设想中可以约略看到战后斗争的渊源。

丘吉尔一直想染指巴尔干，这不仅因为战前英国在这里有它的经济"利益"，尤其有政治目的。丘吉尔早在德黑兰会议以前即曾力主尽可能推迟开辟第二战场，加重意大利和东地中海兵力，以图从巴尔干地区插入中欧，拦住苏联军队的西进。这个主张由于美国不赞成而未实现。其实当时丘吉尔自己也是矛盾的，因为如果这样干就必定把同苏联关系的"政治问题"推到前头，影响整个反法西斯战局的发展，其后果是丘吉尔所承担不起的。① 到一九四四年，东欧形势已经定局，丘吉尔发现"红军于一九四四年夏向中、东欧的挺进，同俄国人在这些地区达成某种政治安排显得紧迫起来"，"战后欧洲似乎正在形成当中"。② 丘吉尔虽然很想插足东欧战场，但显然感到主动权已不在自己手中了。

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便幻想在东欧的战后安排中"入股分红"，以分得一杯羹。

五月间，艾登召见了苏联驻英国大使，向苏联建议，在战争条件下苏联把罗马尼亚作为苏联主要关注的对象（苏联军队于六月进入罗境），而把希腊交给英国负责。苏联政府答复说，如果美国同意，苏联并不反对。③ 英国军队于同年十月十三日占领雅典，英国总算在巴尔干地区有了一席地位。

丘吉尔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载：丘吉尔和艾登一九四四年十月九日下午到达莫斯科，当晚十时就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举行了会晤。丘吉尔对斯大林说："让我们谈谈巴尔干问题吧。你们的军队正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作

---

① 参阅赫伯特·费斯：《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他们进行的战争和探求的和平》，第262页。

②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十一：胜利的潮汐》，第63页。

③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十一：胜利的潮汐》，第64页。

战。而我们则在那里有我们的权益，有驻外代表，还有特工人员。别让我们不知不觉地互相走叉了路。就英国和俄国两国来说，你们在罗马尼亚可以占百分之九十的统治地位，我们在希腊占百分之九十，南斯拉夫各占一半，怎么样？"当译员把这些话给斯大林翻译成俄文的时候，丘吉尔在一张纸头上写了下面几行字：

"罗马尼亚
俄国——90%
其它国家——10%
希腊
英国（在征得美国同意下）——90%
俄国——10%
南斯拉夫——50%—50%
匈牙利——50%—50%
保加利亚
俄国——75%
其它——25%"

写完后，丘吉尔把这张纸头推到斯大林一边，斯大林用蓝铅笔在上面重重地划了一个"V"，又退还给丘吉尔。①

这就是后来传出来的"百分比方案"。

过了两天，丘吉尔于十一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没有发出的信，丘吉尔在回忆录里说，这封信虽然没有发出，却是他当时思想的切实写照。丘吉尔在这封信中说，那天在纸头上写的"百分比"无非表明他和斯大林的想法何等"接近"，真要拿到外交界去推敲，还失之粗糙，但总可以算是处理问题的"一个好的开头"，如果事情进行得顺利，就可以在那些有关的小国家避免内战、流血事件和冲突。他说："我们的广泛原则应该是让每个国家拥有人民所希望要的政府。"接着丘吉尔写道："除了政体问题以

①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十一：胜利的潮汐》，第200—201页。

外，在这些国家里还存在着极权主义形式的政府和我们称之为直接投票的自由选举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我们很高兴，你已经表示反对试图通过武力或共产主义宣传来改变巴尔干地区各国的现行制度。"丘吉尔在这封信中还说，希特勒曾经努力利用西欧害怕共产主义的情绪；但这样的恐惧感确实在"每个国家"都有。丘吉尔说："我们把你解散第三国际看作是苏联政府不打算干涉别国内政的一项决定，我们觉得我们的理解是对头的。"①

这封信为什么没有发出，丘吉尔没有解释，也许是觉得它反共的味道太露骨；也许是丘吉尔深知，斯大林根本就不会承认那个"百分比方案"。斯大林在那张纸头上打上一个"V"，丝毫不能说明斯大林同意英国染指巴尔干。

丘吉尔这次访苏，主要目的就在于东欧，他在十二日给英国内阁的信中确认，"苏俄对在黑海边界的国家有重大利害关系"，"苏联军队既然已经控制了匈牙利，很自然，能发挥最大影响和作用的就非他们莫属了。"（按，此时，苏联军队已经先后进入了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同时，丘吉尔说，作为一种交换条件，苏联已同意"让大不列颠在希腊发挥如同我们承认俄国与罗马尼亚之间的亲密关系的作用"②。应该说，丘吉尔的这次莫斯科之行，已经使他意识到西方对战后东欧的干预是十分有限的。

罗斯福虽然否决了丘吉尔推迟开辟第二战场、进军东地中海的意见，但并不等于他对巴尔干无所求。只是因为美国的处境与英国不同，因此更费踌躇。罗斯福预感到——这种思想在罗斯福的决策中一直占相当大的比重——美国必定要同一个强大的苏联打交道，而眼前在欧亚战场上都需要苏联。所以罗斯福把同苏联保持密切配合的战时盟国关系，比丘吉尔看得更重要。美国也不乏有人觉得应该把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尽可能往后推，以便使苏

---

①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十一：胜利的潮汐》，第204—206页。
②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十一：胜利的潮汐》，第206—208页。

德相互消耗①，这在政治全局中是绝对不可取的。罗斯福犹豫的是，争取不要失去任何既可以加速希特勒德国的溃败，又能使“巴尔干地区从苏联威力摆脱掉”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时机”。②在罗斯福的头脑里正在酝酿着一种如何对付苏联的方略，因为在未来的欧亚两洲，美国都将同苏联直接会面。因此对于美国来说，最理想的方案是在亚洲有一个亲西方的以中国为美苏间的“缓冲地带”，在欧洲有一个亲西方的以巴尔干地区为美苏的“缓冲地带”。但这样的理想方案只是一种如意算盘而已。

因此，罗斯福的东欧政策始终是逡巡不前的。一九四二年三月，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访问美国，提出要成立所谓“东欧联邦”，被罗斯福否决了。罗斯福认为当时根本不到谈东欧问题的时候，否则就会挑起同苏联之间的“严重麻烦”。③第二年年初，曾任美国驻苏联和驻法国大使的威廉·布利特上书罗斯福，认为从“美国的民族利益”出发，必须“设法把斯大林拉进同美英的合作关系当中”，他认为苏联迟早将会控制欧洲，并且将利用美国在太平洋战场有求于苏联的心理，迫使美国在欧洲作出让步。但同时，布利特又提出，美国不妨以中止对苏联的援助为要挟，迫使苏联既同意参加对日作战，又不“吞并任何欧洲国家”；布利特认为，美国甚至可以做出“入侵”东欧的姿态。布利特提出的是两手策略：在美国无法控制东欧局势的情况下，力争尽可能占些便宜。罗斯福同正在美国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谈了这个问题，艾登认为，即使苏联的意图是控制东欧，在战时与苏合作也不会有任何损失；艾登觉得应该维护同苏联的合作。不过艾登看到，苏联的意图确实是在战后把波罗的海

---

① 约翰·帕顿·戴维斯：《抓住龙尾》，纽约，1972年版，第300页。

② 罗伯特·达赖克：《弗兰克林·罗斯福和1932—45美国对外政策》，牛津，1979年版，第410页。

③ 参阅理查德·T·戴维斯：《来自波兰的看法》，托马斯·T·哈蒙德主编，《冷战起源的见证》论文集，华盛顿，1982年版，第274页。

国家控制在自己手里，罗斯福说到那时英美舆论都会予以制止的。但是罗斯福随后又说，战争结束的时候，苏联一定将控制这些国家，到那时，“谁也没办法强迫他们离开”。他但愿苏联能能同意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他甚至考虑可以索性同意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控制，但以此为“讨价还价的手段”，以便“从俄国取得其它方面的让步”。①

在谈到波兰问题时，艾登认为波兰人（指波兰在伦敦的流亡政府）野心未泯，仍希望在战后成为这个地区的“最强大的国家”。罗斯福说，为了保证战后和平，无论如何也要对波兰和其它东欧国家作出某种安排；他宁可让波兰控制东普鲁士，以换取它沿寇松线对苏联作出领土上的让步。②

这些情况都反映罗斯福（在一定程度上包括英国的艾登）在东欧问题上一直举棋不定；这些问题在罗斯福的脑子里转来转去，怎么也没有法子把包括波兰在内的东欧排除在所谓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外。

由于上述原因，美国对东欧的政策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是不明朗的，有些西方人甚至认为当时的美国根本没有自己的东欧政策，似乎只有丘吉尔在同苏联周旋。美国参议员范登堡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大声疾呼美国必须站出来说话；批评美国政府在东欧问题上过于沉默，说“我们在这个伟大的联盟（指西方联盟）中竟是唯一‘沉默的伙伴’”，抱怨“美国没有说话；它的正式态度没有确凿地记录在案；而在它发言以前，世界是无法了解它的想法的”。③

不久，美国国务院为罗斯福即将参加雅尔塔会议准备了一份《情况报告》（Briefing Book Paper），就战后东欧的安排问题

---

①② 参阅罗伯特·达赖克：《弗兰克林·罗斯福和1932—1945的美国对外政策》，第399—400页。

③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34、35页。

和美国的对策提出了参考性的意见。这份《情况报告》概括了当时美国的东欧政策的构想，实际上把罗斯福犹豫不决的想法条理化了。

《情况报告》表示美国一向“反对划分势力范围的理论”，不赞成“英苏在欧洲大陆的竞争”。[①]这等于否定了丘吉尔的“百分比方案”。美国国务院认为，在东欧战场上起主要作用的是苏联军队，只能承认“其军事力量正在某一领土上作战的政府，在正常事态的进程中，将根据其军事行动的状况，在作出涉及该领土的决策时握有主要的主动权”。[②]并说：“苏联将在这个地区发挥占统治地位的影响，这样的局面现在看来是已经明朗了；（美国）政府肯定不打算同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作对，当然它也不愿意看到美国的影响从世界的这一部分完全消逝。”[③]这些话活画出美国政府充满矛盾而又无可奈何的心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务院为罗斯福准备了什么方案呢？综合起来，是以下两点：

第一，关于战后东欧的政治制度。《情况报告》说，英国希望东欧各国建立“右翼政府”，苏联则要求这些国家建立“左翼政府”，这是“两个极端”。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分析，欧洲人民经过这场战争之后，普遍情绪是“左倾”，要求实行“长期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但是他们并不赞成组成“左翼极权政体”。因此，战后东欧的政府不可能完全排除“左翼”的代表，最理想的方案是：这些政府可以“相当程度的左倾”，“以满足欧洲时行的心情”；同时，又必须有“足够的中间派和小资产者的代表，这样，这些政府就不至于被看作只不过是共产主义独裁的序

---

①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40、44页。

②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43页。

③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46页。

幕"。①

第二，关于美国在东欧的经济利益问题。美国国务院在《情况报告》中建议，美国应该凭借其经济实力，"在多边基础上"参与东欧的"重建"，因为，"只有在贸易、投资和情报资源等方面享有一定程度的均等机会，美国才可望使它的影响得以发挥。"② 例如，美国可以通过进出口银行直接贷款、通过向东欧提供技术援助等方式向东欧渗透；至于私人投资，则在几年之内可能性不大。③

对于这些建议，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的建议是否可行，美国国务院当时并没有把握。《情况报告》对苏联会作出什么反应作了一厢情愿的猜测，幻想苏联或许不会反对，因为东欧各国兴旺起来对苏联也有利；他们还认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将有很严重的经济复兴任务，必然需要资金，而世界上只有美国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援助；所以美国估计，为了取得美国的贷款，苏联或许会在东欧问题上对美国作些让步。④

从以上情况来看，丘吉尔和罗斯福在东欧问题上都终于不得不服从无法扭转的发展趋势。丘吉尔表现得更强硬些，力图"知其不可而为之"地从东欧争夺一点点权益，但是只凭英国自己，而没有美国的参与，是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的。即使美国和英国同一步调地去进行争夺，英国和美国在东欧问题上的地位也已经注定是处于被动态势了。

2. 东欧人民民主制度的确立

雅尔塔协议对于东欧问题是怎样规定的呢？根据《关于被解

---

①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41页。

②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46页。

③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47页。

④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47—48页。

放的欧洲的宣言》，“被解放的欧洲各国”应该“成立能广泛代表各民主阶层的临时政府并责成它尽快通过自由选举建立符合人民意愿的政府”，而且“在必要时，应促成这种选举的进行”。①这里指的是所有被希特勒占领的欧洲国家，多数是东欧国家。关于波兰问题，协议规定：“现在在波兰行使职权的临时政府（即在卢布林民族解放委员会基础上建立的临时政府），应该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进行改组，吸收波兰国内外的民主人士参加（这主要指的是战时的波兰流亡政府）。这个新政府应称作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②

雅尔塔协议签字以后，希特勒迅速败北。战后，东欧地区的国家即在本国共产党、工人党的领导下迅速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组织起相应的新政府。

保加利亚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加入德意日法西斯集团，属于法西斯的附庸国。第二年，保加利亚共产党、农民联盟等组成“祖国阵线”，在国内开展反对法西斯的武装斗争和地下斗争。一九四四年，苏联军队进军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了武装起义，推翻了保皇法西斯政府，是为“祖国阵线”政府。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选出国民议会。一九四六年九月经过全民投票，废除君主政体，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同年十月，新的政府宣告组成，格·季米托洛夫当选为第一任部长会议主席。

其间，苏美英三国外长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曾达成谅解，委托苏联政府负责向当时的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政府建议，在当时政府内增加两名其它民主团体的代表。

罗马尼亚在希特勒入侵后也沦为法西斯的附庸国，安东尼斯库政权参加了德意日法西斯同盟。一九四四年八月底，罗马尼亚

① 〔苏〕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莫斯科，1971年版，第186页。

② 〔苏〕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莫斯科，1971年版，第187页。

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在进入罗境的苏联红军配合下，推翻了安东尼斯库法西斯政权，并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一九四五年三月成立罗民主政府，一九四七年底宣告建立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

其间，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曾组成维辛斯基（苏）、哈里曼（美）、克拉克·凯尔（英）三人委员会，与罗国王米哈伊磋商扩大政府代表性事宜。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和英国同意承认三月成立的民主政府（苏联早在民主政府成立后即予承认）。

匈牙利在战争期间也曾沦为法西斯的附庸国，经历了与罗、保大体相同的过程，于一九四五年四月获得解放，第二年二月国会宣布废除帝制，成立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南斯拉夫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就成立了以铁托为主席的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即临时政府，领导反法西斯的解放战争。一九四四年九月，南斯拉夫和苏联就苏联红军进入南境达成协议，宣布苏联红军在完成作战任务以后即撤出南境。贝尔格莱德解放后，南斯拉夫制宪会议宣布成立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一九四五年三月七日，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政府宣告成立。

阿尔巴尼亚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下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获得解放。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举行全国首次普选。第二年一月，制宪会议宣布成立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有所不同。捷、波都处于东西欧之交，政治上的地位比较敏感。捷克是英法对希特勒德国实行“绥靖政策”的见证人，始而于一九三八年在慕尼黑会议上被出卖，继于第二年被希特勒德国占领。一九四〇年原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在伦敦组织流亡政府，第二年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与苏联签订《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一九四四年八月，斯洛伐克地区爆发了反法西斯武装起义。一九四五年四月以捷克共产党为领导的民族阵线联合政府宣告成立，五月布拉格解

放。一九四六年五月举行战后第一次国民议会选举，贝奈斯当选为总统，产生了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联合政府。一九四八年二月，联合政府内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十二名部长辞职，企图引起政府危机，是为"二月事件"。"二月事件"被粉碎后，贝奈斯拒绝签署捷共提出的人民民主宪法，后于同年六月辞职。

波兰的战略地位之重要极为突出，所以围绕波兰问题的斗争也更为尖锐而曲折。波兰在战争期间就交错着西方和苏联的尖锐而复杂的矛盾斗争。波兰遭希特勒入侵后，先在巴黎、后迁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一直受西方控制，头几年还同苏联有外交关系，以致成了西方同苏联"讨价还价"的本钱。乔治·凯南认为，对于英国和美国说来，苏联是否准备"在欧洲实行一项正当的、人道和合作的政策"，波兰问题是一个"考验"；如果苏联准备实行这样的政策，则美苏关系的前景可能是宽广的；否则，"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便只好把西欧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的态度"将是俄国同西方关系的试金石"。①凯南还说，波兰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领土问题，真正的难题还在于波兰政府的构成问题。②但是，西方要否认苏军进入波兰后在波兰本土成立的卢布林民族解放委员会（后来发展成波兰临时政府），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便力争使流亡政府在未来的政府中占尽可能多的席位。这就引起了旷日持久的复杂的谈判斗争。从谈判的总过程中，英美只能随着苏联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在谈判中一步步后退。

在波兰战后边界问题上，一开始英美就在口头上同意了波苏边界以"寇松线"为准，后来在雅尔塔会议上以文字形式肯定下来；波兰西部边界，苏联一直坚持用奥得——尼斯河以西的原德国领土划归波兰，以补偿波兰在"寇松线"以东失去的领土；英

①② 乔治·凯南，《回忆录1925—1950》，波士顿·多伦多，1967年版，第204页。

美顶了一个时期，后来在波茨坦会议上也基本上定下来了。

至于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西方最终也同意了以卢布林民族解放委员会发展起来的波兰临时政府为基础，并在雅尔塔会议有关波兰问题的决议中宣布伦敦波兰流亡政府“不复存在”。① 英美从力争伦敦波兰流亡政府在政府中占多数、退到一半对一半，再退到只承认波兰民族统一临时政府。一九四七年一月，以波兰工人党为首的各民主党派联盟在立法议会选举中获胜，参加临时民族统一政府任副总理的原流亡政府领导人米科瓦伊契克逃亡国外。二月，波莱斯瓦夫·贝鲁特当选为总统，成立了以西伦凯维兹为首的新政府。

这些十分简单的追述，说明东欧人民民主制度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在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斗争而建立的，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不消说苏联红军的反法西斯军事行动和在政治上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说到两个阵营的对立和斗争时说的“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正在巩固其内部，并相互团结起来”，② 就是战后东欧地区事态的反映。（不过，在毛泽东说这番话不久，就发生了苏联把南斯拉夫开除出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事情。）东欧国家和苏联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欧洲形势发生了根本不同于战前的变化，因而是形成东西方对峙的重要因素。

3. 从“单行道”到“遏制”——欧洲“集团化”在形成中

法国历史学家巴蒂斯特·杜罗塞尔说，雅尔塔会议是苏联的“一次伟大的外交胜利”。③ 意思是说，英国和美国长期试图阻挠出现的事情，没有避免得了；苏联争取有一大片友好的西邻国

① 〔苏〕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第187页、第400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1259页。

③ 让-巴蒂斯特·杜罗塞尔：《外交史》中文本，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36页。

家的愿望终于完全具体化了。前面引的安布罗斯的话，说导致“冷战”的争端是东欧。这个争端的前一段到雅尔塔会议已经告一段落；下一段将在新的条件下进行新一轮争夺——表现为“东西分治”条件下的对峙。但是雅尔塔会议以后还有几个月处于战争时期，东西方的“冷战”局面还暂时地掩盖在反法西斯的“热战”的下面。但是，“冷战”的种子已经播下了。

在第二次大战后期，苏联手里有两张针对英美的“王牌”，使苏联占据了主动地位。一是东欧战场(包括部分中欧战场，或曰苏德战场)上的胜券已然在握，为西方开辟第二战场创造了条件；二是苏联已经同意在欧战结束后参加太平洋战争，以缓解美国和英国，特别是美国的负荷。这就是说，在欧亚两大战场上，西方都有求于苏联。这就决定了美国和英国在战后东欧的安排中无法强求。

罗斯福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逝世，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杜鲁门上台后曾经想扳一扳西方的被动局面。他感到，以往在波兰等问题上同苏联打交道一直走的是“单行道”，这种状况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为此，他在四月二十三日召集了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对外政策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托、海军上将威廉·李海、马歇尔、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等。会上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据说，主张在波兰、东欧问题上持强硬态度最力的是福莱斯托，他说：“如果俄国人继续顽固不化，我们只好同他们摊牌，现在摊牌比晚些摊牌好。”斯退丁纽斯和哈里曼也主张对苏联要硬一些。史汀生的态度比较迟疑，说在重大军事问题上，苏联是守信用的，他们所作的往往比所保证的还要好。他认为不能不考虑波兰的绝大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是受俄国控制的，苏联反正是不会让步的。马歇尔和史汀生一样，也认为要慎重从事。他认为，从军事观点来看，欧洲局势是稳定的，美国希望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因为“俄国人有权拖延参加远东战争的时间，直到我们干完了一切不愉快的工作以后再参加”。所以

他主张尽力不要同苏联闹翻。①

在这次会议以后，杜鲁门就去会见去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经过华盛顿的莫洛托夫。杜鲁门向莫洛托夫递交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信，这封信措词强硬，指责斯大林在波兰问题上违背了雅尔塔协议，阻挠"真正有代表性的波兰领导人"参加组成新政府的磋商，从而可能"动摇对三国（苏、英、美）政府的团结的信心"和"在未来继续合作的决心"。②杜鲁门和莫洛托夫当时就争论起来，据说，莫洛托夫曾面带愠色地说："我这一生还没有人这样跟我说话的！"③但杜鲁门的所谓"强硬"并没有什么效果，反而使苏联的立场更坚定了；因为时已至此，美国除了讲些看来厉害的话以外，实际上是无计可施了。

从杜鲁门的主观意图看，他觉得美国手里也有两张"牌"。一是，杜鲁门认为美国可以对苏联施加经济压力，这还是雅尔塔会议前美国国务院《情况报告》的想法。杜鲁门在追记四月二十日同哈里曼的谈话时有这样两段话：

"哈里曼认为，苏联政府并不希望和美国闹翻，因为他们在重建计划上需要我们的帮助。基于这个原因，他认为在重要问题上，我们可以坚持，而不致碰到严重的危险……

"这时我（杜鲁门）打断了哈里曼的话说道，我不怕俄国人，我准备采取坚定的态度……不管怎么说，俄国人需要我们总比我们需要他们的地方多。"④

但是，杜鲁门想要施加的经济压力，并没有能够实行；苏联宣布了新的五年计划，规划以极大的努力重建自己的重工业，同时退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来又拒绝了"马歇尔计划"。苏联在

---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三联书店，第68—70页。

②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80—81页。

③ 《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74页。

④ 《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61页。

战时曾接受了美国“租借法”的援助，但在战后便断绝了同美国的经济关系。因此，哈里曼认为苏联在重建计划上需要美国援助的想象是落空的；所谓经济压力也就无以售其计了。

有一个插曲可以侧证苏联是不吃经济压力这一套的。

五月八日，正当欧洲战场上的战事刚停下来的时候，杜鲁门突然宣布中止“战时租借法”，正驶向苏联满载战争物资的货轮奉命返航。据说杜鲁门签发了下属起草的命令，连文本都没有通读一遍，他以为既然欧战已停，“租借法”就可以停止实行了。殊不知这样轻率的举动会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应和政治后果。甚至正在参加联合国会议的斯退丁纽斯极为含蓄地表示，在这个关键时刻宣布中止“租借法”，“特别不是时候，它对于美苏关系毫无帮助”。杜鲁门立即意识到办了错事，赶忙收回成命，货轮继续启航开往苏联，并且派特使霍浦金斯到莫斯科，向斯大林承认错误。斯大林对霍浦金斯说，他认为这样作是“不幸的，甚至是粗暴的，轻蔑性的；是一种不信任的表示和一种压力”。①

安布罗斯说这是杜鲁门故意对苏联施加压力，②看来不象，因为连杜鲁门自己也说是犯了错误。③暴露了杜鲁门的弱点和举措失当。但是这件事却可以表明，苏联是不怕美国施加经济压力的。

杜鲁门的第二张“王牌”是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即将试制完成，并在波茨坦会议期间试爆成功。美国人以为，手里有了原子弹，就可以大大增加同苏联打交道的资本。贝尔纳斯在六月间说，美国有了原子弹将“可以使俄国在欧洲更容易驾驭”。④史汀生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向杜鲁门提出了“原子外交”的建议，主

---

① 哈罗德·F·葛斯奈尔：《杜鲁门的危机》，伦敦，1980年版、第244页。
② 斯蒂芬·E·安布罗斯：《上升为全球主义》，第106页。
③ 《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139—140页。
④ 《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111页。

张美国以原子优势驾驭美苏关系。①

然而，原子弹并没有"镇慑"得住苏联。因为，一者苏联也正在研制原子武器，打破美国的原子垄断只是时间问题；四年后，一九四九年七月，苏联便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再者，原子弹在东西战线迅速合拢的欧洲，根本对苏联起不了威慑作用。美国对于苏联出兵歼灭日本关东军的要求，并没有因此而减弱。所以，当杜鲁门向斯大林故意暗示美国已有原子弹时，斯大林的反应是异常镇静的。

杜鲁门追述说："七月二十四日，我偶然（不是"偶然"，而是"故意"——作者注）对斯大林提到我们拥有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武器。俄国部长会议主席并没有表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只是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并希望我们'好好地运用它来对付日本'。"②看来斯大林的这种反应，是杜鲁门没有料到的。

所以，杜鲁门上台后在东欧问题仍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大势所趋，仍旧只好继续走"单行道"。唯一能作的便是在雅尔塔会议通过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提出的所谓"自由选举"上作文章，一再指责东欧各国政府不是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并且一直用来作为反共宣传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这样的指责既无实效，也不理直气壮，因为西方在解决西方有关这类问题上特别是意大利的政府问题就把苏联完全撇开了。

斯大林在四月二十四日复杜鲁门信中反驳了杜鲁门在波兰问题上的指责（这封复信也同时寄给了丘吉尔）。斯大林在驳斥西方不按照协议把波兰临时政府看作未来政府的基础之后说："波兰问题对于苏联安全，正如比利时和希腊问题对于英国安全具有同样的意义。"复信说："我不知道希腊是不是已经建立起真正

---

①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138—141页。

② 《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第353页。

有代表性的政府，比利时政府是不是真正民主的。当这些政府组成的时候，苏联并没有被征求意见。苏联政府也不要求干预这些事情，因为它理解比利时和希腊对于英国安全所具有的全部重要意义。”复信接着说：“弄不懂为什么讨论波兰问题就不要考虑苏联的安全利益。”①

因此，所谓没有举行“自由选举”之类的责难是软弱无力的，只能反映在东、西欧的对峙已成定型、反法西斯盟国关系已经结束的情况下，西方已是无棋可走了。

杜鲁门执政的头一年多，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罗斯福的东欧政策。波茨坦会议是盟国的最后一次会议。以后就不再有什么重大的协议了，东西方都需要在新的条件下巩固自己的地盘。西方终于不得不放弃对东欧的觊觎而向对抗过渡：丘吉尔一九四六年三月的富尔敦讲话用“铁幕”把东西欧割开，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之间开始了针锋相对的论战；一年后，一九四七年三月，杜鲁门关于希腊问题的一篇讲话完成了政策的转变——从战时与苏联的盟国关系过渡到对苏联实行所谓“遏制”的时期。（关于杜鲁门的这篇讲话，在下一章有关“杜鲁门主义”的部分，还将谈到）东、西方各自的“集团化”实际上早已经开始了。

至此，西方（主要是美国和英国，其它西欧国家都不能起有意义的能动作用）对东欧政策，有这样“三部曲”：先是在战争后期妄图插手东欧战场，主要是丘吉尔的设想；继而是力争在组织战后政府时施加影响；最后是对苏联和东欧实行“遏制”政策。

①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81—82页。

（三）关于"冷战"的几个问题

由此可见，所谓"冷战"是一种具有历史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战后东西方各自组成一个阵营，相互对峙。这种局面在欧洲表现得尤其尖锐。由于世界上出现了比其它国家强大得多的两个超级大国，因之"冷战"便首先表现为两个超级大国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了搞明白战后东西方对峙的特点及其表现，有两个问题需要作些分析：第一，"冷战"与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或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问题）有什么联系；第二，"冷战"中的双方如此尖锐对立，何以没有发展成为"热战"。地区性的战争是不少的，如美国假联合国的名义对朝鲜发动的侵略战争，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殖民战争等等，但都不是东西方直接冲突的全球性战争。

1. "冷战"与社会制度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势力范围"；两次大战之间，西方列强虽然要包围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但更需对付正在重新崛起的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则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而出现了社会制度的尖锐对立，所以，"冷战"刚一开始就带有十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就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色彩，并且把反苏和反共结合起来。在西方看来，战后东欧建立了一批由共产党、工人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有的国家（如希腊）发生了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人民运动或战争，有些国家（如意大利、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发展很快，世界各地爆发了人民革命运动、民族解放战争，等等，都是"共产主义扩张"的反映，威胁了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而其源皆出于苏联。某些带有政治偏见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甚至说，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提出共产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游荡

之日起，共产主义就伴随着扩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则是这种扩张的思想、学说的具体化，因此“冷战”该从一九一七年算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共同敌人被打倒了，反法西斯盟国关系转入对抗关系。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止一次地说过，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包含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并不是平衡地均衡地向前发展，而是经历着危机和战祸的。”① 还说反法西斯取得的胜利表明，“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② 这篇演说并没有强烈的用语，讲的是众所周知的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资本主义必然导致危机和战争的道理，但是由于当时美苏关系已趋紧张，尤其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已在一大批国家里成为现实，它的影响正在跨越边界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因此引起西方的特别重视，扬言斯大林对西方发动了“冷战”。美国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竟危言耸听地把这篇演说比作“第三次世界大战宣言”。③

斯大林演说后一个月，丘吉尔在美国发表了有名的富尔敦讲话，在谈到当时欧洲形势的时候，下面的一段话是人们所熟知的。他说：

“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有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

---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88页。

② 同上书，第492页。

③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191页。

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① 又说，“在所有这些东欧国家原来都很弱小的共产党，已经上升到同它们党员人数远不相称的主导的、掌权的地位，到处争取极权主义的控制。”② 还说什么，“在远离俄国边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里，共产党第五纵队已经建立。它绝对服从来自共产主义中心的指令，完全协调地工作着。”③ 丘吉尔说，这样的局势“拖得越久，就越困难，对我们的危险也就越大”，④ 所以要加强“英语联邦”和美国在“空中、海上、科学和工业各方面的合作”，以制止“出现不稳定的、靠不住的力量均衡”。⑤

斯大林立即对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作出了强烈反应，于三月十三日在对苏联《真理报》记者的谈话中指出这个演说是“危险的行动”，“其目的是要在盟国中间散播纠纷的种子，使它们难于合作”；“丘吉尔先生现在是站在战争挑拨者的立场上的”，“非常象希特勒及其同伴”，其方针是“进行战争的方针”，是“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

针对丘吉尔关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及索非亚等名城都处于苏联“势力范围”的言论，斯大林反驳道：“说维也纳和柏林完全受苏联的管制，这是十分荒谬的，在维也纳和柏林都设有四国代表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苏联只占四分之一的票数。”至于东欧各国，希特勒法西斯正是经过这些国家入侵苏联的，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当时存在着敌视苏联的政府。斯大林问道：“苏联为了保证自己将来的安全，力求在这些国家内能有对于苏联抱善意态度的政府，试问，这有什么奇怪呢？假使没有发疯的话，那怎么会把苏联这

---

①② 温斯顿·丘吉尔：《演讲全集》，第七卷，纽约，第7290页。
③ 温斯顿·丘吉尔：《演讲全集》，第七卷，第7291页。
④ 温斯顿·丘吉尔：《演讲全集》，第七卷，第7292页。
⑤ 温斯顿·丘吉尔：《演讲全集》，第七卷，第7293页。

些和平的愿望看作是扩张倾向呢？”[1] 斯大林还对丘吉尔攻击东欧实行所谓“极权主义控制”进行了驳斥。当时，杜鲁门、美国政府以及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们已在积极筹划战后的对苏战略，东西方关系随着德国问题的僵持和东欧形势的明朗化正一天比一天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的一篇讲话，便为未雨绸缪的“冷战”揭开了大幕。

然而，“冷战”并不单纯是对立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因为，即使没有这些因素，对峙也不能避免。苏联之需要在波罗的海地区拥有不冻港及东普鲁士相应的部分领土[2]，与十八世纪的俄国之需要在波罗的海拥有不冻港[3]，从国家安全角度看并没有什么差别。苏联希望自己的西邻是同它友好合作的国家，彼得大帝也要求在这里有一片尽可能宽阔的“缓冲区”。而西方也绝不会因为如果东方出现的是一个彼得大帝的俄国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就会稍微放松一点同它的争夺。换言之，不管社会主义的苏联，还是沙皇时期封建帝国主义的俄国，东西对垒之势总是避免不了的。当然问题的性质和表现形式都有所不同。因此，战后初期的“冷战”既包含有社会制度对立的因素，也有东西方进行争夺的因素。一方前进一步，就意味着另一方后退一步。

2. “冷战”与“热战”

东西双方的关系这样紧张，只是维持着外交关系和没有兵戎相见，所以可以说是一种非战的敌对状态。双方都控制在不发生直接冲突的限度之内。

---

① 斯大林：《关于丘吉尔先生的演说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1946年3月14日《真理报》。

② 斯大林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德黑兰会议上提出，苏联需要哥尼斯堡和默麦尔不冻港和东普鲁士相应的部分领土。丘吉尔表示加以研究。参见〔苏〕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第87页。

③ 马克思说：“彼得大帝一上台就破除了斯拉夫族的所有传统。‘俄国需要的是水域’——他对坎特米尔亲王讲的这句辩驳之词被铭刻到他的传记的扉页上。”见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9—80页。

那末，何以“冷战”的唇枪舌剑没有变成“热战”的行动呢？回答可以很简单：仍然是形势使然；双方都不想、也没有条件在一次大战之后再把自己卷进一场全球性冲突。

从美国方面看，复员后可供动员的力量已经十分有限，这在美国的政策中是一个很大的矛盾，“遏制”政策缺乏有力的支撑。马歇尔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就远东军事局势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对外关系委员会作证回顾一九四七年初的情况时说：“根据我的回忆，在那个特定的时候，在整个美国只有一又三分之一个师。我知道，我本人很关心，参谋长联席会议尤其关心，要力争有足够的人员去守卫费尔班克斯的可供空军起落的地带，以防范在那里可能发生的空降，因为那可能使西北地区面临相当大的险情。”他接着说：“这就是说，我们除了海军和一支切实有效、但却不十分充裕的空军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军事力量（在国外的占领军除外），而且大家都知道，在日本的驻军甚至还不足满员的百分之六十。”①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好象十个手指按跳蚤，顾此失彼。美国虽然已应英国的要求作了干预希腊局势的准备，并且说了大话，但实在是力不从心。

当时的国防部长福莱斯托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四日的一段日记，颇能说明美国捉襟见肘的处境：“……马歇尔对于英国军队从希腊和意大利撤出可能产生的影响，深感忧虑。他已经以强烈的措词给贝文②发了电报，对于英国的行动表示了抗议……他请道格拉斯问一问贝文，这（指英国从希腊和意大利撤军）是不是说明英国政策要有根本性的改变。贝文的回答是否定的。”“哈里曼的分析是，艾德礼内阁的裁军决定是受到极左翼的强大压力所致……”“马歇尔要我想想有没有可能逐渐在地中海增加一些海

① 《远东的军事局势，国防部长乔治·C·马歇尔在1951年5月8日参议院武装和对外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词》，第382页。

② 贝文当时是英国的外交大臣。

军，同时增加（海军）访问希腊海港的次数。他极其关心的是，要尽力避免任何虚张声势性质的行动，换言之，就是不要去作那种我们办不到的姿态，不过他觉得这样可以试探一下俄国打算坚持它已经采取的强硬路线到多么深。"①

福莱斯托日记中这段话起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丘吉尔一年多前在富尔敦呼吁英美联合、共同对抗苏联，事实远没有那么简单，英美两国都要求对方多承担责任，以减轻自己的负担；第二，由于美国战后面临着难于解决的矛盾，杜鲁门的"遏制"政策有相当程度"虚张声势"的成份。

西欧的情况比美国要糟得多，否则英国也不会在希腊问题上向美国呼救。《纽约时报》著名记者索尔兹伯格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日的日记十分典型，虽然讲的是法国，但由此却可见一斑。日记记载了他同法国总统赫里欧的谈话，索尔兹伯格问赫里欧：法国为什么没有向西方联盟提供更多的兵力？赫里欧勃然大怒，讲了一篇很长的大道理，说法国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承受了多么大的损失，好不容易才恢复了元气，但很快就赶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〇年法国几乎是孤军作战，英国人出的力简直是微不足道的；比利时失陷后，法国便整个儿暴露在敌人面前。接着是四年的德国占领、争取解放、非洲之役，法国死伤人数比英美死伤人数加在一起还多。战时法国沿海都布了地雷，用了很大力量才排除掉。两百万住房毁掉了。为了重建，法国不得不拿出四千亿法郎。在占领德国的四年当中，法国每天都拿出五亿法郎维持占领区的德国人的生活。赫里欧说，美国不要在西方的共同防务上对法国期望过高。法国肯定可以贡献象英国那样多的力量，但是无论如何，美国总不能要求象比利时那样的国家动员跟美国那样多的兵力罢？！②

---

① 瓦尔特·米里斯主编：《福莱斯托日记》，伦敦，1952年版，第292—293页。

② C·L·索尔兹伯格：《一长串逝去的烛光——回忆与日记》，麦克米伦出版社，1969年版，第606—607页。

从苏联方面讲，它在战争中受到的人力、物力损失最沉重，因而最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重建。这一点连丘吉尔也是承认的，他说："我不相信苏维埃俄国想要打仗。"[1]

总之，一方面，东西双方都不想、也不可能再打一场"热战"；另一方面又必须把双方的关系绷得很紧，紧到不致把弦挣断的程度。一九四八年的"柏林封锁"事件是对双方意图的一次检验。如果说，在希腊问题上，美国想试一试苏联的反应[2]，那么，"柏林封锁"则是苏联对西方的试探。形势虽然如同箭在弦上，但是，西方的"反封锁"对策是架起通向西柏林的"空中走廊"；同时，美、英、法的代表受命通过多种渠道同苏联接触，直至把问题提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去，而不是迎头相撞[3]。

这样的"冷战"局面到一九五五年发展到了顶点，双方都把各自的军事集团完善化了，从而形成了两种力的长期僵持：紧张气氛既发展到了顶点，又不越过极限，这就是那个时期的形势特点。"冷战"终于没有衍成"热战"，但对峙仍在继续。

---

① 温斯顿·丘吉尔：《演讲全集》，第七卷，第7292页。

② 参阅《福莱斯托日记》，第292—293页。

③ 参阅彼得·卡尔沃科莱西主编：《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牛津，1952年版，第246—247页。

• 第四章 •

欧洲的"集团化"之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诞生

欧洲的"集团化"是"冷战"的体现，欧洲的"集团化"在西方的具体化则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由于多数西欧国家都参加了北约组织，而北约成员国又大部分集中在西欧，因此北约组织的诞生便成为把欧美联结成一个军事集团、并促进欧洲地区"集团化"的关键步骤。

然而，在战后的条件下，在组织北约军事集团时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只能是美国。西欧国家——包括象英国、法国那样的大国——只能起赞助、推动的作用。西欧国家在战争结束以后确有联合美国、抵御苏联的要求，但实现这个要求却首先取决于美国。所以北约的成立，不能离开美国的主持和西欧有关国家的促成。战后，西欧和美国在相互需要的基础上结合了起来。

当然，这种结合，是在一定条件下的结合，并非全然天衣无缝；当着条件发生了变化的时候，结合中的矛盾自会滋长。这方面的问题将

随着叙述的进程而展开，本章不作专门论述。

想要着重说明的是，当北约组织诞生之日，虽然作为对立物的华沙条约组织还没有成立，在欧洲出现两个对立集团的趋势已经成为战后国际事务中的现实了。

（一）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三个重要文件

早在战争后期，丘吉尔已经明确说，苏联将是西方的主要对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丘吉尔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在美国富尔敦发表演说，这篇演说一般被看作是“冷战”的开篇。但是，当时除了美国以外，西方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同苏联对抗中起领头作用。美国形成和制定所谓“遏制”政策（战略）的主要年代是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开始具体化。没有美国的对苏“遏制”政策，就不可能有北大西洋公约。

在战后的国际关系发展史中，“杜鲁门主义”是美国政府把“冷战”作为国策的起点，所谓对苏“遏制”政策从此明确起来。而“马歇尔计划”则是推动西方结成以美国为首的、针对苏联的西方联盟的一个关键性的步骤。这将在下一节中详细论及。为了了解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形成过程，下面几篇有关美国外交的文件是不应该忽视的。

这些文件是：乔治·凯南的“长电报”和论文，克拉克·克里福德关于美苏关系的报告等。

一、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发给美国国务院一封长达八千字的“长电报”，分析苏联国内形势和对外政策，并提出凯南本人的看法。①

一九四六年初，美国国务院以苏联退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

① 乔治·凯南：《回忆录1925—1950》，第547—559页。

基金为题，电示凯南就苏联国内外政策动向写一个分析性的报告，[①]这就是“长电报”的起因。这封“长电报”从详细分析苏联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入手，谈到苏联从一九一七年以来几十年所处的国际环境，认为：“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的核心观点的最深处，是俄国人传统的和直观的不安全感。”[②]在凯南看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因素是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一直采取敌视态度的决定性因素。苏联确信，只要“苏联的力量是稳固的”，“美国社会的内部和谐”和“传统生活方式”就必定会遭到破坏。[③]凯南认为：“今天在消灭了德国和日本之后，在有了最近一次战争的先例之后再谈什么对苏联实行干涉的可能性，便纯属无稽之谈。”[④]因此，“如何对付苏联无疑是我们（指美国）的外交从来遇到过的巨大任务，甚至是它将面对的最重大的任务。这应当是我国普通政治工作人员在当前进行工作的出发点。”[⑤]凯南在“长电报”中非常明确的一点是，美国必须把“对付”苏联放在美国对外政策的首位，至于怎样“对付”，“长电报”没有明确，只是笼统提到“西方世界”要“团结、坚定和有力”。[⑥]他说：“我们（指美国）必须为其他国家设计和提出一幅我们希望见到的，远比我们过去提出过的积极得多和有建设性得多的那种世界图景。只是催促人们发展与我们自己相似的政治进程是不够的。许多别国的人民，至少在欧洲，对于过去的经验已经厌倦和怀有恐惧心理了；他们对于抽象的自由兴趣不大，而更关切安全问题。他们正在寻求的是引导，而不是（承担）责任。在给他们以引导方面，我们应当比俄国人更能干一些。除非我们动手干，否则，俄国人肯定会干的。”[⑦]

---

① 乔治·凯南：《回忆录1925—1950》，第292页。
②③ 乔治·凯南：《回忆录1925—1950》，第549页。
④⑤ 乔治·凯南：《回忆录1925—1950》，第557页。
⑥ 乔治·凯南：《回忆录1925—1950》，第558页。
⑦ 乔治·凯南：《回忆录1925—1950》，第559页。

凯南的“长电报”不仅在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中传阅，而且当时主张对苏联持强硬态度的海军部长詹姆士·福莱斯托也从美国驻苏联海军武官拿到一个附本，深加赞许，并收进自己的日记里。① 这年冬天，凯南又写了一份题为《美国和俄国》的意见书，供福莱斯托本人参考。这份参考文件说：“对于他们（指苏联）来说，一切外国人都是潜在敌人。俄国的外交手法，一般说来东方的外交手法都一样，集中的表现就是以俄国吓人的武力给对手以强烈印象……”，因此同苏联没有“友好关系”可言。② 在这份文件中，凯南提出了“指导”对苏关系的十条“准则”。这十条是：1.“同他们（指苏联）不要过从密切。”2.“不要设想同他们会有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共同目标。”3.“不要妄作善意的姿态。”4.“除非我们准备以切实的方式让他们感觉到只要不同意我们的要求我们就不高兴的时候，决不向俄国人提出任何要求。”5.“通过正常的级别（同苏联）打交道，并坚持让俄国人对同一级别的行动承担完全的责任。”凯南解释说，这意思就是，不单纯由于同某一级打交道不顺利便把问题提到上一级；相反，美国应该迅速而果断地采取“报复或惩罚的行动”。6.“不鼓励同俄国人举行高级会晤，除非这类创议有至少百分之五十的成份来自他们一方。”7.“对于我们看来似乎是些小事情也不害怕使用重武器。”凯南认为这一条十分重要，并不是用铁锤打苍蝇，他认为只有态度强硬才能使对方却步，所以应该“在任何时候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都保持坚定和警觉的姿态”。8.“不要害怕（在美苏关系上）出现不愉快和公开分歧。”9.“在我们既定方针下，把政府对俄活动和政府所能影响的一切这类美国的民间活动协调起来。”凯南说，就是要使美国朝野在对苏关系的方针上“集中力量”。10.“加强和支持我国在俄国的代表机

① 瓦尔特·米里斯主编：《福莱斯托日记——冷战的内部历史》，第142—146页。
② 乔治·凯南：《回忆录1925—1950》，第560页。

构。”①

这份意见书无疑在同苏联对抗上比“长电报”具体多了，而且实际上已涉及军事“遏制”问题。

二、总统特别顾问克拉克·克里弗德一九四六年九月起草了一份美苏关系“长篇报告”。②据说，这份报告是根据杜鲁门的指示、在凯南的“长电报”的基础上草拟的一份内部文件；它在二十多年当中一直属于“绝密级”文件，美国在这期间许多对苏政策都可以放在这份文件提出的“政策设想”中得到最好的理解。③克里弗德的报告是了解美国制定对苏“遏制”政策的一份重要材料。核心是把同苏联对峙提到美国对外政策的首位，为此必须加强美国与西方国家的联盟关系，并在军事上作充分准备。

克里弗德的报告分析当时形势时说：“我们对德国和日本的恐惧已成过去，而对苏联的疑虑——疑虑是恐惧的第一步——则正在增长。”④所以，“今天美国所面对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美国同苏联的关系问题。”⑤克里弗德认为，美国人必须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客观地和勇敢地”对待这个现实。⑥既然不可能指望取得同苏联的合作来解决世界问题，那么美国就应当同英国和其它西方国家联合起来，以建立“一个我们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将追求自己的目标”，并确认“苏联的势力范围是个截然不同的实体”，同它纵使不是“注定”要发生冲突，也不可能同它有“共同目的”。⑦

克里弗德报告与凯南的“长电报”的不同点，是突出了军事上对峙的重要性。克里弗德认为，“苏联控制的地区愈大，本国

---

① 乔治·凯南：《回忆录1925—1950》，第560—565页。

②③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268—304页。

④⑤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259页。

⑥⑦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300页。

（指美国）的军事需求也就愈大”；“美国的军事计划应该以如下的设想为基础，即：起码在最近几年之内，西欧，中东，中国和日本仍将处在苏联的影响之外。如果苏联得以控制其中的一个或更多的地区，那么为了制止苏联军事力量并阻止它进一步得逞所需要的（美国）军事力量就将要大大增加。”①

克里弗德认为，对于是否会同苏联发生战争也要有准备。这样的战争可能是“全面”的，其“可怕的程度”将超过“历次战争”，所以无论是进攻性武器或防御性武器，都必须“经常研制”，而“重要之点是，美国必须准备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原子战争和细菌战争”。②

在文件的末尾，克里弗德这样概括他的政策建议：“总之，只要苏联政府坚持它的现行政策，美国就应当保持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以限制苏联和把苏联的影响圈定在目前的地区之内。对于一切今天不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内的国家，（美国）都应给以慷慨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帮助它们反对苏联的侵入。（美国）也可以给苏联政府以经济援助，也可以同苏联进行民间贸易，但其结果必须有利于我们的利益，而不是单纯地加强苏联的计划。美国和苏联之间应当继续有文化来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容忍共产主义在这类交流项目的名义下对美国进行颠覆和渗透。”③

在涉及美国对外政策的文件当中，象克里弗德报告这类措词和构想的文章是很多的，但在战争结束以后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个报告便恰好表明美国正处在调整和修改同苏联的战时盟国关系的过程——从战时反法西斯的盟国到争夺世界势力范围的对手。克里弗德在起草这个报告时曾经与马歇尔、艾奇逊、福莱

---

①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268—304页。

②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301页。

③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304页。

斯托等决策人物商讨，所以克里弗德虽不过是一个年青的律师，但这份报告却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克里弗德在报告提出的对立的军事集团的构想，联合西方同盟的构想，都是以后几年美国政府要做的。

三、乔治·凯南一九四七年七月在美国《外交季刊》第二十五期发表了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文章。① 发表这篇文章时，凯南已经就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

凯南于一九四七年二月曾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作了一次美苏关系的演讲，并根据这篇演讲整理成文，交《外交季刊》发表，发表时署名"X"，所以《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即被称为"X论文"（X ARTICLE)。但是发表后不久，人们很快就知道了是出自凯南之手。

文章公开发表的时候，"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都已出笼，但是文章的思想早就有了，而且凯南实际上是美国对苏政策的主要智囊人物，所以人们都把这篇论文看作是从理论上阐述"遏制"政策的代表作。

凯南这篇论文的基础仍是"长电报"，突出从苏联的社会性质分析苏联的国内外政策，所以它基本是"长电报"的延续和发展，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篇论文多次使用了"遏制"(Containment) 这个字，这是"长电报"中所没有的。文章强调苏联总有一种极强烈的"不安全感",② 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目的同苏联政权及其所控制的国家的利益是敌对的"；③ 因此，"任何美国对苏联的政策的主要因素，必须是对俄国扩张倾向实行长期的、耐

---

①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 330—343页。

②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 332 页。

③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335 页。

心的、但同时又是坚定和警觉的遏制”，① 而且“要针对一系列根据苏联政策的转移和策略部署而经常交换的地理和政治点”，通过“对抗力量的巧妙而警惕的运用”来“遏制”苏联对西方世界的压力。② 凯南还认为，同西方世界相比，苏联仍然“比较弱”，它的政策“十分机动”，苏联社会的缺陷也会“削弱自己的全部潜力”，所以美国可以对于在任何地方实行“一项旨在以抗衡的力量对抗俄国人的坚定的遏制政策”抱有“合乎情理的信心”。③

凯南这篇论文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争论。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这篇论文发表以前的“长电报”和克里弗德报告等内部文件，因此不觉得“x论文”有什么新奇之处，但在当时前两份文件都还没有公开，这篇论文的发表便特别触目了。然而不管有什么样的争论，无论是主张对苏“强硬”的人、或是主张对苏“温和”的人，都从不同角度认为“x论文”与“杜鲁门主义”是一致的。当时因对“遏制”政策有不同见解而批评凯南文章的美国名记者李普曼就说，这篇论文不仅是对“苏联行为的根源”所作的“分析性阐述”，而且也是关于“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那一部分美国对外政策的根源”的一份“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文件”。④ 后来，凯南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他的文章被人们误解了，说他本来是反对对苏联搞“军事遏制”的，之所以被误解的一个最重要原因，也是文章“最严重的缺陷”是没有把“遏制”这个字的含义说明白，说他的意思本来指的不是“用军事手段去遏

---

①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337页。

②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338页。

③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341页。

④ 瓦尔特·李普曼：《冷战——一份对美国对外政策的研究报告》，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1972年版，第4页。

制某种军事威胁”而是对“某种政治威胁进行政治遏制”,[①]这是二十年后凯南的一种辩解之词，前面提到的当初凯南给福莱斯托写的《美国和俄国》的十条意见书足资证明。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凯南对于苏美关系问题的观点已有了新的发挥，许多重要观点有了变化，凯南实际上修改了他的“遏制”政策的理论，这就不属于这个时期应该探讨的范围了。[②]

总之，有一点是清楚的，这里所说到的几篇美国外交文件都反映了一九四六年是美国外交的决策机关动员其智囊人物、政治工作人员制定战后对外政策，包括对欧政策的重要年代，就是说第一，从战时以德为重点转向和平时期以苏为重点，从而确定把对苏“遏制”政策放在美国外交政策的首位。第二，为了加强同苏联的对抗，美国需要把西欧各国联合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种集团的力量同苏联对峙；西欧成为美国与苏对峙的战略蓝图中的伙伴，已是必然趋势，剩下的便是怎样把西方国家组织在以美国为首的联盟集团里了。

（二）“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通往北约

“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发表，说明美国公开地走上了对苏“遏制”政策的道路。所以有人把“杜鲁门主义”视为美国在推行对苏“遏制”政策中采取的一次“主动行动”，表明美国将对苏联实行“更加强硬的政策”。杜鲁门自己也说:“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的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③]“马歇尔计

① 乔治·凯南：《回忆录1925—1950》，第358页。

② 《同凯南的谈话》，见查里斯·加蒂主编：《把北极熊关起来——遏制和冷战》，纽约版，第27—39页。

③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中译本，第121页。

划”则利用西欧在战后在经济上的困境，通过所谓“欧洲复兴计划”把分散的西欧控制起来，从而在政治上促进了美国和西欧在同苏联对抗中的联合，所以，是“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迈进的主要步骤之一”①，也是一种所谓“反对共产党人的干预行为”。②

“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目的都是为了“遏制”苏联，前者着重军事和政治对抗，后者则借重经济的手段，是“同一颗核桃的两半”。③

“杜鲁门主义”，指的是杜鲁门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在国会发表的咨文，它系统提出了一个反苏反共的纲领。

“杜鲁门主义”的诱发点是希腊和土耳其形势；但它的实际意义则是全球性的。

苏联和土耳其之间一直在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问题上、在原俄国领土问题上存在着争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英国插手土耳其问题，美国提出土耳其政府“对莫斯科的回答应该‘合理而又坚定’”。④英美和苏联对土耳其的争夺涉及到对黑海、爱琴海以及东地中海的争夺。

希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占领期间，受到苏联支持的希腊民族解放阵线一直坚持反法西斯的武装斗争，战后，流亡政府在英军庇护下回到希腊，对民族解放阵线进行镇压，希腊爆发了内战。希腊政府以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受到外界支持为由向西方呼吁援助，已经派有军队进驻希腊的英国无能为力，于是求救于美国。显然，希腊问题也涉及到对东地中海地区的争夺。

杜鲁门对当时这一地区的形势描述如下：“俄国人除了设法通过伊朗包围土耳其外，还开始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要求取得领土上的让步。一九四六年七月，莫斯科给安卡拉送去一份关于调整

①② 托马斯·贝雷：《美国人民外交史》，纽约，1934年版，第801页。

③ 威廉·克伦威尔：《马歇尔计划，英国和冷战》，英国《国际问题评论》第八卷，第四期，1982年10月。

④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中译文，第111页。

达达尼尔海峡使用规定的照会，按照苏联的建议，一切非黑海沿岸的国家都将受到排斥。换句话说，我们和英国都将被排除于未来的任何协议之外，而土耳其将被迫承受三个共产国家——俄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联合力量。……（如果达达尼尔海峡保不住）结果就一定是希腊和整个中近东陷入苏联的控制之下。"①而且如果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在希腊取得胜利，"希腊便会陷落"，"铁幕便会从东地中海伸展过来"。②"如果希腊陷落了，土耳其将成为共产主义大海中的一个无法防守的前哨。同样地，如果土耳其送给了苏联，希腊的处境将十分危险。"③因此，杜鲁门认为美国不能坐视，必须固守希、土。杜鲁门批准在国务院内成立了一个以乔治·凯南为首的政策计划司，研究对策和为杜鲁门准备一项向国会提交的咨文。上一节已经谈到，凯南刚刚为福莱斯托起草了《美苏关系》的内部文件；凯南向对外关系委员会作非正式演说也是在这个时候。

杜鲁门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向国会提出的咨文中谈到关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时说，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创造各种条件"，使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都能采用一种"不受强制行径支配的生活方式"；"除非我们愿意帮助自由人民维持他们的自由制度和国家完整，以抵制企图将极权政体强加于他们的种种侵犯行动，我们就将达不到我们的目标。这不过是坦白承认：通过直接或间接侵犯而强加于各国自由人民的极权政体，削弱着国际和平的基础，因而也危害着美国的安全。"他接着举了波兰和罗马尼亚为例。换句话说就是，凡是不受美国控制而实行人民民主制度的国家，都被诬为实行了"极权政体"，而且竟然"危害着美国的安全"！

关于希腊问题，杜鲁门说："只要看一下地图便足以了解，希

---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中译本，第110—111页。

②③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中译本，第115页。

腊国家的存在和完整，从远为广阔的角度去看，是具有严重意义的。"它必将影响到中东地区，而且，"将给欧洲的一些国家带来深刻影响，这些国家的人民正在医治战争创伤的同时，向种种巨大困难进行斗争，以维持它们多种多样的自由和独立地位。"美国打出捍卫"自由"和"独立"的旗号，是美国在"冷战"中习用的语言，其煽动性和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意图，是无需多加解释的。至于土耳其，杜鲁门说，虽然不象希腊那样严重、但也需要美国的支持。杜鲁门要求国会拨款四亿美元"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说这不过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开支（三千四百一十亿美元）的千分之一。同时，美国还将派出军事和文职人员到希腊和土耳其去。

这篇咨文的结尾是画龙点睛的、极为露骨的几笔："极权政体的种子是靠灾难和匮乏发育滋长的。它们散布、生长在贫困和不和的秽土中。当一国人民要求改善生活的愿望破灭时，它们便很快茁壮成长起来。""世界各国的自由人民都在期待我们的支持，以维护他们的自由。倘若我们在领导方面举棋不定，我们就会使全世界的和平受到危害，我们也必定使我国的繁荣受到危害。"①

显然，"杜鲁门主义"的实质绝对不只是希腊和土耳其问题，它无异于一项遏制"苏联的全球性战略宣言"，矛头所向是针对着苏联的。施莱辛格把这篇反共檄文收进美国外交政策文件集中的"东欧和苏联"卷，是有他的根据的。舆论界的反应也没有把它的实际意义仅限于希、土或包括希、土在内的巴尔干地区。杜鲁门的国会咨文发表后，美国参议员爱德温·约翰逊说："我觉得有点象一次不宣而战的战争宣言"。另一位参议员肯奈特·威利则说，"这等于是对世界各地极权主义力量的一次真正宣战"。共和党议员詹姆士·范·赞特说："我看，我可以把我的

① 全文见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309—313页。

海军制服从箱底翻出来了。"不少国会议员把杜鲁门的咨文看作是"一个新的世界范围的门罗主义"。①

托马斯·贝雷在评论"杜鲁门主义"时说:"杜鲁门主义在记者们称之为'冷战'当中是主要号炮——这是一场不用射击的办法发动的战争。同时，它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为新的遏制政策——或曰在紧要地点阻滞苏联前进的计划——揭开了大幕。"②

又说:"杜鲁门主义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它使美国在'冷战'中取得了'遏制'共产主义的攻势。它虽然只针对希腊和土耳其，但却有普遍意义，而且直接通向重要得多的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相当于某种租借法案，不过这一回是对准共产主义、而不是对准法西斯主义的。它把起初门罗主义的不干涉原则翻了个个。但是也象门罗主义一样，目的在于长期的防务。"③

几个月以后的"马歇尔计划"是"杜鲁门主义"的延续。如果说"杜鲁门主义"是一个政治纲领，"马歇尔计划"则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通过经济复兴方案实现美国对西方盟国的控制的更为具体的方案。其精神实质和要达到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在策略上（手法上）有所不同，有所侧重。曾任美国驻苏联大使、负责苏联事务的国务卿特别助理和代理国务卿的查里斯·波伦说，在他和马歇尔看来，杜鲁门的国会咨文"所写的反对共产主义的浮华辞句似乎太多了一些"。"写进了过多的好听的废话"，④而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则"删掉"了"关于共产主义的明确提法"，强调"计划"的目标是"战胜饥饿、贫困和混乱"。因此，"各国的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计划，就无异是站到赞同饥饿、贫困、自暴自弃和混乱的地位上去了"；"从宣传的观点看来"，这样作"对于那些内部有强大共产党的

① 《纪事年鉴——1947》，第7卷，纽约，1948年版，第78页D1—G1。
② 托马斯·贝雷：《美国人民外交史》，第797页。
③ 托马斯·贝雷：《美国人民外交史》，第798—799页。
④ 查里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第261页。

国家来说是很有分量的”。①

如上所述，“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目的都是为了抗衡苏联；“马歇尔计划”的特点是通过经济援助手段使欧洲各国，实际上是使西欧各国联合起来，与美国共同设计出“一套符合它们需要的解决办法”。②因为当时西欧那种生产下降、物资匮乏、力量虚弱、困顿不堪的状况，是没有办法和美国一起对付苏联的。所以美国看到，赶快把西欧扶植起来，并且把它联合成一个整体，实为抗苏之所必需。杜鲁门说：“如果能够引导欧洲国家把欧洲的经济问题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看作不相关联的各个国家的问题，来寻求自力更生的办法，并实行互相合作，那么美国的援助将更为有效，同时恢复后的欧洲的力量也更能持久。”③“除了经济上的考虑以外，这个实行合作的主张将在欧洲国家中激起新的希望和信心，从而提供生动的论据来对抗共产党那种自暴自弃的态度。”④阿登纳在回忆录中也说：“美国的经济需要欧洲的销售市场，同时美国从它面对世界共产主义的安全考虑出发，和出于它自己的经济原因，就必须关心欧洲的复兴”。⑤“马歇尔计划”的反共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以控制西欧、乘人之危的意图也是很明显的。已经在野的戴高乐于六月二十九日在里尔的讲演中第一次评论马歇尔计划时提出：从美国得到的任何援助都应该通过在平等关系上的谈判；七月九日在巴黎英美报刊联合会上又说，这个计划实际上是美国方面高姿态地承认它与欧洲的利益一致——换言之，是“开明的自私自利”的一例。后来戴高乐还不断对“马歇尔计划”附加的条件提出批评。⑥美国名记者白修

①② 查里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第265页。

③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中译本，第129页。

④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中译本，第130页。

⑤ 《阿登纳回忆录》（一），中译本，第120页。

⑥ 希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下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09页。

德联系英国在战后的衰落对“马歇尔计划”要达到的目的有过十分形象的描绘。白修德说，美国所追求的就是要“复兴一个曾是英国人所开创的公平的、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①白修德在一九四九年左右，即“马歇尔计划”推行的第二年，在西欧的经历使他感到，“十分显然，（英国）工党政府管辖下的英国人已不可能在由英格兰人开创的开放的旧世界中继续作为一个大国存在下去了。”②“英国人和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的制定者之间的比较”令人回想到上个世纪的“英国世纪”。“在那个开拓者的世纪里，整个地球成为一体。欧洲把整个地球变成一个整体——而英国又统领着欧洲。到本世纪初，伦敦简直成了世界的首都。”四面八方的物资、商业金融的活动都通过伦敦集散和流通。“（世界上的）所有的海洋、水道、船舶、保险捐税都经由欧洲的码头结成一体。由黄金估量出各种物品的价值；而黄金的价格则由伦敦确定……不管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买或卖，都可以在伦敦得到提取黄金的保证。”③这就是十九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形象。战后的美国竭力要用美元去“抓到手”或“再现的”，正是英国在十九世纪的这种地位。④其实还远不止此，“马歇尔计划所要创建的是一个比十九世纪具有高得多的效率的二十世纪贸易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指美国）将是为首的保证人，最高级的武士，唯我独尊的银行家和保护伞的永恒持有者。在我们的保护伞的荫庇下没有宠儿；就连我们最大的盟友英国人也休想享有特殊的待遇。”⑤这里特别提到连英国人也不能享有特权，是有所指的。在“马歇尔计划”发表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曾在伦敦向来访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克莱顿提出英国在战后收支平衡方面情况严

---

① 白修德：《历史的探索》，纽约，1979年版，第286页。
② 白修德：《历史的探索》，第285页。
③ 白修德：《历史的探索》，第287页。
④ 白修德：《历史的探索》，第288页。
⑤ 白修德：《历史的探索》，第294页。

重，美国和加拿大战后提供的五十亿美元贷款行将告竭，将会影响英国承担全球性义务。贝文说，如果得不到美国的额外支持，他"也许不能如愿地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支持马歇尔元帅"。[①]又说，假如英国在财政上得不到可以在欧洲复兴方案中发挥全面作用的援助，那英美关系就会变得同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相类似了，并且危言耸听地说："美国把英国同其它国家等同看待，将正中俄国战略的下怀，也就是说，美国将遇到挫折，并从欧洲撤出，联合王国将会陷于无助和美元告缺的处境，到那时俄国人作为纯纯粹粹的另一个欧洲国家将居于大陆的统帅地位而同英国打交道。"[②]但是，克莱顿始终无动于衷，坚持说"马歇尔计划"是一个把欧洲作为整体的方案，不能把英国从欧洲分出来单独对待；因为脱离总的欧洲援助方案而给英国特殊援助将违反不搞零敲碎打的原则，而且国会也不可能批准。这次英国争取特殊待遇终于没有成功。

总之，"马歇尔计划"担负着抗衡苏联和控制西欧的双重任务。

下面就来谈谈"马歇尔计划"本身。

为制定"马歇尔计划"作了直接准备的，一是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五月九日在密西西比州克利夫兰州立教育学院的讲话，再一个是凯南作为政策计划司司长于五月二十三日受命向国务院提出的关于"欧洲复兴"的建议。艾奇逊提出，美国国会应该通过立法拿出一笔钱来做这件事。后来杜鲁门把艾奇逊的这次讲话看作"马歇尔计划的开场白"和"开端"。[③]凯南则具体设计了"欧洲复兴"的方案，即不由美国主持其事，而让欧洲人为了自己的"复兴"而向美国提出援助要求，美其名曰"自助"、"自

① 《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第三卷，第269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7年》，第三卷，第271页。
③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130页。

立"。[①]这些建议大体都在"马歇尔计划"中体现出来了，也是"马歇尔计划"的重要依据。

六月五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演说。这就是后来所说的"马歇尔计划"。马歇尔的演说很短，是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把美国政府当时的欧洲政策浓缩为十五分钟的。马歇尔在谈及欧洲经济困难、急需"大量的额外援助"之后说："美国应该尽其所能地帮助它在世界上恢复正常的经济状态，这是合乎逻辑的。否则就不可能有稳定的政治与有保障的和平。我们的政策不是反对任何国家或任何主义，而是反对饥饿与贫穷、冒险和混乱。"他说："任何愿意协助完成恢复工作的政府都将得到美国政府的充分合作。任何图谋阻挠别国复兴的政府，都不能指望得到我们的援助。"

马歇尔还说："在美国进一步努力改善局势和帮助欧洲走上复兴道路之前，为使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能够收到适当的效果，欧洲各国必须就形势的需要和自己将承担什么义务取得一定程度的协议。由美国政府承担责任，单方面地草拟一项旨在使西欧在经济上自立的计划，这种做法既不妥当也不会有效。这是欧洲人的事。我认为，欧洲必须首先提出倡议。至于美国的任务，应该在拟定一项欧洲计划时给予友好的协助，然后在我们实际所能做到的范围内，支持这项计划。这个计划必须是联合性质的。假使不能商得所有欧洲国家的同意，也应商得一部分国家的同意。"[②]

马歇尔的演说和杜鲁门的国会咨文，宗旨相同，但在表现形式上（或者说策略上）很不同。例如用语比较温和，不象杜鲁门咨文那样有浓厚的火药味；只侧重谈欧洲的经济复兴问题，不象杜鲁门咨文那样露骨的反共。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马歇尔在

① 乔治·凯南：《回忆录1925—1950》，第337页。

②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一卷：《西欧》，第52—54页。

演说中使用了"欧洲"这个含糊的地理概念，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当时的人自然会问：这里的"欧洲"是否包括苏联和东欧呢？对于这一点，马歇尔后来说，这项"复兴欧洲"的计划包括"亚洲以西的欧洲地区"。① 那么怎样解释"马歇尔计划"的这个考虑呢？怎样解释它与"杜鲁门主义"的精神是一致的呢？既然说"马歇尔计划"是为了抗衡苏联，为什么又把苏联和东欧包括在计划的范围之内呢？英国威廉·克伦威尔教授的分析基本上是符合美国政府的策略考虑的。在谈到"马歇尔计划"在西欧的推行之前，有必要先把这个问题澄清一下。看来美国这样做有以下三层用意：

一、一项包括苏联和东欧在内的"复兴计划"有利于争取欧洲人。"杜鲁门主义"咄咄逼人的反共调子，曾引起了对美国不利的反响。西欧一般舆论都害怕把局势搞紧张，更怕再打仗。美国国务院援外委员会感到，在西欧有影响的选民们对于组织"反共十字军"不会感到有吸引力，对于"在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中站队的主张"都抱有"抵制"态度；所以美国在宣传上"应该避免采取直截了当的反共路线"，把欧洲复兴计划建筑在"纯西方集团"的基础上也照样会产生"相同效果"。② 瓦尔特·罗斯托认为，西欧人除了极少数人之外，都不愿欧洲的分裂"具体化"。③ 凯南也持同样看法。虽然在政策建议中他的立场十分明确，但他认为，由于"当时欧洲政治的首要事实"，必须避免给人以发动一场"意识形态战争"的印象，认为应该在表述方式上不要把欧洲复兴问题同美苏关系挂起钩来。④ 克伦威尔说，在"泛欧"的范围内提出"马歇尔计划"，并不是美国政府想这样做，这无宁是出自一种"策略上的必要"；如果"马歇尔计划""毫不隐讳"地针对苏联，那就会在欧洲引起"消极的反应"，而且美国

① 威廉·克伦威尔：《马歇尔计划，英国和冷战》。
②③④ 威廉·克伦威尔：《马歇尔计划，英国和冷战》。

还准备承担使欧洲分裂加剧的责任。① 当时凯南主持的政策计划司在准备“欧洲复兴”的建议以及查理斯·波伦在为马歇尔起草演说稿时，都是考虑了这些因素的。②

二、一项包括苏联和东欧在内的“复兴欧洲计划”有助于瓦解或离间苏联和东欧的关系。战后东欧的经济同样十分困难，也面临着恢复战争创伤、发展经济的严重任务。如果东欧竟也有几个国家接受了“马歇尔计划”，就会产生对西方十分有利的政治局面。当波兰和捷克曾表示接受邀请参加研究“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时，西方国家真的有过这种幻想。杜鲁门回忆说：“马歇尔的建议有一度看起来好象不仅可能收到复兴经济的结果，而且也可能产生揭开‘铁幕’的结果。”③ 当时的英国工党政府也曾对“马歇尔计划”在东欧可能产生影响，有过非非之想。艾德礼说，当波兰和捷克对“马歇尔计划”表示有兴趣时，贝文外相关于东西欧可能实现一体化的希望便“大大膨胀起来了”。正在英国访问的克莱顿同意贝文的想法，认为，“马歇尔计划”也许真是降下东西方之间“铁幕”的最快途径。④ 但是，波兰和捷克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和苏联一起拒绝了“马歇尔计划”。结果，“马歇尔计划”的这个算盘落了空。

三、也是最重要的，美国深知苏联根本不可能接受“马歇尔计划”，把苏联和东欧包括进来无非是为了把分裂欧洲的责任推给苏联。美国不仅十分清楚，苏联不会接受“马歇尔计划”，而且美国也并不希望它接受。⑤ 马歇尔曾说，如果一开始就把苏联和东欧排斥在计划之外，就会吓跑了欧洲人，有的欧洲国家就会表现迟疑。⑥ 而把苏联和东欧包括进来，结果必定是苏联“自外”于“马歇尔计划”，⑦ 分裂的责任便在苏不在美了。事实上，英

---

① 威廉·克伦威尔：《马歇尔计划，英国和冷战》。

② 查理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第263页。

③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133页。

④⑤⑥⑦ 威廉·克伦威尔：《马歇尔计划，英国和冷战》。

法苏三国外长于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二日在巴黎会晤时，莫洛托夫便明确拒绝了“马歇尔计划”。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马歇尔计划”在西欧的落实。对于“马歇尔计划”，最早作出响应的是英法两国。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于六月十三日就表态支持；十七日贝文前往巴黎，与法国外交部长皮杜尔就马歇尔计划的落实问题进行协商，两国外长达成协议成立若干专门委员会，以估算西欧需要多少援助。十九日，英国在野的艾登和其他保守党人也表态支持。二十日，法国外长皮杜尔在国民议会上说，未来的几个星期对于“世界团结的未来”将具有决定意义。①

苏联拒绝“马歇尔计划”以后，英国和法国便于七月三日邀请所有欧洲国家于七月十二日出席研究“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希腊、荷兰、冰岛、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土耳其、奥地利、丹德、瑞典和挪威接受了邀请，芬兰以“政治和地理原因”婉言谢绝，苏联和东欧国家拒绝了邀请。巴黎会议一直进行到九月，决定接受“马歇尔计划”，成立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后来改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向美国提出一百六十亿至二百二十亿美元的援助要求。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杜鲁门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了总额为一百七十亿美元的“欧洲复兴方案”。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完成了使“马歇尔计划”具体化的法律手续，期限订为五年，法案规定，美国将拨款援助西欧各国作为复兴战后经济之用，凡参加“欧洲经济复兴计划”的成员国都分别和美国政府签定协定，受援国必须购买一定数量的美国货，尽快撤除关税壁垒，取消或放松外汇限制，向美国提供使用美援的情况报告，向美国提供所需要的战略物资，设立由美国控制的“对等资金”，保障美国私

① 《纪事年鉴——1947》，第7卷，第189页H2—K2。

人投资和开发的权利。法案还规定，对于凡用美援物资为“任何欧洲非成员国”生产商品的成员国，美国得拒绝给予援助，美国也不给“全部或部分（领土）在欧洲的非成员国（发放）任何物资的出口许可证”。[①]这种行文堪称“弯弯绕”笔法，所谓“任何欧洲非成员国”和“全部或部分（领土）在欧洲的非成员国”分明指的就是苏联和东欧各国。这一条意思就是要限制西欧国家同苏联、东欧的贸易。至此，“马歇尔计划”的国内法律程序即告完成。根据“马歇尔计划”，奥、比、丹、法、希、爱尔兰、冰岛、意、卢、挪、荷、葡、英、瑞典、瑞士等国以及法、英、美的德占区总司令于四月十六日签订了“欧洲经济合作公约”；美国在一九四八年先后和西欧各国以及西德的各占领区、的里雅斯特英美占领区分别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至五一年底“马歇尔计划”提前宣告结束时，美国根据这些协定共支出了一百二十五亿美元。从“马歇尔计划”推行的过程和后果来看，西欧各国更加在经济上依赖美国了，从而也促进了西欧和美国在对苏对抗战略的接近和协调，它在加剧东西欧的分裂、使“两极”格局的“定型化”上起了重要作用。

“马歇尔计划”宣布后不久，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苏联、法国、捷克、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于九月在华沙举行代表会议，决定成立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于九月底发表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明确提出世界已分为“帝国主义和反民主力量的阵营”的概念，强烈谴责“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侵略性，号召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奋起为维护民主、民族主权、独立和自决而斗争。

至此，世界已正式分成了战后形成的两大阵营，并逐步向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发展，这也就是托马斯·贝雷说的，“马歇尔计划”的推行是通向北大西洋公约的一个重大步骤。以后的事态

---

① 《关于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十卷，1948年，第195—219页。

表明，美国很快完成了战争期间对苏政策的转变，放开手脚以西方“盟主”的姿态策划、推动和筹组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

（三）从敦刻尔克到布鲁塞尔，从布鲁塞尔到北大西洋

正如前面已经谈到，在战后的头几年，防止德国法西斯再起和与苏联对峙，在西方战略中曾是交织在一起的。对于深受希特勒侵略之害的国家（如法国）来说，对德国法西斯的余悸不可能由于同苏联的对峙而很快消除，还需要为防止德国法西斯势力再起采取防范措施。英国和法国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签订的“敦刻尔克条约”就是这种性质的条约。选择敦刻尔克作为签字的地点，是颇有历史寓意的：八年前，希特勒肆虐西欧，在法国北部一下子把英法联军切成两节，三十三万五千英法军队困于敦刻尔克一隅，造成现代史上有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加速了法国的沦陷。“敦刻尔克条约”规定，英法在发生德国侵略威胁的情况下要相互磋商，联合行动，彼此支援，任何一方保证不签署反对另一方的条约。① 当时英法签订这个条约完全是针对德国问题的。但是，实际上，西方战略的注意力已经开始东移了。“敦刻尔克条约”签定，在丘吉尔富尔敦讲话一年之后，与“杜鲁门主义”问世几乎同时；英美扶植德国以制约苏联的方针已经公开化，东西方的紧张气氛正在加剧。

“敦刻尔克条约”签字后不久，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议。在会议上，在有关战后德国的各项重大问题上——解除德国侵略军的武装、“非纳粹化”、战争赔偿等等——没有一项不出现尖锐对立，最后以失败而散会。几个月后，“马歇尔计划”把西欧和美国紧紧联在了一起。防止德国法西斯再起的问

---

① 《纪事年鉴——1947》，第7卷，第69页B1。

题在西方战略方针中，一步一步地退居次要地位，而抗衡苏联的方针明显地跃居于西方战略的首位。诚然，西方各国在认识上并不一致，法国比较看重德国问题，英国和美国的态度比较接近；但从总的趋势上看，共同抗苏的趋势在加强，而苏联也相应地采取对抗的姿态，这在一九四七年以后是更加清楚了。

从英国来说，推行"三环"外交、维护英国的大国地位，苏联是它的大障碍，需要依靠美国的支持和英美的"特殊关系"，需要把美国捆在一个西欧、北美统一的防务体系里。这一点，丘吉尔时期就已明确。英国了解，如果没有美国，英国就根本没有力量把西欧联合在一个针对苏联的防务体系里；英国显然不能满足于停留在"敦刻尔克条约"的水平。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三日在给美国国务院的一项备忘录中说，苏联正在对西方形成日益沉重的压力；"马歇尔计划"已不足以遏止这种威胁，需要在防务上动员"政治的精神的力量"。贝文建议"组成一个以美国和大不列颠自治领为支柱的西方民主体系"，这个体系应该把斯堪的纳维亚、荷兰、法国、意大利、希腊和葡萄牙都包含进去。[①]同时，贝文开始同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磋商实现这一构想。贝文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在英国下院说，根据磋商的情况来看，英国打算先把若干个"敦刻尔克条约"式的条约联成一个"防务条约的网络"，逐步形成区域防务体系。贝文在这次讲话中的主旨就是要把美国同西欧防务联结在一起。他说，"当出现危机的时候，除非美国保证给西欧防务以支持，否则我们拟议中的任何条约都不能是充分有效的。"[②]在这以后，英、法、比、荷、卢五国即以英国外交部起草的条约草案为基础进一步磋商。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七日，英、法、比、荷、卢五国外长在布

① 《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三卷，第4—6页。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1948年，73045号。

鲁塞尔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成立了五国组成的“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条约虽然还有防止“德国侵略政策的复活”之类用词，但作为“集体防务”的条约，其范围比“敦刻尔克条约”要广泛得多。它规定，当任何缔约国在欧洲遭到侵略的时候，其它缔约国应给以军事的或其它力所能及的援助。① 这时，德国问题已发生巨大变化：西方占领区和苏联占领区都在加紧政权建设；西方六国为了建设西德国家正在伦敦举行会议；柏林局势日见紧张。法国由于对德国怀有宿怨，每每发出不协调的声音，但是从总的发展上看，法国的态度和立场正在同英美靠近。在这种背景下签订的“布鲁塞尔条约”不能不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一年前签订的英法“敦刻尔克条约”已经过时了。

对于布鲁塞尔条约，美国持什么态度呢？从表面上看，“布鲁塞尔条约”是五个西欧国家的事情，美国没有参与其事。实际上美国是积极推动的，是个没有签字的成员国。美国副国务卿洛维特三月三日在华盛顿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对西欧承担义务的问题，但在五个西欧国家就某种形式的西方联盟达成协议之前不可能明确自己的欧洲政策。② 意思是说，西欧首先联合起来，然后美国再同这个联合起来的西欧打交道，使其接受美国的“领导”。当时美国十分支持西欧把自己的力量联合在一起，但美国的决策者们还不可能预想到，若干年后，它曾经支持过的西欧联合并不一定完全与美国利益一致。总之此时此刻美国的政策是一方面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一方面把西欧联合放在抗苏的共同目标之下。就在“布鲁塞尔条约”签字的当天，洛维特就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说，“布鲁塞尔条约”的“意义”远远超过条约本身，值得美国给以“全力支持”。③

---

①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一卷：《西欧》，第130—133页。

② 《纽约时报》，1948年3月4日。

③ 美国《国会记录》，1948年3月17日，第2996—2998页。

但是根据美国的法律程序，必须取得国会的批准，美国政府才能进一步“明正言顺”地“卷入”同其它国家的军事联盟。完成这个法律步骤的便是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一日美国参议院通过的参议员范登堡提出的决议。根据这项决议，美国可以根据宪法参加“区域性和其它集体协议”。[①]这就为美国出面组织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开了绿灯，它“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的终结”，是“历史上第一次批准这类行动”。[②]

杜鲁门很快于七月二日批准了一项政策声明，声明说，范登堡决议应尽可能彻底地执行，国务院应立即着手进行“布鲁塞尔条约”国家所建议的初步会谈。同时还决定，美国代表以非会员国身份参加伦敦五国军事会议；并试探把挪威、丹麦、冰岛、意大利、葡萄牙和瑞典包括在拟议中的北大西洋公约里的可能性，而且还打算在以后把西班牙、西德、奥地利等都包括进去。[③]

在范登堡决议通过的时候，通向北大西洋公约的“华盛顿文件”已在筹备之中了。“布鲁塞尔条约”正在向北大西洋公约过渡。

布鲁塞尔条约签订以后，大西洋体系就提上了日程。英国对于把布鲁塞尔条约扩大为北大西洋安全体系表现是很急切的。法国也感到有必要把美国拉进来组成一个“防御体系”，在法国看来这也有利于限制德国。所以布鲁塞尔会议以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和法国外交部长皮杜尔即分别向美国政府提出，布鲁塞尔五个成员国准备同美国会谈条约的扩大问题。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实际上已成为“西欧未来政治、组织和战略发展的核心”，[④]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块“硬核”。[⑤]

---

①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一卷：《西欧》，第133页。

② 查理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第267页。

③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292页。

④ 皮特·卡尔沃克来西：《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牛津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109页。

⑤ 皮特·卡尔沃克来西：《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牛津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107页。

英国的表现更为急切。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贝文致电美国副国务卿洛维特，说组织一个集体安全体系，而不只是一个防御性组织，更合适些；同时也是使法国同意重建德国的唯一途径。后来，贝文在给马歇尔的电报中再次强调，美国必须对大西洋集体安全体系承担一定义务，而且应由美国倡议成立这个体系的会议。①

在这期间，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一日，美国代表、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英国驻美大使莫弗查佩尔和加拿大驻美大使皮尔逊已在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就在“布鲁塞尔条约”基础上扩大为北大西洋区域安全体系问题进行了磋商，四月一日通过了基本上是美国起草的“五角大楼文件”，表示赞同把布鲁塞尔条约扩大为北大西洋体系，并立即向有关国家的政府征求意见。

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加拿大和布鲁塞尔条约五国代表从一九四八年七月六日起在华盛顿举行了具体筹备北约的工作会议。会议以分两个阶段进行，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会议通过了《华盛顿文件》。

《华盛顿文件》是与会国代表向政府提交的关于成立大西洋区域安全体系的备忘录，备忘录附有一份关于北约条款的提纲。《华盛顿文件》反映了六国（其中卢森堡由比利时代表）对当时的局势和缔结北约问题的共同主张，②为正式缔结北约作好准备：

一、对于时局的估计，会议认为，西欧在战争中被削弱，德国出现“真空”，苏联力量超过西欧力量，并从希特勒失败以来即开始向西扩张，因此西欧普遍有“不安全感”，北美安全也因而受到严重影响。为此美国部队必须继续留在西欧，并且结成一个包括美、加在内的北大西洋安全体系。

①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290—291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8年》，第三卷，《西欧》，第238—245页。

二、会议认为，北大西洋安全体系不仅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布鲁塞尔条约缔约国，而且也要包括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和爱尔兰；在条件具备成熟时，还应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和当时还处于西方三国占领下的西德。

三、北大西洋安全体系和拟议中的北约要同联合国宪章、特别是联合国宪章的第五十一条（“联合国成员国在受到武装进攻时可以行使单独和集体的自卫权利”）挂起钩来。

四、战后西欧经济凋敝、实力虚弱，需要美国继续给以军事的和经济的援助。

“华盛顿文件”比布鲁塞尔条约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明确说西欧的“不安全感”来自苏联，布鲁塞尔条约中关于抵制“德国侵略政策”再起等语不见了。

会议进行到一九四九年三月，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和意大利都先后决定加入北约，筹备工作至此完成，四月四日十二国外长（美、英、法、荷、比、卢、加、挪、冰、葡、意、丹）在华盛顿举行了北大西洋公约签字仪式，正式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条约经各成员国批准于同年八月二十四日正式生效。

北约包括一个序言和十四条条款，核心是它的第五条和第六条。下面把这两条的全文照录如次：

“第五条　各缔约国同意对于欧洲或北美之一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因此，缔约国同意如此种武装攻击发生，每一缔约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承认之单独或集体自卫权利之行使，应单独并会同其他缔约国采取视为必要之行动，包括武力之使用，协助被攻击之一国或数国以恢复并维持北大西洋区域之安全。此等武装攻击及因此而采取之一切措施，均应立即呈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安全理事会采取恢复并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必要措施时，此项措施应即终止。”

“第六条　第五条所述对于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包括对于欧洲或北美任何一缔约国之领土、法国之阿尔及利亚、

欧洲任何缔约国之占领军队，北大西洋区域回归线以北任何缔约国所辖岛屿，以及该区域内任何缔约国之船舶或飞机之武装攻击在内。"①

北约组织创始时为参加会议的十二国。希腊和土耳其于一九五二年二月加入。

(四) 第十五个成员国

联邦德国是一九五五年五月加入北约的。联邦德国加入北约问题是与它能否拥有自己的武装联系在一起的。这需要把战后美国和西欧盟国关于西德重新武装问题的讨论，略作回顾。

杜鲁门说，没有德国，"欧洲的防御不过是大西洋岸边的一场后卫战"；有了德国，欧洲"就能够有一个纵深的防御"。他说："这种形势背后的逻辑推理是非常明显的。任何地图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只要懂得一点算术就可证明，把德国的人力加进去，对欧洲联合防御的实力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意义"。② 于是，美国于一九五〇年九月在纽约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会议上提出了重新武装西德的建议。

西方国家虽然在同苏联对峙上已经基本上一致了，但是仍不能没有疑虑。美国的建议首先受到法国的反对和抵制。参加纽约北约理事会议的法国外交部长舒曼，根据法国政府的指示表示不能同意任何建立德国军队的计划；法国认为如果接受了任何一项重新武装西德的建议，就会引起法国的"内阁危机"，而且法国舆论还认为武装西德会刺激苏联向西方进攻。③

英国的反应虽然不象法国那样强烈，但也认为一个"不加控制的德国"和美国的在西欧的武装力量"结合在一起"，固然会

① 《国际条约集，1948—1949》，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93页。
② 《杜鲁门回忆录》（二），三联书店版，第300—301页。
③ 《纪事年鉴——1950》，第10卷，第299页C1。

给苏联增加压力，然而“却会使某种完全可以接受的既成事实出现险情”。①阿登纳回忆说：

“英法两国外长的多次声明已清楚地表明，他们不同意美国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态度。我已经知道，贝文是带着反对德国参加防务的指示去参加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的纽约外长会议的。这一指示与法国政府的指示是相似的。”②

这是英国工党的态度。当时已处于在野地位的丘吉尔则是支持美国主张的。一九五〇年八月，丘吉尔在欧洲委员会斯特拉斯堡会议上提出了在大西洋公约范围内建立一支有西德军队参加的“欧洲防务军”的草案。它当时虽然没有法律上的意义，但是对于尔后重新武装德国问题的讨论却是有影响的。

根据当时的情况看，美国在纽约会议上是比较“孤立”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和与会其他部长们之间出现了“尖锐的不一致”，艾奇逊在会上曾经把德国的重新武装作为增派驻欧美军和任命艾森豪威尔为盟军总司令的条件。结果这次会议通过的公报只提到会议接受了重新武装的原则，在执行上却还有许多困难。③

阿登纳对于重新武装问题自然是最积极的。西德处于战败国的地位急于改变自己的处境，积极致力于恢复国力，以便跻身于西欧强国之列，使西德成为西欧国家中享有充分主权和完全平等的一员。阿登纳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莱茵兰党代会上说，在“东西方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德国人不能“手无寸铁，毫无防御”，如果欧洲联邦要求德国对欧洲的防务作出贡献，那么在一定情况下，德国人也会如同英国人、法国人和其他国家一样参与”。④而且针对法国的态度，阿登纳讲了这样一段

---

① 《三十年后的北约组织》，美国SR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② 《阿登纳回忆录》（一），第432页。
③ 《三十年后的北约组织》，第69页。
④ 《阿登纳回忆录》（一），第393页。

话：

“我认为，德国参加欧洲防务的先决条件，就是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同样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同等的义务以同等的权力为前提。我觉得，重新武装对于我国人民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通往重新武装的道路上，联邦共和国就可以争取到充分的主权。这是有关我们政治前途的重要问题。西方盟国，特别是法国，必须解答这个问题，到底哪种危险性大：是来自苏联方面咄咄逼人的危险性大呢？还是德国加入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危险性大。”①

显然，主要关键在于法国。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四日，法国总理勒内·普利文在一项政府声明中接过了丘吉尔的意见，宣布了关于组成“欧洲防务集团”和“欧洲军”的建议，即所谓“普利文计划”。根据这个计划，西方盟国在西欧的驻军，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都置于一个最高统帅的指挥之下，还不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的西德也向这支“欧洲军”派出少数部队。

“普利文计划”在这个时候提出，是多种因素促成的：重新武装西德是美国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的一项既定方针；英国政府虽摇摆不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未尝不同情法国的观点，但是颇有影响的以丘吉尔为代表的保守党却有意借助西德力量；法国虽然极力反对，但它形成的阻力是有限的，而且激化与西德的矛盾对法国也不利。此外，法国还感到，舒曼计划一旦实现就可以把西德战争工业的基础统管起来，也可收限制西德实力之效，所以法国政府觉得在这些条件下提出“普利文计划”，可以既缓和同美国和西德的紧张关系，又起到制约西德的作用。“普利文计划”在法国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国内并无广泛支持的基础。

---

① 《阿登纳回忆录》（一），第393—394页。

美国则感到，一意孤行地重新武装西德，在西欧各国存在不同程度的阻力，“普利文计划”出自法国人之手，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案，但是需要赋予美国的解释。艾森豪威尔说：“我所支持的计划，就是众所周知的欧洲防务集团，它是由法国发起的。根据这一计划，西德和其它五个欧洲国家（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要建立一支为北约服务的穿同一军服，遣同一预算的超国家军队。由于欧洲各国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特别是法国害怕重新武装的德国，因此尽管欧洲防务集团规定把西德武装力量合并到国际化的欧洲军队里去，但在达成一致意见上还是难以取得进展。我们必须建立一支一体化的军事力量。对北约来说，德国作为羽毛丰满的一员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除非我们能找到一个满意的安排把强大的德国分遣部队加进我们的武装力量，我们的防御安排便不能称为有效的。”① 艾森豪威尔这段话对于了解美国武装西德的政策和西欧各国的态度是很有用的。美国就这样把法国的方案接了过来，纳入美国的轨道，通过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把六个缔约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武装部队联合起来，借此使西德建立武装合法化。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五月二十七日，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以及西德在巴黎签订了“建立欧洲防务集团条约”。

条约签定了，还需要各缔约国国会批准才能成立。艾森豪威尔说：“作为北约司令官，我竭力劝说人们迅速接受这个计划。我考虑到完成这一任务是如此之重要，因此，我在一九五二年春天宣布，除非法国政府签署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我是不能安心地离开北约的岗位回到美国去的”。②

艾森豪威尔一九五三年就任总统后派国务卿杜勒斯到西欧各国游说，重点也是对法国加压；因为法国议会是否批准条约，是条

---

①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一），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7—18页。

②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二），第447页。

约能否成立的关键。最露骨的是杜勒斯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巴黎会议期间语带要挟的讲话。他在十四日的开幕式上说，如果建立西欧“政治、经济和军事统一”的事情——即建立“欧洲防务集团”——一拖再拖，美国就将被迫对它的对欧基本政策作出“令人痛苦的重新估价”(agonizing reappraisal)意思是说，美国就将不承担“保护”西欧的义务，减少对西欧的援助。杜勒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一九五四年对西欧援助的一半是给“欧洲防务集团”的，其前提是这个集团必须在一九五四年新年前后建立起来。艾森豪威尔在十六日也讲了类似的话。①

杜勒斯这些话还说中了法国政府的一种顾虑。法国外交部长皮杜尔在杜勒斯讲话之前就提出要警惕任何“把欧洲孤立起来”的动向，担心西德重新武装后美国和英国都会从大陆“脱身”，从而使法国在防务上受制于西德。皮杜尔说，至少在西德获得武装之前，美国和英国必须向西欧国家的“超国家机构”提供防范德国再起的“平衡力”和“保证”②。这指的是不久前（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艾森豪威尔、丘吉尔和拉尼埃尔百慕大会议期间讨论欧洲防务集团问题时，法国曾提出，美国必须承诺，拟议中的“欧洲防务集团”存在多久，北约组织也应该存在多久（因为“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有效期是五十年，而北约的有效期是二十年）。③

为了平息法国的疑虑，美国和英国分别表示，美国和英国不会离开西欧大陆。英国在一九五四年四月还与西欧大陆六国签订了协定，重申英国对欧洲防务承担义务。美国立刻也宣布，美国将保证它在欧洲的武装部队（其中包括驻在德国的部队），“需要呆多久就呆多久”。④杜勒斯同法国政府会谈也重提美国对欧

①② 《纪事年鉴——1953》，第8卷第417页B1。
③ 《纪事年鉴——1953》，第411页A1。
④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二），第449页。

洲防务将承担责任，但同时强调这一保证将以法国批准欧洲防务集团为先决条件。①

但是，英美的这些保证并没有使法国放心，法国政府仍一直举棋不定。一九五四年六月新上任的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在就职演说中暗示，他在把条约草案提交国民议会以前，可能要对条约进行若干修改。两个月后他透露了一些带有根本性的修改意见，如法国要求欧洲防务集团的成员国应拥有否决权；无限推迟武装部队标准化的计划等等。八月召开的六国布鲁塞尔会议拒绝了法国的提议，于是问题继续陷入僵局。

艾森豪威尔透露了法国一再拖延的原因：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日，当时代理国务卿比德尔·史密斯从日内瓦会议回国途中曾与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会谈。孟戴斯-弗朗斯表示坚决赞同各个领域的欧洲统一运动；同时说他有意拖延欧洲防务集团的原因，是要等待印度支那战争的结束。他还说，到那时他的个人威信将会提高，就可能获得多数的支持使议会批准这一条约。②

一九五四年八月三十日，法国国民议会终于还是以三百十九票对二百六十四票、四十三票弃权，否决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反复折腾了三、四年之久的"欧洲防务集团"条约至此告吹。投反对票的有戴高乐派内的有影响的人物，还有法国共产党议员和大约二分之一左右的社会党议员。

这里顺便提一下，英国对于组织欧洲防务集团也有自己独特态度，它表示愿在集团之外支持集团，这样可以保持英国"全球性大国"的形象和地位，因此在欧洲防务集团的讨论阶段，英国基本上保持某种超然姿态，不时为美国帮些腔，但是绝对不卷进去。

法国国民议会拒绝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反映了法国时至五十

①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二），第449页。
②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二），第449页注。

年代中期在德国问题上仍疑虑甚深，同时也暴露了西方阵营的重大分歧。法国的态度无疑对美国是一盆冷水，美法关系顿时紧张起来。杜勒斯九月的西欧之行，去了伦敦、波恩和罗马，却故意绕开了巴黎。然而，把西德武装起来、使之成为大西洋联盟的一员，是美国的一项战略考虑，是必定要坚持的。艾森豪威尔在得到法国否决了欧洲防务集团之后立即表示："凡是对美国自己和世界有好处的事情，美国决不会放弃。"① 并写信给当时的代理国务卿比德尔·史密斯，指示他"考虑用什么东西代替欧洲防务集团的问题"。②

经过不到一个月的十分紧张的活动，由丘吉尔倡议的九国外长会议于九月二十八日在伦敦开会，这九个国家是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五个成员国，英、法、比、卢、荷，加上西德、意大利、美国和加拿大。伦敦会议达成了下列几项成果：

"（1）三大国和西德专家委员会将安排结束对德国的占领；

（2）邀请西德加入北约，并提供十二个师和一支拥有一千架飞机的空军部队（与欧洲防务集团协议中规定的一样）；欧洲最高盟军司令官的权力将扩大到足以制止德国武装力量的独立部署；

（3）西德和意大利将参加布鲁塞尔条约组织，这个组织将确定欧洲大陆各成员国对北约提供兵力的最高数额并控制所有武器的制造；

（4）西德将不得制造导弹、原子弹、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③

接着北约各国和西德外长根据伦敦会议的决定，从十月二十

---

①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二），第453页6注。
②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二），第453页。
③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二），第457—458页。

日至二十三日在巴黎开会，签订了"巴黎协定"。① 会议决定请西德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参加北约；确认了伦敦会议的各项决定；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增加了西德和意大利，改为"西欧联盟"。一九五五年五月，西德正式成为北约的第十五名成员。

结束对德国的军事占领、使联邦德国成为北约成员的带有战略意义的安排，至此算是完成了。"巴黎协定"实际上保留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基本内容，但是没有"超国家"性质；而且通过"西欧联盟"的渠道把西德有限地武装起来、并加入北约，这就明确了美国和英国对西欧防务的义务，也就减轻了法国的疑虑。

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对于欧洲局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从此，联邦德国不仅成为主权国家，而且成为西方军事集团的一员。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表明，西方各国已经联合在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里。美国人说这是美国第一次在和平时期参加的集体军事条约。当然，集团内部还有许多问题，在筹组期间，各种意见就很不一致。杜鲁门曾这样描写北约集团内部的复杂情况："……法国不愿放弃任何对德国防御的成见，比、荷、卢三国要求明确不但法国而且连英国在内都要承担它们那个地区的实际防务部署。斯堪的纳维亚人感到他们处在侧翼，并且是危险地暴露在这条战略弧线的末端。英国企图保存它的实力以便维护它的帝国的残存部分。这只不过是一系列问题的开头而已。"②

然而，无论集团内部还存在多少问题和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和斗争必将随着成员国的实力和地位发生变化而日益尖锐，北大西洋公约的诞生无疑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战略步骤，在战后的欧洲史上是一个重大事件。它表明，在欧洲范围建立起对立的军事

① 详见《国际条约集，1953—1955》，第276页以次。

②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300页。

集团，是西方先迈了第一步；它也表明，西方针对德国法西斯复活的方针已经完完全全让位给同苏联对抗的方针了。这一转变，在战争末期始见端倪，丘吉尔的富尔敦讲话是战后的第一个信号，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则标志着这个转变的完成。

几乎同时，东方的安排也已经就绪。苏联和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内的东欧国家等七国于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在华沙举行了“欧洲国家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第二次会议”，缔结了七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即华沙条约。条约规定：（1）每逢一缔约国“认为产生了对一个或几个缔约国发动武装进攻的威胁时”，缔约国各方应“毫不拖延地在它们之间进行磋商”；（2）“如果在欧洲发生了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对一个或几个缔约国的武装进攻”，各缔约国应以一切“必要的方式，包括使用武装部队”来“给以援助”；（3）缔约国建立武装部队的联合司令部，统率“拨归其指挥的各国武装部队”；（4）建立一政治协商委员会，磋商和审查实施条件的问题。在同一次会议上还通过了“华沙条约国关于成立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的决议”。①

至此，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名副其实地在欧洲面面相对，所谓欧洲的“集团化”也最后完成了。

① 详见《国际条约集，1953—1955》，第455页以次。

· 第五章 ·

印度支那问题和苏伊士运河危机——英法殖民体系的衰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第三世界地区掀起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是当代的一件头等大事，是战前所不曾有过的。从战争结束以来到整个五十年代，在亚洲发生的变化是剧烈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宣告帝国主义及其支撑下的反动统治在这个国家彻底垮台；朝鲜人民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印度支那人民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战争延续了八年之久，终于取得胜利；在这期间，印度、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缅甸等国相继取得了政治独立。在中近东地区，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反帝斗争，沉重地打击并动摇了殖民主义在中近东的统治基础；阿拉伯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日益激烈。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促进了非洲人民的民族觉醒。马达加斯加、肯尼亚、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许多国家先后爆发了反帝反殖的武装斗争。这一时期，苏丹、

摩洛哥、突尼斯、加纳、几内亚等国先后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拉丁美洲地区的反美风暴也在酝酿之中。

总的说来，这些斗争的矛头所向主要是英、法老殖民主义。有些地区则主要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特别是中国人民、朝鲜人民进行的长期斗争、菲律宾人民的斗争以及拉丁美洲地区的斗争，等等。

这些斗争程度不同，但几乎连成一片，冲击着传统殖民主义的根基，使它的大厦一片瓦、一片瓦地剥落。殖民主义者的难于招架便为美国势力的渗入和取而代之提供了机会。于是美国和英法在殖民地问题上的明争暗斗便日益尖锐，较量的结果，总是更强大、更富有的美国压倒自己的“盟友”。本来在战争快结束时美国曾想用“国际托管”的办法把英法的殖民地统过来，英国强烈反对，当时的法国的发言权还比较小，但戴高乐明确表示法国不会让出自己的“势力范围”。

因此，美国和英法之间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争斗是必定要发生的。这种情况在英美关系上特别触目，英国在大英帝国内的势力每后退一步，必然地意味着美国势力向前迈进一步。英国历史学家诺塞芝说：“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政策的第一个目标好象就是使英帝国解体。”①战争后期罗斯福提出的日本占领下的殖民地实行国际托管的主张，很大程度是针对英国的，当时即曾引起丘吉尔和艾登的强烈反对。罗斯福的主张虽然没有实现，但是美国的打算并没有放弃，罗斯福曾对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发牢骚说，英国人走到哪里就要把那里的土地拿到手，哪怕是块岩石或沙丘也好。②然而英国由于实力不逮，也就只好一块一块地让出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种情况以中近东和东南亚最突出。

---

① F·诺塞芝：《英国对外政策，1945—1961的调整过程》，伦敦，1962年版，第182页。

② 斯退丁纽斯：《罗斯福和俄国人》，纽约，第212页。

中近东地区在战前本来主要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这里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强大潮流，却使英国无法控制。而美国则因而有了可乘之机：美国有时貌似"公允"，实际却在扯英国后腿，甚或落井下石。例如，在黎巴嫩、叙利亚地区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美国都插上了一手。一九五一年，伊朗爆发了把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的运动，摩萨台政府终于不顾英国的反对宣布了国有化政策。美国却劝英国"克制"，说如果过份强求，伊朗难免把波斯湾的大门向苏联打开。① 埃及强烈要求英国军队从苏伊士运河撤走，英埃就此从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四年进行了漫长的谈判，英国最后只好同意撤军。当埃及游击队向英军基地进攻时，丘吉尔曾经呼吁美国派部队支持英国驻军，但是美国竟然不动声色。两年后的苏伊士运河侵埃战争则不仅标志着英国势力在中东地区的衰落和终结，而且美国也正是从这时起更加公开地和更大规模地插手中东事务。在巴格达条约问题上，英国对于美国的埋怨溢于言表。英国首相艾登抱怨说，中央条约组织本来是美国带头推动的，可是当英国加入条约时，美国政府却往后退了；不仅如此还居然向那些对条约持敌对态度的国家讨好。但是过些时候，美国又犹犹豫豫地向条约靠拢，又派观察员、又给钱，可仍然还是不参加。艾登说，美国不给"朋友"撑腰，却指望得到敌人（指埃及）的好感。② 美国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呢？艾登的解释是，显然美国政府在即使它的责任本不占首位的地区也不甘居第二位，因此拒绝对于北约伙伴（指英国）有权提出的要求给以全心全意的支持。③ 艾登的话虽然说的吞吞吐吐，但对美国的居心是看得很清楚的。及至英国完完全全在中东混不下去了的时候，美国就取而代之了。"艾森豪威尔主义"一发表，"真空"就被美国"填补"上了。到一九六〇年左右，英

① F·诺塞芝：《英国对外政策，1945—1951的调整过程》，第185页。
② 安托尼·艾登：《全程》，伦敦，第336页。
③ 安托尼·艾登：《全程》，伦敦，第256—257页。

国势力只限于海湾少数国家，只在塞浦路斯和亚丁剩下两处军事基地；美国势力则在中东跃居首位，在土耳其、利比亚和沙特阿拉伯建立了基地，第六舰队派驻到地中海，美国在贸易、投资、经援、军援等各方面都把英国挤在后面去了。

东南亚地区，在英国的心目中是摆在欧洲和中东之后的，但是一九四七年印度、缅甸等国的宣布独立，特别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使英国十分担心英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受到影响。所以英国既对亚洲的民族民主运动、特别是对中国革命抱敌视态度又希望尽量保存一些英国同这个地区的联系，注意不把事情作绝。因此，在同中国保持贸易关系的问题上，英国同美国有不同意见，因为英国仍希望"有一支脚留在门内"。①同时，英国又希望在阻止亚洲民族民主运动方面借美国一把力。当时英国和美国的驻亚洲使节曾提出过一些英美共同干预的设想。如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所谓"攻心"的建议，即英国、法国、荷兰等同美国一起"帮助"东南亚各国"恢复完全独立"，通过这种手段来抵御"国际共产主义"。②英国驻东南亚专员马尔克姆·麦克唐纳一九四九年三月认为，应该把东南亚看作一个整体，最好在东南亚推行一项"亚洲的"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③凯南也有类似的想法，他所领导的政策计划司提出的报告建议，美国与英联邦成员国实行"多边合作"，把东南亚作为整体，使之成为印度半岛、澳大利亚和日本形成的新月地带的组成部分。④但是，这些方案在美国决策机关都没有形成政策，而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特别是在经济上的参与，英国的麦克唐纳方案就实现不了。同时还有另一方面问题，英国也担心一旦美国

①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九卷，第842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七卷，第1117—1118页。

③ 李奇·欧温达尔：《英国、美国和1949年至1950年在东南亚的冷战》，英国《国际事务》第58卷，第3期，第450页。

④ 《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七卷，第1123页。

插手，英国的“利益”也就不易保住。英国于一九五〇年一月九日至十四日在科伦坡召开了八个英联邦国家的会议，通过了六年为期（一九五一——一九五七）的“开发计划”，打算在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尼泊尔、马来亚、缅甸、英属北婆罗洲和沙捞越推行；英国固然想通过这个方案把英联邦的东南亚成员稳住，同时也有同杜鲁门“第四点计划”相抗衡的意思。不过，英国财力匮乏，“开发计划”没有行得通。

美国没有采纳司徒雷登等人的建议，并不是对东南亚不感兴趣；它要打进东南亚比英国要容易得多，可以从西海岸直趋太平洋。问题是当时美国正忙于西欧事务，如筹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不能兼顾。直到一九四九年底，美国才下决心参与东南亚事务。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十二月同英国驻美大使奥里弗·弗兰克斯的一次谈话中表示，一九五〇年起美国国务院要关心太平洋事务了。他建议美国和英国分分工：美国负责印尼、菲律宾、印度支那和泰国；英联邦负责印度洋各国和缅甸，弗兰克斯赶忙表示不赞成这样明确的分工。①一九五〇年十月九日，当时负责远东事务的副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建议美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结成军事性和政治性的密切关系，第二年九月一日，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三国代表在旧金山签订了澳新美安全条约，成立了澳新美理事会。这件事，英国人看作是美国开始取代英国人在东南亚地区“传统地位”的标志。②美国同英联邦的两个成员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军事条约，而把英国排除在外，使英国非常恼火。保守党批评工党政府没有强烈地要求加入条约；但是保守党重新执政后也没有办法补救。当澳、新、美理事会于一九五二年八月在夏威夷举行第一次会议时，连英国要求作为观察员与会也

---

① 李奇·欧温达尔：《英国、美国和1949至1950年在东南亚的冷战》，英国《国际事务》第58卷，第3期，第459—460页。

② 李奇·欧温达尔：《英国、美国和1949至1950年在东南亚的冷战》，英国《国际事务》第58卷，第3期，第463页。

被拒绝了。[①]澳、新、美条约的签订被看作是美国插手东南亚事务的一个重要措施，这就把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夏威夷、菲律宾和大洋洲连成了一条线。这当然对英国势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大大地缩小了英国在东南亚的地盘。

美国进一步插手东南亚是在一九五四年筹组东南亚军事条约。从此，英国在东南亚只能是美国的一个小伙伴了。

法国殖民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同样受到了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冲击。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十年当中，法国殖民主义的根基不断被猛烈地摇撼着。美国一时顾不上非洲，对于原法属印度支那形势却抱有特殊的兴趣；当然，美国对于中近东的觊觎也不能不同法国利益发生矛盾，但其深度和广度比美英矛盾要小一些。美法矛盾在五十年代主要在印度支那地区。

英法殖民体系的衰落，反映了整个殖民体系的根基已经动摇；荷兰、比利时、葡萄牙等虽然也有殖民地，但其规模比英法要小得多。所以，传统殖民体系的衰落和瓦解，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英法殖民主义的衰落和瓦解。

这里想要说明的是，战后英法殖民体系的衰落，同美国势力挤进、甚至取代英法的地位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成为美欧关系中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现象。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美国在东西方"冷战"中之所以居于西方联盟的"盟主"地位，西欧势力的衰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盟主"作了乘人之危的事情。

这一章对印度支那问题和苏伊士运河危机作重点叙述，不仅因为它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足以标志英法殖民体系衰落的最突出的事例，不应省略，而且其结局都是美国势力随着英法的退出而得以渗入——法国从印度支那退出，东南亚军事条约组织随之建立；英法从苏伊士撤走，"艾森豪威尔主义"出来"填补

---

① H. G. 尼克拉斯：《英国和美国》，伦敦，1963年版，第85页。

真空”。

（一）印度支那问题

1. 印度支那战争发动以前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于印度支那一直是有打算的，因此就同法国的殖民利益撞了车。法国抵制美国渗入，但当它无力支撑时又需要美国“援助”，以至最终法国殖民势力随着大势所迫不得不从印支撤出，而由美国所取代。

一九四〇年六月法国被希特勒德国攻陷，维希傀儡政府成立，接着日本即在印度支那步步进逼。当时维希政府曾向美国求援，美国持“不介入”态度，声称美国不打算在印支问题上同日本发生冲突。然而由于日军频频进攻，美国感到如果日本在印支得逞，便会危及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于是便改变了“不介入”政策。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九日维希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共同防守法属印度支那议定书”，日军便于七月二十四日，开进印支南部。同日，罗斯福接见日本驻美大使野村，要求日军撤出印支，认为应宣布印支为中立区，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同意日本从印支取得原料供应，被日本拒绝。两天以后，罗斯福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全部资产，并中止对日本输出石油产品。此时美日关系已相当紧张，距离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的珍珠港事件已不到半年了。

在这期间，罗斯福正酝酿着对印支实行“国际托管”计划。一九四三年三月，罗斯福会见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设想。艾登在向丘吉尔发回的电报中报告罗斯福的关于亚洲和太平洋前途的构想时这样说，根据罗斯福的意见，“法属马克萨斯群岛和土阿莫土群岛将移交给联合国”，“朝鲜和法属印度支那将交给国际托管”。艾登在同一电报中说：“我提出，总统对法国太冷酷了，法国方面一定会提出最强烈的反对。总统承认这点，但说法国无疑需要援助，为了考虑得到援助，可能把它的领

土的某些部分置于联合国支配之下。”①

此后，罗斯福在不同场合又一再提到要把包括印度支那在内的日本占领下的殖民地在战后交付“国际托管”。对于这个方案，蒋介石和斯大林一般表示支持，英国则持很大保留态度。上面曾提到，罗斯福第一次向艾登提出“托管”计划时，艾登就已表示了不同看法。显然，英国的反应并不是专对“印支”问题而发的，而是因为“托管”的推行势必使英国也要失去对殖民地的控制。艾登在回忆雅尔塔期间的情况时记述了这样一段插曲：“斯大林不时就故意逗他（指丘吉尔）发作。在雅尔塔，有一次斯退丁纽斯谈起三国外长的一个报告中提到的领土托管制。如斯退丁纽斯后来所解释的，这主要是为了处理从日本那里接收过来的领土问题的。但我一直怀疑这个做法日后可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应用，所以罗斯福一九四三年在华盛顿提出托管制来时，我就不喜欢这个议题。丘吉尔认为这个报告可能是蓄意针对英国的，他不能放任不管。于是，他滔滔不绝地替英帝国辩护开了。虽然首相的愤慨对美国人是一个警告，看来却给了斯大林以极大的乐趣。”② 在雅尔塔会议上，斯退丁纽斯说，美国代表团建议，未来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通过外交途径就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托管问题进行磋商。丘吉尔立即非常激动地反对美国的建议，说他绝对不能同意对任何一小块大英帝国的“领土”实行“拍卖”，英国不能因“托管”问题而坐在“国际法庭的被告席上”，讨论“托管问题”不能涉及“大英帝国的领土”。③

在这时期戴高乐则针锋相对地提出法国“重回”印支的主张，并在军事上积极部署，以造成既成事实。

---

① 《艾登回忆录·清算》，中册，中文版、商务印书馆，第658页。

② 《艾登回忆录·清算》，下册，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897—898页。

③ 〔苏〕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第161—162页。

在一九四三年英美两国首脑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戴高尔在同罗斯福首次会见时曾提出战后法国应重新控制它全部的殖民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戴高乐与丘吉尔在圣福米尼克会谈，戴高乐争取丘吉尔的支持说："我们——包括你们和我们——都是很久以前就驻扎在印度、印度支那和远东的某些要地的。我们很了解这些地方。我们知道，万不可在那里作出不慎重的改变。"①

戴高乐对战后印支问题的完整政策体现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的"政府声明"里，这份声明的主要内容是：

一、"印度支那联邦将和法国以及法兰西共同体的其他部分组成一个'法兰西联邦'。法兰西联邦的对外利益将由法国代表，印度支那在联邦内享有应有的自由。"②

二、"印度支那应有自己的联邦政府，由总督主持，由向总督负责的部长组成，各部部长从印支人和居住在印支的法国人中选任。"③

三、"印支联邦应在宗主国的援助下和在法兰西联邦总防御体系内建立自己的陆、海、空军。在这些军队中，印支人只要具有同等资格，将和来自宗主国或法兰西联邦其他部分的人员同样担任各级军官。"④

四、"印支联邦在法兰西联邦内应享有经济自治的权利，以便使自己的农业、工业和商业获得全面发展……"⑤。

核心是印支联邦属于"法兰西联盟"的一个成员，它对外没有独立自主的外交，它的政府、军队、经济等等必须纳入"法兰西联盟"的范围内。戴高乐的印支政策显然与罗斯福的"国际托

---

①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1944—1946），法国普隆出版社，1959年版，第388—389页。

②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1944—1946），法国普隆出版社，1959年版，第439页。

③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1944—1946），第439页。

④⑤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1944—1946），第440页。

管”相悖。

波茨坦会议以后，戴高乐访问美国。在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戴高乐同杜鲁门进行了三次会谈。戴高乐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同美国就欧洲问题、特别是就法国的战后安排问题同杜鲁门磋商。在谈到印支问题时，戴高乐提出："现在还不能确切地决定印支联邦的未来政权将是什么样的政权，法国有意同组成印支联邦的各国协商解决这一问题，以便满足当地居民的愿望。"① 杜鲁门只外交辞令地表示"美国不会作任何反对法国（在印支）恢复权力的事。"② 实际上，戴高乐并不是不知道，当时由魏德迈领导下的美国在华特工人员正在准备进入越境进行活动。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戴高乐立即于八月十七日任命了乔治·梯也里·达让里约海军上将为法国驻印度支那的高级专员，任命莱克勒克将军为驻军最高司令；同时决定在九至十一月分三批派遣陆军进驻印支。一九四六年三月七日，达让里约海军上将在西贡宣布头天晚上已经签署了一项协议，法国承认胡志明为主席的越南共和国是"印度支那联邦和法兰西联盟内的一个自由国家"。③ 在差不多的时候在战争期间进入印支的英国军队和中国（国民党）军队分别从越南的南部和北部撤出。至此，法国基本上是按照戴高乐关于"重返"印支的计划行事的。

然而，越南人民要求彻底独立，法国采取高压手段，因此从法国"重返"印支之日起，武装冲突即不时地在越南各地发生，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战争。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冲突规模更扩大了，当时的法国勃鲁姆政府命令达让里约和海外部长马里奥斯·蒙泰到河内去"视察"，于十二月二十日在河内发布了"紧急法"。法国侵略军包围了主席府。同一天法国国民议会指令勃鲁姆在两周内采取行动"维护"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所谓"权益"。

---

①②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1944—1946），第492页。
③ 《纪事年鉴——1946》，第5卷，第77页。

第二天越南游击队开始向越南北部进攻，十二月二十三日，勃鲁姆在国民议会上说，印支局势虽然“不到紧急的程度，但却是严重的”；雅克-菲利浦-莱克勒克将军将受命“在举行谈判前恢复（那里的）秩序”。法国驻印支高级官员达让里约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咨文”中说：“在印支事态发展的目前状况下，法国不打算给印支人民全面的和无条件的独立”，① 莱克勒克将军在西贡重申在举行和平谈判之前，“首先要恢复秩序”。② 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法国国防部动员全部正规军和空军部队作好应召准备。③ 长达七年多的法国侵越战争便正式开始了。

2. 战场之外——美法的勾心斗角

在法国发动侵略印支的战争的初期，法国政府一门心思以为，它完全有能力采取军事镇压的手段来控制越南以及整个印度支那，使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共和国就范。法国在发动战争后，便于一九四八年六月拼凑了以保大为首的亲法傀儡政府，同越南共和国对抗。当时法国要包揽印支战争，拒绝任何国家插手。艾森豪威尔认为法国竭力把这场战争说成“主要是法国与其帝国一部分之间的内部争端”，是“家庭争吵的争端”。因此，法国甚至不同意把印支问题“提交联合国实行仲裁”，④ 以致美国无法插手。

然而战场上的形势愈来愈不按照法国的意图发展。到一九五三年法国已被拖得筋疲力尽，国内各阶层要求摆脱战争的呼声日益普遍和强烈，法国官方在寻求美国支持的同时开始探索结束战争的途径。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日至十四日美、英、法三国外长在华盛顿

---

① 《纪事年鉴——1946》，第5卷，第412页。
② 《纪事年鉴——1946》，第5卷，第413页。
③ 《纪事年鉴——1947》，第6卷，第2页。
④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二），中译本，三联书店，第372页。

举行会议，讨论了“在印度支那恢复和平”的措施，①当苏联在十月伦敦外长会议上提出召开苏、美、法、英、中五大国会议讨论远东局势时，法国政府即指示法国外长促成这个会议的召开，认为五大国会议有助于在印度支那通过谈判实现和平。②同年十月二十八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决议，敦促政府制定一项政策，以便“发展（印度支那）联邦国家的武装力量，使它们能逐步取代法国军队”，“尽一切可能通过谈判促成在亚洲实现普遍和平”、“争取联邦国家在法兰西联盟范围内实现自己的防务和独立”③。当时舆论界认为，法国议会的这次辩论反映了法国人对耗资巨大的印支战争已经“厌倦”了。④十一月十二日，法国总理拉尼埃尔在参议院说，法国打算为在印度支那的战争寻求一种“体面的解决办法”⑤。

胡志明主席十一月二十九日在接见瑞典斯德哥尔摩《快报》记者时表示，如果法国政府愿意停火，越南方面可以同法国进行谈判。当时法国负责印度支那事务的国务秘书马克·雅盖曾反驳为“纯属宣传”。但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赶快声明说，拉尼埃尔“严厉批评了”雅盖；外长皮杜尔则于第二天表示，胡志明的建议应予“仔细研究”。法国政府接着于十二月二日发表声明，说胡志明如有诚意，应该通过“正式途径”提出。报界认为，这些迹象表明法国打算无论如何也要结束战争了⑥。第二年三月三日法国政府表示接受印度总理尼赫鲁关于无条件停火的建议⑦。

在关于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法国急不可待地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会议开始后不久，法国外长皮杜尔就接到法国政府的指示，要他竭尽全力争取实现一个停火妥协方案⑧。同时，与

①② 《纪事年鉴——1953》，第13卷，第231页E2。
③④ 《纪事年鉴——1953》，第13卷，第355页C3。
⑤ 《纪事年鉴——1953》，第13卷，第383页B3。
⑥ 《纪事年鉴——1953》，第13卷，第403页B3。
⑦ 《纪事年鉴——1954》，第14卷，第65页B1。
⑧ 《纪事年鉴——1954》，第14卷，第169页D3。

美国在会外进行秘密谈判争取美国增加军事援助，作为对可能进行谈判的后盾，法国甚至一反战争初期的立场，表示如果日内瓦会议无结果不惜要求美国参预越战。这说明法国实在顶不下去了。

艾森豪威尔在回忆法国当时的情绪时有过许多描述：他说在奠边府战役后，“我的顾问中有些人认为，法国人实际上已到达这么一个地步，即他们宁可放弃印度支那或作为军事失败的结果而丢失它，也不愿通过国际干涉来加以挽救。作为法国政府意志消沉的一例，比德尔·史密斯在三月十二日向我报告，法国国防部长曾对五名美国记者说，印度支那问题只能由共产党中国来解决，共产党中国要的是对它的承认和放宽自由世界国家在朝鲜战争中强加于它的贸易上的封锁，而作出这些让步的关键性国家只能是美国。比德尔增加的一点评论是：‘据我看来，（国防部长）在谈到我们的谈判立场时是过于随便了。’”① 其实法国国防部长普利文的这种想法并不是他个人“随便”想出来的；三月五日拉尼埃尔的确已在国民议会上表示过，如果中国答应停止给胡志明的援助，他便有意敦促美国给中国以“可观的具体的好处”，例如“外交上的承认”和同意增加贸易（！）② 这实在是法国殖民主义在战场上被打晕了头以后的非非之想。

法国原来是不希望别国特别是美国介入的，这一点由于法国在印支的极其狼狈的处境而不得不加以改变。日内瓦会议前夕，杜勒斯到巴黎同皮杜尔会晤，皮杜尔在表示奠边府的局势已经绝望之后便暗示，“如果说过去他曾反对这场战争国际化的话，现在，他将赞成国际化，只要美国的行动能挽救奠边府。”③ 杜勒斯在四月二十三日发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中说：“皮杜尔流露出一个濒临破产的人的神态。……他显然已经筋疲力尽，在发言中思

①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二），中译本，第383页。
② 《纪事年鉴……1954》，第14卷，第73页D1。
③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二），中译本，第388页。

路混乱并漫无头绪。"①

进入五月份，奠边府局势愈加紧张，法国更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它已经顾不得战局"国际化"的后果而渴望美国干预，但是美国却担心直接插手会"被公开谴责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且为法国火中取栗，也难免"得不偿失"，因此"只能坐视（奠边府）战况不断恶化"。②实际上美国在坐山观虎斗。对此，法国对美国已颇有怨言了。六月八日美国格伦瑟将军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报告他同法国国防部长勒内·普利文会见的情况，信中转述普利文的话说："如果我们失陷三角洲地区，对法国那将是一场大灾难，而且对整个自由世界也是个大挫折。这就会在法国极其强烈地爆发一股反结盟的浪潮，因为盟国听任我们垮台。英国人在这种进攻面前肯定会首当其冲，因为法国人民觉得是英国人在阻挠联合行动。然而这不仅仅是反对英国人，它真的会发展成为带有一种强烈的、歇斯底里式的'让我们自己干'的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运动……美国政府必须理解，如果我们在三角洲遭到严重失败，事情将会多么严重。美国在欧洲所支持的一切都将受到威胁。"③一个临于绝境的人是不惜饮鸩止渴的。

普利文在美国人面前抱怨英国，当然是讲给美国人听的。这段话反映了法国已经彻底垮了，这段话对美国有怨艾，也有要挟，因为这时正是美国逼迫法国迅速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时候，所以说"美国在欧洲所支持的一切都将受到威胁"。格伦瑟在同一信中还说："近几个月来，法国政府开始用另一种口吻说话了，而且要求提供各种各样的援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请求的援助都要根据法国本身的条件而提供——法国政府始终坚持从我们这儿得到这样的许诺，即某几种技术性援助，我们

①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二），第389页。
②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二），第391页。
③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二），第404页。

会晤中，孟戴斯-弗朗斯受到很大鼓舞，感到停火有望，据当时伯尔尼的报导称，孟戴斯-弗朗斯接受了周恩来在早些时候提出的一些建议。孟戴斯-弗朗斯同意日内瓦谈判应包括对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政治解决（而不是象皮杜尔所坚持的日内瓦只限于解决越南停火问题）；在停火期间应建立一个统一的越南政府，尽管在军事上仍处于分裂状况；全越选举应在停战以后一段时间内举行；虽然老、柬的主权还有待确认，但它们应成为“中立化”国家，以免对邻国构成威胁。①

日内瓦会议关于在印度支那实现和平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以及在越、老、柬停止敌对行动的几个协定等文件于七月二十一日正式签字。杜勒斯一直没有回到日内瓦来，而由副国务卿史密斯代表美国，美国政府也没有在文件上签字，只声明保证不使用威胁或武力去妨碍日内瓦协议的执行。七月二十三日，法国国民议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印度支那的停火协定。

3．美国葫芦里的药——拼凑东南亚军事集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提出关于“国际托管”殖民地（包括印支）的方案没有能够实行；法国于战后立即“重返”印支并发动了殖民战争。美国在“国际托管”的方案被搁置后便转而策划印支战争的“国际化”。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披露：“一九五一年初，印度支那事件开始强烈地引起我的关注，那时我正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的盟军司令，司令部就设在巴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务需要法国人更多的参与，但是……由于法国在印度支那战争中的伤亡和消耗，此事未能如愿以偿。”“我相信，如果盟国能够分担保卫印度支那的负担，法国的伤亡和消耗就可能会减少。”同时，艾森豪威尔还说：“要使人们有这样一种认识，法国人就必须作出明确而公开的许诺，即一俟取得了军

① 《纪事年鉴——1954》，第14卷，第205页B 1。

事胜利，就立即给予印度支那三联邦国家以独立和自决的权利。”[①] 正在武装镇压和侵略战争势头上的法国政府没有理睬美国。谁都能理解，这里的“独立和自决的权利”自然是美国控制下的“独立”和“自决”，谁也不会单纯从用词的表面意义去理解美国的意图。

日内瓦会议前夕和开会期间，美国政府一方面在二月九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仍继续不介入印度支那战争，决不打第二个朝战；[②] 同时积极拼凑东南亚军事集团，[③] 酝酿由联合国插手印度支那问题，[④] 以便为美国插手寻找法律依据。艾森豪威尔这样说：“当我在比较平静的一九五四年初考虑进行军事介入的前景时，事情看来很清楚，如果能满足三项基本要求，美国就能够正当而有效地为赢得这场战争提供真正的援助。第一个要求是一种以国际法为依据的合法权力；第二是自由世界舆论的有利气氛；第三是国会同意采取行动。”[⑤] 首先，要美国国会同意美国政府直接参战，这对刚在朝鲜战争中打得大败的美国说来是很困难的。于是美国便考虑通过另外两个办法介入印度支那问题，一个办法是指使“法兰西联邦”的三个“印度支那联邦国家”呼吁联合国给予“帮助”；另一个办法是，把美国的干涉限制在参加一种联合行动中，参加这一行动的应包括“英国、‘美、澳、新条约’成员国和某些东南亚国家”。[⑥] 但是通过联合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内就必定遇到苏联的反对，因而是“靠不住的”。[⑦] 所以就剩下了拼凑东南亚条约这个办法。而这又必须取得英国和当时许多是英联邦成员国的支持。英国是不愿意被美国拖进“联合行动”中

---

①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二），第371页。
② 《纪事年鉴——1954》，第14卷，第42页B3。
③ 《纪事年鉴——1954》，第14卷，第161页D3。
④ 《纪事年鉴——1954》，第14卷，第169页E3。
⑤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二），第376页。
⑥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二），第377页。
⑦ 杜勒斯6月10日在扶轮社大会上的讲话，见《纪事年鉴——1954》，第14卷，第198页B1。

去的。丘吉尔四月二十七日在下院说，在日内瓦谈判正在进行时英国政府不会提供反对印度支那人的军事援助，① 五月十八日丘吉尔在回答反对党质询又说，“在日内瓦会议结束以前，不可能就建立东南亚和西太平洋集体防务问题作最后决定”。② 美国政府对此十分恼火，艾森豪威尔第二天在记者招待会上发泄说，没有英国参加，美国也可以照样干。③ 在这期间，美国已在背着英国同法国密谈，五月十五日瑞士报纸已有所透露，说探讨了美国军事干预的可能性。④ 艾登认为，美法密谈表明“华盛顿一定是再次对我们的（日内瓦）谈判失去耐心”。美国对达成什么协议都“深怀疑虑”；美国代表团还害怕法国人会和“越盟”接触、私下成交。同时据英国驻法大使格赖德温·吉布的报告，美国实际已就日内瓦会议失败后进行干涉的条件同法国达成了协议。⑤ 直到六月二十五日，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会谈时，丘吉尔才有条件地同意了建立东南亚集团的方案。⑥ 丘、艾会谈形成了所谓“七点共同立场”，同意老挝和柬埔寨作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南北越以十七度线为界，允许法国在不低于“七点共同立场”的情况下与越方达成协议⑦。

日内瓦协议签署的当天（七月二十一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为美国的立场辩解说，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不是交战国，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主要责任应落在交战国身上；美国虽然不受会议决议的约束，但希望决议能“导致和平”，协议中包含了某些美国所不喜欢的东西，但很大程度要看这些东西在实践中如何贯彻；美国已在日内瓦发表声明，美国将不使用武力干扰协议的执行。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再次说美国将继续积极促成

① 《纪事年鉴——1954》，第14卷，第133页D3。
②③ 《纪事年鉴——1954》，第14卷，第161页F2。
④ 安托尼·艾登：《全程》，第119页。
⑤ 安托尼·艾登：《全程》，第127页。
⑥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二），第410页。
⑦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二），第411页。

东南亚军事集团的建立。①

八月十七日艾森豪威尔下令，从即日起，美国对印支地区国家的“援助”将直接交付，而不通过法国。②

4．英国的算盘

英国对印支问题的态度，同它千方百计要保着它在东南亚固有势力范围的基本立场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曾强烈反对罗斯福的“国际托管”方案。英国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战后英美在东南亚地区的第一个争端曾经是如何处理泰国问题。还在战争进行期间，在日泰合流后，英美即对泰伪政权采取了不同立场。英国认为泰伪政权属于同日本结盟的敌国；美国则认为泰国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根据英国的意见，战后的泰国应该回到英国势力范围来。而根据美国意见，日本的殖民地应当交付“国际托管”。美国甚至在华盛顿支持前泰驻美公使作为“自由暹罗人民”的代表。英国则企图力争在东南亚取得军事上的较好成果，以向美国显示，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应由英国军队收复，美国不要染指。一九四五年初，美国意欲在华盛顿成立“自由泰国解放委员会”这就更增加了英国对美国在东南亚意图的疑虑。艾登在致美国的备忘录中指责了美国国务院干预英国利益。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四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委员会在一份文件中记述道:“在（美国）国务院里有这样一种明显的倾向，就是认为我们对暹罗所做的或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预示着我们想要在战后对它施加与它的自由、主权和独立不相容的控制，”美国接着表示一旦“一个合法的暹罗政府……废弃前政府的战争宣言及其同日本签署的协定和条约……并开始公开反抗日本”，美国就可以与这个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这更加引起了英国的严重警惕，英国指责美国的声明是“挑衅性的”；而美国则在六月二十五日致英国的照会中坚持，任何有关

①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二），第414页。

②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二），第418页。

暹罗的重大问题，英美两个政府都应事先相互协商。

日本投降后，泰摄政王指示原驻美公使主持新政府，负责与英国和美国的谈判。在英泰谈判过程中，美国百般干预，在这以后，英美两国在泰国战后问题进行了往返的“照会”战，美国标榜“反殖民主义”竭力压英国不得在泰国建立军事基地，并坚持把泰国防务纳入有美国参加的某种东南亚防御体系，虽然当时东南亚集团尚未成立。美国这些作法不能不使英国感到，美国正在设法建立自己的实力地位，排挤英国势力。①

这里插上一段美、英在泰国问题上的角逐，是为了说明它反映了英美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矛盾；泰国本属英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却要插足其间，美国在东南亚的任何重大动作就不能不引起英国的疑心。因此英国在印支问题上很长时间内同美国印支战争“国际化”的立场合不上拍，是合乎逻辑的；英国感到，对于美国到底想干什么“捉摸不住”②，而美国则说英国不愿意跟着美国搞“联合行动”，态度“总是犹豫不决”。③

艾森豪威尔于一九五四年四月一日写信给丘吉尔，提出建立一个有美、英、法、“印支联邦”、澳、新、泰、菲参加的“集团或联盟”，以便对法国“提供更大的道义与物质资源”。丘吉尔的回信却“很不热心”④。杜勒斯在伦敦得到的印象则是英国“似乎对同共产党谈判的价值寄予了很大的信赖”，并认为，“在日内瓦会议之前，任何一项为了联合行动而作出的准备，都是不能接受的……”⑤杜勒斯挖苦地说，其原因就在于英国的外交长期以来“使得这个英伦小岛保持为一个世界大国”，还由于英国“总

---

① 参阅J. E. 威廉：《暹罗，英国和美国1942—46的一个争端》，英国《国际问题评论》，第8卷，第3期，1982年7月，第187—201页。

② 安托尼·艾登：《全程》，第120页。

③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二），第387页。

④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二），第384—385页。

⑤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二），第386—387页。

是十分敏感地意识到今天的敌人可能成为明天的朋友……”。①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丘吉尔在下院宣布，英国政府不同意美国关于就建立亚洲安全体系问题立即召开有美、英、法、澳、新、泰、菲和法属印支联邦参加的会议。② 这等于正式拒绝了艾森豪威尔的建议。四月三十日杜勒斯在向艾森豪威尔作的书面报告中说，在日内瓦会议的第一周中，“当共产党破口大骂美国的‘帝国主义行为’时”，英国代表团却没有任何反应，一声不响。③ 美国代理国务卿比德尔·史密斯汇报他在巴黎和日内瓦进行的幕后活动时说：“艾登的立场是，对法国人所提出来的任何和平协议，英国人一概予以支持，并且愿意为此提供保证，即施加影响促使其实现。在日内瓦会议结束之前，他们不愿同非共产党国家一道加入任何捍卫东南亚的区域性防务协定。”④

就在这个时候，美法秘密会谈的消息透露出来了。从一九五四年五月中旬开始，艾登便对这件事非常关注。艾登多次追问，美国代表和法国代表都闪烁其辞⑤。丘吉尔五月二十四日在下院回答工党议员的质询时抱怨说，法美会谈绕过了英国，违背了英法联盟的精神。⑥ 艾登在五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记载说：“……根据最近从巴黎得来的消息，法国人和美国人已经谈妥了某些计划，那显然是关于对印度支那的干预问题的。”⑦ 后来皮杜尔向艾登证实，如果在日内瓦达不成任何协议，就要考虑由美国帮助三个师的兵力；皮杜尔还说这是一种“远方的雷声”，为的是促进会议的进展。艾登看出了这种用意，但他向皮杜尔重申英国政府的政策没有变化，即英国绝不承担义务。⑧

①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二），第387页。
② 《纪事年鉴——1954》，第14卷，第133页D 3。
③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二），中译本，第394页。
④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二），中译本，第393页。
⑤ 安托尼·艾登：《全程》，第119页。
⑥ 《纪事年鉴——1954》，第14卷，第169页F2。
⑦⑧ 安托尼·艾登：《全程》，第127页。

英国不参与美国的“联合行动”的立场一直坚持到六月下旬才有所改变。两国为了弥合分歧，决定于六月二十五日在华盛顿举行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会谈。会谈前，艾登在六月二十三日在下院的讲话调子开始转变，说为了稳定远东局势，英国认为可以考虑签订两个条约：一是签订洛迦诺式的、有中国、苏联和西方国家参加的保证远东安全的公约；二是成立东南亚防御联盟。同时艾登仍然隐约批评了杜勒斯关于在日内瓦会议前就忙于成立东南亚防御集团的计划，说，英国已经制止住了一次“仓促的行动”。①

丘吉尔——艾森豪威尔会谈使英美之间在印支问题上的龃龉得到了一些缓解，达成了一些谅解，即前面提到过的“七点共同立场”。英国参加会谈的意图是“说服美国政府至少应给法国人在几周内在日内瓦达成某种安排的机会”，因此不主张急于在日内瓦会议结束之前召开任何策划和宣布“某种反对共产主义的东南亚联盟”；同时英国再次声明在会议有了结果以前不对任何形式的“联合行动”承担义务。②美国在会谈中的意图显然是争取英国在建立东南亚防御体系上同美国协调步骤。经过会谈，英国也同意了就东南亚条约组织问题进行筹备，会谈产生了一个“研究小组”。至于英国提出的签署洛迦诺式条约的想法则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般的抗议”③，立刻被否定了。美国的印象是，“丘吉尔和艾登只是想表示这样一种‘愿望’，即法国人将在不低于我们（英美的）‘七点’的情况下作出协议；我们（美国）则要求把这些条件作为最低限度的要求。”④

美、英、法三国之间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勾心斗角是很曲折的；扩大来说，它反映了英法在东南亚地区的衰落。法国是印支战场上的败将，印支停火后法国便丧失了在这里立足的力量。这

① 《纪事年鉴——1954》，第205页F2。

②③ 安托尼·艾登：《全程》，第131页。

④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二），中译本，第411页。

是历史规律注定的。英国虽不是印支战场上的交战一方，印支本来也不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包括印支在内的亚洲战后形势使英国的转身之地越来越窄小了。英国从一个处于颓势的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地位出发，同时又妄图保持“世界大国”的形象，对美帝国主义的东南亚（包括印支）政策和动向便不能不十分敏感，并产生种种疑虑。

法国殖民主义从印度支那被赶走，已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下一步就将是美国的侵入。侵略者的命运不会放过美国这个后来者；历史不会照原版再现，然而，重蹈复辙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

印度支那战争停下来后，美国便于九月六日至八日拼凑了东南亚军事条约组织。但是，与北约不同，美国一直没有能够在争夺世界和亚洲霸权中如意地利用这个组织。二十年后，这个组织已经名存实亡。一九七五年九月，东南亚条约组织理事会会议宣布，鉴于情况发生变化，该组织将分阶段解散。一九七七年六月，该组织正式宣布解散。

（二）苏伊士运河危机——“艾森豪威尔主义”出笼和英法影响在中东地区的消逝

1. 苏伊士运河问题小史

中东在战前对于英国一直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一直属于大英帝国的“势力范围”。从十八世纪以来，英国就把包括西南亚和尼罗河地区作为通向远东的桥梁和英国扩大贸易的通道，作为海上强国和贸易强国，英国必须倚重中近东，并且把埃及、波斯湾和亚丁地区看作三根支柱，特别是埃及在英殖民帝国对外扩张

中的作用更加不可缺少。

苏伊士运河的开放使这个地区成为国际贸易和大国角逐的场所。苏伊士运河是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正式开放的。一八八八年九国公约在君士坦丁堡签订（九个国家是：英国、奥匈帝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土耳其；埃及当时受土耳其统治，实已为英国所占领）。从此运河置于苏伊士运河公司董事会管辖之下，董事会由十六名法国董事、九名英国董事、五名埃及董事、一名荷兰董事和一名美国董事所组成。九国公约规定，运河“无论在战争时期或在和平时期对任何商船或战舰，不论悬何种旗帜，都是自由的和开放的”。[①]苏伊士运河公司在一八五八年的资金为四十万股份。英法两国垄断了百分之九十六的股份，每年获得巨额利润。从一八八二年起英国在运河地区建立了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驻扎了近十万军队。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石油资源使这个地区增加了又一层战略意义。至一九三八年，中东的原油和天然气产量每日平均达三十三万五千桶，几乎占世界产量的四分之一。到一九四七年，日产量增至八十六万五千桶；一九五六年达三百四十八万桶。以一九五五年为例，全年有一万五千支船通过运河，其中四分之三属于北约国家，近三分之一的船只是英国船。经过运河运往西欧的中东石油占年产量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英国进口石油的一半以上要经过运河。因此运河对于西方，特别对英国具有突出的经济和战略意义。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在下院说，绝不允许这里出现“真空”，所谓“真空”就意味着英国已经不在这里了[②]。

因此，英国一直把中东问题，特别是英埃关系问题放在对外政策中的重要位置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东地区出现了两个新的因素，第

---

① 《纪事年鉴——1956》，第16卷，第251页D2。

② 参阅F.S.诺塞芝：《英国对外政策》，第208页。

一，在欧洲，两大阵营壁垒分明，中东地区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石油蕴藏日益成为国际斗争的重要场所；第二，阿拉伯民族日益觉醒，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和斗争日益高涨。这两个因素都使英国和法国感到不安；尤其是英国很怕失去它的传统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进行了积极的、频繁的外交活动，它同埃及就苏丹地位问题和英国撤出苏伊士运河问题进行了长期而紧张的谈判：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二日先与埃及就苏丹地位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英埃条约，双方同意苏丹制宪会议有权决定苏丹的独立地位，于是苏丹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宣布苏丹共和国独立。苏丹问题的解决为解决复杂得多的苏伊士运河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气氛。英埃从三月十四日到五月六日进行了关于苏伊士运河的谈判。谈判的焦点是埃及要求废除英国使用运河基地的一九三六年英埃"同盟条约"，埃及恢复对苏伊士的主权。英国在当时也感到仍然坚持一九三六年的条约已不可能；但是英国如果撤出，怎样保持这个地方不变成贝文所担心的"真空"，则是英国不能不考虑的。英国本来设想，英国撤出后，这里可考虑某种包括埃及在内的区域防御安排，使英国在必要时仍然可以使用运河基地。艾登于一九五三年三月在华盛顿同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谈了这个问题，美国当时没有表态。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签订了英埃协议，原则上提到英国要从苏伊士撤出，到第二年的十月十九日又签署了关于确保英国撤出苏伊士运河的条约。条约宣布废除一九三六年"同盟条约"；英国军队在二十个月内撤出；"阿拉伯联盟"国家或土耳其遭到其他国家的武装进攻时，埃及允许英国在运河基地作战斗准备。条约还规定："双方缔约政府承认苏伊士运河航道——这是埃及领土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国际重要航道，双方表示决心维持一八八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君士坦丁堡签订的公约……之规定。"①

---

① 转引自（法）让-巴蒂斯特·杜罗塞尔《外交史》下册，第202页。

显然，这个条约是不符合埃及的根本民族利益的；继续承认埃及处于无权的地位时签订的“九国公约”，与承认苏伊士运河航道为埃及领土，是完全矛盾的。因此一九五三年英埃协定和英国撤出运河区的条约都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在这期间，美国和苏联都在中东扩展自己的影响。美国已向埃及提供了经济援助，还拟向埃及提供武器，并且就美国投资修建阿斯旺水坝问题进行谈判（后于一九五六年因埃及接受苏联军事援助而撤销）。苏联则准备给埃及以军事援助，对埃及反对以色列侵略阿拉伯的斗争和国内经济建设，也表示给以支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一九五五年的万隆会议是民族民主运动达到新高度的标志；万隆会议精神和新兴的不结盟运动，相互支持，在亚非地区产生空前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推动强大的反帝反殖潮流奔腾澎湃。这种局面进一步推动了纳赛尔实行“积极的中立主义”政策，并作了不结盟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纳赛尔在万隆会议以后在南斯拉夫的布里奥尼同铁托和尼赫鲁举行了会谈，后来纳赛尔把这次会谈看作埃及进入塑造世界历史的列强之林的象征。这时，对苏伊士运河实行更彻底的国有化政策的时机和国际条件已经成熟了。

2．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和西方三国的反应

埃及总统阿卜杜勒·纳赛尔于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在亚历山大解放广场举行的有几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宣读了把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法令。要点有：

——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公司的一切财产、权利和义务将移交给国家。股东和股票持有者可以得到赔偿。

——苏伊士运河航运的管理将委托给一个具有法人地位的、从属于商业部的独立机构。

——已经收归国有的这个公司在埃及共和国和在国外的财产将予以冻结。

——新的机构将留用现有人员，任何人不得擅离职守。[①]

同一天，埃及警察当局接管了这家公司在开罗的房屋。当开罗电台广播纳赛尔关于运河国有化的法令时，群情为之激动振奋，人们互相拥抱，互相道贺。每个装有收音机的商店都大声播放这个历史性的决定。

英美法在第二天都马上分别作出了反应：

英法两国作为苏伊士运河公司的主要股东，向埃及政府发出了"抗议"照会；英国首相艾登、法国总理摩勒分别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艾登表示，英国政府决心维护英国的"利益"，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在英国看来，如果不能保持运河的国际性，英国在中东的地盘就会一个一个地丢掉。[②]艾登于七月二十七日在英下院说，英国正在同法国、英联邦成员国和美国磋商，研究对埃及采取"报复措施"。同一天，英国政府向埃及发出照会，抨击埃及的国有化法令是"严重威胁具有国际重要性水道航行自由的专断行动"，"埃及政府对由此产生的后果应承担全部责任"[③]。

法国外交部长克里斯蒂安·皮诺二十七日召见埃及驻法大使说，"法国政府一再注意到埃及的独裁者没有履行他的诺言"。埃及方面立即反驳法国外长的指责是"不能接受的"，坚决拒绝了英法两国政府的抗议[④]。据报道，法国官员还准备把国有化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或海牙国际法庭。[⑤]

纳赛尔于二十八日立即反驳，指出西方对国有化的干预"将为通航制造障碍"，"我们将以眼还眼，不惜为捍卫我们的独立、自由和权利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纳赛尔还说，"至于法国的失礼及其外长的粗鲁（指皮诺诬蔑纳赛尔为"独裁者"），我们将让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去回报"，阿尔及利亚会"给法

---

① 1956年8月1日"新华社新闻稿"。

② 安东尼·艾登：《全程》，第426页。

③④⑤ 《纪事年鉴——1956》，第16卷，第249页A1。

国以相应的教训”。①

美国与英、法的表现显然有所不同。美国国务院二十七日只十分矜持地表示，它将马上对国有化的“长远影响”同“其它有关政府”进行磋商。②

在国有化命令公布后，“苏伊士运河公司”号召资产所有者们抵制和拒绝执行命令，煽动公司职员们（其中有三百五十名法国人、一百三十五名英国人和二个美国人）只接受公司的指示，“只执行为航行业务所严格必需的任务”。③

与此同时，英、法对埃及实行了经济上的报复政策。

英国政府在举行会议后决定冻结埃及在英国银行的全部国家和私人财产。据七月二十八日来自伦敦的报导，这样等于埃及国家银行在国外长期投资的一亿英镑中的百分之五十。埃及外贸额每年达一亿五千万英镑，其中百分之八十是用英镑结算的。苏伊士运河每年过境税三千五百万英镑的百分之五十自伦敦银行支出。④

法国政府也于二十九日冻结了埃及在法国的财产，价值十二亿八千五百万美元。⑤

据二十八日伦敦电讯，英国内阁和军事首脑决定，如果埃及占用英国留在苏伊士运河区的军事设施，英国便将“以武力对付武力”。英国巡洋舰“牙买加”号中断了对亚历山大的访问，向英国地中海舰队靠拢，“地亚那”号驱逐舰于三十日同停舶在亚丁的“肯尼亚”号巡洋舰集结，⑥英国地中海的舰队也迅速增加了实力。⑦

---

① 《纪事年鉴——1956》，第16卷，第249页G3。
② 《纪事年鉴——1956》，第16卷，第250页A3。
③ 《纪事年鉴——1956》，第16卷，第250页D1。
④ 《纪事年鉴——1956》，第16卷，第250页E1。
⑤ 《纪事年鉴——1956》，第16卷，第250页F1。
⑥ 《纪事年鉴——1956》，第16卷，第250页F2。
⑦ 《纪事年鉴——1956》，第16卷，第251页A1。

法国总理居伊·摩勒把纳赛尔污蔑为“希特勒式的人物”，扬言要对埃及施加“有力而严厉的反击”。当天法国国民议会以四百二十二票对一百五十票通过了支持政府对埃及实行强硬政策的决议。①八月初，法国舰队也在地中海活动，对埃及施加压力。

美国在这期间展开了频繁的活动。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罗伯特·墨菲和杜勒斯先后到伦敦活动。美国政府对纳赛尔七月二十六日的讲话表示了“抗议”，说国有化“对国际信任是一严重打击”，美国作为一个海运国家对此“深为关切”②。据说，墨菲在同法国外长皮诺会晤时，法国曾要求美国支持英法在苏伊士地区“显示武力”，但美国表示担心这样做会招致苏联插手。③杜勒斯也根据艾森豪威尔的指令，劝英国和法国在使用武力方面持审慎态度，督促英法通过谈判解决苏伊士争端。④美国国防部长查里斯·E·威尔逊说，苏伊士危机与美国军事战略相比，“相对说来是一件小事情”。“应当寻求体面的方式以达成一项和平安排，而不要挥舞大棒和危及人民。”⑤八月二日，美、英、法三国磋商后根据美国的提议决定发起于八月十六日在伦敦召开二十四国会议讨论苏伊士运河问题。第二天（三日），杜勒斯一方面指责埃及政府的决定是“由一个国家出自自私的目的”，是“不能接受”的，胡说纳赛尔有“把自己的势力从大西洋扩展到波斯湾的野心”，另一方面则表示，“（在英国和法国）某些人想采取断然的强力行动”，这“可能有背于联合国宪章，而且无疑会导致危及世界和平的大规模暴力冲突”，因此，杜勒斯说希望会议能获得成功；就算会议失败了，美国“在任何时候也没有对我们可能做些什么承担义务……”⑥。第二天，巴黎舆论便评论说，

①　《纪事年鉴——1956》，第16卷，第251页A1。
②③　《纪事年鉴——1956》，第16卷，第250页A3。
④　《纪事年鉴——1956》，第16卷，第257页B2。
⑤　《纪事年鉴——1956》，第16卷，第258页A1。
⑥　《纪事年鉴——1956》，第16卷，第267页A1。

杜勒斯的电视讲话表明在苏伊士的政策方面、特别在使用武力问题上，美国与英法的政策不同；《巴黎新闻》说："我们不能指靠华盛顿对我国在地中海的地位给予什么支持。"①

美国与英、法两国对于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虽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但都千方百计地设法阻挠和破坏国有化的彻底实行。

在英、法各自在地中海地区调兵遣将以武力相威胁的同时，②英、美、法三国在八月二日联合提议于八月十六日在伦敦举行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国际会议，以便"在某种国际体制下建立起管理运河的安排"，目的是保证"运河管理的延续性"。③举行这次会议体现了美国的意图，美国不是一八八八年九国公约的成员国，这样的安排则可以保证美国也有一份。三国决定邀请与会的国家有：澳大利亚、锡兰、丹麦、埃及、埃塞俄比亚、法国、英国、希腊、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巴基斯坦、葡萄牙、苏联、西班牙、瑞典、土耳其、美国、西德。

根据从华盛顿八月十日透露的消息，三国的国际共管方案主要内容有：重申一八八八年君士坦丁堡九国公约；成立新的苏伊士国际行政机构；合理增加埃及的收入；制定股票持有者的赔偿条款；建立国际法院，磋商和裁决有关赔偿和埃及应得份额等问题。④

这个方案的核心是绝口不提埃及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和国有化问题，策划所谓"国际共管"。埃及总统纳赛尔于八月十二日明确拒绝参加伦敦会议，谴责拟议中的伦敦会议和正在进行的英法军事调动是妄图把"集体殖民主义"强加给埃及，他提出了召开一八八八年公约签字国和四十五个在一九五五年使用过运河的

---

① 《纪事年鉴——1956》，第16卷，第258页A1。
② 《纪事年鉴——1956》，第16卷，第257—267页。
③ 《纪事年鉴——1956》，第16卷，第257页A1。
④ 《纪事年鉴——1956》，第16卷，第265页D1。

国家举行会议，重新审议一八八八年公约，就"重申和保证苏伊士运河的通航自由研究一项协议"。①

苏联政府八月九日表示将参加伦敦会议，但声明不对是否就国际共管达成协议承担义务；指出英美法在提议举行伦敦会议之前没有同苏联和其它一八八八年公约签字国协商，邀请范围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苏联建议增加二十二个包括中国、东欧、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国家参加会议。② 苏联的反建议立即被西方国家拒绝。

英法继续把武力威胁和召开伦敦会议结合起来，艾登在八月八日的电视讲话中把矛头指向纳赛尔本人，他说："我们不是跟埃及吵架，更不是跟阿拉伯世界吵架"，说什么纳赛尔"已经表明，他不是一个能信赖的可以与之保持某种协议的人"。艾登在谈到苏伊士运河对欧洲的重要性时说，如果没有通过运河运输的石油供应，英国在西欧的工业就不能发展，"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事"，如果纳赛尔的国有化政策得以推行，"我们每一个人都得仰一个人的鼻息，以取得我们赖以生存的供应"。在谈到伦敦会议时，艾登一方面说开伦敦会议是为了避免"通过武力解决争端"，但另一方面又威胁说："我们必须明确，将来世界贸易大国的生命不能由于某些人随时中断运河的自由通航而被掐死。"③

法国总理居伊·摩勒也声言不惜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来迫使埃及政府接受伦敦会议的决定。④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十四日动身前往伦敦时仍持另一种腔调，表示美国在会议上将奉行灵活的政策，希望能"在符合埃及的权益和尊严的情况下"保证"对运河实行可靠的国际管理"。⑤

伦敦会议于八月十六日开幕，二十三日结束。参加国除埃及和希腊未到会外共二十二国，会议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方案：一个

①② 《纪事年鉴——1956》，第265页F1、C3。
③④ 《纪事年鉴——1956》，第266页F1。
⑤ 《纪事年鉴——1956》，第267页A1。

是印度外长梅农提出的由埃及在与一个国际协商团体联系的情况下负责管理运河，苏联等少数国家支持；另一个是美国杜勒斯提出的“国际共管”方案，是在十七个国家支持下提出的。会议终于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会议决定成立了一个以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为首的五人委员会与埃及磋商。另外四个国家的代表是：美助理国务卿洛伊·汉德森，伊朗外长阿里·亨利·阿达兰，瑞典外长奥斯汀·温汀，埃塞俄比亚外长阿图·阿克里隆。

孟席斯委员会和埃及的谈判失败后，纳赛尔继续坚定地推行运河国有化政策，九月十日纳赛尔建议召开会议，修改一八八八年公约，运河公司引水员等人员开始撤离运河。英、法两国加紧磋商。艾登和摩勒于九月十日和十一日在伦敦进行会谈后发表声明说，在纳赛尔总统拒绝协商后，英法两国“讨论了应采取的进一步措施，并取得一致意见”；两国决定“以所有适当的手段反对任何对国际协议规定的权益所施加的武断干涉”。①

艾森豪威尔于同时在记者招待会上则说，只有当一切和平手段都“用尽了”，而且确证埃及发动了“某种侵略行动”时，美国才会同意英法诉诸武力。至于美国是否干涉问题，艾森豪威尔说，除非国会通过决议，否则美国不会参战；所以在目前情况下，美国不会参与任何军事行动。②

第二天（九月十二日），英、法、美三国在杜勒斯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成立所谓“苏伊士国际用户协会”的倡议，这实际上是改头换面的“国际共管”。讨论所谓“用户协会”的第二次伦敦会议于九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召开，在第一次伦敦会议上支持杜勒斯方案的十八国代表参加。会前，艾登在英国下院透露了西方三国关于“用户协会”的方案要点：“用户协会”自行雇用引水员，并负责苏伊士运河通航的协调事宜；通行税将交给“用户

① 《纪事年鉴——1956》，第297页E3。
② 《纪事年鉴——1956》，第298页G1。

协会”，而不交给埃及当局；埃及政府应为“用户协会”的工作提供方便，在维持通航方面提供合作；“用户协会”的成立不排除把争端提交联合国审议。① 杜勒斯也透露了类似内容，但语气有所不同，他说“认为方案的目的在于把某种制度强加给埃及，是想入非非的”；用户的正当权益受到损害时协同地进行工作”是“正常的”；“用户协会”的船将由一名有经验的外国引水员引航通过运河；如果这支船遭到攻击，它可以使用自己拥有的手段自卫；“用户协会”由支持“国际共管”的十八国组成。② 杜勒斯十七日离开华盛顿时说要继续用“和平手段”解决苏伊士争端，否认美国将对运河实行封锁。据华盛顿消息透露，艾森豪威尔曾以私人名义写信给艾登，说如果苏伊士局势发展成为战争，美国将躲在一边。③

在第二次伦敦会议上，意见纷纭，莫衷一是，西方三国的方案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西班牙认为应继续同埃及谈判。挪威、瑞典、丹麦、荷兰等小国认为应该由联合国讨论苏伊士运河争端。日本、埃塞俄比亚、伊朗、土耳其和葡萄牙不愿对“用户协会”承担义务。意大利在荷兰、丹麦和挪威的支持下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企图限制一下“用户协会”的职权，使它成为一个与埃及谈判一项新公约的机构。

第二次伦敦会议期间未能成立“用户协会”。经西方三国的坚持，“用户协会”终于在第三次伦敦会议（十月一日至三日）上成立。伊朗在会上坚持“用户协会”应保证不使用武力。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和日本仍表示不承担义务，因此只对第三次伦敦会议派遣了观察员。会议分成组织、管理和财务等三个委员会，并草拟“用户协会”的章程。

“用户协会”在各种矛盾中实际上不可能起什么作用。九月

---

① 《纪事年鉴——1956》，第305页C1。
② 《纪事年鉴——1956》，第305页F2。
③ 《纪事年鉴——1956》，第306页C3。

十五日，纳赛尔宣布不承认"用户协会"，并使用和训练自已的引水员，还雇佣了一些包括美国在内的别国引水员。据埃及苏伊士运河当局说，自从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后，经过运河的各国船只依旧络绎不绝，埃及人自己管理得很好。

在这期间，美国的态度和作法越来越与英法的"利益"相抵触，英法两国十分不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当英法坚持对埃及取强硬态度、并不断向地中海地区、塞浦路斯地区调集军队的时候，美国领导人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则一再泼冷水，表示应采用"和平手段"，不搞武力，说如果打起来，美国不会介入。美国还摆出不搞"殖民主义"的模样，杜勒斯在十月二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甚至说，美国"在涉及某些根本性事务的苏伊士政策上"与英法有不同意见，它涉及到"所谓殖民主义问题"，在这方面，"美国多多少少起一些独立作用"。① 这番话使英国极为恼火；艾登说这等于告诉纳赛尔可以赶快下手，美国将会袖手旁观。② 法国舆论界也十分敏感，认为这不单针对苏伊士运河问题，它的意图是"勾划"出一项长期的美国政策，可能有一天也会用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问题上。③ 美国对自己的伙伴要落井下石了。

第二，美国趁苏伊士运河危机同埃及拉关系。美国本来打算在修建阿斯旺水坝上投资，后来以埃及接受苏联军援而撤消了。然而美、埃双方在苏伊士危机期间一直都相互试探。例如据开罗十月二日报导，埃及运河当局经理海尔米·巴加特·巴达维曾访问美国，带去了埃方的建议，提出美国石油业向埃及五千五百万美元贷款的要求，并且希望美国公司就发展苏伊士运河问题提供援助。④

美国国际合作署专员九月三十日在开罗说，价值四千二百七十五万美元的美援计划的执行虽然放慢了，但是根据价值九百万

①③④ 《纪事年鉴——1956》，第322页。
② 安东尼·艾登：《全程》，第497页。

美元的铁路计划订购的四十五支柴油机车，有二十六个已交货，另六个已启运；开罗—亚历山大的高速公路的援建工程和尼罗河谷的淡水计划照常进行。①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对埃及的援助也没有停止。②

在美英法积极搞所谓"国际共管"、"用户协会"的同时，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了会议，讨论苏伊士危机问题。在会议期间，埃及、英国、法国在会外进行了会谈，分别同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碰头。最后哈马舍尔德十月十二日在安理会闭幕会上提出了六条管理运河的原则，这六条原则是：(一)运河通航应是自由的和开放的，不得有任何歧视；（二）埃及的主权应予尊重；（三）对运河的管理应与任何国家的政治没有联系；（四）确定通航税和费用问题应通过埃及和用户的协议来决定；（五）应有合理比例的费用拨归发展之用；（六）当苏伊士运河公司与埃及政府之间的未决事宜发生争端时，应通过仲裁来解决。③

有关各方似乎都接受了哈马舍尔德的六条原则，但是由于它并未解决根本问题，因此并没有实际意义。

3．英、法、以侵埃战争

从一九五六年九月下半月起，以色列开始向阿拉伯寻衅滋扰，以色列——约旦边境冲突层出不穷。十月二十九日夜，以色列突然强袭埃及的西奈半岛，挑起了埃以战争。

十月三十日，英法趁机介入，向埃及和以色列发出所谓"最后通牒"，要埃以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把各自军队撤离运河十六公里。英国下议院以二百七十票对二百十八票的多数支持艾登政府对埃及用兵；法国国民议会也以三百六十八票对一百八十二票支持居伊·摩勒。

---

①② 《纪事年鉴——1956》，第16卷，第322页C3。
③ 《纪事年鉴——1956》，第16卷，第337页C1。

十日三十日，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辩论苏伊士局势。美国提出决议草案，呼吁埃以双方立即停战；以色列军队撤至停火线以外；有关各方都不在这一地区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在以色列未执行决议之前，不给它以任何军事、经济或财政援助。苏联提出的决议草案要求立即停火和以色列撤出埃及领土。两个决议案付表决时，英国和法国都行使了否决权。美国和苏联在一起反对英法，联合国安理会第一次出现了怪事情。

安理会会议失败后，战事一发不可收拾，以色列迅即强占加沙，三十一日起英法侵略军对苏伊士发动武装进攻，对埃及领土大肆轰击，截至十一月六日，英法军队占领了苏伊士、伊斯梅利亚和塞得港。

十月三十一日英法发动侵略战争之日，艾森豪威尔再次宣布，美国不会卷入中东战争。艾森豪威尔在电视广播讲话中说英法对埃及的进攻是“错误的行动”，事前没有“以任何方式”同美国“商量”过，美国事先也不知道。① 十一月二日美国国务院命令停止向埃以双方提供武器和军事供应。同一天，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法以对埃及的侵略，警告英法应对其走上侵略道路承担一切后果。②

十一月一日联合国举行紧急大会，杜勒斯提出呼吁各方面立即停火的决议草案，第二天以六十四票赞成，五票反对（英、法、以、奥、新）、六票弃权通过。十一月四日加拿大外长皮尔逊提出决议草案，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提出组织联合国紧急部队监督停火的计划。十一月五日苏联向英、法、以发出最后通牒，指出英法如不住手，苏联可能动用现代化毁灭性武器。英法在国际上陷于完全孤立，埃及和叙利亚同它们断绝了外交关系，阿拉伯国家纷纷声援埃及。从联合国投票的情况看，英法只

---

① 《纪事年鉴——1956》，第16卷，第362页A3。
② 《纪事年鉴——1956》，第363页A1。

能取得极少数几个国家的支持。

十一月七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如下两项决议：

第一项决议案要求英法军队从埃及撤出，以色列军队撤至一九四九年埃以停火线。这项决议以六十五票赞成，一票反对（以色列），十票弃权（其中有英国和法国）通过。

第二项决议支持哈马舍尔德成立联合国部队和七国顾问委员会（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印度、伊朗、挪威、巴基斯坦）的建议，这项决议以六十四票赞成，0票反对，十二票弃权（其中有以色列、埃及、苏联等）。

同时，哈马舍尔德宣称，E·L·M·伯恩斯陆军少将（加拿大）将领导联合国部队前往中东。英国的联大代表皮尔森·迪克松在七日的联大会议上说，英国和法国"衷心欢迎"联合国部队去"接替我们不得不肩负的责任"。①至此，可以说英国和法国无论在军事上和外交上都遭到了彻底失败。英法在苏伊士危机中的冒险失败，直接引起英法国内政局的变化，艾登和摩勒都各自引起政敌的攻击，艾登不得于一九五七年一月被迫下台。摩勒内阁于五月倒台，侵埃战争的失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4. "艾森豪威尔主义"

美国在苏伊士危机时的表现与一九五四年印度支那日内瓦会议期间的表现，是异曲同工的。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尤其是在苏伊士战争问题上，美国竭力把自己打扮成温和的姿态，一再表示反对英、法动武和美国不拟卷入，直至大言不惭地以反殖姿态打扮自己。波伦对于美国的策略有过一段很有趣的分析，他说："如果断言杜勒斯推动了英法在苏伊士运河采取军事干涉，那也许是言过其实的。如果美国全心全意支持英国和法国的立场，愿意对纳赛尔施加更大的压力，巴黎和伦敦说不定会取消它们的军事行

① 《纪事年鉴——1956》，第373页B2。

动计划。"①所以照波伦的分析，英法在苏伊士的冒险，是美国促成的，推动英国和法国犯错误，然后美国再来收拾。以后事态的发展确实证明美国想取代英法的司马昭之心。在印度支那是如此，在中东也是如此。日内瓦会议以后美国逐渐取代了法国的位置；苏伊士运河以后美国逐渐取代了英法、主要是英国的位置。

苏伊士运河战争几个月以后，即第二年的一月五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了一项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案，要求国会授权美国总统在必要时可以在中东使用美国武装力量，以反对所谓"来自国际共产主义控制下的国家的公开武装侵略"。②这个所谓"军事援助和合作方案"后来即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决议案还决定对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中东国家分配二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真正意图被当时任副总统的尼克松在一月十九日的一次讲话中说得十分明白，说中苏谴责"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联合声明③"引人注目地"表明"为什么自由世界不应该（在中东）留下真空"。④"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出笼彻底揭露了美国的真实意图，一九五六年曾经反对英法在中东使用武力的美国在五八年就在"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名义下对黎巴嫩进行了粗暴的武装侵略。所谓"填补真空"，无非如此而已。

法国历史学家让-巴蒂斯特·杜罗塞尔这样概括当时的形势说："苏伊士事件的主要后果是法国和英国在这个关键地区的影响几乎全部消灭了。现在是（美、苏）两大强国互相对峙的局面了。"⑤

"艾森豪威尔主义"还说明，到大体上五十年代中期为止，美国已经在相当大的英、法老殖民地上排挤和取代了老殖民主义

① 查里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第430页。

② 《纪事年鉴——1957》，第17卷，第1页A1。

③ 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于57年1月17日至18日访问苏联，18日中苏发表了联合声明。

④ 《纪事年鉴——1957》，第17卷，第18页B3。

⑤ （法）让-巴蒂斯特·杜罗塞尔：《外交史》，下册，中译本，第211页。

者的地位；美国更加巩固了西方联盟“盟主”的资格。

然而事物是复杂的，也正是大体上从五十年代中期起，西欧各国从战争创伤中走出来，经济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已经开始“起飞”了。从“舒曼计划”起步的西欧联合经过几年的发展，早已大大扩大了最初的宗旨和范围；“罗马条约”的签订，预告西欧正在走上一条将对美苏“两极”格局产生长远影响的道路。

• 第六章 •

从战后欧洲一体化思潮到“小欧洲”共同市场的诞生

(一) 欧洲一体化思潮在战后的发展

战后西欧的一体化思潮可以溯源于历史上的欧洲统一运动。远的不说，欧洲进入二十世纪起，就已有了联邦主义和邦联主义之议。而在提到二十世纪初的有关争论时，人们不免会联想到列宁对“欧洲联邦”口号的批判，于是以此来类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出现的欧洲一体化思潮或欧洲统一运动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列宁曾经对“欧洲联邦”的口号进行过批判，指出：“从帝国主主义的经济条件来看，即从‘先进的’‘文明的’殖民强国输出资本和瓜分世界这一点来看，欧洲联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无法实现的，便是反动的。”①

对于“欧洲联邦”口号的历史背景，列宁指出，当时“资本已经具有国际性和垄断性。世界已经被少数强国……瓜分完毕。”②这就

①②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707页。

是说，当时“欧洲联邦”的口号是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殖民地联在一起的。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联合的思潮继续发展。例如一九二二年奥地利外交家里查德·库当霍夫-卡莱吉公爵创建了“泛欧运动”；一九二九年九月，法国总理白里安向国联提出了成立“欧洲联盟”的备忘录，并且第一次使用了“共同市场”这个概念。①这一时期的欧洲统一（或曰“联合”、“联盟”等等）思潮或设想，或多或少是为了通过缔结联盟的方式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体系”保持住。这样的主张出自法国，则更有限制德国的意图。这类构想因希特勒的迅速崛起而成为泡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在就何时开辟第二战场反复磋商时，丘吉尔已在考虑战后的欧洲安排。他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给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出，他考虑的第一位问题是战争结束后如何“再振欧洲的光辉”，认为欧洲国家应该针对着苏联组成“欧洲委员会”，建立“欧洲合众国”，“各国间的壁垒将大大减少”，“欧洲的经济将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②英国工党的克罗斯曼也有类似的设想。一九四四年七月，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的抵抗运动的代表声明，主张战后在欧洲建立联邦体制。这些国家的一些联邦主义者认为，一个联邦式的欧洲应该成为独立于美、苏两个大国以外的“第三种国际力量”。舒曼计划的创始人罗伯特·舒曼、让·莫内，墨西拿会议和罗马条约的倡导者之一、比利时外交大臣亨利·斯巴克等都是战后初期的欧洲联邦主义者。

一九四六年九月，丘吉尔在苏黎士发表了题为“欧洲的悲剧”的演说，说欧洲各国应该捐弃前嫌、展望未来，“重建欧洲大家庭”即“欧洲合众国”；第一步应组成“欧洲委员会”。丘

---

① 保尔·比努：《欧洲的先驱——欧洲和法德接近》，巴黎，1972年版，第137页。
② 《丘吉尔战争回忆录，八，在非洲的胜利》，第135页。

吉尔并且说，在欧洲建设的进程中，法国和德国(他指的是西德)应该一起起带头作用。[①] 此后，以欧洲统一为宗旨的组织纷纷在欧洲出现。西欧国家的一些联邦主义者在一九四六年底在巴黎组成了"欧洲联邦主义者联盟"；四七年初，在英国成立了以丘吉尔为首的"统一欧洲运动"组织；在法国，著名政界人士赫里欧、雷诺、泰根等人牵头组成了"欧洲联盟法国委员会"；西德也成立了"欧洲联盟"。年底，欧洲各国的统一组织联合成立了"欧洲统一运动国际委员会"，并在第二年五月在海牙召开了有西欧各国代表七、八百人参加的"欧洲大会"，代表中有许多著名政治家，如丘吉尔、雷诺、赫里欧、齐兰、阿登纳、布鲁格曼等，此外还有许多工业家、工会代表、学者、教授。

以后丘吉尔又多次发表演说，一时成为"欧洲统一"运动的最起劲的鼓吹者之一。在海牙欧洲大会上，丘吉尔也是主要发言人。一九四九年二月再次提出建立"一个联合起来的欧洲"的口号。

在欧洲统一运动的推动下，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丹麦、挪威、瑞典、爱尔兰等十国政府于一九四九年八月成立了"欧洲委员会"。随后，希腊、冰岛、西德、奥地利、瑞士、马耳他等国也先后加入了这个组织。

然而，欧洲委员会只是一个目标模糊、也没有实际职权而且十分松散的组织。英、法等国在实现欧洲统一的目标和办法上争论不休，欧洲委员会不久就陷入名存实亡的状态，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从一九四六年九月丘吉尔发出建立"欧洲合众国"的号召到一九四九年八月欧洲委员会的成立，可以算是欧洲统一运动的舆论准备阶段。这个运动在战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起来，成为西欧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大议题。

推动这一时期欧洲统一运动的，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是德

① 丘吉尔：《演讲全集》，第七卷，第7379--82页。

国问题，联邦主义者以为，只要建立起“欧洲联邦”或“欧洲合众国”，并且使一个实现了非军事化的德国成为其中的一员，就可以把它置于欧洲国家的联合控制和监督之下，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的威胁问题。

欧洲统一运动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苏联。对于西欧国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资产阶级右翼政治家来说，昔日十月革命的炮声，已成为今天近在咫尺的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还有一大片与苏联结成同盟的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西欧共产党影响的扩大也是战后西欧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现实。欧洲联邦主义者认为，西欧国家只有联合起来，组成联邦，并且同美国的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对付“共产主义威胁”。丘吉尔在一系列关于欧洲统一的演说中，都很强调这层意义。

应该指出，“欧洲统一运动”绝不是一个统一的运动。有的人主张欧洲统一，侧重于戒备德国，德国的近邻多有此想；有的则把主要矛头对着东方的苏联。不同的提倡者有不同的动机和不同的侧重。同时，从西欧自身的发展出发，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时代，西欧只有联合起来，才能立足于世界。当然，联合还有利于扩大市场，促进投资和流通，这是欧洲经济复兴所迫切需要的。战后初期的欧洲统一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当时在欧洲统一运动的旗号下，荦荦大者就是开头提到的联邦主义和邦联主义两大类别。联邦主义在法、德、意、荷、比、卢等国影响较大，法国的让·莫内、联邦德国的哈尔斯坦、比利时的斯巴克等都是较有名的代表人物。联邦主义的影响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就差得多。丘吉尔首先倡导“欧洲合众国”，真到实行的时候，英国却是最不赞成搞欧洲联邦的。

在一九四八年五月的欧洲大会上已反映出这个运动中的联邦主义和邦联主义两种主张的分歧。联邦主义者认为，现代形式的民族国家如同历史上存在过的城邦国家和封建帝国一样，都是一

种暂时的现象，国家就是一部战争机器，是战争的组织者、受益者或受害者，因此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在政治上已经过时。在经济上，单个的国家市场太小，投资机会有限，不但不能促进社会发展，而且是发展的障碍。所以为了求得永久和平与经济发展，应当放弃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把国家主权让渡给一种更高一级的组织，即“欧洲联邦”或“欧洲合众国”。

联邦主义者中有所谓“职能主义”派，他们认为，欧洲统一是一个缓慢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而是应当通过在自愿基础上逐步实现各国间职能部门（如贸易、运输、货币、农业、工业、能源、社会、文化科学等）的联合，这种部门之间的联合就是所谓“一体化”，然后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再实现欧洲国家的政治一体化。按照职能主义的构想发展起来的欧洲统一运动后来亦习称欧洲（实际上的西欧）“一体化”运动。因此，“一体化”的概念总是或多或少地同“超国家”理论相联系的。

邦联主义者则认为，欧洲国家虽然关系密切，但各有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经济和社会结构，发展程度不同，政治地位和倾向各异，民族国家的界限和不同的民族利益不可能强行消除。因此他们赞成西欧国家加强合作与联合，但这种联合应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即所谓“邦联式”的联合，他们反对让渡国家主权，建立超国家的联合机构。

欧洲委员会成立以后，西欧各国政府就对这个组织的目标、职权、活动方式发生了争论，反映出它们对欧洲统一抱有不同的目的。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对这一运动表现最为积极，力图拉住英国，实现“西欧联合”，以便对德国实行联合控制，并共同对付苏联。西德支持实行西欧“一体化”，因为阿登纳认为只有通过法德和解、西欧联合，西德才能较快地摆脱被占领状态，取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意大利政府除了有与西德相似的考虑外，国内还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因此也力求倚靠西方来增强自己在国内的地位。

英国的情况则别有其特点。英国是欧洲国家，但不是欧洲大陆国家，同大陆隔了一条英吉利海峡。由于它是个岛国，是较早地向外扩张的海洋国家，超然于欧洲大陆。在欧洲大陆上群雄并立的时代，英国总是以这种超然的姿态干预大陆的事务。历史上有英国卷进的欧洲战争，如两次百年战争、拿破仑战争等等，都是英国凭借军事上、特别是海上的优势，用武于岛国之外的。它的对欧政策的出发点是试图以此制彼，竭力维持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均势，不允许哪一个国家鹤立鸡群地凌驾在其它国家之上；尤其不能容许哪一个大陆国家向英国的霸权地位挑战。英国在十九世纪推行所谓“光荣孤立”的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就在此。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因素，由于经济利益的冲突，英国与西欧大陆——特别是法国——一直存在着一层厚厚的隔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的国际地位无可挽回地降了格。然而战争也给英国提供了机会，使它成为除美国以外在欧亚非几大洲同法西斯作战的战场上，负担最大的西方盟国，是美国最密切的盟国，与大陆上的西欧国家相比，是美国的“第一盟友”。而且广泛的英联邦在战后初期尚能艰难维持，虽然已经捉襟见肘、显现其难于控制的矛盾，但仍是英国在国际舞台上得以驰骋的一种倚靠。因此，比起其它国家来，英国在战争结束时仍不失为西欧的强国。

于是，在战争结束以后，英国依靠这种特殊地位，仍不把自己看作是与其它西方盟国同等的一员，而摆出超于西欧国家之外的全球性大国的架式。丘吉尔下面这几句话，就很能反映英国当时的这种心情：

“我们所处的地位在那里呢？我们不是欧洲防务集团的成员国，也不想被并入某种联邦欧洲体系当中去。我们觉得，我们同这两者都有联系；这可以用‘with’这个介词来表示，而不是用‘of’来表示——，我们是跟它们在一起的，

但却不属于它们……”①

这种立场与丘吉尔在另外场合讲的连“边界线”都用不着划的“统一欧洲”的思想，显然是对不上号的。明乎此，则英国在一个相长的时期自外于大陆上。西欧联合的进程就容易瞭然了。因此英国不愿降低作为“世界大国”之一的身价，参加西欧地区性的联合，受到区域性义务的约束。英国的态度影响了与它关系密切的爱尔兰、挪威、丹麦等国。瑞士、瑞典、奥地利、芬兰等则因为它们的特殊地位和政策也不便参加联合的进程。所以当法国和荷、比、卢等国一九五〇年建议采取积极步骤把欧洲委员会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和经济联盟时，便遭到了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反对。

以上说的大体上属于思潮的范畴。从组织上讲，西欧主要国家都成立了促进联合的机构，开了许多西欧范围的会议，但是，直到舒曼计划以前还基本上是舆论准备阶段。

（二）“职能主义”的体现——“小欧洲”的共同市场

荷兰早在一九五〇年就曾提出建立部分工业品的“共同市场”的斯蒂克计划，后来又提出建立农产品“共同市场”的曼斯霍尔计划。法国则提出了实现西欧运输一体化的计划和关于农产品贸易的普弗利林计划。这些计划在当时都没有实现，然而这样设想却是较为切实的，即先在有条件的领域里搞起来，所谓“职能主义”就是这个意思。

实现了“职能主义”的第一个方案是“欧洲煤钢共同体”或“煤钢联营”。这个计划是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于一九五〇年五月九日提出的，因名“舒曼计划”，起草人是战后欧洲联合的鼓吹者、号称“欧洲大将军”的让·莫内。这项计划建议首

① 丘吉尔，《演讲全集》，第八卷，第8481页。

先把法国和联邦德国的钢和煤的生产置于一个共同高级管理机构的领导之下实行联营，以此来作为走向欧洲统一的一个重大步骤。法国政府提出这项计划时申明，首先由法德组成煤钢联营的计划，是向所有西欧国家开放的；它可能会发展为西欧大陆的“经济共同体”，也许会通向“欧洲联邦”。①“舒曼计划”迅速得到联邦德国的响应，并很快博得比利时、卢森堡、荷兰和意大利的支持。于是参加煤钢共同体的西欧六国因而得名为“小欧洲”。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八日，六国签订了建立欧洲煤钢联营的巴黎条约。一九五二年六月，各国议会批准了这个条约，共同体正式成立。

然而，舒曼计划的提出，旗子上写的是“欧洲联邦”，眼前的政治目的却在于“套住”德国。法国政府提出计划时说，法德两国的煤钢实行联营将“搬掉法德敌对的一个主要根源”。②一个多月后，六国代表于六月二十日在巴黎举行会谈，为成立六国煤钢共同体进行磋商。舒曼在二十日开幕式上说，如果法国和联邦德国的工业联合在一种“超国家组织”里，“曾在几个世纪中流血对抗的两个民族”就可以“根绝”在欧洲的一个主要的“隐患”。③

在法国看来，煤钢联营不仅可以收到经济上的效益，而且在政治上可以防止德国的重工业再度发展为战争工业。这无疑是法国十分挂怀的。

随着联邦德国的正式建立，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曾公布过一个盟国高级专员与联邦德国政府签订的进一步放宽对德限制的彼得斯堡协定，停止拆卸西德的重工业设施。④

协定在法国引起的反应是微妙的。国民议会批准了彼得斯堡协定。几个月后，法国与萨尔政府于一九五〇年三月三日签订了

---

① 《纪事年鉴——1950》，第10卷，第145页C1。
② 《纪事年鉴——1950》，第10卷，第145页C1。
③ 《纪事年鉴——1950》，第10卷，第193页C1。
④ 《纪事年鉴——1949》，第9卷，第377页C1。

使萨尔继续留在法国—萨尔经济联盟的协定。

两个协定在西德引起的反应截然两样。联邦德国欢迎第一个协定，反对第二个协定。

一九五〇年的头几个月，法德两国政府就萨尔问题多次接触，毫无结果，两国各执一词，情绪对立。法国指责德意志民族主义在复活，西德指责法国时至今日仍不放弃肢解德国的打算。阿登纳于三月九日接见美国著名记者金斯伯里-史密斯时提出建立法德之间的"一个完整的联盟"①，作为解决两国分歧和走向欧洲统一的步骤，并主张把这种联盟扩大到西欧大陆上的其它国家，如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英国。②三月十日和二十一日，阿登纳两次发表声明，表示愿与法国缔结关税同盟，当时法国没有作出反应。③

西德复兴的趋势是不可免的；鲁尔和萨尔问题之一定要解决也是不可免的。法国此时急需一项相应的对策，以取得主动。为了缓和僵持不下的分歧，舒曼和阿登纳从不同的出发点竟想到一起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政府内负责经济计划工作的让·莫内向外交部长舒曼提出了这个建立煤钢联营组织的方案。

舒曼计划在政治上的用意是明摆着的，已如上述。那为什么说阿登纳和舒曼想到一起去了呢？看看阿登纳对煤钢经营是怎样讲的，不仅对于了解战后法德关系有用，而且为西欧联合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乃至今天的发展，也提供了一些历史背景。

前面提到阿登纳曾对美国记者金斯伯里-史密斯提出建立法德联盟的想法。后来，在舒曼计划于五月九日正式公布以后，法国即以舒曼私人亲笔信的形式向阿登纳提出建议，而且把舒曼计划草案作为备忘录寄去。

舒曼在私人信中写道，他的建议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经

①②　《阿登纳回忆录》（一），中译本，第354页。
③　《纪事年鉴——1950》，第10卷，第90页C1。

济性的，而是具有重要的政治性质。在法国，人们担忧的是，德国一旦恢复了元气，就会进攻法国。反过来说，也可以设想，在德国，人们也有安全的要求。重整军备首先总是在煤、铁、钢的增产过程中显见其端倪。如果建立起如舒曼的建议的那种机构，那么两国中的任何一国都能够觉察到重整军备的初步迹象，这对法国将起着极大的安定人心的效果。①

阿登纳的反映是："舒曼计划完全符合我长久以来所主张的关于欧洲基础工业联营的设想。我立即通知罗贝尔·舒曼，我由衷地赞同他的建议"。②阿登纳认为，舒曼计划是"法国及其外交部长舒曼针对德国和欧洲问题所采取的一项宽宏大量的步骤"，"是德法关系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发展"，③"为今后消除法德之间的一切争端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前提"。④

然而，阿登纳从中还看到更进一步的意义，因为他联系到西欧在世界上的地位来看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在联合起来的欧洲建立一个第三种力量，这种力量虽然远不如这两大强国那样强大，但是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却是如此有力，如果潜在的分歧发展成为严重的紧张局势，在面临这种威胁时，为了维护和平，它可以在天平上投入自己的砝码。我认为，这就是人们在执行欧洲政策时必须注视和追求的目标……"⑤（重点是作者加的）

法国并没有向阿登纳隐瞒舒曼计划在政治上的用意，阿登纳支持舒曼计划则是接过来"为我所用"。

因此，"小欧洲"的煤钢联营之所以能实现，与其说是六国为实现欧洲"一体化"的理想而迈出的第一步，无宁说是六国都

---

①② 《阿登纳回忆录》（一），中译本，第373—374页。
③ 《阿登纳回忆录》（一），中译本，第377页。
④ 《阿登纳回忆录》（一），中译本，第378页。
⑤ 《阿登纳回忆录》（一），中译本，第375—376页。

从中看到对本国发展的好处。法国得以按照自己的政治目的"套住"西德，并取得西德的炼焦煤和焦炭；西德借此同其它五国有了伙伴关系，便于打进五国市场，并利于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国际地位；其它国家也可享受到"小欧洲"内的关税优惠。经过五年的试验，六国在经济上都受了益，钢的出口贸易额为原贸易额的百分之一百五十七，钢产量增产百分之六十五，促进了采煤工业的现代化，保证了煤炭、矿石的可靠供应。但是煤钢联营共同体毕竟是很松散的合作机构，"超国家"和民族利益是必定会产生矛盾的。例如，成员国不愿共同体的高级管理机构干涉本国国有化煤炭企业；五十年代后期一些成员国大量进口美国的廉价煤，法德等国违背条约规定通过运输补贴影响煤钢价格等等，以致被戴高乐讥为患了"营养不良的慢性病"。①

"小欧洲"以外的英国工党政府对舒曼计划是抵制的。舒曼计划公布后，英国首相艾德礼只是在下院说，煤钢联营的计划将受到"仔细"的、"善意"的研究。②态度极不明朗。斯塔弗尔德·克利普斯勋爵在提到英国政府应该拒绝参加讨论时说，从生产上看，英国的煤产量是其他所有被邀请国煤产量的两倍，钢产量相当于它们的一半，更重要的，英国不能参加那些不详究竟的谈判。克利普斯以英国同欧洲支付同盟的谈判为例说，那时，有关具体问题——诸如支付同盟的职能、权限、成员国的义务以及开展活动的方式——都已经清楚了，这才是政府间自由谈判应取的方式；如果在讨论当中，硬要把某种"超国家"机构未经讨论[illegible]加于人，谈判就一定会彻底失败，英国就必须撤离支付同盟了。丘吉尔则认为，英国政府不妨参加讨论，但要根据克利普斯勋爵的意见行事，只有条约符合英国的要求才能接受。丘吉尔还说，在涉及组成西欧政治联邦之类的问题时，英国必须保留自己

①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法国普隆出版社，1970年版，第197页。

② 《纪事年鉴——1950》，第10卷，第145页C1。

的权利。① 英国政府终于拒绝参加舒曼计划。

美国对于舒曼计划的态度与英国有所不同，当时美国从与苏联对抗的需要出发对于西欧联合是采取支持态度的，而且主张英国参加进去。据说，当时美国驻联邦德国高级专员麦克洛伊的法律顾问罗伯特·波威由于与让·莫内关系密切，曾经参与了巴黎条约的起草。美国政府还于一九五三年邀请已作了煤钢共同体高级管理机构主席的让·莫内访问华盛顿，并给予一亿美元的贷款。②

本书的第四章在论述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组织时，曾回顾了夭折的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即普利文计划）问题；由于它同舒曼计划一样，打的也是建立欧洲联邦的旗号，而且它要求实现"一体化"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因此，这里再从西欧联合的角度补充几句。

早在一九四九年七月法国国民议会就北大西洋公约问题进行辩论时，外长舒曼就宣布："德国尚未缔结和约。它没有军队，它决不能有军队。它没有武器，它将不会有武器"。然而，在美国的强大压力和朝鲜战争所造成的东西方紧张关系的形势下，法国便于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四日提出了由让·莫内等起草的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计划。按照法国人的想法，这个计划将具有"武装德国人而不武装德国"的优点。

光是建立一支欧洲军而没有统一的对外政策是不行的。所以普利文计划建议除了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外，还要建立一个政治共同体。六国外长委托欧洲委员会咨询议会起草的报告要求成员国在对外政策、防务、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现一体化，建立欧洲共同体，在两年内把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防务共同体两个组织合并进去。

---

① R·W·G·马凯：《走向欧洲合众国》，伦敦，1961年，第109页。
② 见《欧洲资料》：《欧洲共同体对外关系25年》。

英国对于普利文计划的态度与对舒曼计划的方针是一致的。在评论普利文计划时，艾登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日写给丘吉尔的个人意见中说，普利文计划可能在“主权问题”上引起“政治上的麻烦”，因为，根据这个计划，参加国都不能有自己国家的军队，这就为走向“联邦”铺了路，英国是绝对不能参加这种军队的。①

对于普利文计划，英国有一种很微妙的心理。英国认为，应该有一个能够站得住脚的西欧，这对于同苏联对抗、对于英国的“安全”说来，是很有必要的；而且主要的西欧国家之间也需要保持一定的均衡。从这一点出发，英国赞同美国的观点，不能使西德长此以往没有武装。②但是法国以及西欧其它大陆国家却反应不一，在这种情况下，普利文计划便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然而问题是，英国又绝不愿承担义务把自己的军队卷进去，因为那就意味着英国只能与其它西欧国家处于相同水平，突出不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同时，对于美国打算把“欧洲防务共同体”变成一种由美国领导的“超国家”性质的军事集团，也持保留态度。因此，英国一方面对普利文计划作支持的姿态，另一方面又保持距离，绝不参加。同时准备普利文计划一旦行不通时，英国便出来收拾局面，领头搞一个松散的、温和的方案，以促进某种把西德包括在内的“技术性军事安排”。但是这样的方案什么时候拿出来需要“慎重”，因为如果提得过早，普利文计划可能会被冲掉，那时就会有人说是英国把普利文计划搞掉了。③因此，艾登认为，英国政府应该在“欧洲防务共同体”酝酿的各个阶段中都同西欧大陆保持“尽可能密切的合作”。④

诺塞芝对于英国当时的对欧政策，作了这样的概括：

---

① 艾登：《全程》，伦敦，第33页。
② 丘吉尔：《演讲全集》，第八卷，第8518页。
③ 艾登：《全程》，第34页。
④ 艾登：《全程》，第33页。

"……看到仅仅二十英里以外出现了一个萧条的和没有抵抗力的欧洲，英国政府势必感到忧心忡忡，因为这样的欧洲如果不成为共产主义的受害者，也会把英国经济拖进深渊。但是，英国的部长们同样确信，欧洲的合作……也不能使英国冒丧失独立的危险。这就是说，应该让西欧联合起来，并且形成一个整体，形成一个决策中心，然后英国就很快从中抽出身来……"①

英国的"不卷入"欧洲大陆的政策，是一种英国版的"孤立主义"，目的在于保持自己"超"欧洲的世界大国地位和形象。

欧洲防务共同体彻底失败，英国于是根据艾登的设想，提议扩大一九四八年签订的英、法、荷、比、卢五国布鲁塞尔条约，吸收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参加，组成西欧联盟，为联邦德国加入北约铺垫了道路（此后就接上了第四章谈及的北约的诞生）。

普利文计划固然可以看作是欧洲统一运动这个大范畴里的一个插曲，但是与舒曼计划却并非一脉相承，与后来的罗马条约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普利文计划是法国因美国急于使西德重新武装而提出的妥协方案，目的在于起限制作用。在法国看来，舒曼计划和普利文计划的共同点都是要限制西德的发展。但舒曼计划是法国主动倡议从经济职能部门入手的，普利文计划则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为应急而提出的，甚至法国自己嫌准备不足，阻力极大，结果自己否定了自己。

舒曼计划合乎逻辑的发展，是经过一九五五年的墨西拿会议到一九五七年签订的罗马条约。后者是前者在范围和内容上的扩大，使六国的经济合作向更高一级发展。因舒曼计划而产生的六国煤钢共同体，结束了对欧洲统一运动主要是舆论准备的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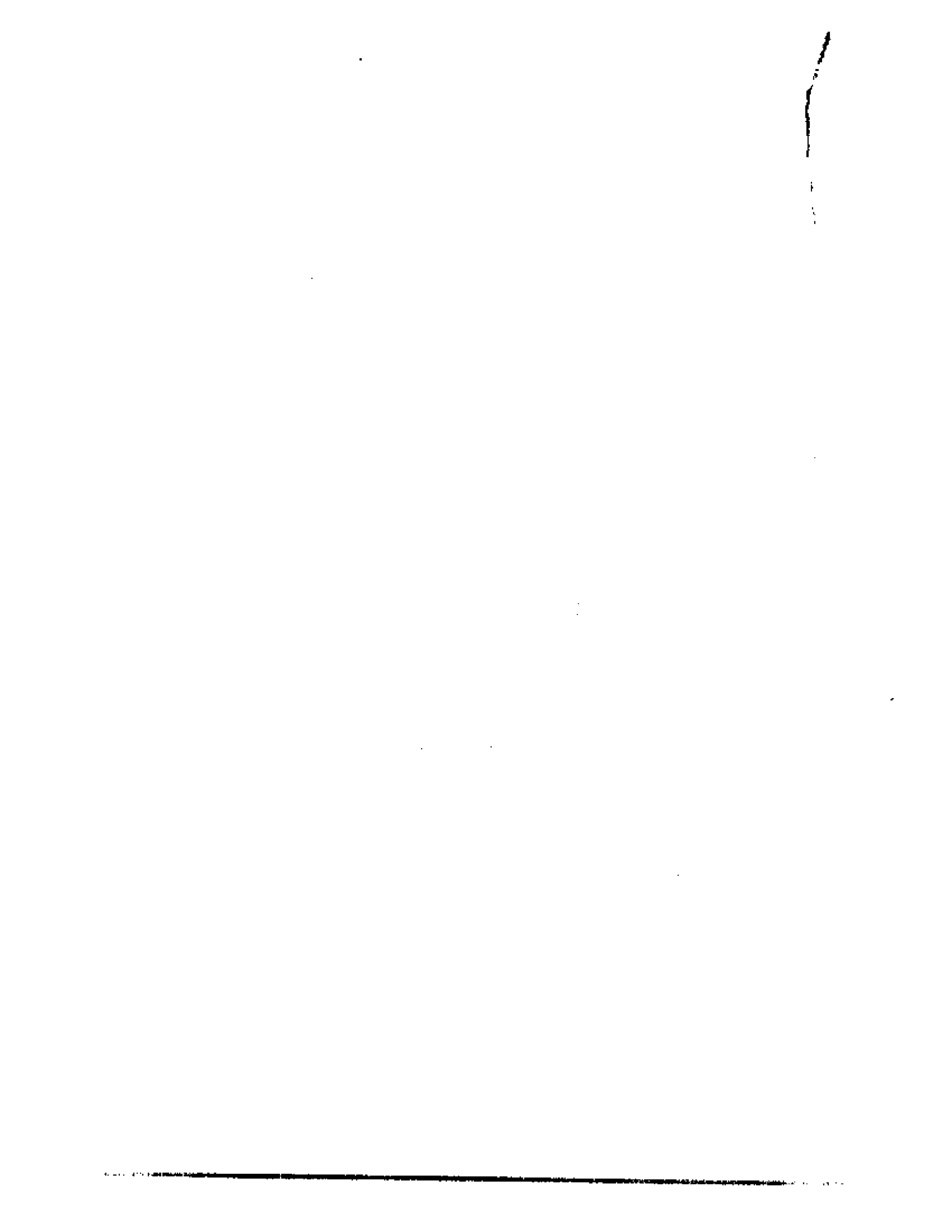
---

① F·G·诺塞芝：《英国对外政策》，第132页。

也使联邦主义和邦联主义在理论上的讨论告一段落，为西欧联合在一定程度上的具体化开了篇。从这个意义上说，舒曼计划标志着欧洲统一运动走进一个新的时期。由于组成共同体的西欧各国处在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和苏联之间，其国际和各国国内条件都与列宁批判“欧洲联邦”口号时大不相同；西欧任何程度的联合都必然地带有在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条件下团结自强的意义。也正是由于这种时代背景，美国、苏联以及与西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亚非拉地区都对西欧出现的这个新事物，寄予很大关注。特别是美国，当舒曼计划向前发展，并在酝酿更加广泛得多、深刻得多的联合时，更不能不密切注意西欧的动向。显然，五十年代中期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来势与十年前因“马歇尔计划”而组合起来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已完全不同了。共同体的出现和发展将使西欧更坚定地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二部分
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的西欧国际关系



内容提要

从五十年代中期起，国际形势发生显著变化：东西方都在试探相互接触的途径；两大军事集团继续尖锐对立，不时出现紧张和危机，但作为总的发展趋势，战后形成的相互封闭的"冷战"局面正出现"解冻"的征兆。与此同时，西欧已经洗刷掉战争留下的烙印，走出了经济匮乏的困难处境，实力明显增强。法国和联邦德国分别制定、提出和执行自己的独立对外政策。法国的戴高乐主义和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是西欧因形势演变而调整对外关系、并相应调整政策的信号。欧洲经济共同体作为西欧联合的根基更加巩固，但困难很多，内部矛盾尖锐，正在艰难地向前迈步。

东西方关系的和缓势头和西欧要求独立发展的倾向，相互促进，是这一时期西欧舞台上的重要特点。欧美关系势必将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

• 第七章 •

“大国交易”——西欧国际关系的时代背景之一

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三年这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出现了许多与前不同的因素。国际关系中的不少环节开始松动，两个军事集团形成以后，美苏两个大国在探索某种共处的新方式。无论在东西方关系方面，或者在西欧局势方面，各方面的接触比以前更加活跃，国际舞台上的面貌孕育着新的变化。

——到一九五五年，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已经建立起来了，欧洲从雅尔塔会议以来的分裂过程——即所谓“两极”体制的建立过程已经完成；

——美苏两个东西方最强大的国家的军事实力的差距在缩小，双方在力量对比的新发展的基础上开始接触，战后出现的“冷战”局面开始发生变化；

——东西方各自的内部关系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从西欧看，战争中遭到破坏的经济不仅已经恢复，而且正在“起飞”，在政治上自然也谋求较为独立的姿态；西欧首先在经济上

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联合。

总之，这几年是从“冷战”走向“缓和”的转变时期。

跌宕起伏、矛盾交错而又谋求相互接触的东西方关系——首先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是了解这一时期西欧国际关系的重要时代背景。西欧正是在这样的国际条件下试图挣脱“冷战”局面加给它们的束缚。

（一）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松动的第一步

举行四国首脑会议一类的想法，最早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就开始有所酝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一直把斯大林看作是对西方不可调和的关键人物，以为斯大林身后的对外政策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斯大林的逝世便在西方引起广泛反应，密切注视苏联将出现什么影响东西方关系的动向。

丘吉尔在斯大林逝世两个多月以后在下院的一次讲话中曾说，斯大林逝世已经使苏联有了“改变态度”的可能，西方应该及时推动召开大国高级会议来讨论东西方的分歧，这样的会议应该是不拘形式的、不规定议程的高级秘密会议，而且也不必非达成协议不可。他还说，参加这样的会议的国家和人数应该越少越好，例如美国、苏联、英国。① 丘吉尔的想法在西方是有一定代表性的，特别象英国这样的世界贸易大国，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很深，更希望同东方发展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英国和美国在同解放了的新中国发展贸易关系的问题上就有过争论，英国由于香港问题和中国的贸易利益，认为它不能完全象美国那样与中国为敌，而应该尽可能长地在“中国的大门里”保留一支脚②；在朝鲜战争期间，英国一方面不得不追随美国，另一方面

① 《纪事年鉴——1953》，第13卷，第149页M 2—150页C1。

②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第九卷，第842页。

仍不想作绝，艾德礼同杜鲁门进行了六次长时间的讨论。① 这次丘吉尔提出同苏联举行高级会晤，立刻得到了下院两党的广泛支持。法国对于同苏联拉关系也心向往之，只是对丘吉尔只提到美英苏三家不以为然。② 美国国务院认为，丘吉尔谋求的"崇高目的"值得称许，但没有进一步表态。③

一九五三年还有几个重大国际问题正在势头上，这也许是丘吉尔的想法不可能很快实现的重要原因。例如，朝鲜战争刚刚停下来，问题还很多，两个德国已经成立，西方正忙于解决重新武装西德的问题；对奥地利的和约谈了几年还没有解决的迹象，等等。特别从战后以来绷得很紧的弦，一下子松下来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大国需要接触的舆论在当时是已经有了。

一九五四年是"印度支那年"，大国的主要注意力都放在了印度支那问题上，（然而日内瓦会议毕竟给大国领导人的会晤提供了机会。）这一年，西方还忙于讨论欧洲防务集团一类的问题，东西方都在为成立两个德国、并使之分别加入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而积极活动。

到了一九五五年，两个德国和两个军事集团都已是既成事实，"希望德国统一的一切托词统统丢到九霄云外去了"。④ 东西方都好象完成了自己的一件大事，从而有可能产生在同对方打交道时换换策略的想法。西方在接受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的巴黎会议上，已有了把丘吉尔一年多前的方案加以具体化的设想。一九五五年二月，布尔加宁接替了马林科夫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实际上外交决策人是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新的领导班子比马林科夫时期走得远得多，以很大的劲头修改了斯大林生前的对外政策，大力推进东西方的接触。召开四国首脑会议的设想，在

①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第三卷，第1206页—1788页。
② 《纪事年鉴——1953》，第13卷，第150页E1。
③ 《纪事年鉴——1953》，第13卷，第150页E1。
④ 查里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第376页。

西方和苏联频繁磋商下，愈来愈成熟了。差不多同时，旷日持久的对奥和约问题的谈判，意外地有了转机，在几个月内谈妥了几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五月十五日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签定了奥地利国家条约，四国保证奥地利的永久中立地位，外国占领军限期撤离。这件事在欧洲引起了一阵和缓的气氛，被看作是东西方可能转向“和解”的信息。艾森豪威尔说：“这个举动（指奥地利国家条约的签订）可以解释为一个吉兆，把东西之间有成果谈判冻结起来的苏联冰块大有融化之势。”① 当然艾森豪威尔的话带着很大偏见，把美国的责任洗刷得一干二净。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值得一提。在四国首脑会议正在筹备的时候，苏联在白令海峡打下了一架美国海军巡逻机。杜勒斯向莫洛托夫提出了抗议，莫洛托夫居然没有照惯例那样驳回，而是表示“遗憾”。接着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对这件事表示遗憾，并且答应赔偿美国一半损失。② 艾森豪威尔说，这件事，“似乎会破坏会议的召开，实际上却给了一线希望”。③ 美国国务院马上表示“满意”，说苏方当时确实没有掌握应有的情报。④

经过双方频繁磋商，最后决定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在日内瓦举行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商定的议程是（一）德国统一问题；（二）欧洲安全问题；（三）裁军问题；（四）改善东西方关系问题。在会议举行之前，美英法三国先协调了步调，并且在联合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在旧金山同莫洛托夫一起为会议作了最后准备工作。在这期间，双方一再表白自己对通过会晤讨论东西方关系问题如何具有诚意。在美国独立日那天，赫鲁晓夫破例出席了美国驻苏联使馆的招待会，与美国驻苏代办谈笑风生，

---

①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上）·受命变革（二）》，中译本，第571页。

② 《纪事年鉴——1955》，第15卷，第214页B3。

③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上）·受命变革（二）》，第574页。

④ 《纪事年鉴——1955》，第15卷，第214页D3。

一时被视为颇有寓意的外交姿态。同时，双方还通过记者招待会等渠道披露各自对实质问题的立场和观点。其实，在会议之前，谁都明白议程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不会取得一致意见，而且开会的目的和意义原不在于能解决什么问题。会议进行的一周当中，双方观点无调和之可能，各说一套，也没有很尖锐的交锋，同战争后期几次会议要当真解决几个战后安排问题的情形，大不相同。阿登纳说，这次会议是一次“微笑的会议”。①

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任何一方都没有放弃统一的口号。双方都在口头上抓这个旗帜，但又都知道，随着欧洲两大军事集团的成立，德国统一的前途是越来越渺茫了。西方以“艾登方案”为代表，提出需把通过“自由选举”实现德国统一放在“欧洲安全”问题之前，并且坚持统一后的德国属于西方。法国是最不愿意看到德国统一的，但在会议上为同英美保持共同立场，表态口径尽力与英美一致。苏联则坚持首先建立全欧集体安全体系，两个德国都参加，在过渡时期，两个军事集团可以保留。在裁军问题上，西方强调互相检查和监督，以对付苏联在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苏联则强调无条件禁止核武器，针对的则是美国的优势。会议结束的头两天，艾森豪威尔突然提出一个“开放天空”的建议，提出美国和苏联交换各自军事设施的蓝图，并允许对方派飞机到自己的领空进行“空中侦察”，据说这就可以预防任何一方搞“突然袭击”。布尔加宁在会上没有明确表态，直到会后回国在八月份向最高苏维埃作关于日内瓦会议的报告时，才正式拒绝了“开放天空”的建议。

在四国首脑会议之外，必须提到一个没有列席的“代表”，这就是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阿登纳从始至终关注着会议的进行，而且与杜勒斯书信往还，督促西方与会者坚持把德国统一和欧洲安全连在一起的立场。阿登纳最担心的是西方上苏联关于德国

① 《阿登纳回忆录》（二），中译本，第551页。

"中立化"主张的当。莫洛托夫在一九五四年柏林四国外长会议上就提过德国"中立化"的主张。阿登纳认为，德国实行"中立化"显然对苏联有利，因为这等于西德脱离西欧，西方必将蒙受严重的战略损失，与奥地利和瑞士实行中立的情况都不一样。他说："如果人们考虑到德国中立化的后果，就一定会明白，这样就会使美、英两国的军队撤出欧洲大陆，德国在发展过程中就有落入苏联势力范围的危险。"①

把德国的东半部"统"过来的想法，是阿登纳一辈子处心积虑、奋力以求的，对于西方盟国能否顶得住，一直不放心。阿登纳的担心并不是毫无根据，因为当时不仅苏联提出德国"中立化"问题，即使在西欧，甚至在美国，也有这种议论。例如，在欧洲中部划出一个非军事区的设想，在东、西欧都有所酝酿。但是，德国的形势早已明朗。苏联和西方都清楚，自己的方案，绝不可能为对方所接受，双方愈是提对方不会接受的方案，就愈是确认了德国分裂的现状。"西方国家坚持一项促进和发展西德国家的政策，苏联人则建立了东德。"②这种现状起码在当时已经无法改变了。

总之，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任何实质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了一个给四国外交部长的"指示"作为这次会议的公报，决定于一九五五年十月在日内瓦举行四国外长会议，继续讨论这次会议提出的议题。当然基于同样的理由，四国外长会议照样没有任何结果。

在日内瓦会议的最后一天，四国首脑轮流讲了一番好听的话，表示这样的会议还要继续下去。英国首相艾登说，谁也没有期待会议会解决"那些复杂的问题"，但是，"一种新的和解精神"已经出现在会议上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说，首脑

① 《阿登纳回忆录》（二），第552—553页。
② 查里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第387页。

会议无疑对“和缓紧张局势有积极意义”，东西方之间“增加了信任”,会议为“各国间的更广泛的合作打下了基础”。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历史将说出这次会议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一种持久和平的前景”是“光明的”，“现代战争的危险变得小了”。法国总理富尔说，“笼罩”着会议的“精神”，“将为国际关系留下深刻的印记”。①

四国首脑参加日内瓦会议并不是为了解决什么具体问题，而是为了打开东西方沟通的渠道。它表明，在波茨坦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整整十年之后，双方都觉得应该从互相封闭的状况中走出来，寻找一种既保持立场鲜明对立、又不触动世界格局的现状的共处方式。用西方的语言，就是要“解冻”和掀开“铁幕”。苏联的姿态是相当主动的。在会议举行以前，苏联政府便向阿登纳发出了邀请，后来在阿登纳访苏期间，苏联和联邦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等于从逻辑上确认两个德国的既成事实。与苏联建交，对于阿登纳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外交举动。阿登纳特意说，与苏联建交并不意味着联邦德国承认了东德国家，更不是放弃了“统一”目标。同年12月，联邦德国提出了“哈尔斯坦学说”，把同苏联建交作为一种例外。尽管如此，苏联和联邦德国建交在东西方关系中毕竟是一件大事。日内瓦会议以后，法国总理富尔和外交部长比内也接受了访问苏联的邀请，英国政府则邀请了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访问英国。在晚些时候，美苏两国的交往也有了一些进展，苏联的米高扬和科兹洛夫访问了美国，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回访了苏联。

会议结束后，便产生了“日内瓦精神”这个国际关系上的名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西方关系在“冷战”中持续了十来年，到一九五五年开始出现了“缓解”的征候，东西方之间的争斗将采取新的形式。

---

① 《纪事年鉴——1955》，第15卷，第246页A3。

（二）U-2飞机事件和巴黎首脑会议的夭折

四国首脑会议的第二年的局势是十分动荡的。上半年，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有名的全面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从未有过的轰动，而且使全世界都高度集中地注视着苏联的变化。下半年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爆发了英、法、以色列侵略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一九五七年，苏联第一个发射人造卫星成功，苏联以自己实力的增长为后盾，再次向美英法提出“缓和局势”的倡议，西方称之为“和平攻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一九五八年一月正式提出再举行一次四国首脑会议的建议。

然而当时的客观形势并没有为举行这样的高级会议提供有利的气氛。“艾森豪威尔主义”出笼后，中东形势再度紧张，一九五八年七月美英军队在黎巴嫩登陆；不久，台湾海峡的局势也出现紧张。同年十一月，欧洲最脆弱而敏感的神经——柏林地区，因赫鲁晓夫的一项动议而发生了“危机”。赫鲁晓夫提出，苏联将在六个月后把西方和西柏林的通道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管理，西柏林将成为实行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有关国家缔结一项对德和约。这就是说，美英法的军队必须从西柏林撤出，西方国家必须同它们拒绝承认的民主德国政府打交道。苏联还提出，如果西方拒绝签订一项对德和约，苏联就将单独同民主德国签订条约。赫鲁晓夫这一哀的美敦式的建议，给西方出了一道难题：按照赫鲁晓夫的要求从西柏林撤出，那是不可想象的；同苏联搞军事对抗，更是不可思议的。西方当然表示了强烈的抗议，但是就是再严厉、再强烈的抗议，也是无济于事的；同苏联谈判是不可避免的唯一出路。有人说，赫鲁晓夫的“哀的美敦书”是为了压西方接受关于第二次四国首脑会议的建议。也许不无道理。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东西方都进行了紧张的活动，苏联和美英法之间展开了“通信”外交。赫鲁晓夫的柏林建议，虽然限期六个月，实际上弯弓不发，并不准备如期硬性实行。

一九五九年五月在日内瓦举行了四国外长会议，并决定邀请两个德国派代表列席。按照艾森豪威尔的意见，如果外长会议有所“进展”，就进一步准备更高一级的会议；否则就告吹。苏联的态度是积极促成，力图把外长会议变成高级会议的预备会议。英国正在同苏联谈判贸易，麦克米伦刚访问过苏联，英国向苏联提供商品信贷的谈判正在进行，麦克米伦对于中欧开辟非军事区的方案也持同情态度，因此，极力在美苏之间起调和作用，力促高级会议能够开得起来。然而，外长会议注定是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会议一开始就因为一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琐事而拖延下来。例如，外长会议的谈判桌应该是什么形状的，扯个没完：美国赞成用方形的，苏联认为该是圆的，英国主张是椭圆的，由于争执不下，木匠只好停工等待“指示”。后来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撮合了各方意见，达成了协议：桌子是圆的，但是两个德国的代表不坐在此处，而坐在圆桌以外的地方，以示有所区别。对于两个德国的代表团的发言权问题，外长们协议，任何一个德国代表团要发言，需先向会议主席提出，由会议主席征询代表们的意见。此外，四国外长可以根据四国中任何一国的要求，立即举行只限于四国外长参加的秘密会议。①这些事看来只是会前的一些花絮，但却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气氛。外长会议虽然进行下去了，但达不成任何协议是在意料之中的。

这一年九月，赫鲁晓夫第一次去了美国，在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了好几次长时间会谈，后来被新闻界渲染为“戴维营精神”。双方协议，在柏林问题上的谈判不受期限的约束，等于赫鲁晓夫收回了六个月为期的“哀的美敦书”。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后

① 哈罗德·麦克米伦：《指明方向》，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76页。

宣布苏联将削减自己的武装力量。至此，通向另一次四国首脑会议的路已经铺垫得差不多了。于是，再一次四国会议预定在一九六〇年五月在巴黎举行。

但是，"戴维营会谈"以后的气氛并不顺利。反复酝酿的巴黎会议竟然一天也没有开就夭折了。导火线是会议前夕的美国U-2飞机事件。

一九六〇年五月五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的火箭部队于五月一日击落了一架侵入苏联领空的美国U-2侦察机。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一架探测大气层条件的美机失踪，并说是因高空缺氧而失控。① 过两天后，美国承认U-2飞机可能为"取得铁幕后面的情报"而飞入苏联领空，同时说，这种搜集情报的活动是"所有国家"都干的，算不得什么"秘密"，"战后历史肯定地表明，苏联在这方面并不后人"；并且辩解说，这样做是为了防范"突然袭击"；而且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美国才在一九五五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提出"开放天空"的建议。② 五月七日，赫鲁晓夫在会见捷克代表团时再次强烈谴责美国侵略苏联领空，说美国派U-2飞机侵入苏领空，是由于苏联提出关于西柏林通道的建议而故意要"教训"一下苏联；因为在苏联和民主德国签订和约之后，如果西方不经过民主德国而硬行到西柏林去，就要受到苏联驻民主德国的部队的阻遏。在这个谈话中，赫鲁晓夫顺便强调了苏联火箭的准确无误。③ 不过这时，赫鲁晓夫并没有抵制巴黎会议的意思。

五月中旬，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赫鲁晓夫等按计划分别到达巴黎。十五日这一天，各方活动紧张，苏联向美英法三国散

①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616页。

②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620页、625页。

③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623—624页。

发了声明，要求美国就U-2飞机事件道歉，惩办肇事者，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西方三国作了会议开不成的准备，紧张地起草了一个共同声明。五月十六日，巴黎四国首脑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赫鲁晓夫在戴高乐作为东道主简短致词后，出其不意地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声明，谴责美国U-2飞机侵入苏联领空，并提出美国政府应该：第一，"谴责美国空军部队对苏联的不可容忍的挑衅行为"；第二，"以后不再继续这些针对苏联的行动和政策"，否则，苏联不可能同美国在高级会议上进行"有成效的谈判"；在这种情况下，会议将只能延期举行。① 紧接着，艾森豪威尔也发表了一项声明，拒绝向苏联道歉。他说，美国并没有威胁苏联，它所做的无非是为了防范"突然袭击"；并说，他正是为了同苏联探讨如何"消除一切形式的间谍活动的必要性"、并就此达成协议才到巴黎来的。②

麦克米伦在U-2飞机事件发生后一直想从中斡旋，力图使会议少受影响。他觉得美国应该"采取一条合理的方针——特别是保证不再进行U-2飞行"，而且"这其实不需要作出什么重大牺牲，因为明摆着的事实是不管这个方法有多大好处，现在它已经'露馅'了——象一个间谍被抓住或被揭露一样。"③ 因此，麦克米伦在会议上的发言仍希望会议不要受到威胁。④

戴高乐的态度又有所不同，他本来就不象美国那样热中于这样的会议。五月十五日，戴高乐在会议前见到赫鲁晓夫时说，这次U-2飞机事件只不过是美苏"冷战"和军备竞赛中的一个插曲；正是由于紧张局势的存在，美国才进行间谍活动，其实苏联也不例外，真正的问题是弄清楚双方是否打算结束这种局面。⑤

---

①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636页。

②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和苏联》，第639页。

③④ 哈罗德·麦克米伦：《指明方向》，中译本，第246页。

⑤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拯救》，第266页。

戴高乐在十六日的会议上，在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念了自己的声明之后，继续针对美苏两家说，U-2飞机事件是五月一日发生的，在这半个月当中，要么美苏双方就这件事及时谈判，找出解决办法，要么索性通知大家用不着来开这次会议，现在大家都来了，却有人提出一些要求，势必影响会议进行。他说："间谍事件确实是令人遗憾的事。但是，既然两个大国针锋相对，拼命扩充军备，随时都可能发动攻击，这样的事（指间谍活动）怎么能够避免呢？一架美国飞机飞过俄国领土，但就在今天二十四小时内，苏联的卫星已经十八次飞过法国的领空，怎么能知道它不拍摄照片呢？"所以，戴高乐认为，会议还应该按日程进行下去。①

但是，巴黎会议是没法开下去了。赫鲁晓夫在十七日突然在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苏联的立场。西方三国也发表了表示遗憾的声明。赫鲁晓夫并且撤回了头年向艾森豪威尔发出的访苏邀请。

诚然，"解冻"的步伐是缓慢的，从一九五五年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以来，冰层似乎不但没有溶化，反而更加厚了。然而在厚厚的冰层下面，一些固有的因素仍在活跃着，只要有相应的契机，冰层还会出现裂缝；当然裂缝还会再冻结起来。从现在起，紧张一时、松弛一时，因有关各方的利益而相互交替着，形成了国际形势发展中的一条规律。

（三）从"柏林墙事件"到加勒比海危机

巴黎会议夭折半年以后，肯尼迪于一九六一年接替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一月二十日宣誓就职，大作"寻求和平"的姿态。赫鲁晓夫在贺信中表示希望通过共同努力实现两国关系的"根本改善"。双方在寻求转机。②

---

①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拯救》，第267—270页。

② 《纪事年鉴——1961》，第21卷，第21页A 1。

肯尼迪的政策与艾森豪威尔的政策是有所不同的。肯尼迪的政策有两大“发明”：一是提出了所谓“宏伟计划”，在对苏政策上以美国的“和平攻势”对苏联的“和平攻势”，在就职演说中特别强调美国的“和平意图”；明确说涉及世界和平的问题，主要要看美苏两家的关系。二是用“灵活反应战略”代替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时期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这就是说，在核武器——洲际导弹时代，美国已失去了独揽核威慑力量的绝对优势，美国一家独霸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个新战略还涉及到西方盟国的“分工”问题，按照美国的意思，在西方防务中，美国负有全球责任，北约的核武器的领导权应该集中在美国手里，发展核力量也主要是美国的任务；西欧则负地区责任，主要负担发展常规武器的任务。美国这种考虑在战后是有延续性的。战后初期，美国勉强与英国分享一些原子能的秘密，那是因为维护英美“特殊关系”符合美国在欧洲的利益和需要；而且在战争期间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曾经协同搞试制的实验工作，英国的科学家是出过力的，因此英国理应分得一杯羹。至于对法国，则取排斥态度。肯尼迪和麦克米伦联合发起的“多边核力量”，就是这个意思。以后七十年代尼克松和基辛格提出“欧洲年”和一直持续下来的关于大西洋两岸的防务分工，直到最近基辛格提出的“改造北约的计划”等等，都贯串了这种美欧分工的思想。①（肯尼迪在第三世界地区还有别的花样，诸如“和平队”、“争取进步联盟”等等。）

在美苏两家实力差距逐渐缩小的情况下，东西方关系就象一条弹力皮带，紧一紧，松一松。一九六一年六月，肯尼迪——赫鲁晓夫的“维也纳会谈”虽然没有象“戴维营会谈”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但是表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有意要建立某种两个核

---

① 亨利·基辛格：《改造北约的计划》，1985年3月5日《时代》周刊，第16—20页。

大国的“共管”体制（CONDOMINIUM）。“维也纳会谈”后，美苏间缓和之风又起，好事者称之为“维也纳精神”。

同年八月的“柏林墙事件”所引起的影响很能说明局势发展的趋向。围绕柏林墙问题的喧嚣当时是非常强烈的，西方各国政府众口一辞地加以谴责。肯尼迪表示美国坚决作西方的后盾，派了副总统约翰逊到西柏林表示声援。但是，在一片抗议声的后面，人们感到，西方国家除了必须在道义上表明立场之外，似乎并不打算、也不可能多做些什么。苏联也通过外交途径向西方国家表示，民主德国修筑这道墙只是为了防止过多的东德人移居西柏林，绝对没有针对西方国家的任何政治意图。“柏林墙”确实使欧洲的空气紧张了一阵，再次说明，柏林是一个神经脆弱的地方，这里发生的事情总要牵动整个欧洲的神经。但是“柏林墙”事件的发展却说明，柏林在欧洲的这种奇特的地位越来越变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慢性病”，或者差不多已经“钙化”了。

最能说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局势总趋势的，莫过于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或曰加勒比海危机。西方惯于把加勒比海危机的解除看作是“冷战”时期的结束，认为它表明世界局势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东西方对话的新时期。按一般常情来看，两国的导弹在加勒比海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只要一按扳机，就会发生战争，那情景是够紧张的。两国搞的都是“边缘政策”，都是以讹诈对讹诈。最后，“危机”没有酿成战祸；双方表示接受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调停，苏联满载导弹的舰队在美国军舰的监视下撤走；美国也保证不再干涉古巴的事务。

加勒比海危机使苏美两家都试了试自己的膂力。在苏联导弹于一九六一年七月运进古巴后，美国在采取什么对策方面曾是很费踌躇的。直到十月中旬，美国决策层还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首席检察官罗伯特·肯尼迪等为代表，认为应该力避直接武装冲突，主张对古巴实行封锁；第二种意见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主，主张立即对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

进行轰炸。他们认为，只靠封锁搬不走导弹，无异于“把马关在厩里”；还说，如果对古巴实行封锁，苏联可以以封锁柏林作为报复。肯尼迪最后采纳了麦克纳马拉等人的意见，认为如采取军事行动，苏联不会束手挨打，即使不在古巴动手，也会在柏林采取报复措施。①十月二十二日肯尼迪发表电视演说，宣布武装封锁古巴，并且要苏联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视下，立即拆除和撤走在古巴设置的导弹。二十三日，肯尼迪发布“禁止进攻性武器运往古巴”的公告，宣布从第二天起将拦截前往古巴的舰船，任何被拦截的船只都要听候美国检查。同一天，苏联发表声明，坚决拒绝美国的“拦截”，并将准备反击美国的“威胁”。但是几天后，二十六日赫鲁晓夫给肯尼迪一封当时没有公开发表的信，突然表示愿在联合国监督下从古巴撤出导弹，美国则需撤消封锁并保证不入侵古巴。（这封信后来第一次发表在施莱辛格主编的《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中）二十七日，肯尼迪立即复信并发表声明，要求苏联撤走导弹，美国给予不进攻古巴的“保证”。二十八日，赫鲁晓夫复信肯尼迪，说已下令撤退导弹，并同意让联合国核实。十一月间，苏联从古巴运走了四十二枚导弹，并在公海上接受美国军舰“船靠船”的“观察”。十一月二十日，肯尼迪宣布赫鲁晓夫已经答应在三十天以内从古巴撤走全部“伊尔-28”轰炸机，同时宣布取消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十二月六日，美国国防部宣布苏联轰炸机已经撤离古巴。

至此，所谓加勒比海危机即告一段落。苏联的导弹来得快，去得也快。这其间有一个美苏互相观察的过程。双方都战战兢兢地放了一支试探对方意图的气球，双方都冒了一次风险，肯尼迪是以武装封锁的讹诈，对付苏联导弹的讹诈。结果双方在千钧一发之际后退了。西方舆论界认为，这表明美苏双方谁也不想冒一场核

---

① 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第二卷：《东欧与苏联》，第689—693页。

战争的危险，谁发动了进攻，都不会得到什么。因此，双方在力量趋于平衡的条件下只有寻求共处之道；"冷战"局面不能照原样持续下去，"热战"更是双方所极力避免的。加勒比海危机在战后第一次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摆在随时可以交手的形势里，问题就表现得格外鲜明而现实了。它在政治上产生的后果，便是美苏两家从战后初期形成的对峙态势过渡到有意识地在国际事务中的"共管"体制。这时在日内瓦举行的三国核停试会议正在缓慢爬行，商量在哪些领域、在多长时间内可以有限地把核试验暂停一下，美英苏三国在策划着排他性的核交易。此外，柏林问题虽然还在僵持着，然而，在柏林墙事件之后，尖锐的程度已大不如前了。德国统一问题，东西方没有人公开放弃，但事实上不是临近于解决，而是更遥远了。两个德国的现实，正在国际上为人们所接受。对比战后的头十年，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到以加勒比海危机为标志的六十年代初，国际舞台上的斗争已经具有新的形式。

（四）从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到莫斯科三国条约

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在当时曾是一个震动世界的头条新闻。美国的科学家们纷纷感到，美国的实力正在受到严重挑战。艾森豪威尔立即从十月八日至十五日召集了有防务专家和科学家的会议，研究美国火箭问题。艾森豪威尔十月九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对于美国之落后于苏联表示"关切"，虽然苏联的人造卫星并未构成对美国安全的威胁。① 从一九五七年三月起，苏联已经开始了新的一轮"和平攻势"，西方感到，这是苏联在苏共二十大以后采取的新步骤。布尔加宁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提出在国际监督下在二至三年

① 《纪事年鉴——1957》，第17卷，第330页D2。

内停止核试验的建议，并且酝酿上面提到的夭折了的再一次高级会议。一九五七年十月，波兰外交部长腊巴斯基提出中欧实现非军事区的建议，“腊巴斯基计划”因此得名。这个建议在西方也引起了某些响应。实际上早在一九五五年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上，艾登就曾提过类似的问题，但没有展开。这时已接替艾登出任英国首相的麦克米伦采取的姿态更积极一些。不过，法国有保留，美国更反对，所以英国试探了几次发现西方盟国反应不佳便收回了。然而，“腊巴斯基计划”的影响一直时隐时现地没有间断过，对于害怕局势紧张和在欧洲发生武装冲突的中欧地区尤其有吸引力。

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发布了一项法令，宣称只要其它国家不进行核试验，苏联就不试验。接着刚接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致函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提出苏联方面的上述建议。艾森豪威尔四月八日复信赫鲁晓夫，提议召开专家会议就核试验核查的技术问题进行研究，专家会议于七月一日起在日内瓦进行，第一阶段开到八月二十一日。参加会议的都是专家、教授，讨论核试验能否核查以及怎样核查等问题。三十日发表的会议报告说，核试验是可能核查的，为此需建立一百六十到一百八十个地面监察站，部署各种科学仪器，每站由三十至四十名科学家管理等等。这一套科学技术核查方案，统称为“日内瓦体系”。这样广泛的监察站需要把几千名科学家派到偏远地方去，而且耗资甚巨，所以可行性不大。始终参与其事的美国能源委员会主席西伯尔格说：“报告的细节……极少报导，普通人也搞不懂。由此而产生的印象是，一种有监督的禁试何以竟那么轻而易举地取得快速的协议；至于将来怎么样，那可是另一回事了。”①

格兰·T·西伯尔格：《肯尼迪—赫鲁晓夫和禁止试验》，伦敦，1983年版，第13页。

艾森豪威尔的反应是很迅速的，报告还没有问世，就建议三个核大国（苏联、英国和美国）就永远停止核试验举行谈判，而且说从开始谈判之日起，美国可以暂停试验一年。苏联在八月三十日答复，同意从十月三十一日起开始谈判。有意思的是，会议临近的时候，双方都拼命进行爆炸试验，美国进行了五十多次试验，其中八次是地下试验。据美国方面的消息，苏联试验了十四次，其中有两次是在谈判开始后进行的。以后这类爆炸停止了大约三年。

三个核国家的会议叫作“不继续核武器试验会议”，仍然在日内瓦进行。与专家会议不同的是，这个会议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会议。美国代表团团长、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詹姆士·瓦兹沃尔斯，英国代表团团长、外交国务秘书大卫·奥姆斯贝-戈尔，苏联代表团团长希米扬·K·查拉普金，都是裁军问题的谈判老手。会议讨论的问题看来是技术性的，实质上反映了政治上的讨价还价。他们主要在以下三个问题上谈不拢：

一、苏联主张，各监察站的人员应由设立监察站的国家配备，监督委员会只派一、两名观察员；西方则主张各监察站的人员一半由设立监察站的国家以外的另两个国家配备，另一半由中立国家配备。

二、苏联主张监督委员会实行否决权制；西方反对。

三、苏联主张，视察小组是临时性机构，成员完全由视察国的人员组成；西方坚持视察小组是常设的，人员从监督委员会中的国际工作人员选择。

很显然，核心是西方要坚持和扩大监察和监督的范围，苏联则千方百计抵制这种监察和监督。从这点看，美国是想竭力保住自己的优势，大规模的国际监督当然不利于苏联赶超美国。一九五九年初，三国会议行将复会的时候，美国代表团团长瓦兹沃尔斯要求同苏联代表团团长查拉普金作一次非正式的交谈。瓦兹沃尔斯告诉查拉普金说，根据美国科学家在头年地下核试验取得的

技术资料，专家会议提出的核查方案早已过时了，不能胜任发展了的情况，“日内瓦体系”的一百八十个监察站远远不够，还得增设一些。对此，苏联当然不能同意。

这样的讨论继续进行下去，双方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繁琐的核查方案，根据“日内瓦体系”和一九五八年双方突击性大规模试验得到的新情报，研究在高空、水下、地下爆炸的监督问题，商讨怎样达到在这三个领域里停止试验的目的。总之，双方都不是先把核试验停下来，而是没完没了地讨论一旦达成停止试验的协议以后怎样核查出违背协议的行为。这样的讨论显然是本末倒置的。在会议进行期间，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反复交换信件。在艾森豪威尔即将去任的一九六〇年，三国停止试验的谈判还不见有什么重大突破，U-2飞机事件一度加剧了东西方的紧张关系，在开了近三百次会议以后的“不继续核武器试验会议”于十二月五日停了下来。美国白宫的新主人肯尼迪上台后，双方中断了三年的核试验恢复进行，美苏双方重新试探新的接触。

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国日内瓦不继续核试验会议复会。从日内瓦专家会议到不继续核试验会议，意味着从技术性会议发展为政治性会谈。这提供了一种迹象，即三个核国家——主要是苏联和美国——都有意在有限度地停止核试验方面作成一些交易，谈判朝向缔结一项条约的方向迈步。这种迹象在一九六一年以后更加明显。美国和英国在四月先联合提出一个条约草案，苏联在十一月也提出了自己的草案。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举行会议，美国和苏联再次分别提出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草案。两个草案虽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特别是在核查问题上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是双方都提到了可以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等三个领域停止核试验。

在这期间，美国和苏联都想搞成一些交易的迹象是很多的。其中西伯尔格率代表团访苏就很说明问题。这次访苏是为了谈判“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西伯尔格是美国能源委员会主席，代

表团由专家们组成，于五月十八日乘坐了肯尼迪的总统专机抵苏。苏联给了这个代表团以格外热情的接待和很高的礼遇。代表团到莫斯科后的第三天，西伯尔格就和苏联国家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彼特洛赛昂茨签署了两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合作备忘录。据西伯尔格追忆："我们的旅行实现了好几个'第一'。我们是第一批外国人参观了乌里扬诺夫斯克的苏联核反应堆实验站和赛尔普柯夫高能加速器；战后第一批西方人参观了列宁格勒的镭研究所；第一批外国人参观了许多工业反应堆和一些其它科学设施。"① 这次访问的"高潮"则是五月二十九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的接见。西伯尔格回国后于六月十四日向肯尼迪作了汇报。西伯尔格认为，他所率领的代表团实际上扮演了"友好使节"的角色，而且"表演得差强人意"，主客之间的气氛"开始得极好"，"逐渐地减少了保留而增多了友谊"；这样的接触"肯定会通向高一级的会晤"。西伯尔格判断，勃列日涅夫接见代表团绝不是出自一般"常礼"。② 西伯尔格在三国谈判核试验问题的全过程中是美国方面的主要参谋人员之一，肯尼迪为此召集的高级会议，他都在场。他的记载比较能够反映苏美双方希望加速达成某些协议的意向。

在美苏领导人之间架设"热线"是又一个重要迹象。苏联在一九六二年七月曾经提过这样的建议，当时美国的反应不积极。加勒比海危机以后，美国对这个问题有了兴趣，于是在十八国裁军会议期间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说在克里姆林宫和白宫之间架设直接电话线，可以在危机的紧急关头由双方最高领导直接通话。六月二十日，美苏双方签署了架设"热线"的备忘录。其实，谁都懂得，"热线"本身解决不了什么"危机"，"热线"在这个时候架设无非表明美苏关系中的一种气候。

① 格兰·T·西伯尔格：《肯尼迪—赫鲁晓夫和禁止试验》，第203—204页。
② 格兰·T·西伯尔格：《肯尼迪—赫鲁晓夫和禁止试验》，第205—206页。

在商谈架设“热线”的同时，肯尼迪于六月十日在檀香山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据说在讲话发表之前就向报界透露，说肯尼迪将作一次“意义重大”的演讲。①

肯尼迪在这次讲话中宣布了两件事：第一，苏联、英国和美国三国首脑已经协议，三国不久将在莫斯科签署一项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第二，只要其它国家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美国也不进行这种试验，而且不会第一个恢复试验。肯尼迪还说，如果世界上发生全面战争，首先遭到攻击的必定是苏美两国；两个最强大的国家恰恰最有被毁掉的危险。肯尼迪在这次讲话中大作和平姿态，他说：“我打算要什么样的和平呢？那将不是由美国武器强加给世界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而是所有人的和平。”②第二天的苏联报纸几乎全文刊载了肯尼迪的讲话。据说，赫鲁晓夫后来见到哈里曼说，肯尼迪的讲话是罗斯福身后至今美国总统所作的“最好的”讲话。③

同一天（六月十日），赫鲁晓夫会见了英国工党代表团。英国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在会见后接见记者说，赫鲁晓夫给他的印象是，马上搞以监督为基础的全面停止核试验的协议，可能是渺茫的，但是，就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停止试验达成协议，是很有希望的。④以后，赫鲁晓夫七月二日访问民主德国时明确表示苏联准备签署三国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

七月十五日，美国代表哈里曼（他在一九四三年至四六年当过美国驻苏大使，被认为是一个苏联问题专家）、英国代表海尔沙姆伯爵（英国科学部长）抵达莫斯科。十天后，三方代表完成了条约的定稿文本。八月五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莫斯科正式签署了“禁止在大

---

① 格兰·T·西伯尔格，《肯尼迪—赫鲁晓夫和禁止试验》，第213页。
② 《纪事年鉴——1963》，第23卷，第205页A1。
③ 格兰·T·西伯尔格，《肯尼迪—赫鲁晓夫和禁止试验》，第218页。
④ 《纪事年鉴——1963》，第23卷，第205页E2。

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简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或“三国条约”。

三国条约由一个前言和五个条款组成，条约有两大特点：

第一，条约名曰“禁止”实际上并不妨碍苏美两国继续制造、储存和使用核武器，特别是等于使没有包括在条约以内的地下核试验合法化。尤其必须提到的是，美苏两国在谈判过程中并没有停止试验，除了前面曾经提到过的比较集中的核试验竞赛之外，一九六二年正当两国就停试条约问题接触频繁的同时，两国抢在条约之前突击式地进行了一系列规模更大、更为集中的核爆炸。肯尼迪接任总统后感到，苏联在核武器方面发展很快，美国必须加紧核试验，提高核武器的质量，否则美国难免要付出“政治代价”。① 美国从六二年四月起在半年之内进行了代号为“多米尼克”的核试验五十多次，其中二十九次核装置试验，八次高空核爆炸以及导弹发射等，分别在圣诞岛、约翰斯顿岛等东太平洋地区进行。这次试验大大地增强了美国核威慑的能力。苏联也从一九六一年八月起恢复核试验，六二年夏季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大气层核试验。

可以说，三国条约是在苏联和美国在大气层等领域进行了足够的核爆炸以后签订的，部分停止试验束缚不了它们的手脚。尔后的事实证明，三国条约在禁止核武器方面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苏美的核武器积累越来越多，质量也越来越提高了。

第二，三国条约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苏美的核垄断地位。三国条约是向所有国家开放的，任何国家都可以签字，签了字便受其约束，所以它所约束的不是已经试验够了的苏美两个核大国，而是那些少核和无核国家，剥夺它们拥有和发展自己的防御性核武器的权利。在酝酿这个条约的过程中，苏美两国就已把这个条约同“不扩散”核武器联系起来了。主要针对的是即将试验自己的

① 格兰·T·西伯尔格，《肯尼迪—赫鲁晓夫和禁止试验》，第90页。

核武器的中国和已经有了核武器的法国。肯尼迪在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记者招待会上说："我认为，那些抨击这种努力（指准备三国条约的'努力'）的人应当永远牢记，不这样作就等于把这些武器扩散给可能是不负责任的政府，或扩散给由于偶然的因素可能酿成一场普遍核浩劫的国家。"[①] 同年二月底，"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总署"的一分备忘录说得更明白：美国、苏联和英国签署一项停试条约，如果能"剥夺"法国和中国进行核试验的权利，那就向"不扩散的方向"迈出了一步。这分备忘录还说，美国可以为不搞核试验的国家提供"保证"：在欧洲，可以搞"多边核力量"；在世界其它地区，美国也可以提供"某种形式的保证"，为此可以考虑一些其它军备控制措施，如"不扩散协定"等。[②] 西伯尔格认为，他感到肯尼迪坚持要搞停止核试验条约的"主要动机"是探索"制止核武器扩散的可能性"。[③]

英国是三国条约的发起国之一，麦克米伦是积极促成的。他支持美国举行的"多米尼克"核试验，同意美国在英国管辖下的圣诞岛进行这些试验，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允许英国在美国内华达的核试验中爆炸一枚英国的核装置。不过，美国对于英国指望得到美国更多的核援助，是并不情愿的，担心诱发法国的同样要求，所以腊斯克建议英国参加内华达试验一事不要公诸于世。[④] 事实上，法国确曾向美国提出提供浓缩钠等要求，并已为美国所拒绝。[⑤] 总之，三国条约首先保证了苏美的核垄断地位，英国由于有"英美特殊关系"，它的小小的核地位也得到了保证。

法国从战后起不止一次希望美国支持它发展核武器，美国借口美国有原子能法案的约束而没有理睬，但却援助了英国。对此，

---

① 格兰·T·西伯尔格：《肯尼迪—赫鲁晓夫和禁止试验》，第193页。
② 格兰·T·西伯尔格：《肯尼迪—赫鲁晓夫和禁止试验》，第194页。
③ 格兰·T·西伯尔格：《肯尼迪—赫鲁晓夫和禁止试验》，第193页。
④ 格兰·T·西伯尔格：《肯尼迪—赫鲁晓夫和禁止试验》，第109页。
⑤ 格兰·T·西伯尔格：《肯尼迪—赫鲁晓夫和禁止试验》，第111页。

法国一直心怀芥蒂。戴高乐一九五八年上台后更加坚定地要发展法国自己的独立防务，立为"国策"。美国企图用"多边核力量"套住法国，法国拒绝了；十八国裁军会议，法国也没有参加。对于三国条约，法国当然更持反对立场。阿尔弗莱·格罗赛说："我不相信那一位法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在这个条约上签字。因为如果签了字，就意味着法国在一夜之间成了彻底断送其军事政策的国家，并且必须从头到脚地改变自己的政策。"①他引用戴高乐九月二十九日在里昂说的很强烈的话："……任何人都不应该成为我们命运的主宰者，正是由于同一意愿，我们正在制造自己的核武器。"戴高乐还说："对于我们来说，问题在于：究竟是由我们自己掌握这类威慑性武器……还是把我们生死存亡的全部命运以及我国今后的经济潜力统统转交给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问题早已解决了。凡是对于保卫自己并使我们享有指导未来的知识和成果所需要的一切，我们都下决心要拿到手，而丝毫也不放弃同大西洋彼岸盟国的密切联系。"他还说："如果有一天所有拥有这类武器的国家实行了裁军，而不是只禁止没有这些武器的人拥有这类武器，法国也一定会痛痛快快地放弃（这些武器）。"所以，"法国不可能同意只允许两个特权国家成为核力量的唯一占有者。"②

三国条约谈判期间，也是中苏分歧日益尖锐化和公开化的时期，赫鲁晓夫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与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后加紧恶化中苏关系。第二年，苏联在一夜之间撤退了在华专家、撕毁了全部合同，企图压服中国。三国条约在莫斯科谈判的时候，中苏两党代表团正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三国条约出笼时，中国代表团还在莫斯科。

三国条约在七月二十五日公布以后，中国政府即在七月三十

① 阿尔弗莱·格罗赛：《戴高乐的法国外交政策》，波士顿第1967年版，第107页。

② 阿尔弗莱·格罗赛：《戴高乐的法国外交政策》，第107—108页。

一日发表声明，揭露苏美两国企图通过这个条约巩固自己的核垄断地位，而把一切受核威胁的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中国建议全世界所有国家，无论是有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庄严宣布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即,不使用、不输出、不输入、不制造、不试验、不储存核武器，把世界现有的一切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统统销毁,把世界上现有的一切研究、试验、生产核武器的机构统统解散。中国政府在声明中还倡议，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召开世界各国政府的首脑会议。同年八月二日，周恩来总理写信给世界各国政府首脑，转达了中国政府声明中的建议。中国政府当然拒绝在三国条约上签字，第二年十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三年这一时期的东西方关系，比前期的东西方关系，确实发生了新的变化：以前可以称之为“两极”格局的建立或形成时期，东西方刚从长时期的对共同敌人作战的状态走出来，战争中的盟国在对共同敌人的战争结束以后都需要巩固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作为战时盟国的关系起了变化。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只确定了大国分治欧洲的大致轮廓和原则，却不可能把复杂的现实问题在会议上确定下来。这大体上是一九五五年以前双方所完成的事情。

一九五五年以后，即双方的阵营已经组织起来了，营垒分明了；东西双方——首先是苏美双方——感到这种面面相对的格局可能会长期地持续下去，同时争夺优势的竞赛也将长期地持续下去。在谁也既不可能、也不打算打破战后十多年来形成的格局的情况下，苏美双方只能相互承认现状，都认为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下些功夫：第一，把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首先是核力量放在首位；第二，竭力以实力为基础、以自己的阵地为支撑，寻求与对方的共处之道，探索某种由两个大国共同主宰国际事务的办法。

对于这种形势，戴高乐和阿登纳都有过分析，他们的分析在

西欧是有代表性的。

戴高乐认为，到了一九五八年左右，世界局势与战后初期已大不相同了。“现在看来，苏联不大可能真正动手去征服西方国家，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恢复了正常状态，而且在物力方面不断有所增长。”同时，“按照永远指导俄国人历史上非东即西的策略，今天只要西方国家不（对苏联）加以威胁，它所担心的与其说是欧洲，无宁说是亚洲，因为目前中国正是野心勃勃的。特别是，当前对于莫斯科来说——正象对任何国家一样——如果发动一场世界性的冲突，那简直是发了疯！因为结果只会在原子弹的进攻下全部覆灭。但是，如果不打仗，那迟早总是要和平的……因此一切都令人相信：东方集团将会越来越感到需要、越来越希望缓和国际局势。”他还说：“在西方国家方面，保卫国家安全的军事条件，经过了十二年以后，与前大不相同了。因为自从苏联获得歼灭美国的手段以后——正象美国具有消灭苏联的手段一样——怎么能够设想，非到万不得已时，两个敌人会打起来呢？”①

阿登纳对当时形势的分析自有其特点。他认为，五十年代末期的苏联领导层仍然没有稳定下来，最终的方针还没有确定。同时，苏联在成为核大国之后，更加要在经济上超过美国，因此它不会放弃把西欧的经济力量置于它的支配之下的企图。再一点是，苏美两个大国的核武装规模，旗鼓相当，因此极不可能大规模使用核武器；如果消除了苏联害怕受到进攻的顾虑，并且使它感到裁军以后可以更顺利地发展经济，那么，“世界紧张局势就可能出现缓和”。②

戴高乐和阿登纳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但意思是接近的，都认为由于苏美两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均势”，谁也不敢冒然发动直接冲突，因此苏美关系中出现缓和的征候已是一种必然的

---

①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法文版，第216—217页。
② 《阿登纳回忆录》（三），中文版，第547—555页。

趋势。

概括这一节所涉及的重大事件，可以看到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三年出现了紧张与和缓交替的现象；紧张到一定程度便出现缓和，而缓和又极不稳定，随时又出现紧张：五五年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后出现所谓“日内瓦精神”；五六年发生了波、匈事件和苏伊士运河战争；五八年美英在黎巴嫩登陆，接着是所谓“柏林危机”；五九年赫鲁晓夫访美，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举行会谈，一时称为“戴维营精神”；六〇年第二次四国首脑会议因美国U-2飞机事件而破裂；六一年有“柏林墙事件”；六二年有加勒比海危机，“冷战”气氛开始“解冻”。在这期间无论紧张也好，缓和也好，酝酿苏美的某些“妥协”的安排一直没有断。例如先是禁止核试验的专家会议，继而是旨在达成一项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政治性谈判，基本上没有间断，而且谈判的级别越来越高，终于在一九六三年八月签订了苏美英三国条约。

三国条约的签订是一个标志，它表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试图通过直接接触，由它们两家处理或包办一些全局性的问题。从三国条约到稍后些时候的“不扩散条约”，乃至七十年代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等等，都是沿着这个路子发展的。五五年之后的形势并没有改变双方对峙的姿态，但不同的是，前此是“冷战”中的对峙，而以后或许可称为互相承认现状中的对峙。

然而，由两个大国包办或主宰国际事务是不可能的。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东西方关系的变化，对西欧形势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国际条件。它促使西欧各国，尤其是几个西欧大国，在经济“起飞”、摆脱了对“马歇尔计划”的依赖的基础上，有可能采取更为活跃的外交姿态。西欧的国际关系在酝酿和进行某些重要的新调度，预示西欧将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事务中，向美苏“两极”格局挑战。

· 第八章 ·

非洲大陆的变革与传统殖民体系的终结——西欧国际关系时代背景之二

西欧集中了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在亚非拉地区还维持着面积不等的殖民地。但是，由于民族解放的洪流已成势不可遏之势，整个殖民体系从战争结束以后已经动摇了，这一股伟大潮流是战后最重要的国际现象之一，它始于亚洲，及于中近东，到六十年代遍及非洲大陆，传统殖民体系因成批成片的新独立国家的诞生乃告瓦解。

如果说，世界上出现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战后西欧面临的一个重要国际现实；那么，殖民体系的终结，则是战后西欧面临的另一个重要国际现实。这两种国际现实构成了西欧国家调整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

殖民地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普遍到震裂殖民体系的规模和程度，可以以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为标志。这次会议有三十个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会议的参加者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倾向很不一致，但其主流是民族主义，都谴责各

种形式的殖民主义，要求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万隆会议是长期受压迫、受奴役的亚非国家的第一次盛会，是一次向殖民主义示威的壮举。

万隆会议与几个月以后在日内瓦举行的四大国首脑会议，性质完全不同，讨论的问题也不同，在同一年先后举行并没有任何内在联系，然而都对西方、对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问题不在于这两个会议本身讨论和解决了哪些问题，重要的是它们向世界发出了两个不同的信号。西欧在对外关系上将面临两条战线上的任务：一是在东西方关系上需要采取新的姿态，日内瓦四国首脑会的召开，就是这一信号的标志；一是必须应付来自广大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挑战，当时西欧还有殖民地的国家对于这种形势已有思想准备，但准备还很不足，形势注定它们的姿态是被动的。一切殖民地都要独立，这是万隆会议给的另一个重要信号。

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民族解放的重心转到了非洲大陆这块殖民主义的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堡垒。这股民族解放之风吹得极猛，"非洲的迷雾"[①]正在迅速散去；"尚未独立的殖民地——在这些殖民地中，已经发生了各种结构上的改变，标志着走向最后独立的道路——问题，除少数例外，都集中在非洲。"[②]接替艾登出任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一九五七年三月在百慕大会谈时说，这股潮流来得使人猝不及防，特别使他操心的是非洲，因为这个地区对欧洲至关重要。[③]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有史以来第一次非洲独立国家首脑会议在阿克拉开幕。参加会议的除了已经取得政治独立的国家加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利比亚、突尼斯、摩洛哥、苏丹、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等以外，还有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多哥等尚

---

① 《麦克米伦回忆录（6）从政末期》，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9页。

② 哈罗德·麦克米伦：《指明方向》，中译本，第140页。

③ 杜勒斯档案第114卷。

未获得独立的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会议大声疾呼："不要干涉非洲，非洲必须自由！"要求"承认非洲人有独立和自决权，并且采取适当步骤加速实现这种权利"。会议通过的各种决议支持阿尔及利亚等国人民的斗争，谴责南非联邦、中非联邦、肯尼亚和其它非洲地区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①非洲独立国家首脑会议在这个时候举行，绝非偶然，它说明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已发展为整整一个大陆的规模，显示了它的成熟性，它的矛头所向，自然首先是西欧的几个拥有大片殖民地的英国和法国。

与民族解放运动并驾齐驱的，还有一个范围广泛的不结盟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国家主张不同大国签订双边联盟，更不参加大国的军事联盟。参加这个运动的绝大多数是亚非拉地区国家，它们于一九六一年九月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了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不结盟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具有反帝、反殖、反霸的共同主张，起了促使传统殖民体系迅速瓦解的作用。

这些会议告诉人们：非洲大陆不仅已经苏醒，而且正在发生剧烈变革。使欧洲感到震惊、大大缩小了殖民主义旧有阵地的地区，一是地处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二是非洲心脏的刚果，三是广漠无垠的黑非洲。

一，阿尔及利亚。法国在一九五四年被迫从印度支那撤离后接着就集中力量镇压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解放和自由的斗争。

法国殖民者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就侵入了阿尔及利亚，从此把它当作法国的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十分重要的"海外省"，法国殖民主义者在这里扎下了很深的根子。到一九〇五年，阿尔及利亚全部领土都已沦为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有极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有铁、汞、铝、锌、铜、磷酸盐、铀、黄金等矿藏。这里的战略地位很重要，与法国本土隔着地中海，对于法国

---

① 《新华半月刊》，1958年10月，第156页以次。

在地中海以及大西洋的利益都有重要意义。阿尔及利亚的南邻是一大片黑非洲国家，法国控制了阿尔及利亚也有利于维持它在黑非洲的殖民统治。

一九五四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发动了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一九五八年九月，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法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把赌注押在武力镇压上。一九五六年法国社会党居伊·摩勒政府表示要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但其行动却是加紧所谓"绥靖"活动，殖民战争反而扩大了。

那时，法国最顽固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是那些在阿尔及利亚有直接利益的殖民者和代表其利益的右翼军人。这些人是极端殖民主义者，他们竭力要维护的，仍是十九世纪以来的那种最野蛮的殖民统治。他们认为，第四共和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镇压还不够坚决，当时在政界经常有关于"阿尔及利亚现实"、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自决、寻求政治解决等等的激烈而广泛的讨论，越来越多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反对使用武力镇压的办法。虽然有些意见与承认阿尔及利亚享有真正独立还有距离，但极端殖民者仍然认为这种局面与他们的政治口号"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不合。他们希望法国出现一个完全代表殖民利益的极右政府。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三日采取暴力方式冲击总督府的暴乱，就是这批极端殖民主义者策动的，他们的意图是通过一种类似政变的办法在法国逼出一个对继续维持殖民统治有利的独裁政权来。

但是，法国已越来越难以继续阿尔及利亚战争了。从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来看，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为代表的反殖力量，越来越发展、成熟，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觉醒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法国政府逆历史潮流而动，继印度支那战争惨败之后，又继续了几年的毫无胜利希望的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搞得政局动荡、怨声载道、国库空虚。

失道寡助，法国政府由于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镇压政策在国际上陷入极其孤立的境地，成为谴责的对象。居伊·摩勒政府倒

台后，法国出现了长达三十五天的内阁危机，勒内·科蒂总统艰难地物色下届组阁的人。人民共和党人加亚尔政府于困顿无望中上台后，不得不靠增加税收和向美国举债来填补一下殖民战争造成的无底洞，这无异于饮鸩止渴，法国政府已难乎为继。法国政局迅速而紧张地酝酿着突破。殖民战争不仅给阿尔及利亚带来灾难，从而引起不屈不挠的英勇反抗，而且也使法兰西民族蒙受痛苦，从而引起法国人民的强烈谴责和反对，开展了广泛而深入地要求停止殖民战争、使阿尔及利亚人民通过自决取得独立的群众运动，对法国政府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

一九五八年，戴高乐重新上台之初还是说要把"绥靖"政策继续下去。戴高乐六月四日在阿尔及利亚的演说中就说什么"法国军队是这块土地的促进因素"，法国要"继续完成争取谅解和绥靖的辉煌事业"[①]，六月六日在阿尔及利亚的莫士达加南竟然喊出"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②]据说，戴高乐使用这个词就只这一次。[③]戴高乐毕竟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善于审时度势；他没有按照那些极端殖民主义者的要求来制定第五共和国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在取得政权后不久就不再提"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口号了。一九五九年的九月十六日，戴高乐在电视广播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在阿尔及利亚实行"自决"的问题。他说："我们将通过唯一值得采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是指通过阿尔及利亚人自己自由选择来决定他们的前途的办法。"[④]他说，阿尔及利亚人可以在三种方案中作出选择："分离"(即与法国"分离"，即宣布独立)，"完全法国化"和与法国紧密合作的"自治"。[⑤]戴高乐在一步一步地接受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现实。这时，戴高乐既受到阿尔及利

① 戴高乐在阿尔及尔的演说（法《世界报》1958年6月6日）。

② 戴高乐在莫士达加南的演说（法《世界报》1958年6月8日、9日）。

③ 皮埃尔·维昂松—庞德：《戴高乐共和国的历史》，法雅尔出版社，1970年版，第504—505页。

④ 《文献和文件》，法国政府秘书厅出版，1959年9月19日，第6.850号。

⑤ 《文献和文件》，法国政府秘书厅出版。

亚人民的斗争以及法国国内进步力量的压力，同时也经常受到极右派殖民主义者的干扰，斗争和矛盾是异常尖锐复杂的。

但是，戴高乐已经懂得，北非的形势发展到这种程度，继续镇压只能激起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更加坚决而激烈的反抗，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在印度支那已有前车之鉴，长期陷在殖民战争中终将引进外国的势力，到那时，法国的前途将更受到严重损害。戴高乐决心改变拒绝承认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态度，表示愿意与“交战者”谈判。

一九六〇年九月五日，也就是在承认阿尔及利亚有自决权的一年以后，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在发展中，它在前进着，这就是说，这是一个依靠阿尔及利亚居民决定其命运的阿尔及利亚，一个由阿尔及利亚人管理自己事务的阿尔及利亚。但是，良知再次决定，这样一个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应该紧密地同法国联合在一起。”① 一九六一年三月三十日，法国政府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同时宣布，双方将在瑞士的埃维昂举行停战谈判。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八日，双方达成停火协议，第二天中午起实现停火。同年七月一日，阿尔及利亚在关于自决问题的公民投票中以百分之九十九点七二的绝对多数宣告独立。法国政府接受了这个现实，任命让南奈为法国驻阿尔及利亚首任大使。至此，阿尔及利亚终于摆脱了法国的殖民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法国著名政论家雷蒙·阿隆在评论埃维昂协议时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去参加谈判的，因为，“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或许在战场上打输了所有的战役，但是却赢得了这场战争，因为法国政府终于承认了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表示给以满足并且也希望就此‘脱身’……。”②

---

① 法国《世界报》，1960年9月7日。

② 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朱利亚尔出版社，1983年版，第385页。

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使法国避免了一场民族的灾难，使法国的“非殖民化”政策向前跨了一大步。戴高乐的法国为此争得了在国际上的主动地位。戴高乐写道：“殖民化的终结是我国历史当中的一页。在翻过这一页的时候，法国既对过去的事情感到遗憾，也对将要到来的事情满怀希望。”[①]

在埃维昂协议的筹备和缔结过程中，为了掌握独立的核力量和在北大西洋集团内争取与美、英国等的大国地位，戴高乐正在先后与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折冲樽俎。显然，戴高乐摆脱了在阿尔及利亚以及其它殖民地的羁绊，可以使法国有一个新的面貌和姿态，当然对于戴高乐的法国为争取大国地位所进行的国际斗争，是一种有利的条件。

二，原比属刚果。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几乎没有美国或联合国的插手，戴高乐非常警觉这一点，绝不允许使阿尔及利亚问题象印度支那问题那样成为“国际化”的问题。地处非洲大陆中心的原比属刚果——今天的扎伊尔——局势的发展却引来了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进行的干预。比利时殖民主义完全无能为力。

刚果问题也别有其复杂之处，刚果人民反对比利时殖民主义者的斗争、这个庞大的非洲国家内部各个部族之间的矛盾冲突、握有丰富矿藏的开赛省、加丹加省建立“独立”政权的“分离主义”活动、外来势力的干涉，尤其是美国的插手，等等。各种因素错综复杂地纠合在一起，使这个地区在六十年代开始的几个年头，出现了异常动荡、复杂和混乱的局面。

一九六〇年七月五日，刚果部队士兵要求罢免比利时军官，比利时海军陆战队的刚果士兵开了枪。八日，比利时当局派军队入侵，“刚果危机”即由此开始。十一日，加丹加省在比利时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的支持下，由莫瓦泽·冲伯宣布“独立”，造成刚果的分裂。十三日，刚果总统卡萨武布、总理卢蒙巴抗议比利

①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普隆出版社，1970年版，第140页。

时干涉，要求联合国给以支持。十五日，由美国人拉尔夫·本奇率领的"联合国军"进入刚果。开赛省继加丹加省之后也宣布为"独立"的"王国"。卡萨武布和卢蒙巴相互"罢免"，刚果局势陷于"巴尔干化"，乱作一团。九月十四日，刚果陆军参谋长蒙博托发动军事政变，接管了政府全部权力。"联合国军"立即以保护为名软禁了卢蒙巴，并假手冲伯集团把他杀害。一九六一年二月，以"联合国军"为后盾，阿杜拉政府成立，用了两年左右光景，同冲伯火并厮杀，于同年十二月结束了因加丹加和开赛两省宣布"独立"而形成的分裂局面。一九六四年，"联合国军"撤退，冲伯卷土重来，出任政府总理。冲伯当局在比利时伞兵的帮助下占领了当时的刚果首都斯坦利维尔。一九六五年十月，卡萨武布总统罢免冲伯内阁，同年十一月，国民军总司令蒙博托推翻了卡萨武布，行使总统权力。

从这个快速的粗线条的刚果危机时间表，可以约略看出那几年位于非洲大陆心脏的刚果局势何等混乱。

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中，首先可以看到，刚果危机是在非洲大陆向殖民主义冲锋的强大潮流当中发生的，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到高峰的集中反映。联系到非洲各个地区爆发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刚果事件是传统殖民体系濒临瓦解的时代产物。麦克米伦说："不论在亚洲或是在非洲，从欧洲人的统治转变为独立的这个过程，往往显得困难重重、充满血腥。"①

其次，这里还交织着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和其它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势力的角逐，比利时的传统殖民主义势力从此大为削弱。不过刚果问题既不同于印度支那问题，也不同于苏伊士运河危机以后的中东，在刚果是赤裸裸的"武装角逐"。所谓"联合国军"虽然并不曾与比利时军队交手，但它是作为比利时殖民军队的对立物、应卢蒙巴的要求出现在那里的。比利时在刚果全

① 《麦克米伦回忆录（6）从政末期》，第275页。

境失控后转而支持加丹加的冲伯，便是这种角逐的表现和结果。英国不是当事人，但是它对刚果局势有其特别要关注的理由，因为加丹加省毗邻北罗得西亚（今日的赞比亚），两地的铜矿共同着同一条矿脉；刚果发生的动乱不能不牵动这个地区的垄断资本的利益。刚果以南是一大片英属和葡属殖民地，它的西部则与原法属殖民地相接。因此，刚果局势的演变既会推动这些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也必定引起有关的西欧国家的注意。

三，黑非洲。原是殖民地的黑非洲，一般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即除阿拉伯非洲以南的非洲。大部分是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小部分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地。这片广漠的地区，是殖民压迫最久、最深的地区。如果说非洲各国的独立运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黑非洲的解放和独立应该是衡量非洲独立运动的重要标志；黑非洲一旦摆脱了殖民枷锁，整个殖民体系也就崩溃了。

第一个获得政治独立的黑非洲国家是当时被叫作"黄金海岸"的加纳。那是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加纳人民取得独立，使非洲在黑暗的浓雾中绽出了一道光明。接着在一九五八年九月，法属非洲国家在"法兰西共同体"内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自治权；除几内亚在公民投票中反对加入"共同体"而取得独立外，其它法属非洲国家都成了"法兰西共同体"的成员国，法国总统兼任"法兰西共同体"主席。各成员国享有的自治权是很有限的，因为对外政策、国防、货币等大权都还属于"共同体"。在整个非洲大陆已嗅到反帝反殖、争取独立的战火的时刻，这种"共同体"式的自治显然不能持久，只能是一种过渡的形式。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共同体"的樊篱就被冲破了，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以马里联邦为先导，其它法属非洲国家都先后宣布了独立。法国殖民地的独立推动了其它地区的运动。从一九六〇年开始，英国的非洲殖民地也开始了同样的进程；到六十年代中期，除了南部非洲还剩下几块地方，绝大部分殖民地宣布独立后都成了英联邦成

员国。

在不过十年之内的时间里，这样大批的殖民地相当集中地走上了独立的道路，在国际关系史中不能不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虽然各国独立的程度不同，政治独立由于缺少经济独立的支撑还不完备，这些国家仍然紧紧地受着前殖民国家的控制；在它们面前还有清除长期以来殖民主义施加的沉重影响和束缚的严重任务，但是，毕竟跨进了民族独立国家的门槛，殖民主义不能照样统治下去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质的飞跃。而英法等西欧国家在摘掉了殖民主义国家的帽子之后，它们和原殖民地国家的关系也就需要重新安排了。

D·W·厄尔温这样描述了这部分国际关系的演变："殖民主义的消逝自然给欧洲的政治家留下了痕迹——殖民国家不再需要为了维持它们对反叛的殖民地的控制而发动战争了。这首先意味着一个调节的过程。在经济和工业方面，这意味着对战略和市场的再思考和再规划。在统治和管理方面，这意味着那种赚钱营利的事业将就此结束。对于殖民者和官吏来说，这预示着某种痛苦的选择：留在新独立的国家呢，还是回到祖国去重新安家。无论作出哪一种选择，终归都意味着社会地位和收入的降低。"①

"调节的过程"开始了。印度支那时期过去了，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时期也过去了，非洲的殖民时期也就要过去了，西欧的两个前殖民大国英国和法国，都需要通过双边协定或条约，把千丝万缕的政治、经济联系在新的条件下保持下来。

* * *

以上简要地叙述了一些与非洲殖民体系瓦解有关的情况，主要是为了展示战后西欧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方面。殖民体系的必然瓦解必定把原殖民国家和新独立国家带进一个新时代。

---

① D·W·厄尔温：《一九四五年以来的西欧》，朗格曼，1981年版，第212页。

这种国家之间关系的演变，对于西欧资本主义来说，尤其是对本来殖民地较多的英国和法国来说，具有双重意义：殖民体系终结了，对于殖民大国是痛苦的；但是，它对于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欧又未始不是一种“解脱”。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这个时期，已经有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同一个世纪以前殖民开拓时期大不相同了。英国和法国在战后已经感到，殖民地在相当程度上说已成为一支沉重的包袱（诚然，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是主要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殖民地问题才能成为“包袱”）使它们步履艰难，而没有殖民地的联邦德国却发展迅速，西北欧许多工业发达国家也不靠拥有殖民地而取得较大发展。西欧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感到，传统的殖民主义早已过时，改变它比保持它对自己更有利。

从国际上看，西欧也日益迫切地感到需要为殖民地问题找出一个解决方案。其中原因之一是，战后的殖民地问题已涉及西欧拥有殖民地的国家同超级大国的关系问题。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德黑兰会议，罗斯福和斯大林就已提到过，战争结束后，原来的殖民地不应归还原来的殖民国家，罗斯福提出了对被法西斯轴心国占领的殖民地（主要是英法殖民地）实行“国际托管”之议。斯大林的反应是赞同的，丘吉尔和艾登则立即表示反对；丘吉尔声明，大英帝国的领土，谁也不能染指。戴高乐被排除在会议之外，但他的态度极为明确而坚决，在同罗斯福、杜鲁门会晤时都强烈地表示反对美国干预法国殖民地事务的任何方案。

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在印度支那战争停火之后进入了法国的“势力范围”；两年后又借英法侵略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抬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美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和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不止一次地对“殖民主义”旁敲侧击地加以抨击，使英、法两国领导人十分恼火。艾登在他的《全程》一书中，曾绘声绘色地记述了他与杜勒斯相互讥诮的谈话。一向把非洲地区视为自己

"势力范围"的英国和法国，对美国的举止持警惕的态度，是不言自明的。

对于苏联的态度，西方也是很敏感的。麦克米伦在说到刚果局势时曾说："在刚果独立后的第一年以及接下去的一些动乱的年头里，西方国家政府所一直焦虑的主要问题之一，便是防止那一大片土地及其资源落入共产党人手中，或是受到他们的控制。"① 他们担心，苏联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将使苏联乘机步入这个地区。如果新独立国家采取了与苏联友好的立场、接受了苏联的经济、乃至军事上的援助、支持了苏联的国际政策，就必将影响东西方关系的平衡。

从战后东西方关系的大势看，美苏争夺的影子在六十年代已在非洲上空飘动。西欧国家当然不愿意这块富饶而有战略意义的大陆成为美苏角逐的场所。对于英法等前殖民大国来说，与其徒劳地抗拒历史潮流，终至完全"失控"，为超级大国的争夺提供地盘，不如采取新的政策，作些让步，实行所谓"非殖民化"，倒能够凭借往昔的传统历史联系保持住自己的影响和势力。

西欧如果进而同一个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拥有雄厚资源和广阔市场的非洲大陆建立起密切的欧非合作关系，那对于西欧在东西方关系中的地位，毫无疑问是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在旧殖民体系处在瓦解过程当中的时候已经露出一点影子，随着形势的发展，南北关系问题提上日程，就将日见其显然了。

① 《麦克米伦回忆录（6）从政末期》，第269页。

·第九章·

核武器与大国地位

（一）问题的引子

从五十年代中期起，在美国的盟国——首先是西欧的两个大国英国和法国——当中开始出现了“离心倾向”。英国和法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深深感到美国在关键时刻会牺牲盟友。尤其是对于英国，“特殊关系”在这种时候竟然完全不起作用，而且象杜勒斯那样的帝国主义分子居然扮成反殖民主义者教训起艾登来，对处于困境中的英国落井下石。英美关系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降到了最低点。

艾登由于苏伊士运河战争而辞了职。麦克米伦上台后马上便抓三件事：重新修好美国，联合西欧大陆；应付“非殖民化”潮流。丘吉尔制定的外交政策的“三环”都因时代不同而发生了一些问题。麦克米伦需要把它们调节妥当。

在重新修好美国这一条里，英国要实现的一个重大战略目标，是必须在美国的援助下搞起英国自己的独立核力量。英国虽然已经有了原子弹，但是为了确保世界大国地位——这时

英国的国际地位甚至不如战争刚结束的时候——，即在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地位，英国需要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核武器。

法国政府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就已经深陷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泥潭里；与英国发动侵埃战争，不仅无助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而且把自己弄得更加声名狼籍，处境更加困难。结果，居伊·摩勒也在一九五七年下了台。但是，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法国政府也还是要搞原子武器。财政濒于绝境的人民共和党费利克斯·加亚尔政府还作出了研制原子武器的决定。戴高乐在五八年六月重新执政后，不仅加速原子武器的研制，而且从战略思想上更加明确地把发展核力量同法国的独立和大国地位紧密地联结起来。

英国和法国都要求掌握不受美国约束的核武器，都认为这是与各自的国际地位直接相关的战略问题。这当然是美国所不乐意看到的情况，因为这样就自然会削弱美国在大西洋联盟内的领导权威。所以美国千方百计地企图把英法的核武器纳进美国的轨道，于是矛盾和斗争便由此展开。

英国由于受到美国的援助，不能径情直遂地同美国争斗，斗争的方式只能是比较隐避而迂回的，甚至要接受或附合美国提出的一些要求。英美"特殊关系"对英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不能不起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但以此便认为英国完全屈从于美国，便错了，原子武器是非要不可的。事实上英国一直都在争取尽可能多地挣脱美国的核控制。这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迹象是十分明显的。

法国则没有英国背上的包袱。尤其是戴高乐重新执政以后，立即直接顶撞了美国在大西洋联盟的领导权威。戴高乐的法国走出的几步棋，在世界上产生了极为强大的冲击波，使美国很被动，使大西洋联盟的团结受到相当大的震撼，出现了不可弥合的裂缝。戴高乐在发展法国独立核力量的努力上，同美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是西欧独立发展道路上的很辉煌的一个篇章。

英法决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本是战争结束后的老问题，但那时矛盾还不尖锐和突出。因为那时西欧必须服从美国的政策和战略。后来，特别进入六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因素：核战略力量对比有了很大变化，苏美之间出现了大体上的核均势，并开始进行全球性交易，美国的对苏战略不得不从“大规模报复”改变为“灵活反应战略”，对西欧盟国则提出，所谓“多边核力量”计划，等等。这些重要因素综合在一起，推动了有条件发展核力量的英国和法国更加迫切地为自己建立一个与世界大国形象相符合的独立核武库。

这一章主要是要把英法发展自己核力量的过程，作一个比较系统的回顾，以便了解英国和法国在核武器问题上是怎样争取独立自主权利的。

英国和法国各自同美国的关系不同，因此它们在争取独立核武装的策略也不一样，但要争取在战略问题上有尽可能大的发言权和自主权，则是相同的。西欧的非核国家当然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要争取自己在处理与它们利益攸关的国际问题的自主地位，在精神上也是有相通之处的。

（二）英国核力量问题——麦克米伦：“为了在世界上的声望和影响，英国需要威慑力量。”

英国需要有自己的核威慑力量，早在保守党的丘吉尔和工党的艾德礼就是既定方针。以后历届政府均然。工党内虽然不时有人主张英国不必搞核武器，有的还认为西方应单方面实行核裁军。但是迄今为止的执政者没有不主张有自己的核武器的。英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就是在艾德礼任首相的工党政府任内实现的。威尔逊政府的国防白皮书明确提出，英国的防务只能以核威慑为基础。

然而，英国发展核力量与英美“特殊关系”瓜葛较多，因此英国发展核力量既要独立，又需依靠与美国的合作。为了对问题的历史渊源了解得更深些，有必要对有关的历史过程略作回顾。

英国和美国在原子科研方面的合作，可以上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一九四〇年八月，英国政府派科研考察团访问美国。据说，考察团到美国去是为了向美国传授“它（美国）希望了解的东西”。看来，当时英国在原子能科研方面已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至少英国自信如此。一九四一年初，英国政府同意向美国公开有关科研机密；从此，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开始了这方面的合作。① 一九四二年夏天，丘吉尔和罗斯福在海德公园的“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密谈，当时情况很紧急，德国也正在研制原子武器，丘吉尔和罗斯福都认为必须抢在德国前头把原子弹搞出来，否则不堪设想。丘吉尔提出要立即把两国的科研力量组织在一起，“在平等的基础”上合作，然后两国“均等”地分享成果。至于研制地点，当时英国几乎天天都受到敌机轰炸和空中侦察，显然不是合适的地方。于是罗斯福建议在美国作这件事。就这样，丘吉尔和罗斯福把这件事定了下来。② 后来就在美国机械军团的监护下积极进行研制工作。

可是，原子武器的科研工作一旦集中在美国，美国就以怕影响战争进程为由，严禁传出任何科研情报。所以到一九四二年底，英国已经拿不到原子武器的情报了。

第二年一月，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向罗斯福提出了这个问题；五月丘吉尔访美，罗斯福同意英美继续交流情报；八月丘吉尔和罗斯福在魁北克举行会谈，就英美原子科技合作问题拟出了一份专门文件。一九四四年九月，丘吉尔和罗斯福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谈期间进一步草拟了一份“备忘录”，重申英美在原

---

① H．G．尼柯拉斯：《英国和美国》，第58页。

② 见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七卷，第343—345页。

子武器的研究上进行“全面合作”。双方同意成立一个联合政策委员会，委员六人，美国和英国各三人，有关原子能的情报通过这个委员会进行交流。据说，这些文件都属“绝密件”，连罗斯福的专门顾问亨利·斯梯姆森都不知情，唯一的文本竟在档案库里封存了若干年，① 英国战时内阁也不了解详情。② 因此，这些协议并未实行。

美国在广岛和长崎丢了两颗原子弹之后，更加要保持自己的原子垄断权，③ 艾德礼出任首相后即向美国交涉。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五日，艾德礼给杜鲁门写了一封长信，要求与杜鲁门“共同讨论美英两国原子伙伴关系的前途问题”。④ 同年十一月，艾德礼、杜鲁门和加拿大总理麦肯齐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十六日通过了一项共同声明，提出应该对原子能实行“国际监督”；同时在一项备忘录中提出美、英、加三方应在原子能方面实行“全面和切实的合作”；三方联合政策委员会和联合发展托拉斯以适当方式继续协作；联合政策委员会研究并提出实施的具体建议。⑤

然而，三方声明和备忘录，依然只是一纸空文。联合政策委员会开始工作后发现，英美双方对文件措词各取所需：英国强调“全面合作”，而美国则说同英国交换情报势必影响通过联合国实行“国际监督”。⑥ 所以备忘录的意见无法落实。

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杜鲁门签署了由美国垄断原子弹生产的麦克马洪法案，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统管所有美国原子能生产部门；美英之间有关原子科技情报交流，进一步受阻。

当然在这几年英美之间并不是完全绝缘的。例如，一九四六年七月两国签署了分享比属刚果铀矿的协议。一九四八年一月七

①② H·G·尼克拉斯：《英国和美国》，第61、62页。

③ 杜鲁门在1945年10月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将不与盟国分享原子能秘密。

④ 《杜鲁门回忆录》，中文版，第二册，三联书店，第496页。

⑤ R·G·休莱特和O·E·安德逊：《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历史》，第一卷，纽约，第481页。

⑥ H·G·尼古拉斯，《英国和美国》，第64页。

日，两国又签署了一项临时协议：美国向英国在除原子武器以外的几个项目上提供一些资料情报；英国则同意美国从四八年至四九年使用刚果铀矿。

英国对于麦克马洪法案反应是很强烈的，认为它违反了丘吉尔和罗斯福四三年八月十九日魁北克协议，也违反了杜鲁门、艾德礼和麦肯齐四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的三方共同声明。① 在杜鲁门签署麦克马洪法案以前，艾德礼曾一再给杜鲁门写信，质问“全面和有效合作”的涵义，杜鲁门回答说，这句话只适用于基本科学情报的交流，而不适用于原子能设施的修建和管理。直到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艾德礼还就这个问题再次致函杜鲁门，进行争辩；但杜鲁门置若罔闻。

一九四九年一月，英国重提英美两国在原子能问题上的合作问题，要求就全面合作问题进行谈判。这件事在美国国务院和国会之间引起了反复、激烈的辩论，成为国务院与国会矛盾、争论的一个题目：从四九年到五一年之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多次召集各方面人士开会，但都议而不决。以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哥仑比亚大学校长艾森豪威尔等为代表，主张同英国就全面合作问题进行谈判，认为英美团结是战略上的需要，而且研制原子武器英国本是有贡献的，现在把英国撇在一边说不过去，何况英国制造原子弹只是时间问题：美国帮助一下，它可能有两年功夫就制造出来了；没有美国的帮助，英国在四年内也可以试制成功。以参议员范登堡、海肯鲁珀尔等为另一方，坚决反对同英国“全面合作”，认为，原子秘密应该为美国所独专，英国应承认美国的“统治地位”；英国有赖于美国的比美国需倚重英国的要多；既然美国已经掌握了原子武器，英国便无需搞重复劳动；国务院必须尊重国会意见，不得擅自决定……双方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这样的辩论断断续续持续了两年，其间苏联试爆原子弹

---

① F·S·诺塞芝：《英国对外政策》，第173页。

成功之后，艾奇逊一派的意见一度有些转机，但麦卡锡法案通过后，国务院又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与英国谈判的事又被束之高阁了。①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初，艾德礼到美国进行了五天访问，同杜鲁门就当时朝鲜战争局势、欧洲防务等问题进行会谈。据说，艾德礼此次访美的目的之一，是试探英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原子武器的使用权，换个说法，英国能不能在美国使用原子武器问题上有"否决权"。② 当时杜鲁门曾扬言不排除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原子武器，使西欧国家大为震惊，艾德礼在华盛顿要求杜鲁门保证不在朝鲜战场上动用原子武器。杜鲁门则回答说使用什么武器，是美国政府的事。③ 十二月八日发表的会谈公报中说，杜鲁门"希望"永远不必使用原子弹，如果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将随时通报英国首相。④ 看来英国也并不认为美国会真的动用原子武器，用意是以此来试探美国能给英国多少发言权。丘吉尔在五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下院抱怨说，在战争年代英国在原子研究中本来与美国是"平起平坐"的，可是这次艾德礼访美，却连"磋商的保证"都没有得到。⑤

丘吉尔再次组阁后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至八日在华盛顿与杜鲁门会谈，原子武器问题仍是主要议题之一。丘吉尔再次力图改变美国垄断使用原子武器的决策权，⑥ 争取能在原子秘密上争得"较大的份额"，⑦ 但是都没有成功。丘吉尔和杜鲁门的会谈公报比一年前艾德礼和杜鲁门的会谈公报多了一个内容，即在英

---

① 详见迪安·艾奇逊：《在创兴的现场，我在国务院的岁月》，纽约，1969年，第314—321页。

② 《纪事年鉴——1950》，第10卷，第398页A1。

③⑥ F·S·诺塞芝：《英国对外政策》，第175页。

④ 《纪事年鉴——1950》，第10卷，第398页J2。

⑤ 《丘吉尔演说全集》，第8卷，第8144页。

⑦ 《纪事年鉴——1952》，第12卷，第1页J2。

国领土上的美国空军基地使用原子弹必须征得英国的同意。①丘吉尔已经很清楚，指靠美国提供英国所要求的原子情报是不可能的了。此时，英国制造原子弹已接近成功，并且已决定将在澳大利亚沿海的蒙特贝洛试爆，一切都要看"这次试爆的结果"了。②

英国第一颗原子弹于一九五二年十月三日试爆成功。艾森豪威尔于五三年就任美国总统，第二年二月向国会提议修改麦克马洪法案。美国对于向英国提供原子情报开始有所松动。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后进展更快些。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讨论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在"军事、科学以及心理上"产生的影响。会谈后发表了"共同目标声明"，协议成立若干个研究防务、核能和火箭的联合委员会。声明说，"民族自足的观念已经过时"，西方国家应在资源等方面加强合作；英美在北约组织中应促进北约在科技方面的联合努力；美国"将要求国会修改原子能法案……以促进英国、美国和其他友好国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密切而有效的合作"；"国际安全不仅要依靠地区性的防御盾牌"，而且要倚靠"核武器的威慑和报复力量"，英美两国将在这方面进行合作。①美国在核力量问题上对英国有了较大的松动。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由美国助理国务卿克里斯蒂安·赫脱和英国驻美大使哈罗德·加西亚签署了一项美国向英国提供中程弹道导弹为期五年的协议。二十四日双方签署的备忘录记载了实施二十二日协议的具体条款，双方协议：

一、美国将向英国提供中程弹道导弹及有关装备，并提供训练援助。这些导弹将设置在两国政府协议的英国领土上，由美国训练的英国人员操纵。

---

①② 丘吉尔：《演讲全集》，第8卷，第8342页。

③ 《纪事年鉴——1957》，第17卷，第345页C2。

二、一旦英国能够操纵这些导弹，这些导弹的所有权即属于英国。

三、发射这些导弹要由英美两国政府共同决定。

四、双方协议中的导弹不包括核弹头。核弹头由美国另行提供，所有权及监督权属于美国。①

同年六月八日，两国政府签署了两国分享原子秘密的协定，协定包括：一，两国交换核武器的设计、生产、服役和研制等方面的情报；二，美国向英国转让一套核潜艇推进装置和燃料；三，交换有关核武器传递系统及其设计、发展和制造方面的情报。②七月二日，艾森豪威尔签署发布了新的原子能法案，取代了麦克马洪法案，新法案规定，美国政府可以向已经在核武器方面有了实质性进展的盟国提供核技术资料。③而英国是唯一被认为有资格取得美国核资料援助的盟国。英国发展核武器名正言顺地同美国的支持联系在一起了。

但是，美国并不想让英国对自己的核武器享有充分主权。肯尼迪上台后为了把英国的核武器纳入美国设计的轨道，并企图把法国也纳入壳中，提出了所谓北约"多边核力量"的建议。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在巴哈马群岛的拿骚举行会谈，根据肯尼迪的建议，发表了一个关于建立北约"多边核力量"的"核防务体系"的联合声明。声明的重点如下：

一、肯尼迪宣布，美国由于经费问题，决定放弃闪电式空对地导弹的生产。由于美国曾于一九六〇年答应向英国提供这种导弹，所以作为补偿，美国将向英国提供一定数量的北极星中程导弹。

二、英国的这些核威慑力量将成为北约核力量的一个部分，

---

① 《纪事年鉴——1958》，第18卷，第62页A 2。

②③ 《纪事年鉴——1958》，第18卷，第221页C1。

除非英国的“最高民族利益”受到威胁，这些武器应置于北约的指挥之下。

三，美国也向北约提交起码相等的核力量，接受北约的统一指挥和控制。英国和美国的这些核力量将包括在一项北约的“多边核力量”的计划之内。

四，声明表示，北约除了拥有“一个核盾牌”之外，还需要有“一把非核宝剑”；因此，北约应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常规武器。①

虽说是“联合声明”，但英国并不情愿。道理很明显，声明中提到的英国可以拿到手的北极星导弹，终归要受北约(即美国)的约束。英国下院在肯尼迪——麦克米伦会晤后就国防部“白皮书”展开激烈辩论时，对于“多边核力量”问题便出现了尖锐的意见分歧，争论的焦点是：英国能不能保住自己的世界强国地位和拿骚协议能不能保证英国核威慑力量的独立性。

已经引退的丘吉尔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三日写给保守党年会的信中强调英国绝不能放弃自己的核武装，否则就等于把自己的国防交到一个“友好的、但终究是外国的”手里，丘吉尔说，把核武器放在自己手里无论如何比放在任何别人的手里可靠得多。②

英国虽然签了字，但在事实上却踟蹰不前，以经费、政治和战略等种种理由搪塞拖延。九月二十六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和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谈，没有结果。十月一日，英国政府宣布，英国政府不拟对“多边核力量”的具体方案承担义务。③英国终于打了退堂鼓。

英国之所以在“多边核力量”问题上被美国拖着走了一程，后来又翻悔，反映了一种矛盾的心理状况：既需要有自己的核力量，又需要保持英美“特殊关系”。但是这两者很难完全协调。

---

① 《纪事年鉴——1962》，第22卷，第457页D2。
② 《纪事年鉴——1963》，第23卷，第415页C2。
③ 《纪事年鉴——1963》，第23卷，第414页D2。

戴高乐曾经挖苦地说，英国将在“多边核力量”的名义下把自己的小小核武器交给美国，法国可绝不干这种事。

英国作为一个大国要有自己的独立核力量，这种意向、努力和政策都是确定无疑的。麦克米伦早在一九五五年任国防大臣时就说过：“有人这样说，因为主要的威慑力量是美国的，所以英国没有必要、也不应当作出贡献。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理论。”“这从两层意思上说是危险的。从政治上看，这等于放弃了我们影响美国决策的权力；从战略和策略上看，无异于不允许我们对于选择攻击目标和使用我们自己的打击力量施加任何影响。所以，前者会削弱我们在世界上的威望和影响；后者则将危及我们的安全。”①

麦克米伦这些话的含义十分清楚，英国必须执行以核威慑为基础的防务政策，才能在美苏之间保住尽可能多的发言权，否则就不可能有英国的地位。

然而，问题的复杂在于，英国在走自己的路的同时，仍不能不瞻前顾后，这是英国历届政府都摆脱不了的。它不能象法国那样放手地谋求自己的核独立地位。

（三）法国的独立核战略——戴高乐："法国绝不放弃在核武器上的自主权。"

英美在核武器合作问题上的每次磋商，都绕开了法国，法国处于被排斥的地位。

一九五七年十月，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在华盛顿会谈后，当时任法国国防部部长的沙邦—戴尔玛便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巴黎会议上抨击美英两国企图垄断核武器，他说，法国将不得不单独生产核武器，以维护法国的“世界

① 《众议院辩论记录》，第5辑，第537卷，第2181—2182栏。

大国”地位。[1]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美国政府发布新的原子能法案，说美国政府只向已有“实质性进展的盟国”提供核技术资料，[2]明确地排除了法国。

法国决心自己生产没有美国插手、更不受美国控制的核武器。戴高乐一九五八年六月再次执政后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第一次谈话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一九五八年七月四日，杜勒斯来到了巴黎。当时美国正在研制大力神洲际导弹，拟在一九五九年服役，在这之前，美国打算先在西欧部署中程弹道导弹。法国当即表示拒绝在法国领土上部署美国中程导弹。杜勒斯在这个时刻访问法国，自然不能不涉及核武器问题。

杜勒斯对戴高乐说，美国方面知道，法国正在制造原子武器；但是，与其法国花那么多钱去搞试验和生产这些武器，由美国提供岂不更好？戴高乐回答说，如果美国肯卖，法国当然愿意买；问题是一旦买过来，这些原子弹就必须完完全全、毫无限制地属于法国。杜勒斯没有答腔。这次谈话在“法美之间这种率直的解释”之后结束了。[3]杜勒斯在到法国的前夕曾经对记者表示，美国可以考虑卖给法国一套核潜艇推进装置，但他在离开法国后却改口说，美国七月二日通过的新原子能法案依然不允许美国向法国提供核武器部件或图纸。[4]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日，艾森豪威尔在赫鲁晓夫将访问美国之前来到了西欧。艾森豪威尔在巴黎和戴高乐会谈中又重提了杜勒斯说过的话，说，美国可以向法国转让核机密，但条件是控制权要掌握在美国手里。

戴高乐则依然强调说，只有由法国自己掌握这些原子弹，法

---

① 《纪事年鉴——1957》，第17卷，第377页B2。
② 《纪事年鉴——1958》，第18卷，第221页C1。
③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225—226页。
④ 《纪事年鉴——1958》，第18卷，第228页F1。

国才愿意接受。戴高乐进一步发挥说，法国一定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美国和苏联都掌握着彼此相互威慑的手段，但它们各自的盟国却没有这种手段；一旦打起来，谁能保得准原子弹不会落在欧洲战场上呢？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么无论从地理、政治、战略上看，法国都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是以前两次世界大战证明了的。

艾森豪威尔说，他不理解为什么法国竟然怀疑美国是把自己的命运同欧洲联在一起的。戴高乐反唇相讥说，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法国都是盟友，但是，法国不会忘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美国是在法国经受了三年濒于灭亡边缘的战争考验之后才参战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也是在法国已被打垮之后很久才卷进战争的。所以，一个国家可以帮助另一个国家，却无法包办那个国家的事情。

戴高乐接着说，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法国不能接受北约的军事一体化的安排，在核武器方面也必须在英美法三个核国家直接合作的范围内协调原子弹的使用问题。艾森豪威尔说，搞原子弹很费钱，法国是没有办法赶上苏联的水平的，所以也就谈不上法国原子弹的威慑价值。戴高乐反驳说，至于原子弹的威力，只需要扔几支就足以把任何什么国家毁掉了，所以，法国只要有能够杀死敌人一次的原子弹就够了，到那时敌人即使有十倍的手段也无济于事了。[①]

戴高乐这些话奠定了发展法国的独立核打击力量的理论基础，即"以小慑大"的核威慑理论。戴高乐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使双方的观点都亮明了。戴高乐使艾森豪威尔明白，法国绝不会在核武器问题上放弃自己的主权。这一年十一月三日，戴高乐视察军事学校，对学校教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着重指出，法国的防务必须是属于法国的，法国必须用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法国

---

① 参阅《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230—232页。

将在最近几年内建立起一支主要组织部分是原子武器的“打击力量”，它将能在任何必要的时候和地方部署起来。①

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三日，法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从此，法国也成为核国家。

建立一支独立于美国的核防务力量，是戴高乐的一贯主张，也是法国战后历届政府的打算，而且一直作这方面的准备工作。法国要搞原子武器从一九五二年就已有了初步设想。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在孟戴斯—弗朗斯任总理时，法国内阁会议研究过发展原子武器问题，但没有作出决定。在埃德加·富尔执政时，决定发展第94号元素的生产，并且筹办了分离同位素的工厂。一九五六年，居伊·摩勒政府制定了核能试验的五年计划。在第四共和国末期的费利克斯·加亚尔政府决定制造第一颗原子弹。不可否认，戴高乐一九五八年重新上台以后不仅大大促进了原子弹的生产；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法国自己的独立核战略。

在肯尼迪担任美国总统的三年中，法美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分歧更加深了。这要从肯尼迪的“新战略”谈起。

肯尼迪政府为了同很快在核武器方面赶上来的苏联争夺世界霸权，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灵活而进攻的姿态。美国政府一方面继续同苏联进行核竞赛、竭力保持核优势，另一方面修改了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时期的“大规模报复”战略，采取“灵活反应战略”，即，用核武器对核武器、用常规武器对常规武器和打“两个半战争”的战略。同时提出美国要同西欧建立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欧洲政策，以便协调在“灵活反应战略”上的协作。把欧美“伙伴关系”同“灵活反应战略”联系起来，就是：(一)美国承担所谓“全球责任”，用核武器装备北约军队，但部署和使用的决定权集中在美国手里，即拿骚会议提出的北约各国入股的“多边核力量”；(二)北约成员国以发展常规武器为主，

---

① 参阅《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220页。

不搞自己的核武器。肯尼迪基本上延续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开始转变的政策，表明由于苏联核力量的迅速发展，"大规模报复"已经宣告失效。

四月十日，肯尼迪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华盛顿会议上，第一次公开提出了这一新战略建议。他说，北约需要以常规武器有效地对付常规武器的进攻，应该象北约总司令诺尔塔德将军说的那样，起码可以用常规武器坚持进行足以"迫使"对方"暂停"攻击所需要的那么长的时间，这样就可以避免动用核武器。他还说，对于所有武器，特别是核武器，必须实行灵活机动的控制，以保持其切实有效的威慑力量。①

第二天，戴高乐立即在记者招待会上作出了反应。他说，欧洲各国的责任和权利是拥有自己的防务，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即使是友好的国家，对于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也是无法容忍的。他说，是否应由两个掌握核武器的国家（指美国和英国）决定使用这些武器的问题，必须加以澄清；因为那些比较脆弱的欧洲大陆国家必须准确地知道，它们的海外盟国将使用什么武器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参加共同的战斗。②

五月十二日，肯尼迪总统的战略问题特别顾问亨利·基辛格在波恩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在西方防务范围内增加常规武装部队，从而可以更为机动灵活地控制全面战争。他说，美国的欧洲盟国可以在使用战术原子武器上而不是战略原子武器上有发言权。③五月十七日，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发表演说，再次解释关于欧美"分工"的战略思想。他说，北约的防务应该在两个方面上发展：第一，要加强北约用常规武器作战的能力；第二，核武器应对北约整体负责，所以，核武器在任何时候都应该置于严格而灵活的政治控制之下，即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肯尼迪强调欧

① 《纪事年鉴——1961》，第21卷，第174页A3。
② 《纪事年鉴——1961》，第21卷，第175页A1。
③ 《阿登纳回忆录》（四），第109页。

美防务是不可分割的，北约成员国都应增加防务力量，并且把各国的防务力量联合起来；美国也将把自己的五艘北极星核潜艇交给北约战区，美国在欧驻军及其常规武器也将加强。①

这些话反复地讲来讲去，无非是说，北约的核武器由美国统管，而西欧成员国的任务则是发展常规武器。核武器是用于全面战争的，常规武器则是对付"灵活反应战略"中的常规战争那一部分的。

肯尼迪在去维也纳同赫鲁晓夫会晤之前，先到西欧几个国家走了一周，最后于五月三十一日到了巴黎，同戴高乐会晤。

戴高乐深知肯尼迪的来意，也早有自己不可移易的立场和对策；他不会允许美国干预法国掌握独立核打击力量的自主权。戴高乐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有过一段有趣的自白，比较扼要地反映了戴高乐当时的想法，也是戴高乐对美政策的一个通俗概述。照引下来或许有助于了解戴高乐决策时是怎样想的。他在提到肯尼迪即将来巴黎之后说："最突出的是美国对法国的态度终于改变了！已经有很长时间一除了传统的友谊还存在以外一华盛顿把巴黎当作被保护的对象，把它和所有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集团的国家一样看待。现在美国承认了我们的独立，直接而且专程同我们交往了。但是，他们不能想象，他的行动已不再处于主要地位；也不能想象，我们的行动可以脱离美国的行动。总之，肯尼迪每次对我建议的都是要求我参加他提出的计划。他听到的我的回答却是：巴黎自然准备和华盛顿紧密合作，但是，法国无论做什么都必须出于自愿。"②

戴高乐十分清楚，美国的一贯想法，就是要保持美国在西方核防务中的统治和垄断地位，按照美国的想法，法国根本不必发

---

① 《纪事年鉴——1961》，第21卷，第174页C2。

②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273页。

展自己的核武器。所以，当肯尼迪对戴高乐说，美国绝不会把西欧拱手送到苏联手里的时候，戴高乐便反驳说，美国从来也说不出一旦西欧受到攻击，美国将怎样切实有效地动用它手中的武器。对于肯尼迪说美国将把五艘北极星核潜艇交北约使用，戴高乐则说，那无非是把这些潜水艇的指挥权从这一个美国将军手里转移给另一个美国将军而已，决定权终归只属于美国总统。戴高乐告诉肯尼迪：法国决心要成为一个核大国，因为这是法国应该掌握的、使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不冒风险就妄图毁掉法国的唯一手段。①

法美两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争论，到一九六二年发展得更为针锋相对，戴高乐继续寸步不让。

五月十五日，戴高乐在巴黎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国都决心要成为一个核大国，法国一定要掌握自己的命运，绝不从属于美国的保证，不管这种保证何等诚恳。他说，自从北约成立十三年以来，欧洲必须把欧洲防务的责任交给美国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北约诞生时，美国独家垄断着核武器，因而曾是西欧安全的“捍卫者”，现在，苏联的核武器也已相当强大，因此，双方都可以互相打击，而且都有能力致对方于死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不能不尽其所能制造自己的核武器，建立自己的核打击力量，以保证自己不处于被毁灭的危险境地。②

肯尼迪接着在五月十七日记者招待会和十八日讨论贸易政策的会议上两次讲话，这可以看作是对戴高乐的回答。他说，只有北约的威慑才能提供可靠的保护，一个国家单独发展威慑武器是危险的，因为这等于削弱整个西方联盟的防务。他还说，美国不会从欧洲撤退，除非欧洲要求它离开。六月十六日，美国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密支甘大学发表演说，再次强调只有维持一个

①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276页。

② 《纪事年鉴——1962》，第22卷，第215页。

统一的核威慑力量，并且置于"集中领导"之下，北约的防卫才是可能的；而单个国家的核防务力量十分脆弱，经不起强大敌人的打击；在战争条件下，这些弱小的核武器对这些国家反会构成很大的危险，这些国家将"无异于自杀"。麦克纳马拉反复地说，他所概括的"总战略"特别着重"计划的统一"、"执行权力机构的集中"和"集中领导"。① 换言之，北约核武器的领导权要"统一"、"集中"在美国的"领导"之下。

六月二十七日，法国内阁会议宣布，法国政府将要求国民议会增加拨款五千万美元，以加速生产235号浓缩铀。法国官方发言人表示，不管美国提出什么样的指责，法国都将照旧执行其核规划。②

七月十二日，法国财政部长吉斯卡尔·德斯坦在给美国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的信中通知他，法国政府将提前偿还总数为二亿九千三百四十万美元的债款。同一天，法国还宣布，对加拿大的六千二百五十万美元的债务也将提前偿还。当时舆论界反映，此举使法国成为几年来西方在支付平衡中超额最大的国家。③ 这件事的意义当然不仅限于经济，而是从一个很重要的侧面表明，六十年代的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姿态已经十分主动，第四共和国时期那种困顿、被动的形象已经一扫而光了。法国政府在这个时候宣布提前还债，不是政策的巧合，而是有意显示法国已经有了推行独立自主政策的本钱。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法美在拿骚协议——即所谓"多边核力量"问题上，又展开了一轮激烈的论战。

戴高乐在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四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针对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关于建立北约"多边核力量"问题的共同声明，再次

① 《纪事年鉴——1962》，第22卷，第215页。
② 《纪事年鉴——1962》，第22卷，第216页。
③ 《纪事年鉴——1962》，第22卷，第242页。

强调法国继续发展独立核力量的决心。他指出，根据英美两国已经达成的协议，英国将交出它的核武器，美国也交出一些来，用以组成由美国司令员指挥的“多边核力量”，但是，美国核武器的“主体”却仍处于“多边核力量”之外。戴高乐宣布，法国绝对不会参加。他重申，自从苏联也有了足以威胁美国的核武装以来，“世界上，特别是美国，再也没有人能够说出来，美国的核武器是不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怎么样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用以保卫欧洲。”他说，虽然美国的核武器最强大，仍是“世界和平的主要保证”，但是，却不一定能应付有关欧洲的各种事变。①戴高乐在向法国军队发表的新年祝词中宣告：一九六三年将“出现我们自己的原子力量”。②同年四月，他再次强调，“任何打算把我们的主权移交给某种国际‘阿鲁巴库斯’（古希腊雅典刑事法庭）的体制，都是与法兰西共和国的权益和责任不相容的。”③

法国抵制了“多边核力量”，随后也抵制了美苏英的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以及禁止扩散核武器条约。法国在西欧争取推行有别于美国的独立自主政策的进程中起了领头的作用。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多边核力量”之所以没有搞成，当然不仅是由于法国的抵制，发起国的英国之不情愿，并且终于抽身已如前述。应该特别提出的是西欧其他各国也都程度不同地持观望、敷衍的态度。拿骚会议后，肯尼迪政府于三月派出了特使到西欧各国游说，企图把“多边核力量”计划变成北约的计划。但西欧各国大多口头上支持，实际上都不愿说定。当时曾经有过一种说法，说美国搞“多边核力量”，意在进一步扶植西德，因为“多边核力量”计划需耗资四十至六十亿美元，八年完成，费用由美国和西德各承当百分之四十，其余由北约其他成

---

①② 《纪事年鉴——1963》，第23卷，第9页。
③ 《纪事年鉴——1963》，第23卷，第416页。

员国负担，这有助于提高西德的国际地位，所以西德曾表示乐意参加。[1] 但也有否定这种说法的。如英国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追述说，肯尼迪一九六三年四月曾对他说，他对这个方案并不十分热心，所以并没有加以推动，据说，倒是西德有人想要这个方案；后来，威尔逊从勃兰特那里得知，西德人并没有兴趣，德国人肯定不想要，而且认为还是肯尼迪总统坚持主张的，因此，是肯尼迪自己坚持要搞的。据联邦德国国防部的一位海军官员表示，"就他本人来说，他永远也不会参加任何一种多边部队。"[2] 此时，戴高乐和阿登纳刚签定了法德条约，联邦德国断然不会去做有损于法德关系的事。六月肯尼迪访问了一些西欧国家；九月、十月，西方各国又在华盛顿、纽约和巴黎多次磋商，均无结果。

肯尼迪于十一月二十二日被刺身死，约翰逊继任总统，表示继续推行肯尼迪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十二月十六日至十七日北约部长理事会会议仍未取得进展，公报根本没有正面提到"多边核力量"的谈判，只笼统地提到要执行五月渥太华北约部长理事会关于"更充分地交流各国核情报和各成员国更广泛地参加欧洲最高盟军司令部核力量的组织和切实计划"的决定。[3] "多边核力量"计划就此不了了之了。

英国和法国各自进行这场争取核武器自主权的斗争，至此算是告一段落。此后，英法两国便都按照各自的途径建立核威慑力量。十多年后，当苏联在欧洲中程导弹谈判中提议把英法核武器纳入谈判范围的时候，撒切尔夫人和密特朗都振振有词地加以拒绝，声明，英法的核武装是为了民族自卫，而不属于北约。如果肯尼迪的"多边核力量"得以搞成，也许欧洲中程导弹的谈判又会增加一个复杂的因素。

---

① 《纪事年鉴——1963》，第23卷，第413页。

② （英）哈罗德·威尔逊：《1964—70的工党政府——一份个人记录》，1971年伦敦出版，第41页。

③ 《纪事年鉴——1963》，第23卷，第447页。

· 第十章 ·

法国向"PAX AMERICANA"（美国治下的和平）挑战

（一）法国撤离北约军事一体化

戴高乐在《希望回忆录》中写了几段他在一九五八年六月重新执政后对法国独立外交政策的规划。大意是，西方的军事和安全条件与他去职的十二年前已起了深刻的变化，因为自从苏联也有了消灭美国的手段之日起，谁也不相信这两个对手会互相交锋。但是，又有什么能够确保它们之间万一在相互扔炸弹的时候，炸弹不落在中欧和西欧呢？所以对于西欧人来说，北约组织已经保障不了他们的生存。既然"保护"的有效性已经令人怀疑，那么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保护人"呢？

在这种条件下，戴高乐认为法国的"国际作用"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法国的作用应该排除过去对大西洋联盟的"屈从"，即对美国的"屈从"，而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

欧洲和世界去行动”。

因此，戴高乐设计的“蓝图”就是把法国从美国指挥下的北约军事一体化撤出来；同东方集团的各个国家——首先是苏联，建立“和缓、谅解和合作关系”；当时机成熟时和中国也这样做；用核力量装备自己，使任何国家都不能在进攻法国时不冒风险。戴高乐说，他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这条路，每一阶段都要照顾总的形势发展，力避影响法国同盟国的“传统友谊”。①

法国要为自己在大西洋联盟找到一个最佳方位，以彻底改变自己在联盟中的“从属地位”。

戴高乐的这一思想并不是一朝形成的。早在战争期间，戴高乐就一再表示他所领导的“战斗的法国”应该和美国、英国平等地参与同苏联的对战后安排的谈判，但是却完全被关在谈判大门之外，罗斯福和斯大林都不承认法国具有大国的地位。然而，戴高乐坚决地说，解放后的法国一定要恢复其失去的活力，重新在世界大国之列争得自己的地位。战后第四共和国的领导人，无论属何党派，也都想为法国多争取一些独立权力；社会党领导人勃鲁姆就曾提出，欧洲应该成为美苏之外的第三种国际力量，而法国又应在西欧起主导作用。但是这种抱负在动荡困顿的第四共和国期间不过是画饼充饥。戴高乐于一九五八年六月重新执政，即着手解决使法国陷于四面楚歌的阿尔及利亚问题和其它政治、经济问题，同时为树立法国的大国形象积极准备条件。在先后同麦克米伦、杜勒斯、阿登纳等人的会晤中，戴高乐便透露出了法国应与英美同等地在大西洋联盟中承担领导责任的强烈意向。

法国对美英在北约中所谓“两头领导”的挑战，是在戴高乐九月十四日给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的一件备忘录中正式提出的。戴高乐在信中说，鉴于法国在安全问题上所承当的责任，它应当直接参与大西洋联盟的政治和战略决策；而这类问题至今还

①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217—218页。

只限于美国和英国两家共同决定；随着原子武器的垄断权很快就将不再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因为法国不久即将拥有这类武器），法国更有理由加入北约的最高权力集团。为此，戴高乐提出，联盟的领导权应属于三家，而不是两家；否则，法国将不再为北约的发展负责，并根据条约的第十二条保留对北约体制进行改造或退出的权利。① 十月二十八日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戴高乐的用意只在于指出在涉及北约组织的事务上，英美法三国应该举行正式磋商。但舆论界则普遍认为，戴高乐建议的核心，是要在北约组织理事会内确立一种“三头政治”的领导体制。②

美国政府于十月二日正式拒绝了戴高乐的建议，说，美国必须承担的责任比法国要重得多，不能把它的责任缩小到“三方安排”；而且其它北约成员国也会有异议。西德、英国、意大利以及其它北约小国对戴高乐的建议均有不同的反应；麦克米伦则在十一月三日答复戴高乐，表示反对。③ 问题提到十二月举行的北约部长理事会会议，结果，戴高乐的建议未获通过④。

一九六二年五月中旬，戴高乐到法国中部视察，他在利莫日发表演说中强调说，法国在履行其对北约的义务的同时，不会让任何别的国家牵着鼻子走，而是要在联盟内部实行自己的“意愿”、“行动”和“政策”；法国的目标是“建设我们的欧洲”，而不再是“两个大国”的欧洲。六月四日，法国政府总理乔治·蓬皮杜在巴黎召开的西欧议会联盟会议上提出，为了使欧洲成为军事和经济力量，北约需作“重新安排”，使它能够反映欧美之间“在变化当中的平衡”。蓬皮杜说，北约是在美国握有核垄断、欧洲因战争的后果而大为削弱的时期诞生的，现在情况已有变化，所以需要“重新安排”；这样作并不是要把北约和拟议中的

---

①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218—219页。
② 《纪事年鉴——1958》，第18卷，第354页A1。
③ 《纪事年鉴——1958》，第18卷，第354页B1。
④ 《纪事年鉴——1958》，第18卷，第415页F1。

统一的欧洲对立起来。①

法国从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中撤出是在一九六六年，但在这之前，法国已经积极作准备了。如，一九五九年三月，法国地中海舰队从北约撤回；同年六月，法国拒绝在本国领土接受美国的核武器；一九六〇年五月，法国拒绝把军事航空纳入北约的空防体系；一九六三年一月，法国拒绝把从阿尔及利亚遣返的部队置于北约一体化司令部管辖之下；同年六月，法国大西洋舰队从北约撤出；一九六五年五月，法国拒绝参加北约举行的军事演习……

一九六五年九月九日，戴高乐举行就任总统以来的第十二次记者招待会，就国内外政策发表了长篇讲话。在对外关系方面，讲话涉及欧洲共同市场、北约、与苏联和东欧的关系、德国统一、越南战争等问题。舆论最注意的是他在谈到北约时，第一次示意法国可能于一九六九年退出北约。他提出，最迟到一九六九年，那种在"一体化"名义下的"从属关系"就将结束。他说，这种"从属关系"把法国的"命运"交给了"外国当局"。②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明确提出法国将从北约军事组织撤出。他说，如今同当初以北约的名义建立起美国"保护体制"时的形势大不相同了，现在苏联和东欧已不对西欧构成威胁，在欧洲打仗的前景是很渺茫的。同时，自从苏联有了可以直接打击美国的核力量以来，美国对苏联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更小了；倒是美国卷入其它地区的冲突大有扩大之势（这指的是越南），甚至会把欧洲也卷进去，尽管欧洲极不情愿；如果法国的"领土"、"若干武装力量"、"空军基地"和"港口"仍然"通过北约置于美国的指挥之下"，那么，法国就难免被裹进去。戴高乐说，法国将从现在起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四日（即北约成立二十周年）止的这段时间里对于北约合作

① 《纪事年鉴——1962》，第22卷，第215页C1。
② 《纪事年鉴——1965》，第25卷，第321页A1。

关系的现行措施，进行反复研究，以便“重建某种享有主权的正常局面”，使法国所属的“土地、天空、海洋和武装力量”都仅仅接受法国的管辖。戴高乐说，这并不是法国同北约实行“决裂”，而是对变化了的形势的“一种必要的适应”。①

美国马上就领悟了戴高乐的意思，第二天，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国会说，美国必须有思想准备，当法国不打算参加大西洋联盟的活动的时候，美国就需要同北约的其它十三个盟国担负起北约的全部防务。②

三月七日，戴高乐给美国总统约翰逊写信，同时也给英国首相威尔逊、联邦德国总统艾哈德和意大利总统朱塞佩·萨拉盖特发了内容相同的信，提出，法国决定在本土充分行使主权，将不再参加北约“联合”司令部，因此也不再向北约提供部队。信中提出，“盟国军队”在北约名义下长期在法国驻扎并利用法国领空，使这个国家的主权受到损害。戴高乐在信中表示，法国愿就有关问题同美国政府接触。③ 这封信没有马上公布。据说，约翰逊立即在同国务卿腊斯克交换意见后复了一封短信，说法国的态度对北约之防务不啻是一个沉重打击，美国只能在同北约其它盟国磋商以后才能答复法国。④

三月九日，法国政府新闻发言人伊冯·布尔热在戴高乐亲自主持的内阁会议后发表声明，正式把戴高乐两天前提出的问题公诸于世。布尔热说：“法国无意于利用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条约中关于允许任何成员国从一九六九年退出条约的条款。因此，对于法国来说，联盟将继续存在下去。然而，鉴于对切实改革北约问题一直没有进行有益的讨论，法国考虑到国际形势以及它在本国领土恢复充分主权的决心，决定采取它认为是必要的措施。这

① 《纪事年鉴——1966》，第26卷，第77页A3。
② 《纪事年鉴——1966》，第26卷，第77页E3。
③ 《纪事年鉴——1966》，第26卷，第116页A1。
④ 《纪事年鉴——1966》，第26卷，第84页F1。

些措施涉及在北约组织指挥下的法国部队、法国对北约指挥的参与和盟国军队及勤务在本国领土的长期驻扎等问题。”布尔热说，法国政府将就这些措施“可能产生的实际影响”和在发生战争时“应采取联合行动的安排问题”，与美国等盟国政府进行谈判。①

三月十一日，法国外交部向北约十四个成员国政府发出了内容相同的照会，全面阐述了法国政府的立场和观点。

首先，照会对当时的形势提出了以下四点看法：（一）北约组织在一九四九年成立时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西欧不再面临“追切的和咄咄逼人”的威胁；（二）法国已拥有核军备，并因“这种军备的性质”可以“置身于（北约军事）一体化之外”；（三）苏美的核平衡已经改变了“西方防务所处的总状况”；（四）欧洲不再是“国际危机的中心”，而且，“显然并非所有大西洋联盟的国家都与……亚洲的争端有关”。根据这四点情况，法国曾建议修改现行条款。但是，大西洋联盟的盟国们“似乎都是维持现状的支持者”，因此不支持法国的建议。

据此，法国决定自行采取必要措施，即同时退出北约组织范围内的两个一体化司令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和中欧司令部。当然，这两个司令部的总部也就必须相应地撤离法国领土。

照会说，法国政府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它准备“就执行这些措施的实际条件”进行商讨，和北约盟国一起共同作出“适当安排”。②

发给美国、加拿大和联邦德国政府的照会还涉及一些有关双边问题。

给美国政府的照会指出，本着同样原则，某些法美双边协议也不再符合目前条件，法国将不再同意在法国设置不属于法国管

---

① 《纪事年鉴——1966》，第26卷，第84页B2。

② 《纪事年鉴——1966》，第26卷，第84页E2。

辖的外国驻军、设施和基地。法国建议同美国政府就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并就一旦两国都卷入一场冲突时，美国如何使用法国领土内的军事设施问题进行磋商。①（根据法美双边协议，当时在法国常驻的美国军事人员有二万六千名，与美国军事设施有关的美国公民约六万人，家属和文职人员在内。美国在法国的军事设施有：设在圣日耳曼的美国欧洲司令部，设在奥尔良的美国通讯区司令部，四个现役空军基地和四个救援空军基地；大约十五个后勤军需单位，一条从大西洋通向联邦德国的输油管。）

致加拿大政府的照会涉及加拿大在法国的两个空军基地。致联邦德国政府的照会涉及西德使用法国的训练设施问题。②

三月十八日，北约十四个成员国发表联合声明，作为对法国照会的反应。声明说，北约对各成员国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它的军事组织作为“防御和威慑工具”，任何双边协议都无法代替；而且北约组织的建立也是一种“政治需要”，它反映了各成员国随时准备尽其可能“通过协商和共同行动来保卫自由和安全”。③这份简短的声明只不过是一项重申北约原则的声明，并没有正面回答法国的论点，只是申明北约现行条款仍然有效，用不着修改。联合声明之所以采取了这种方式，据说是由于北约十四国对于应掌握怎样的分寸，意见不尽相同：美国和英国主张“强硬”一些，挪威、丹麦、葡萄牙等国主张“温和”一些。④

四天后，约翰逊给戴高乐写了第二封信，直接针对戴高乐的论点说，对于戴高乐提出的盟国在法国驻军有损法国主权的看法，“感到迷惑不解”，因为这些力量是根据共同商定的计划驻进法国的。约翰逊认为，盟国必须通过它们的“共同组织”，根据“共同计划”在紧急情况下采取行动；如果在危机中各行其

① 《纪事年鉴——1966》，第26卷，第85页A1。
② 《纪事年鉴——1966》，第26卷，第85页D1。
③ 《纪事年鉴——1966》，第26卷，第115页D1。
④ 《纪事年鉴——1966》，第26卷，第115页E1。

是，或者只在彼此间保持“松散的配合”，那对大家说来“都是很危险的”。约翰逊在信中说：“我仍很难相信，曾经为西方的安全和发展作出独特贡献的法国，竟然能长期地远离大西洋的共同事业和责任。”① 二十五日，美国国务院照会法国政府，要求就法国政府的十一日照会提供进一步说明。

二十九日，法国政府再次向北约十四国发出备忘录，对法国提出的各项有关措施完成的最后时限作了说明。法国备忘录提出了如下日程表：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起，法国的驻德陆空部队不再受北约司令部管辖，但仍将根据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关于外国军队留驻联邦德国领土的条约继续在德国驻扎。同一天，法国人员将从北约军事一体化司令部撤出。

七月二十三日，法国在北大西洋防务学院的高级人员和学员在本学期结业后撤走。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北约各司令部（包括北约最高司令部和中欧司令部）机构的总部迁出法国领土。

法国给美国政府的照会说，迁走欧洲美军总部以及一些陆空军设施，一般以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为最后时限；对于某些复杂的技术问题，可适当延长；某些特殊问题，如输油管，可另作特殊安排。②

美国四月十二日复照，要求把迁走美国在法国的基地和司令部机构的最后时限推迟一年。美国照会还提出，法国政府必须对“废除和背弃现行条约所涉及的财政问题”承担责任。意思是说，法国应负担北约机构和美国军事设施撤离法国领土所需的费用。③ 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乔治·W·鲍尔三月二十九日在巴黎参加北约十四个成员国会议时即曾说，法国政府必须承担迁移

① 《纪事年鉴——1966》，第26卷，第115页E2。
② 《纪事年鉴——1966》，第26卷，第116页G1。
③ 《纪事年鉴——1966》，第26卷，第171页E1。

和安顿北约机构的全部费用，约需十亿美元。①

二十二日，法国政府复照美国，坚持法国立场，驳回美国关于推迟一年撤离的要求，重提就具体问题进行谈判。②

至此，法国撤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已毫无挽回余地。北约军事司令部总部根据法国提出的时间表离开了法国。

法国撤离北约军事组织，在当时曾震动了世界，尤其在西方掀起一阵轩然大波。戴高乐此举固然没有得到西欧盟国的支持，显得有些孤家寡人，但这件事使美国在大西洋联盟一统天下的局面，绽裂了一道深深的裂纹，预告大西洋两岸的盟友关系必须实行大幅度调节。

（二）关于“缓和、谅解、合作”政策

法国对美独立政策中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相应地调整法苏关系。这是与法国撤出北约军事组织——实际是调整法美关系——互为表里的。

一九五九年九月戴高乐和艾森豪威尔在巴黎会谈时，就已挑出了这个问题。当时，对苏战略曾是两国总统的重要话题。

艾森豪威尔对戴高乐说，美国绝没有挑起战争的意图，迟早要和苏联人首先为了限制浩大的军事开支达成若干协议；最近，美国副总统访问了苏联，赫鲁晓夫不久将访问美国。美国的意图是竭尽全力同他们进行建设性的谈判。从艾森豪威尔的话中，戴高乐感觉到，艾森豪威尔集中力量考虑的问题是美苏关系问题，似乎宇宙一切事物都与此有关；而在西方阵营中最重大的现实便是美国的现实，其它事物都不过是次要的。

因此，戴高乐有针对性地说，美苏两家在军备上达成某种技

① 《纪事年鉴——1966》，第26卷，第116页A3。
② 《纪事年鉴——1966》，第26卷，第171页E3。
③ 《纪事年鉴——1958》，第18卷，第228页F1。

术性的谅解，固然可以起些促进作用，但是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集团对立照样持续下去。戴高乐认为，在美苏相互接触的同时，欧洲国家之间应该在经济、文化、技术、旅游等方面进行接触，这样倒可以把"铁幕"一块一块地撕碎，逐渐地使扩充军备的狂热没有立足之地。戴高乐告诉艾森豪威尔，法国也打算邀请赫鲁晓夫访问法国，法国打算在实现全欧和解之前先在各种实际领域中实现法苏合作。①

艾森豪威尔把美苏关系问题放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支配地位；戴高乐则强调欧洲——特别是法国——的独特作用。戴高乐的意思是让艾森豪威尔了解，美国不能包办西方的对苏关系。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三日至四月三日，赫鲁晓夫偕夫人、女儿和女婿访问法国。戴高乐在会谈时提出了著名的"缓和、谅解、合作"的三部曲政策和"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建设构想。

戴高乐对赫鲁晓夫说，他完全反对苏联关于柏林地位的建议，如果苏联要单独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条约，从而把柏林通道的管辖权交给民主德国，问题仍然不能解决，集团对立仍会继续下去。戴高乐说，解决的办法不应是维持两个集团的对立，而是应该"在欧洲的范围内依次地推动缓和、谅解和合作"，并且"从大西洋直到乌拉尔"在欧洲人之间建立起来往和联系，这样就可以制造一种有利于去掉德国和柏林问题这个"毒瘤"的气氛，而且可以由此引导两个德国相互接近，"最终把整个日耳曼民族纳入一个和平和进步的欧洲当中，使它得以作一番新的事业"。②

戴高乐这些话固然是从德国问题说起的，但实际上其意义要广泛得多，涉及到一种对外政策的战略思想。法国已经决定独立自主地改善同苏联、东欧的关系，在向美国在联盟中的"领导地

---

① 参阅《戴高乐希望回忆录》，法国普隆出版社，1970年版，第228—229页。
②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246—247页。

位”挑战的同时，向苏联领导人提出了“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构想。法苏的接近使西方舆论界联想到十九世纪的法俄同盟。不过此时的欧洲已经没有了俾斯麦。美国从戴高乐的“缓和、谅解、合作”感受到一种日益强烈的离心倾向，因而把戴高乐的政策视为“叛逆”之音。①

罗斯福生前曾经讽刺丘吉尔支持了戴高乐，是扶植了一个“问题儿童”②，当时罗斯福把戴高乐个人看作一个桀骜不驯的枭雄，丘吉尔则从戴高乐毅然主张抗击法西斯的行为而称之为“应运而生的人”③，他们都看到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不可能屈尊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之下，但是他不会预料到戴高乐的政策迟早将代表一种西欧的政治倾向，并开创一种不可遏止潮流。

法苏关系发展到“高潮”，应该是戴高乐决定退出北约军事组织三个多月以后对苏联的正式访问。戴高乐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一日在苏联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和极高的礼遇，他在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进行了政治会谈，发表了法苏联合声明，签订了贸易、文化协定和空间探索和技术合作协定。联合声明说，双方同意欧洲问题首先应在欧洲范围内进行讨论，说欧洲大陆的国家应该努力为在东西方国家之间建立缓和气氛准备必要条件。④双方还协议将在巴黎和莫斯科之间架设直接通话的“热线”。⑤

法苏联合声明虽然是纸上的协议，重要的是表明法苏双方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找到了汇合点：双方出自不同动机都努力把美国排除在欧洲事务之外。

同年十二月一日至九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回访法

① （美）达维德·卡略欧：《大西洋狂想——美国、北约和欧洲》，第57页。
② （美）小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中译本，新群出版社，1947年版，第64页，西方把调皮的学生称为“问题儿童”（Problem child）。
③ （英）丘吉尔：《战争回忆录，三：法国的陷落》，第163页。
④ 《纪事年鉴——1966》，第26卷，第290页B1。
⑤ 同上书，第290页A1。

国，会谈后的联合声明说，缓和已经有了积极成果，必将推动欧洲各国关系的改善，从而有助于通过谅解解决国际争端。联合声明还说，双方讨论了召开一次全欧会议的建议，以研究欧洲安全和合作问题。①

法国在撤离北约军事组织的一九六六年，不仅大力发展了同苏联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关系，而且响应了苏联关于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倡议。戴高乐还同时加速密切了同东欧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广泛地访问了亚、非、拉各个地区。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戴高乐在访问柬埔寨时于九月一日发表了著名的"金边讲话"。那时美国侵略印度支那战争正在升级，戴高乐在这时访问东南亚，这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戴高乐在金边群众集会上呼吁美国"在适当的和确定的限期内"从印度支那撤走，让印度支那人民以自己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②十多年前，美国曾经通过东南亚军事集团把法国势力挤出印度支那，现在轮到了法国抨击美国在东南亚发动的侵略战争。

戴高乐的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独立姿态，特别是改善同苏联、东欧的关系，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同美国的立场相左，当然首先就强烈地刺激了居于大西洋联盟"盟主"地位的美国。

曾经担任过美国驻法国大使的查尔斯·波伦把戴高乐称作"我行我素"的人，说他在一九六四年根本不考虑美国的意见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六六年退出北约军事组织，同年在金边谴责美国，六七年又同美国唱反调，指责以色列在六日中东战争中是侵略者……波伦慨然叹道："进行讨论和努力求得共同观点和做法，对他来说是格格不入的。"③

然而，波伦并不只限于评说戴高乐个人的言行，他认为更重

① 《纪事年鉴——1966》，第26卷，第475页C3。
② 法国《世界报》1966年9月2日。
③ 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第510页。

要的是，戴高乐的政策起码将产生两点重大的政治影响：第一，波伦认为，如果戴高乐的政策继续下去，西方联盟将难免“彻底瓦解”，因为北约成员国都会受到“诱惑”，也试图摆脱美国的影响。波伦尤其担心西德在法国的影响下，“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想要走上以前遵循的道路，同苏联人达成交易”。第二，因为有第一点担心，于是担心戴高乐的政策在法国将不是权宜之计，而对尔后的法国的政策产生持久的影响。波伦说，在美国约翰逊政府中有些人认为戴高乐的政策只是“暂时的”，波伦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要法国政策再回到赞成联盟的基础上来，是没有多大可能性的”。相反，戴高乐会做得十分彻底，使任何未来的法国政府都不可能再走“回头路”。①

波伦的这些分析，可以说基本上“不幸而言中”。西方联盟毕竟没有“彻底瓦解”，联邦德国也没有同苏联达成波伦的所说的那种“交易”，但是，戴高乐主义在西欧的影响绝不限于六十年代的法国，而是大大鼓舞了大西洋联盟内部对美国的独立和离心倾向。当然，戴高乐在法国所作的不会在别的国家原样重复，但是同美国拉开距离的独立倾向不可避免地将大为发展。到六十年代最后一年完善其新东方政策构想的维利·勃兰特，就不讳言他从戴高乐的经验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发。

戴高乐密切同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关系，在西方舆论中曾引起了不少耸人听闻的评论，把戴高乐主义概括为“亲苏主义”或“反美主义”。需知戴高乐的“缓和、谅解、合作”政策，立足点是在西方。法国取得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看它能不能取得单独以大国身份同苏联对话的资格，否则就说不上什么大国地位；要作到这一点，当然需争得对美国的独立，而发展法苏关系又必然会加强法国同美国打交道的资本。一个受美国控制的法国不可能认真推行自己的对苏政策。所以法国闹“独立

① 查里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第508—509页。

性”的矛头所向必定是针对美国。完完全全推行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政策（波伦称之为“我行我素”），这正是戴高乐二、三十年来一直向美国争取的东西。

（三）戴高乐的“欧洲观”

戴高乐在调整法国对美、对苏政策的过程中，一直都同时强调“欧洲人的欧洲”这一基本观点。戴高乐的独立对外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他的以“法国中心论”为基础的欧洲构想，或者叫做戴高乐的“欧洲观”。

概括说来，戴高乐的“欧洲观”有以下几个基本点：

1．未来的欧洲应该是摆脱美苏两大国控制的独立的欧洲。美国不是欧洲国家，欧洲可以同它“互相承担义务”，但“旧大陆”自己必须“建立起强大和繁荣的堤防”。[①]苏联是欧洲国家，它应该参加欧洲建设的进程；但只有当东方的“思想体系”“消逝之后”，才能够实现“从大西洋至乌拉尔的平衡、和平和发展”。[②]

戴高乐认为，欧洲应该“从政治、经济和战略观点出发，把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国家联合起来，使这个组织成为世界三大势力之一；在必要时，使它成为苏联和盎格鲁—撒克逊两大阵营之间的仲裁者。自从一九四〇年以来，我的一言一行都在为这些问题创造条件”。[③]他说，欧洲应该“组织成为一个整体的”欧洲“能够抑制一切对霸权的企图，并且可以在两个对立的势力之间建立起均衡的因素，没有这个因素，就不会有和平”。[④]他甚至说，长远目标是“建立一个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体欧洲，哪

---

① 戴高乐1962年9月4日在波恩的讲话，法国《世界报》1962年9月5日。

② 同上文。

③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拯救》，第178—180页。

④ 戴高乐1947年6月29日在里尔的演讲。

怕要改变制度"。说，"这才是欧洲人的纲领。这也是我的纲领"。[1]戴高乐还进一步发挥说："正是在欧洲，在这古老的土地上诞生和繁荣了现代文明。正是这个欧洲将决定世界的命运。假如欧洲人民，不管他们是在铁幕的哪一边，有朝一日能在相互之间建立友好协调，那么地球上的和平就有了保障。但假如相反，他们仍分裂为两个相对的集团，那么，迟早就会发生毁灭人类的战争。欧洲在地球上的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重大。"[2]

这是戴高乐的"欧洲观"的最基本的一条，即要把欧洲建成一个与美苏鼎立的独立的平衡力量。从上面摘引的戴高乐的观点来看，戴高乐所理想的欧洲，对美国要加以排斥，对苏联和东欧则是要"促变"。

2．未来的欧洲仍必须是民族国家联合起来的"多国家的欧洲"，"祖国的欧洲"。戴高乐说："国家，是唯一有效的因素。"[3]他关于欧洲统一的思想与任何"超国家"主张和欧洲联邦主义的构想是完全不相容的。

戴高乐指出，未来的欧洲的组成，只能是互不相同的国家，"它们各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不幸，自己的光荣，自己的雄心，它们是有权力下命令和有权力自主行动的实体。要设想在国家之外、或国家之上建设一些有实际效果、并为人民所赞同的东西，那是想入非非。肯定，在真正地和全面地处理了欧洲问题以后，可能已建立了某些或多或少超国家的组织。这些组织有它们的技术价值，但没有，也不可能有权力，因而也就不能有政治上的效能。"[4]他形象地说，欧洲的大作家、大诗人但丁、歌德、夏多布里昂竟然不使用本国语言、而是用这种或那种世界语来写作，他们能够对欧洲作出多大贡献呢？"祖国是

---

① 戴高乐1949年3月29日在巴黎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②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拯救》，第179—180页。
③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205页。
④ 1960年9月5日在爱丽舍宫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一个有情感的字眼”，只有在祖国的基础上去建设欧洲。他强调说，在当前，除掉“多国家的欧洲”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样的欧洲；否则，那只能是一个神话当中的、虚构的和空谈当中的欧洲。①

戴高乐正是本着这种关于欧洲的理论去对待欧洲共同体等欧洲事务的。他执着地认为，任何共同体必须首先为具体的民族国家服务。戴高乐是一个彻底的民族主义者。

3．在“多国家的欧洲”当中，法国应该起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是戴高乐的大法兰西民族主义的另一集中体现，法国要当统一欧洲的头。他在一九四七年就说：“一个自由和统一的欧洲的复兴……必须以法国的复兴作为条件。”② 第二年又说，“……在一个以北海、莱茵河、地中海为主要通道的集体中，应该成为中心和首领的，正是法国。”③ 还说，西欧的“自然的和道德的中心，正是法国”。④ 一九五〇年说：“只要法国不居领导地位，欧洲就无法形成，我所说的是一个站起来的、不受牵制的法国。”⑤ 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以后，戴高乐在一九六一年强调法国的作用说：“我们的法国，对欧洲有根本性的意义，自由世界是非有它不可的。我们的消逝和动乱不安都会给西欧带来分裂，带来不幸的征兆。”⑥

戴高乐关于民族国家的欧洲和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的论点，是戴高乐思想的精髓，是戴高乐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不惮絮烦地多摘引了一些他的原话，以便更准确地了解戴高乐民族主义的特色。

4．联合起来的欧洲应该以法德联合为支柱。戴高乐一直十分重视同德国的关系，他既要把德国的分裂状态固定下来，又要

① 1962年5月15日在爱丽舍宫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② 戴高乐1947年7月9日在巴黎英美报刊联合会上的讲话。
③ 戴高乐1948年3月7日在贡比涅的讲话。
④ 戴高乐1948年4月17日在法兰西人民联盟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时的演说。
⑤ 戴高乐1950年2月11日在冬季赛车场的演说。
⑥ 戴高乐1961年10月20日电视讲话。

把德国的西半部牢牢地“钉”在西方阵营。戴高乐认为，法国和联邦德国的和解和结盟，可以确保西欧在政治上的独立性，而且可以既不使联邦德国同美国拴得太紧，也不致使它“滑”向东方。出现这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都会危及西欧——首先是法国——的安全利益。

法德合作既是西欧联合的支柱，法国和联邦德国也互有需要、可以互相借重。事实上，欧洲共同体之类的西欧联合事业，没有法德之间的谅解和合作，是根本不能想象的。

把戴高乐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四点欧洲构想归纳为一句话、一个公式，就是：在争取东西方关系和缓和国际谅解的前景中，建立一个摆脱美国和苏联控制的、以法国为“中心”的、以法德合作为支柱的、由欧洲各主权民族国家联合起来的欧洲。

至此，戴高乐主义的意义已经基本上完备了。在法国来说，就是民族独立和世界大国地位的综合；在国际关系中则集中表现为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挑战；在大西洋联盟内部关系中，首先是欧美关系中，则表现为对美国的独立倾向。

戴高乐主义产生于法国，但它的精神实质却逾越过法国的边界，在西欧有广泛影响，成为一种“欧洲现象”。戴高乐主义在六十年代的表现和影响，是这一时期西欧国际关系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在戴高乐的法国向“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大举挑战时，曾经是匹马单枪；而后来在西欧出现的“半戴高乐主义”、“新戴高乐主义”等等名词，则表示着戴高乐的基本思想已在向广处延伸，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西欧正在出现与美国拉开距离那样一种政治倾向。

·第十一章·

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新东方政策”在整个六十年代经历了酝酿和形成的过程。和法国的戴高乐主义一样，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在欧洲政治舞台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起了共振，推动了七十年代的欧洲缓和进程。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九四九年成立的，它的对外政策的演变，粗略地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起，包括康拉德·阿登纳担任联邦总理的全部时期。希特勒德国战败后，德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时期。中世纪小邦林立的神圣罗马帝国、俾斯麦统治下的德意志帝国、凡尔赛条约后的魏玛共和国、把整个欧洲卷入空前浩劫的第三帝国等等，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德国，虽然没有被肢解，但是却被分成了东西两半，这在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上犹如发生了一个断裂，两个德国都需要从头写自己的历史。特别是在对外关系上，无论

是建立了民主共和国的东半部，还是建立了联邦共和国的西半部，都处在历史上没有过的国际环境之中，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言，以阿登纳为首的联邦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确立联邦德国作为西方国家平等一员的地位和权益，奠定自己的国际地位。在这期间，它参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签订了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罗马条约。

由于联邦德国，包括其前身西方三国占领区，是在东西方对峙的政治前提下建立起来的，阿登纳时期的对外政策也就带有明确的集团对立的特点。著名的哈尔斯坦学说，从“以西统东”和拒不承认两个德国的现实出发，声明联邦德国不与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交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是唯一的例外)。然而，哈尔斯坦学说本身包含着矛盾的因素，把联邦德国自己同东方隔绝起来了，实际上限制了自己发挥主权国家的作用。特别是当东西方关系出现缓和迹象、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程度不同地松动与苏联、东欧的关系的时候，这种自我封闭的政策更明显地暴露出不利于联邦德国发展的局限性。

阿登纳到晚年对这种情况已有所感，国际形势在变化，联邦德国的对外政策也需要相应地有所调节。但阿登纳已不可能、也来不及有很大的作为了。

第二个时期，大体是六十年代，相当于艾哈德政府和基辛格——勃兰特大联合政府时期，即新东方政策的孕育和萌芽时期。它的前一半基本上仍是五十年代政策的延续；而后一半则进入了新东方政策的准备阶段。

第三个时期，从六十年代最后一年——勃兰特出任联邦总理、组成社会民主党为主的政府起，即七十年以后的时期。新东方政策完全取代了以哈尔斯坦学说为基础的对外政策，提出了一系列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为了了解联邦德国对外政策的特色，最重要的就是搞清楚与勃兰特的名字有密切关系的东方政策。由于德国的特殊地理地位，

从俾斯麦以来的每个时期都有相应的东方政策，为了加以区别，人们习惯地把勃兰特的东方政策称作“新东方政策”。这一章着重要叙述的，就是新东方政策的酝酿、形成和发展，从六十年代（即所谓第二个时期）谈起，并以新东方政策的“诱发”事件——所谓柏林墙事件为开头。

（一）“柏林墙”事件的启发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华沙条约缔约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西柏林国界建立这样的制度，可靠地堵塞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进行破坏活动的道路，在西柏林全境的四周（包括西柏林同民主柏林交界地方）实行可靠的防卫和有效的监视”。[①] 同时，为了“制止自由外流和其他非法活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东柏林领土上、在东西柏林之间筑起了一道墙，东西柏林之间的通道被封锁了，只在交界处开辟了九个过境站。西方为此大为骚动，这一地区的空气异乎寻常地紧张起来；在U-2型飞机事件、巴黎四国首脑会议夭折之后，这是又一耸动舆论的大事。由于这种紧张气氛集中在位于东西之交的柏林地带，大国驻军摩肩接踵地密集在那里，任何一方再多走一步，便有可能酿成爆发性的冲突。

然而，爆发性的冲突并未发生。

在柏林墙修建的当天，西方占领军城防司令并不见有异常的动静。十三日上午十一时，三国城防司令在占领军司令部会见了当时任西柏林市长的维利·勃兰特。司令们先让勃兰特等了一刻钟；见面后稍事寒暄，勃兰特就直截了当地说：“你们昨夜被人背后踢了一脚！”接着是片刻冰冻般沉寂。城防司令们请勃兰特说下去。勃兰特说：“昨天发生的事非法地破坏了四国关于在全柏林自

---

① 《新华月报》，1961年9月号，第181页。

向通行的协议……你们的政府起码应该马上向莫斯科提出尖锐与有力的抗议……”勃兰特要求城防司令们立即派联合巡逻队到东西柏林边界。他们不同意这样做，理由是这会使这件事变成一桩国际政治争端。相反，他们建议勃兰特派西柏林警察到边界一线去，以防止发生冲突；与此同时，他们将“请示”各自的政府。据说，勃兰特无可奈何地忿然离去。①

过了两天，美、英、法三国城防司令向苏联城防司令提交了抗议书，说修筑柏林墙违反了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日关于苏联保证柏林内部以及柏林和德国其余地区的通道畅通的四国协议，指责苏联“实行了非法行动，在破坏四国协议的情况下设置了军事和超军事设施……把柏林的苏占区变成了兵营”。苏联城防司令第二天驳回了西方的抗议，指责西方干涉了纯属民主德国内部的事务。苏联照会说，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日的四国协议的意思是，西方盟国的柏林通道应只用于运送西方在西柏林的卫戍部队的供应补给；柏林空气的恶化，是因为有人“利用西柏林的占领体制”，“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非法挑衅和颠覆活动”。②

又过了两天，即十七日，美、英、法三国政府向苏联递交了复照，说“西方从不接受对柏林内部交通自由的限制”，柏林两个部分的界限“不是一种国家交界线”。③第二天，苏联政府再次照会三国政府，重申支持民主德国为反对颠覆活动所采取的措施，说民主德国“只不过行使了每个主权国家通常拥有的保卫自己利益的权利”；“国境管理制属于每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无需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和赞同”。④

---

① 大卫·宾德：《另一个德国人，维利·勃兰特的一生和时代》，华盛顿D·C·新共和国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183页。

② 《纪事年鉴——1961》，第21卷，第286页C1。

③ 同上书，第293页F2。

④ 《新华半月刊》，1961年9月，第186页。

这样的抗议和反抗议继续了一段时间。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美国副总统约翰逊偕波伦和克莱来到了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约翰逊在西柏林发表了讲话，表示美国将保障西柏林的“安全”。同时，一支一千五百人的美国作战部队到达了西柏林；稍后，美国坦克沿东西柏林的交界区布防。

那几天，维利·勃兰特的活动是频繁的，态度也是强硬的。他在十六日西柏林群众集会上说，他已经给肯尼迪写了信，说，西柏林期待于西方的，“不是单纯的语言，而是政治行动”，“目前问题是不应当使柏林变成另一个慕尼黑”。勃兰特还说，“如果我们通过不了这次的考验，那么共产党人就不会在布兰登堡大门停下来……”①这封信的内容没有公开发表，据十九日《法兰克福总汇报》透露，勃兰特建议西方宣布在西柏林建立某种三国体制，以确保它们在德国统一以前一直留在西柏林；“无所作为和纯属防御性的策略”，“有可能带来对西方的信任危机”；这种局面如果继续下去，就“会对西方国家的应变能力和决心”产生怀疑。因此，勃兰特建议肯尼迪“显著地”增加在西柏林的城防部队。这些都是约翰逊访问西柏林以前的事。在约翰逊访问和美国增加城防部队以后，勃兰特便在二十日表示，约翰逊的来访“已经扫除了人们的怀疑”。②

柏林地区的气氛诚然是紧张的，然而，柏林墙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的一些迹象，却向人们传递了一些与紧张气氛不尽一致的信号。

这一年的六月，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维也纳举行了会晤，会谈时唇枪舌剑，各不相让。而国际舆论却普遍感到，美苏双方都打算利用这次会晤的机会使头一年U2型飞机事件以来的僵局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维也纳会晤前夕，肯尼迪先到了巴黎，当时

---

① 《纪事年鉴——1961》，第21卷，第294页A2。

② 同上书，第294页D2。

肯尼迪对于赫鲁晓夫将在维也纳采取什么动作，还是吃不准的。肯尼迪对戴高乐说，他到维也纳去，无非是向赫鲁晓夫作一番良好的姿态，建立联系，交换交换意见。戴高乐对肯尼迪说，既然没有发生战事，前途便只能是和平。但是，和平是只有通过普遍和持续的缓和，才能建立起来的。但，这样的缓和需要均势。如果破坏了均势——首先是破坏了在德国的均势，就可能使世界蒙受极严重的危险。戴高乐对肯尼迪说一定要“顶住”赫鲁晓夫试图改变柏林现状的任何建议。①

维也纳会晤当然达不成任何协议，但这次会晤把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戴维营会谈那样的两巨头直接对话接续下来了。一时被称为“维也纳精神”。

柏林墙事件以后，美国作出的最大反应，就是上面说的派副总统约翰逊去了一趟西柏林。随约翰逊同行的波伦有过这样一段记载：“经过紧急磋商以后，西方三个盟国认为它们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采取军事行动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将导致对抗，而在这场对抗中西方将不得不实行退却。”② 当时倾向于采取强硬行动的是美国在德国占领军司令克莱，他在同约翰逊一起去欧洲的飞机上说，假如他是驻柏林城防司令的话，他就要命令部队把柏林墙拆掉。波伦评论说：“任何这样的行动将是一个严重的冒险行动。我们对东柏林没有承担义务……”。“约翰逊没有回答克莱的话。在旅途中，副总统更多地是听取意见，很少评论政策，显然他是在坐的人当中最高级的美国官员……他这样谨慎是为了不犯任何错误。”③ 对于约翰逊受命在西柏林的短暂访问，波伦评论道：“在这次访问中，约翰逊表现得很出色。他在适当的时候做了恰如其分的事情。我在给国务卿腊斯克的报告中写道，副总统的访问和增援部队的到达，‘有声有色地向柏林人民表明了美国将

---

①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276—277页。
② 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第483页。
③ 同上书，第484页。

在这个围城中留下来的决心和意志'。这两件事取得了'完全彻底的成功'。"①

从这段记载足以看出，美国并不想比以上这些更多做什么。差不多同时，腊斯克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柏林问题，以及德国和中欧的其它问题都可以通过同苏联的谈判来解决。②

麦克米伦在评论柏林墙事件时说："西方各国除了提出正式抗议外，很难再做什么事情。的确，由于我们一再坚持在西柏林的合法权利，如果对于苏联当局在其所占的那一部分采取的……行为谴责过甚，那也许是危险的。无论如何，重要的是不要让冲动起来的感情以威胁口吻或歇斯底里地预告战争即将到来的方式表现出来。"③ 换言之，无论如何，"柏林墙"是在东柏林的领土上。

戴高乐曾经鼓励肯尼迪在柏林问题上持强硬态度，但是"柏林墙"并没有改变西柏林的地位，而且法国也绝无意充当打头阵的角色。

西方的态度大体就是如此。苏联方面如何呢？

据勃兰特追记，"柏林墙"修筑后的第三天（十六日），正是美英法和苏联相互提出抗议的时候，阿登纳接见了苏联驻联邦德国大使斯米尔诺夫，双方都希望"不要扩大目前的争执目标"。斯米尔诺夫转告阿登纳，这个措施并不是针对联邦德国的。阿登纳回答说，联邦政府将不会采取任何不利于德苏关系和恶化国际局势的措施。几星期后，阿登纳透露同赫鲁晓夫会晤的愿望，而赫鲁晓夫也在九月初对联邦德国驻苏大使克罗尔表示希望见到阿登纳。勃兰特对于阿登纳在柏林墙事件上的印象是："显得十分冷漠"。④

---

① 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第485页。

② 《纪事年鉴——1961》第21卷，第295页 C1。

③ 麦克米伦：《指明方向》，中译本，第479页。

④ 维利·勃兰特《人民和政治1960年—1975年》，波士顿1976年版，第26—27页。

围绕“柏林墙”的风波，到八月底就平息下来了。让·巴普斯蒂——杜罗塞尔说，尽管气氛还显得相当紧张，但是，“我们也许可以说，柏林危机已经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底结束了。”①

勃兰特作为西柏林市长，在西方政治家中自是最直接感受到东西方的紧张气氛的。对于“柏林墙”问题，起初他也许感到事态是严重的，他的处境和地位使他不能不立即作出强烈的反应；然而他又认为修筑“柏林墙”可能是防止东柏林公民自由外流的成份居多，并不一定想就此来改变西柏林的地位。所以，勃兰特一方面提出抗议，举行群众集会，致函肯尼迪呼吁支持，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发生的事情——连同各种有关联的国际因素——也给他一些极重要的启发。他自问：“是否可以用把想象力和善良愿望、灵活性和坚定性结合起来的办法使局势朝好的方向变化呢？”他开始怀疑：在联邦德国从来没有受到过“挑战”的重新统一政策的“有效性”，现在是否还能成立呢？②这可算是提出了一个“突破性”的问题，不仅到那时为止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不曾这样考虑过问题，而且社会民主党也还没有对重新统一问题提出过质疑。到年底，勃兰特得出了结论：“目前的重新统一政策已经失败了。”③勃兰特需要探索新的途径、新的政策。

半年后，勃兰特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社会民主党科隆代表会议上讲了这样一段话：“联邦德国首先必须去掉试图在东西方冲突中渔利的污点。事实上，紧张局势的缓和——虽然似乎极其困难——对于实现我们的自决却是最重要的条件，德国的分裂是希特勒主义的结果，是东西方冲突造成的。因此，重新统一只有同东西方关系的改变联系起来才能够有现实意义。我们应当为了和平和我们民族的命运促进这一改变的实现。那种把东西方

① 让·巴普蒂斯·杜罗塞尔：《外交史》下册，中译本，第236页。
② 维利·勃兰特：《人民和政治，1960年到1975年》，第27页。
③ 维利·勃兰特：《人民和政治，1960年到1975年》，第41页。

关系固定下来，使之一成不变的作法，能对谁有利呢？”①

这段话对于理解勃兰特的思想发展颇为重要。当东西双方都正在试图从战后“冷战”局面中走出来的时候，位于东西之交的、分裂的德国将何以自处，在勃兰特的议事日程中正在成为思索中的大问题——勃兰特愈来愈觉得，联邦德国战后以来一直坚持把重新统一放在首位的立场应当加以修改，联邦德国同它以东的国家的关系应该重新研究；勃兰特认为，德国的前途同它所处的变化中的国际环境已经牢牢地交织在一起，需要通盘地进行思考。

（二）关于“小步子”政策

一九六二年十月，勃兰特访问美国时在哈佛大学发表了两次演说。他着重说，德国已经成为“一种角逐的场地”，“在那里，正在检验着大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和准备以合理方式和可以接受的共处观念来解决困难的国际问题。”他说，柏林事件表明，“精神投降”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要在人类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间找到协调之道，那就应该“把人类利益摆在民族利益的前面”。②

新东方政策的设计者之一埃贡·巴尔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五日在图青神学院演讲中提到了两个著名观点，一个是“通过接近实现转变”（Wandel durch Annäherung），另一个是“小步子”政策。③这两个观点基本上概括了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精髓。这意思就是在东西方关系和两个德国的关系上，通过相互接触、交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科隆代表会议（1962年5月26日至30日）文件汇编》，波恩，第80—81页。

② 大卫·宾德：《另一个德国人，维利·勃兰特的一生和时代》，第199—200页。

③ 大卫·宾德：《另一个德国人，维利·兰勃特的一生和时代》，第199—200页。

流、对话，增进了解，使紧张的关系得到缓和；由于双方的僵持状态已非常严重，所以要从具体的事情做起，一步一步地推动缓和的进程。在此之前，即五月间，勃兰特在斯德哥尔摩参加西北欧六国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会议时，曾经就这个想法同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交换过意见。

勃兰特的“小步子”政策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卡尔斯鲁什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提得更明确了。勃兰特说，从“小步子”做起，就是先在一些容易办到的事情上推动两个德国的相互接近，例如为两个德国的居民相互来往提供方便条件，开展同东欧国家的贸易等等，而不是企图一下子解决什么大问题，这样就可以使“事情变得更容易些”，使事情“一步一步地发生变化”，“人们也许会说，这些都无非是些小的步骤。我回答说：我当然更愿意迈出大的步子，但是小步骤总比没有任何步骤要好得多。”① 勃兰特希望积无数的“小步子”为“大步子”，终归有一天可以“为某种形式的（对德）和约铺平道路，从而打开通向德国重新统一的大道”。②

对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勃兰特主张，已经同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建立起来的贸易关系应该继续下去，而且“（联邦德国）同东欧邻国的关系，应该尽可能地正常化”③ 即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一九六六年对于勃兰特本人、也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有三件重要的事必须提及：

第一，六月社会民主党在多特蒙德举行代表大会，在这次会上，勃兰特提出，他主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和华沙条约的成员国举行会晤；同时在德国问题上提出了“不能绕过欧洲”的有名论点，他说可以考虑“（德国）两部分实行适当的、有监

① 《德国社民党1964年代表大会会议文件汇编》，第149—150页。
② 维利·勃兰特：《人民和政治，1960年到1975年》，第100页。
③ 维利·勃兰特：《人民和政治，1970年到1975年》，第111页。

暂的和临时的共处”，这种共处形式的后盾是“积极进一步解决问题的坚定决心”。①

第二，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德国的统一社会党曾准备举行一次两党发言人的互访活动。这是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从一九五一年起每年都提出的建议，社会民主党一直没有响应。这一年两党达成协议决定两党发言人互访。但是后来因为艾哈德政府提出民主德国方面的代表需持联邦德国特发的“通行证”来联邦德国，结果这项活动未能举行。虽然如此，但毕竟说明，双方的态度都在变化。

勃兰特在本来约定该到民主德国马克思城访问的七月十四日在波恩电台发表讲话，其中有这样几句话：“我们正在经历东西方强权集团的变化和东西方关系的新发展，西欧和东欧都在摆脱阵线僵化的状态。这一进程不可能绕过德国。我们不应该被别人排除在外，我们自己也不能置身事外。德国需要松动内部的僵化状态，这就是问题所在……在这条缓解和和缓的通路上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德国为进一步巩固和平所作出的贡献。”②

欧洲问题不能绕过德国。至此，勃兰特把德国的重新统一问题同总的国际形势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新东方政策另一设计者赫伯特·魏纳也在同一天在波恩电台讲了话，他说：“双方都将受到历史的裁判，要么做好人间一切可能做的每一件事，要么在分裂的德国里终于没有找到有利于人民的肩并肩生活的方式……我们直率地说，我们准备而且也能够努力使德国人民找到和平，用不着事先要求共产党人不当共产党人。正象维利·勃兰特说的，这是一项适用于德国内部和德国周围的和平政策。”③

① 维利·勃兰特：《人民和政治，1960年到1975年》，第111页。
② 维利·勃兰特：《人民和政治，1960年到1975年》，第113页。
③ 大卫·宾德：《另一个德国人，维利·勃兰特的一生和时代》英文版，第214—215页。

第三，最重要的是，这一年的十二月，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组成了大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在战后二十一年后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基民盟的基辛格出任联邦政府总理，勃兰特出任联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这在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是重要的，勃兰特构想中的德国政策和对外政策，在大联合政府中"小步子"地试行了。

"小步子"地同东方来往是必然趋势，然而也只能是"小步子"，勃兰特还需要一些时间把"仍然有效的哈尔斯坦学说的棱角磨圆"。在大联合政府中任全德事务部长的是赫伯特·魏纳，直接负责两个德国之间的事务，这无疑对勃兰特大有帮助。联邦总理基辛格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表示愿意"摆脱僵持局面，而不是强化僵持局面；填补鸿沟，而不是加深鸿沟"。①

一九六八年三月，社会民主党在纽伦堡召开代表大会。美国侵越战争的升级成为大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年轻的代表们强烈要求美国终止侵略越南的战争。这样的运动从美国卷入越战之日起，在美国、在西北欧就没有间断过，是促进西欧对美产生"离心倾向"的重要因素，它对于正处于政策调整中的联邦德国来说，自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因素。

勃兰特在纽伦堡大会上阐述新东方政策时特别提到了奥得-尼斯线问题。他说：奥得-尼斯地区有百分之四十的波兰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生的，谁也不能象战争爆发后把九百万德国人赶走那样，把他们也赶出去。勃兰特还说，进一步的现实是：由于德国人民还不知道将在何时才能根据一项和约实现如同一个国家那样的统一，他们自然希望、并且需要先与波兰和解。于是结论就是：在达成一项和约安排之前先承认——即尊重——奥得-尼斯线。②勃兰特第一次闯进了联邦德国坚持了近二十年的"禁

---

① 大卫·宾德：《另一个德国人，维利·勃兰特的一生和时代》英文版，第276页。

② 《德国社民党纽伦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10—111页。

区”，触及了同东欧——首先是波兰——改善关系的关键问题。二十多年来的立场一直是：在签订一项和约以前，联邦德国绝不承认这条奥得-尼斯线是同波兰的边界线，这个立场在一星期前基辛格还重申过；而此时勃兰特的立场则正好相反，主张在和约签订之前就应承认这条边界线。

勃兰特在纽伦堡会议上表示的这一立场，在同苏联和东欧发展关系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姿态。

然而要把一种新的政策思想变为实际行动，往往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除了主观上的因素之外，还不能不受到许多外界因素的制约。联邦德国虽然与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重建了外交关系，但同其它东欧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条件还没有具备。

在这期间曾短暂地影响联邦德国推行新东方政策的重大国际因素，是一九六八年八月的苏联军队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而入侵又是在华沙条约的旗号下进行的。这件事在一个时期内在国际上产生了相当大的震动。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侵捷事件并没有对于正在起步的东西方缓和势头，起逆时针方向的作用。事件过去两周以后，苏联驻联邦德国大使查拉普金受命拜会基辛格总理，重申苏联愿继续促进两国关系之意。

新东方政策的步伐迟疑了片刻，又接着上路了。勃兰特说，捷克事件不应干扰和缓的进程。还在捷克事件发生之前，西方已在流传和评述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的消息，勃兰特在七月三十一日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现在对布拉格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什么也不要去做……我们不过是见证人和观察员，此外，什么也不是。”①事件发生后，他在九月三日去日内瓦参加欧洲非核国家会议时说，捷克发生的事情诚然对于西德和其它国家旨在建立“一个欧洲和缓区”所作的努力，是“当头一棒”，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准备为建立一个和平睦邻的欧洲地区而努

① 大卫·宾德，《另一个德国人，维利·勃兰特的一生和时代》，第240页。

力”。[1]第二年年初，勃兰特在他的近著《在欧洲和平政策》法文版前言中写道，虽然捷克事件产生了“地震般”的影响，但是，“并未引起集团间的极度强硬化”。[2]勃兰特认为：“集团倾向的重新发展仍不能排除，但是我们不应把它看作是我们的东方政策的终结。”[3]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德国，分裂成两个主权国家，是德意志民族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最基本的特征。同时，作为西方联盟一员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无法视而不见或摆脱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的争夺。到六十年代，联邦德国已不是联盟中的小伙伴了，它为了自身的安全利益，需要一个适应自己独特处境的“东方政策”和“西方政策”。

（三）“新东方政策”的形成

勃兰特在大联合政府中出任副总理和外交部长时，使他的新东方政策在构想中起步；到一九六九年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组阁、社民党成为主要执政党时，新东方政策的构想便完成了。新东方政策从零起步阶段过渡到迅速发展阶段，到这时已不能再说是“小步子”了。联邦德国的对外政策起了根本的变化，联邦德国的对外关系出现了新局面。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勃兰特作为社民党和自民党联合组阁的总理，向联邦议会发表了第一篇讲话，也就是就职演说。他说，“延续和更新”并不一定是两个相互排斥的概念，可以寓“变革”于“守成”之中。勃兰特并不全盘否定过去的政策，而是要在新的条件下创新。

勃兰特说：“我们决心捍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安全和德意

---

[1] 大卫·宾德：《另一个德国人，维利·勃兰特的一生和时代》，第241页。
[2] 大卫·宾德：《另一个德国人，维利·勃兰特的生平和时代》，第241页。
[3] 维利·勃兰特《人民与政策，1960年到1975年》，第228页。

志民族的凝聚力，维护和平并参与寻求某种欧洲和平的安排，扩大我国人民的自由和福利，使我国得到发展，使它的地位在明天的世界里得到承认和确立。”①

他说：“在对外政策方面，我的政府纲领是以以下的简单认识作为出发点的。即：只有和平才能使我们的世界得到安宁，和平只有得到安全的支撑才能传播开去。联邦政府既理解它在欧洲的特殊责任，但又意识到它的局限性，它愿竭尽全力实现这个目标。”

勃兰特强调他的和平政策同联邦德国的西方立场是一致的。他说：“我们强调指出：我们的政策与北大西洋联盟是一致的……它（北大西洋联盟）的坚强团结，对我们致力于实现欧洲缓和的集体努力是一项必不可少的保证。”“我们特别重视同美国的密切关系，确信美国对欧洲、对联邦共和国和西柏林所承担义务的不可移易性。”

在勃兰特的对外政策中，欧洲问题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西欧联合问题上……假如要使欧洲不损害自己的话，欧洲各国的合作就必须把英国人包括在内……这就是说应该努力实现这样一种局面：使共同体同那些不愿意或不可能参加进来的欧洲国家，发展一些新形式的经济合作。我们愿意推动和发展欧洲的密切政治合作，其目的在于在解决国际事务中一步一步地促进一种集体安排。”

关于东西方关系问题，勃兰特说：“我们的民族利益不允许我们站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我们的国家需要同西方保持合作和协议的关系，需要同东方实现某种谅解。在这种背景下，我着重强调，德国人民需要和平，确切地说，需要同苏联以及东欧各国人民和平相处。”②

上面引的一些话，从篇幅上看，主要部分是重申联邦德国属

① 维利·勃兰特：《人民和政治，1960年到1975年》，第231页。

② 维利·勃兰特，《人民和政治，1960年到1975年》，第236—237页。

于西方这一固有观念，这该是属于勃兰特所说的"延续"和"守成"这个范畴的；而联系到勃兰特前此的言论和活动，更引人注目的却是两个德国的关系和同苏联、东欧的关系那几句话，这是属于"更新"和"变革"这一层意思的。

在德国问题上，勃兰特的政策构想也比以前更充分了："本政府的工作是依据如下的设想而进行的——对德国人民来说起因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希特勒政权的民族出卖而产生的（德国）问题，只能在一项欧洲的和平安排中得到最后解答，然而，谁也不能使我们偏离我们的信念，德国人比无论哪国人民也不能少有一点自决的权利。未来的最近几年中，我们实际的政治努力的目的，将是通过和缓德国两部分的关系来维护民族团结，使之摆脱目前的僵持状态。德国人不仅因共同的语言和历史——包括光辉的史绩和苦难的岁月——联结在一起，我们都是在德国安家的；而且我们还有共同的任务和责任，即保障我们当中的和平和欧洲的和平。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年以来，我们必须防止两部分德意志民族的任何进一步离异——努力实现一种正常的共处条件，并由此进而实现合作关系。这不单纯是德国利益所系，对于在欧洲的和平以及东西方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②

德国问题在勃兰特的构想中是一个特殊问题，它是新东方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又不完全属于对外政策的范畴。德国问题是德意志民族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问题；但勃兰特的德国政策，必然地同勃兰特的欧洲政策联在一起。勃兰特的德国政策包括以下三个基本点：

（一）勃兰特在就职演说中第一次正式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地位，不再象以往那样贬称为"德国的东半区"、"苏联占领区"等等。但勃兰特既承认两个德国的现实，又说不存在对

---

① 维利·勃兰特 《人民和政治，1960年到1975年》，第237页。

民主德国的“国际承认”问题。②

（二）勃兰特认为，两个德国的同时存在，并不否定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和历史、对欧洲有共同目标和责任的民族。因此，在还没有实现重新统一之前，两个德国的关系应该先松动起来并加以增进。

（三）与欧洲局势的发展联系起来看，德国问题只能在“一项欧洲的和平安排”中解决，排除了把重新统一问题放在欧洲和平与安全体系之前的可能。因为在欧洲处于分裂的情况下，两个德国的统一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说，两德关系的松动有赖于欧洲局势的缓和。

关于同民主德国以东的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勃兰特决定彻底冲破哈尔斯坦学说的束缚，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同苏联的关系，同东欧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在这方面需多费些周折的是同苏联、波兰的关系。联邦德国同苏联是在一九五五年建立外交关系的，这在当时是哈尔斯坦学说的唯一例外。为什么把德苏关系作为例外来处理呢？阿登纳曾解释说：“丝毫不能怀疑，苏联和我们之间存在的矛盾并没有因为外交关系的建立而减少。但是我们已开辟了一条道路，使我们也许能利用这个或那个机会，在同苏俄的直接谈判中施加影响。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拒绝建立外交关系的话，那和苏俄的关系就会更加恶化。”① 在五十年代中期东西方已露出一点和缓的苗头时，联邦德国在同东方毫无来往的情况下把同苏联的关系例外对待，这本身就说明联邦德国同东方隔绝的状态是不可能持续不变的。但是，阿登纳牢牢守住这一步，坚持同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不依此办理。以后的步子是很小很小的，其中有阿登纳个人因素在起作用，但是在大国关系上还没有迈出较大的步子之前，联邦德国的主动性总是受到限制的。

---

① 《纪事年鉴——1969》，第29卷，第692页F1。

② 《阿登纳回忆录》（二），中文版，第659页。

到勃兰特时期，形势已大不相同了。同东欧的关系积累了不少“小步子”。重要的是，东西方都在积极试探接触的途径。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已开其端，在“柏林墙”事件上，美国显然不打算为西柏林付出比维持现状更多的代价。据勃兰特回忆，早在一九五九年，杜勒斯就曾经说过，同苏联谈判是不可避免的，应该朝这个方向作些事情。勃兰特感到：“他（杜勒斯）的强硬学说已经软化为某种灵活政策的开端了”。杜勒斯曾冷冷地对勃兰特说，例行公式地要求“自由选举”不会有什么结果。当勃兰特提出德国是否可以取得某种特殊地位时，杜勒斯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和俄国人可以有一千件事情谈不到一起，但是在一点上我们之间却没有分歧，即我们决不允许一个重新统一的和重新武装的德国在东西之间的无人地带游荡。”杜勒斯明确说，无论他本人如何反共，他和美国都不会为德国去下赌注。① 美苏都决心把德国分裂状态保持下去，这已是心照不宣的了；但杜勒斯对一个联邦德国政治家直统统把问题说破，对勃兰特不能不产生格外深刻的印象。

在西欧也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戴高乐在一九五八年重新上台后便立即向美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领导提出了挑战，同时向苏联、东欧实行缓和和合作的政策，在西欧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勃兰特关于新东方政策的讲话，对于东西方关系也起了促进作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布鲁塞尔外长会议发表声明，支持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呼吁苏联就柏林局势问题进行谈判。十月三十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凯尔·斯图尔特在下院说，他欢迎华沙条约国家今年三月十七日布达佩斯会议关于“与其它国家人民建立和平和睦邻关系”和召开欧洲安全会议的建议。② 十月三十一日，

---

① 维利·勃兰特：《人民和政治，1960年到1975年》，第79页。
② 《纪事年鉴——1969》，第29卷，第160页C3。

华沙条约成员国在布拉格举行会议，重提于一九七〇年上半年在赫尔辛基举行全欧和平与安全会议的建议；会议的联合声明还提出，在欧洲国家中应该“放弃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建议欧洲国家之间扩大经济、科技交流。①

在这样的气氛里，德苏关系迈出了实际的步子。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莫斯科同联邦德国驻苏大使赫尔穆特·阿拉尔德就不使用武力威胁问题举行了会谈。第二年一月，勃兰特派埃贡—巴尔为特使去莫斯科，就两国关系进一步正常化问题进行磋商；派国务秘书乔治·费迪南·杜克维茨前往波兰。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签字，这是勃兰特就任联邦总理以来全面推行新东方政策的第一个成果。勃兰特和外交部长谢尔在克里姆林宫同柯西金和葛罗米柯在条约上签了字。签定这个条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为联邦德国进一步开展同东欧各国的关系廓清了道路，这个条约的一些基本点甚至为五年后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合作和安全会议准备了基调。

苏德条约最重要的是第三条和第四条。第三条说，联邦德国和苏联“一致认为，只有在任何人都不破坏现有边界的情况下，欧洲的和平才能够维持。”两国“保证不受限制地尊重欧洲所有国家在其现有国界内的领土完整”，认为，“欧洲所有国家的边界都象它们在签订条约之日那样具有不可侵犯性，这些边界包括构成波兰人民共和国西部边界的奥得-尼斯线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边界。”第四条说，两国签订这个条约，“不影响它们以前签订的任何双边或多边条约或协定。”②用一句简单的话讲出这两条的实质，那就是，首先在苏德两国以条约的形式把“雅尔塔格局”确定下来，相互保证不触动它，即

① 《纪事年鉴——1969》，第39卷，第710页A2。

② 《国际条约集，(1968—1971)》，中文版，第420—421页。

确认了两个军事条约的共处。

如此说来，是承认了对峙状态，何言缓和呢？其实，这样的相互承认在"冷战"势头正盛时就已存在，只不过那时所取的形式是两个集团间的尖锐对立；而现在则更多地表现为相互容忍了。

苏德条约签字后，勃兰特首先需要取得美国的谅解。美国的反应如何呢？

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在苏德条约签字后马上说，希望这个条约"成为将引向改善欧洲局势进程的第一步"，希望这个条约能推动柏林局势问题的解决。①

这是美国方面公开表示出来的态度，然而，正在向东方寻求和缓途径的美国，对于联邦德国做同样的事情，却并不完全释然。勃兰特一九七〇年四月在同当时任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的亨利·基辛格举行会谈以后曾记下这样的印象："基辛格对于我们的东方政策有着强烈的兴趣，但是并不是没有一点怀疑。"②基辛格的自述可以佐证勃兰特的印象。基辛格说，他感到当苏联正在通过所谓"有选择的缓和"来孤立美国的时候，是从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看到了"施展这种策略的缺口"的。基辛格认为，"除非我们设法对这个过程取得某种控制，勃兰特在完成德国这一新政策的目标方面将越来越依靠苏联及其善意。"

但是，基辛格同时又感到，勃兰特推行新东方政策是势不可免的。基辛格二月十六日写给尼克松的信中说："应当记住，早在五十年代，不仅舒马赫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内，而且传统上醉心于东方、梦想德国成为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桥梁'的保守派中都有许多德国人反对波恩同西方制度结合，理由是这样做将使德国永远分裂，再也不能在东方起积极作用。关于德国基本立场的这

---

① 《纪事年鉴——1970》，第585页F2。

② 维利·勃兰特：《人民与政治，1960年到1975年》，第284页。

种辩论很可能以更加造成不和的形式重新出现，不仅使德国国内矛盾尖锐化，而且使德国的西方朋友怀疑它作为一个伙伴是否可靠。”

基辛格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能阻挠勃兰特推行新东方政策，公开表态时应该支持它，“附合”它，“虽不热心，但也不乏信心”，并努力把它“导入建设性的方向”，把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我们给予勃兰特的任何支持应仅限于一般地赞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东方改善关系——而不要对它的具体行动表示赞同。”①

怎样的“一定的范围”呢？

首先是，联邦德国要“保持基本上是亲西方的政策”，在处理同民主德国的关系、承认奥得-尼斯线等问题上，美国表示理解。②第二，勃兰特要把柏林问题同与苏联谈判签定条约问题捆在一起，把苏联保证西方国家在西柏林的地位当作一种条件，向苏联施加压力；同时又通过苏德条约的谈判推动正在酝酿当中的四国柏林协议会谈。在基辛格看来，当勃兰特推行新东方政策，并着手就两个德国的关系问题进行试探接触的时候，西方更需要有一项柏林协定。

对于美国的疑虑，勃兰特是心中有数的。他在苏德条约谈判正在进行当中访问了美国，同尼克松、基辛格会谈，用意也正在于取得美国的谅解，让美国放心联邦德国不会离开西方。会谈后，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齐格勒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尼克松总统认为会谈“是很有价值的，很有建设性和很圆满的”。根据国际合众社四月十二日从波恩发出的一条消息，尼克松曾向勃兰特保证，美国不会同苏联达成任何损害西德利益的协定；勃兰特也保证西德不会同苏联、波兰或其它东欧国家达成任何有损于西方联

① 《基辛格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译本，第2册，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23—125页。

② 《基辛格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译本，第2册，第124页。

盟的协定。①

勃兰特一九七一年六月访问美国时，仍发现象艾奇逊、克莱、麦克洛伊等战后初期的老政治家们还是相当信不过新东方政策，艾奇逊用“向莫斯科的发狂般的赛跑”来比喻同苏联的接近。在国防部和国务院里也不乏有人持保留意见。勃兰特说：“有人断言，亨利·基辛格当面表示赞成，背后却说的另一套……”②

勃兰特这次访问美国，除正式会谈外，在华盛顿和纽约各作了一次演讲，反复解释新东方政策的实质，这样做自然是有的放矢的。

第一次演讲是六月十五日在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发表的。他特别强调了新东方政策是西方联盟共同设想的一部分：“它是从现实的形势出发的。这一政策向东方宣布放弃武力，这是我们早在一九五五年向西方宣布放弃武力之后的事情。它是我们的西方条约的逻辑补充。再者，我们的政策承担了任何人都不能代替德国人去完成的任务。谁害怕联盟会因此而受到损害，甚至认为可能导致联盟的倒退，而苏联却可以乘机把影响扩展到莱茵河畔，那他就错了，他应该能够高高兴兴地承认错误。”③

两天后他应纽约的美国德国问题委员会的邀请发表演说，麦克洛伊、克莱等对新东方政策持怀疑态度的人都在场，他们向勃兰特提问道，新东方政策是不是走得太远了。勃兰特讲了两点意见：第一，战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东西方都需要保持力量平衡，目前联邦德国所作的并不是同其它西方国家的“一种竞争”，而是如在威尔逊国际中心所说的，是对西方盟国战略思想的“补充和继续”，目的是“对东西方缓和作出德国应有的贡

① 《纪事年鉴——1970》，第30卷，第238页A3。
② 维利·勃兰特：《人民与政治，1960年到1975年》，第288页。
③ 维利·勃兰特：《人民和政治，1960年到1975年》，第290—291页。

献”。意思是说，联邦德国向东方推行缓和政策并不违背美国从肯尼迪已率先采取的缓和进程，因此，“就某种意义上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现在同东欧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无非是做了它的盟国早已完成了的事”。第二，勃兰特指出，德国的处境是很特殊的，“德国民族分裂的克服，最终需赖欧洲分裂的克服”，这道“用世界政治水泥砌起来的墙”在欧洲一分为二的条件下是拆除不了的，“德国成为一个整体取决于东西方和欧洲各个部分的未来发展……德国人今天生活在两个国家里，这是违反我们的心愿的，但这是一个现实”。所以联邦德国实行新东方政策，目的就是“要竭尽可能，使欧洲各国相互接近、共处和友好”。[①]

以上比较冗长地叙述了勃兰特花大力气争取美国谅解的过程，表明勃兰特迈出这一步必然牵动同美国的关系。然而，苏德条约的签定毕竟标志着新东方政策，已不仅仅是理论，也不仅仅是些“小步子”，而是已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政策行动了。它对于联邦德国在对外关系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在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中，除了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是第一位的问题外，与波兰改善关系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波德关系在中欧历史上一直十分尖锐，十八世纪波兰三次被瓜分，普鲁士都是主谋之一；俾斯麦统一德国后，波兰受到直接的威胁和压迫；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波兰都是直接的受害者。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兰是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的第一个牺牲者，它在被占领期间所受到的镇压、屠杀、摧残，是令人发指的。所以，波德关系如何，是涉及两个毗邻民族相互关系以及中欧局势的重大问题。

战后遗留下来的波德关系中争端，最重要的是边界问题，即联邦德国是否接受奥得-尼斯线问题。奥得-尼斯线之成为波德交界线，见诸于波茨坦会议协定，是大国谈判的结论。但是联邦

---

① 维利·勃兰特：《人民和政治，1960年到1975年》，第295—296页。

德国从阿登纳起一直是不承认的。勃兰特在任外交部长时表示要接受这条线，但并没有成为大联合政府的立场。而联邦德国一天不接受奥得-尼斯线，波德边界就总是悬案，也就不可能使波兰放心。承认这条线，对于联邦德国来说，自然意味着重大让步，但是如果不让这一步，新东方政策这篇文章就做不下去。而且，从战争结束以来，波兰一直根据波茨坦协定行使领土主权；继续不接受奥得-尼斯线，在事实上已没有任何意义。勃兰特看到了这一点，从六十年代中期就为承认这条线准备条件，提出要尊重战后欧洲各国的主权、边界现状和领土完整，并把它作为联邦德国对外政策的原则。[1]至苏德条约的签订，表明联邦德国终于以法律形式正式接受了奥得-尼斯线。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七日，苏德条约签字三个月以后，勃兰特在华沙同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理西伦凯维茨签订了《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的协定》。协定的第一条在关于边界线问题上的规定是这样写的：双方同意，"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波茨坦会议的决议第九章确定的现有边界，即从紧接什维诺乌伊什切以西的波罗的海起沿奥得河至同劳齐茨·尼斯河的汇合点，再沿劳齐茨·尼斯河到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为波兰人民共和国的西部边界"。双方确认，"两国现有的边界，在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侵犯的，并保证无条件地尊重彼此的领土完整"，宣布"彼此对对方没有任何领土要求，今后也不提这类要求"。[2]

勃兰特在签字以前到华沙无名烈士墓和华沙犹太区各献了一支花圈。华沙犹太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希特勒夷为一片废土，希姆莱于一九四二年在这里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五十万犹太人被害。勃兰特来到这里，在冰凉的地上下跪志哀。勃兰

---

[1] 赫尔穆特·施密特：《实力均衡——德国的和平政策和超级大国》，伦敦，1969年出版，第203页。

[2] 《国际条约集》（1969—1971），第458页。

特这个举动曾一时成为轰动新闻界的花絮，且为一千年来两个对立民族实现和解的象征，寓有政治深意。勃兰特说："我们正处于一种重新谅解的开端。"

波德协定签字后，勃兰特在一次广播讲话中说："我认为这是一次困难的旅行。这对于和平的未来是很有意义的。华沙条约（指波德协定）终于结束了充满痛楚和牺牲的罪恶历史，在两国和两个民族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分裂的家庭再次团聚打开道路，使边界不象以往那样是相互分裂的因素……。"①

苏德条约和波德协定推动了四国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而柏林问题如果达不成协议，两个条约就不能在联邦德国的议会上批准。

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苏美英法四国达成了关于柏林问题的协定。东西双方对于这个战后形成的奇怪现象取得了妥协：西柏林既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保持密切联系，又不是联邦德国的组成部分。

柏林协定的签订和生效，也推动了东西德的谈判，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两个德国签订了两国的基础条约。一年后，勃兰特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理斯特诺加尔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日在布拉格签署了捷德条约。不久，联邦德国分别与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发表了建交公报。

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从"柏林墙"事件以后开始酝酿，经过十多年，到七〇年代初终于结出果实，联邦德国同东方的隔绝状态从此宣告结束。

（四）缓和、均势、联盟——"新东方政策"的支点

"新东方政策"从它形成以来，引起的评论是很多的。西方

① 《纪事年鉴——1970》，第30卷，第881页D2。

不少政治家由于西德处于最靠近东欧的关键地区，时隐时现地担心它的新东方政策“走过了头”。时至一九八二年，《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还在说：“华盛顿、伦敦和巴黎也一样，很久以来便认为，战后的政治秩序需要分裂的德国的西半部与北约组织结合在一起，这样就可以既防止西德单方面重新武装，也可以防止出现一个向莫斯科寻求自己的安排的中立主义西德。”①西方从六十年代以来到处都有同东方缓和的呼声，并且作了这样的努力，然而对于联邦德国同东欧的关系却相当敏感。

勃兰特在酝酿和制定新东方政策时，是得到戴高乐和蓬皮杜的支持的。然而，勃兰特记录下来的他同蓬皮杜的谈话，却别有弦外之音。一九七三年六月，蓬皮杜在波恩向勃兰特提出了如何看待德国前途问题。蓬皮杜说他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对法国说来，关系甚大，他要求勃兰特谈谈根据新东方政策怎样想象德国的未来。勃兰特回答说，德国问题是不可能单独得到解决的；为了改善由分裂造成的局面，首先要使两部分的紧张关系得到和缓，所以这就要把欧洲和平的概念置于民族国家概念之前。勃兰特希望蓬皮杜“信任联邦共和国的政治领导”，联邦德国不会“偏离欧洲方向”。他说：“总统不必先入为主地推测联邦共和国是否会采取骑墙政策，即使已有人提出种种引喻。”蓬皮杜索性提出了最敏感的所谓“中欧中立化”问题，说：“实现欧洲的中立化，就算是非武装的中立化，凡能导致中欧中立化的任何因素，都肯定使法国感到不安。”蓬皮杜还说，苏联多年来的对外政策追求的目标就是使“中欧中立化”。勃兰特认为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时正在进行的共同均衡裁军会议的步子不可能迈得很大，尼克松也不会同意用一个德国师去“抵销”一个捷克师或一个波兰师。勃兰特向蓬皮杜保证说，联邦德国将象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所强调的那样，实行“安全等于防

① 詹姆斯·昌斯：《西德中立主义是可能的么？》，1982年11月28日《纽约时报》。

卫加缓和”的口号。①

怎样理解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呢？它的基本点是什么呢？下面从新东方政策与缓和、新东方政策与均势、新东方政策与联盟等三个方面作些分析。

第一，新东方政策与缓和

曾对新东方政策的制定作出过贡献的著名记者彼得·本德尔在分析社会民主党新东方政策形成的基础时，写了这样一些话：“勃兰特和谢尔在一九七〇年庄严地确认了两个德国的现实和奥得-尼斯边界，这是同东方缔约政策的关键。为了使现实的局势得到缓和，必须要先承认现实；为了使东方至少部分地开放，就必须解除它的害怕的心理。”“这个基本条件仍然存在。谁如果对现状提出疑问，那就会破坏东方政策进一步发展的唯一基础。”“但是，保持现状还意味着更多的东西。自一九六六年以来所有各党都一致同意：走向德国的道路要通过全欧；只有本大陆通过缓和和合作的漫长过程克服了分裂，德国也许才能得到统一的机会。”②

所以，新东方政策要求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联邦德国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同东邻国家保持良好的正常关系。如果东西方关系持续紧张，特别是同苏联的关系持续紧张，西德就仍然摆脱不了战后初期那种僵持的、封闭的状态，在国际上的活动地盘便极其有限。因此，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首先是一项缓和政策。联邦德国同苏联以及同其它东欧国家签定的关于关系正常化的条约或协定中，都有“在有关欧洲和国际安全问题及相互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这样的文字。勃兰特对于华沙条约成员国提出的召开欧洲安全会议的建议，从一开始就是积极的。华沙条约国家部长会议在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提出召开有美国和加拿大参加

---

① 见维利·勃兰特：《人民和政治，1960年到1975年》，第269—271页。

② 彼得·本德尔：《继续奉行东方政策的七个原因》，1983年4月15日西德《时代》周刊。

的欧洲安全会议的建议，一周后勃兰特便在社会民主党美因兹会议上表示对此抱“乐观”态度。① 一九七一年九月，勃兰特应勃列日涅夫邀请到克里米亚访问，十八日发表的联合公报说，不久前签署的四国柏林协议将会“促进全欧会议的召开”，双方表示将分别同各自的盟国磋商，“以便推动会议的举行”。②

缓和本身并不是目的。新东方政策还有其长远的西方固有的战略考虑，即通过长时期的缓和进程悄悄地促进东欧的“和平演变”。这一点并不是新东方政策所特有的。但不能不看到新东方政策中也包含着这个因素。自由民主党领导人、联邦德国外交部长根舍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欧洲对东方的缓和政策，尤其是德国政策的中心要素，是在分裂的欧洲寻找和维持彼此相安无事的妥协办法——这种办法使东西方抛开在可预见的将来无法解决的根本冲突，在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长期目标的鸿沟上搭起对话和合作的桥梁。这样作的意图是在短期内减轻欧洲分裂的后果；从长期来说，在于促进东欧和苏联本身的演进过程，最终……在欧洲建立真正的和平秩序。”③

根舍的这些话说得十分明白，是用不着多加解释的。

第二，新东方政策与均势

根据新东方政策，缓和是建筑在东西方力量在欧洲的均势上面的。只有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条件下，新东方政策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彼得·本德尔说，“统一”、“缓和”和“均势”之间形成了“周而复始的规律”。他说：“统一以缓和为前提，缓和以军事和政治上的均势为前提。但正如三十年的发展所形成的那样，均势又是以德国的分裂为前提的。”④ 因此，如果没有均势，新

① 《纪事年鉴——1970》，第30卷，第461页E3。

② 《纪事年鉴——1970》，第31卷，第730页E3。

③ 根舍：《西方争取和平、自由和进步的全面战略》，1982年秋季美国《外交季刊》。

④ 彼得·本德尔：《继续奉行东方政策的七个原因》，1983年4月15日西德《时代》周刊。

东方政策的内容可能不是目前的样子。

勃兰特在谈到联邦德国十分需要这种均势的时候说："这一政策（指北约的政策）是把军事上的均势、政治上的缓和和均衡裁军这三个观念结合在一起的。在德国，为这些目标而积极努力便是所谓和平政策。"①

施密特也说："从我国防务利益的观点来看，欧洲的军事均势将是我国安全所系的政治稳定之必要条件。"②因此，同东方缓和，绝不等于西方单方面从欧洲撤军，"西方单方裁减军队，就将从心理上和政治上为苏联增加对西欧和柏林的压力，打开大门。"③

更明确地说，所谓均势，说到底是美苏两国在欧洲的均势。"只有保持了两个超级大国卷入欧洲的均势，保持欧洲均势的任务才能完成。"勃兰特认为："必须努力缩减高水平的军备和双方的高水平部署，使之降低到低水平。"④

联邦德国从七〇年代起一直坚持的就是这种"低水平"均势的主张，这个原则适用于中欧均衡裁军问题，适用于常规武器问题，也适用于核裁军。缓和和均势互为辩证。

第三，新东方政策与联盟

勃兰特一九六九年就任联邦总理之前和之后，就曾一再声明联邦德国是属于西方联盟的。勃兰特在同肯尼迪、尼克松、威尔逊、希思、戴高乐和蓬皮杜等频繁会晤中，都不忘强调这一点。这固然有表白立场、使西方盟国放心的用意，但是，新东方政策归根到底只有立足于西方才有它的意义和价值。在对外关系中，与美国和其它西欧国家的同盟关系，从来是主要的。勃兰特说，

---

① 赫尔穆特·施密特：《实力均衡——德国的和平政策和超级大国》，第225页。
② 赫尔穆特·施密特：《实力均衡——德国的和平政策和超级大国》，第224页。
③ 赫尔穆特·施密特：《实力均衡——德国的和平政策和超级大国》，第225页。
④ 维利·勃兰特：《停止对于北约组织的失败主义的谈论》，1982年2月12日伦敦《泰晤士报》。

新东方政策"承认包括联盟（"联盟"这个字是复数的，实指北约和华约两个军事联盟）在内的现实"，不打算用武力改变它；而是要通过"协调（两个联盟的）利益"和促进"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合作"来"维护联盟中较小的成员国的独立性，以及压倒一切的安全利益"。① 承认现实，就是承认北约和华约的存在，新东方政策并不是非联盟的政策。

用施密特的话来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牢固地扎根于西方的——既属于大西洋联盟，也属于象西欧联盟和共同市场这样的欧洲机构。这些西方的联系是不容置疑的。"② 施密特进一步说，新东方政策并不与过去"断然决裂"，这个政策在六十年中期艾哈德政府发出"和平照会"时已见端倪；在大联合政府时期又有发展，至勃兰特社民党政府乃底于成。新东方政策也不与西方联盟"绝裂"，而是要试图克服过去那种"无谓的对峙"，联邦德国仍是五四年巴黎协定的签字国，如勃兰特说过的：联邦德国不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徘徊者"，新东方政策的目的在于探索在那些方面可以同东方达成"妥协和和解"。③

新东方政策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之交有了完整的意义，也反映了德美关系的十分有意义的变化。其中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事实是，二十多年来，联邦德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成为在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德国马克在一九六九年因浮动而增值，成为西方最坚挺的货币，与每下愈况的美元地位形成鲜明对应。而且在军事上，联邦德国虽然无权生产核武器，但它的常规军备是发达的；由于法国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西德在北

① 维利·勃兰特：《停止对于北约组织的失败主义的谈论》，1982年2月12日伦敦《泰晤士报》。

② 赫尔穆特·施密特：《政治问题透视》，威斯特威尤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③ 赫尔穆特·施密特：《政治问题透视》，威斯特威尤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8页。

约中的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经济巨人”要求改变“政治矮子”的处境是必然的。新东方政策既“扎根于西方”，又自主地发展同苏联、东欧的关系，正是政治上取独立姿态的重要反映。如果认为，既然结盟，就不能独立；既然独立，就不能结盟，这样的理解就失之胶柱鼓瑟了。

此外，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还应特别提到对新东方政策有不容忽视的影响的和平运动。和平运动在战争结束以后就有，它反映了人民对大国争夺的不满，要求实现普遍裁军、维护民族独立、争取和捍卫世界和平；到六十年代针对美国侵越战争而有新的发展；从七十年代后期起，则围绕着欧洲中程导弹问题开展了声势更为浩大的示威，卷进了愈来愈广泛的阶层。由于西德所处的特殊地理地位，西德的和平运动尤其引人注目。后来发展成为“绿党”的生态主义者曾是主要力量，从反对美国核部署会造成危害生态环境的恶果开始，运动愈发展，政治性愈强，范围愈广泛，很快把反对战争、反对军事集团、反对核武器的人包括进来，反对污染、失业、对现有社会抱有不满情绪的人也包括进来了，形成了一个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倾向的非常广泛的社会运动和群众运动。

运动的发展受到了“绿党”的大力支持，也受到社会民主党左翼的支持。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团副领袖沃尔夫冈·罗特说：“人们害怕，如果在东西方之间发生任何军事对抗，与苏联集团接壤的德国便将成为第一个战场，年轻人越来越反对我们的传统的北约防务政策。一种不忘二十年代的感情用事和理想主义的情绪正在复活。”① 在和平运动的范围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如：中欧非核区、一切外国军队从两个德国撤走、两个德国分别从华约和北约撤出，等等。埃贡·巴尔还提出过两个德国成为一个既不属北约也不属华约的中立的“无核区”的设想。② 英

①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1983年12月19日，第31页。
②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1983年12月19日，第32页。

国《经济学家》一篇评论说，这个运动"酷似五十年代社会民主党的'民族中立主义'的复活（指社会民主党在五十年代初曾主张联邦德国不参加北约等集团的联盟，在五十年代后期已有改变）。"① 这个评论虽然未必精当，但却指出了这一群众运动强烈要求使联盟德国免受大国争夺的一般倾向。

对于和平运动，这里不可能作深入研究，但是应当看到和平运动的持续性和它在社会上产生的强大冲击波，不可能不对决策者产生影响，而坚定联邦德国的决策者执行对东方的缓和政策的决心，更加推动联邦德国争取低水平均衡的努力。联邦德国在对美、对苏政策上，都不能忽视和平运动的存在。

总之，新东方政策与战后国际形势的演变和本国国际地位的变化是相适应的，是联邦德国战后历史发展中必然的产物。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提及，新东方政策的三个基点——缓和、均势和联盟——归结到一个出发点，那就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自身利益。新东方政策从萌发起，经历了几届政府，都证明，只有把缓和、均势和联盟三者结合得很好，才能为联邦德国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

（五）从总趋势看政策的延续性

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孕育于六十年代，结实于七十年代初，并不是偶然的。局势的发展虽然时紧时松，但是总的趋势是要寻求对话，寻求缓和。美苏关系最难缓和，但东方的对话还是从美苏作出姿态开始。莫斯科三国条约以后，接着是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不扩散核武器的谈判以及中欧均衡裁军谈判、欧洲安全会议问题。虽然，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和苏联武侵装占捷克事件，在国际社会上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但是都逆转不了东西方

① 英国《经济学家》，1961年11月21—27日，第61页。

"接近"的趋向。

国际形势的趋势如此，联邦德国的政策是不可能固守不变的。阿登纳到晚年已感到应该松动一下西德的对外关系。艾哈德政府和基辛格政府时期，同东欧的来往就已不同于阿登纳时期了，虽然基本方针还没有变。施密特曾经引用艾哈德政府任外长的施罗德一九六五年在基督教民主联盟代表大会上说的几句话："重新统一德国的政策，作为冷战的象征，是同自由世界国家希望把在欧洲的共产主义势力范围推回去的总要求联在一起的。而在今天的世界上，维护和平的首要和普遍利益，已经取代了德国重新统一的局部利益。对于我们的目标，我们确实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德国的对外政策，事情已经变得更加困难了。"施密特评论说，施罗德已经感觉到，到那时为止的西德对外政策的依据已不复存在了。①

施罗德讲这段话的第二年，一九六六年三月，艾哈德政府向苏联和东欧各国发出了"和平照会"，提出相互保证不使用武力威胁的建议。据说，这个照会是在施罗德主持下与社民党人弗里茨·厄勒和赫伯特·魏纳合作起草的。基辛格——勃兰特大联合政府组成后进一步宣布，"当条件许可时"，联邦德国愿意同东欧邻国建立外交关系。施密特说，"这就等于正式埋葬了以前的哈尔斯坦学说。"②

勃兰特本人的经历也构成了一种有利于推行新东方政策的国际条件。勃兰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到挪威、丹麦，加入过挪威籍，他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同西北欧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十分密切，新东方政策的酝酿不断得到知名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支持，其中有瑞典的帕尔梅、奥地利的克赖斯基、英国的威尔逊等。他从戴高乐那里得到

---

① 赫尔穆特·施密特：《实力均衡——德国的和平政策和超级大国》，第203页。
② 赫尔穆特·施密特：《实力均衡——德国的和平政策和超级大国》，第206页。

的启发特别重要，前后会晤了八次。勃兰特在自己的著作中较详尽地把戴高乐关于东西方关系、对美对苏政策的主张记录了下来。他在一九六四年夏天在波恩同戴高乐会晤后写道："……戴高乐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大胆而坚定地想人之所不能想，并且已开始作出若干结论……有时，我作为一个德国人不禁反躬自问：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能这样干呢？"①

西德通过新东方政策打开了同东方的通道，这是这项政策最直接的成果，同时因而把欧洲的缓和进程大大推进了一步。如果说美苏间的接触象是打开了绿灯，那就无法阻止处于关键地势的西德以更快的速度猛冲过去。而且不仅限于一个联邦德国，透过勃兰特的新动向也看到了几乎整个西欧要求独立处理同东方关系的动向。这种动向自然使欧美关系不能再照原样维持下去。

勃兰特一九七一年底访问美国的时候，舆论中广泛传说，勃兰特同尼克松会谈中涉及的欧美关系问题比德美关系问题要多。勃兰特并不否认。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基·比斯开的会谈确确实实是集中在美欧伙伴关系上，而不是集中在德美关系上。对于这一点，凡是了解到西欧国家和美国的双边关系多么地受到日益发展的多边关系网的制约的人，都不会感到奇怪。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没有任何重要的问题是可以放在美欧关系之外去解决的。这种情况适用于国际货币和贸易，也适用于安全政策，首先是适用于减少东西方紧张局势的努力。"②

勃兰特推行新东方政策的实践表明，联邦德国已经基本上找到了在东西方关系中的恰当的位置；尽管国际条件是经常变动的，不同的决策人物在政策掌握上也会有一定的摇摆，有时摇摆的幅度甚至很大。但是，新东方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延续下来了。一九八三年基民盟接替社民党组织政府，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立

① 维利·勃兰特：《人民和政治，1960年到1975年》，第122—123页。
② 维利·勃兰特：《德国的西方政策》美国1972年4月《外交季刊》，第416页。

即表示，他的政府将基本上延续前任施密特政府的对外政策。

施密特对于新东方政策的延续性，讲了一段话，抄录在下面，算作这一章的结束语，他说："在联邦共和国，最起码的内部一致是万无一失的。某些基督教民主联盟或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政治家，由于必须适应反对党的新角色而吵吵嚷嚷，我们无需为此而烦恼。虽然不应小看极左和极右分子的作用，但是压倒多数的公民不仅在内部事务的基本问题上是一致的，而且在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的基本原则上也是一致的。对于我们的东方政策、对欧洲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政策、对我们的安全政策，即联盟政策，也同样是一致的。社民党、基民盟和基社盟以及自由民主党在这三个问题的某些细节方面有不同意见，并因而一再发生激烈的辩论；但是在基本原则上，联邦德国各党比譬如法国或意大利各党都具有更大的一致。这种侥幸的局面绝不是固有的，也不是源于德国的天性，而是由于都接受了我国因承受战争和被分裂的后果而出现的这种不愉快的局面。"①

不去深究施密特这段话的每一措辞是否恰当，但它说出了为什么新东方政策能够延续下来。简单说来，处于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下的欧洲中部地区、两个德国的现实，决定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必须执行具有本国特色的独立对外政策。

---

① 赫尔穆特·施密特：《实力均衡——德国的和平政策和超级大国》，第227—228页。

· 第十二章 ·

"六国欧洲"——欧洲共同体的成长和问题

（一）从草创到成长

六国的欧洲，一般是指从一九五二年七月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成立到一九七三年一月欧洲经济共同体第一次扩大以前这一段时期。这里所涉及的是从欧洲经济共同体问世后的"六国的欧洲"。然而要讨论的问题却不限于六国，而是更广泛地涉及到西欧经常讨论的"欧洲建设"问题，并且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六国"内部的分歧、"六国与七国"的斗争、法国与英国的矛盾，等等。

煤钢共同体之发展为经济共同体（罗马条约），比利时、荷兰等六国中的小国是起了推动作用的，这些小国比较敏感地感到，在一个经济全面复苏、而且已经进入原子时代的新时期，它们单靠自己的力量，在科研技术力量、投资等各方面困难很大，把毗邻国家联合成共同市场，它们便可以有所借助，取人之长，补

己之短，活动地盘就宽裕多了。比利时外交大臣斯巴克在一九五五年墨西拿六国代表会议上受委托起草的报告，其立意即在此。斯巴克认为，“马歇尔计划”以后成立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已不能适应欧洲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应该用共同的关税同盟来代替自由贸易的安排，组成一个欧洲的共同市场。六国在酝酿经济共同体的过程中，其着眼点是发展经济，从政治倾向上看则附合欧洲联邦主义的观点，即通过经济的共同体最后走向欧洲的联邦制。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六国外长在威尼斯会议上决定举行“关于共同市场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会议”，以便缔结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条约和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条约。① 第二年二月十九日，六国在巴黎举行会议，通过了两个条约的条款，为最后在罗马签订条约作好准备。②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六国全权代表——比利时外交大臣保罗——亨利·斯巴克、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法国外交部长克利斯蒂安·比诺、意大利总理安东尼·塞尼、卢森堡首相兼外交大臣约瑟夫·伯克、荷兰外交大臣约瑟夫·伦斯等——在罗马签署了“关于共同市场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政府间会议最后文件”、“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等文件。

“关于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全文除序言外分六个部分，还有一批附件。条约的第一部分“原则”的第三条把共同体（即共同市场）的“行动”概括为十一项。计：“（1）在各成员国之间取消商品进口和出口的关税和定量限制，以及其他具有相同影响的措施；（2）建立共同的关税率和共同的贸易政策以对付第三国；（3）在各成员国之间，废除阻止人员、服务和资本的自

① 《纪事年鉴——1956》，第16卷，第183页E1。

② 《纪事年鉴——1957》，第17卷，第70页C3。

由流通的各种障碍；（4）建立农业方面的共同政策；（5）建立运输方面的共同政策；（6）建立一个保证在共同市场中竞争不受破坏的制度；（7）应用程序以便调整各成员国的经济政策，并补救它们的支付平衡的失调；（8）在共同市场的必要限度内，使各国的立法趋于接近；（9）设立一笔欧洲社会基金以便增进工人就业的机会，并促进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10）设立欧洲投资银行，发掘新资源，以利于本集团经济的扩张；（11）成员国的海外国家和领地也延入共同体以增加贸易并共同致力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①

条约规定，共同市场设置议会、理事会、委员会和法院等机构。第七条规定："在本条约的施行范围内，并在不影响本条约的特别规定的情况下，禁止以国籍为理由进行任何歧视。”“理事会经委员会的建议并与议会协商后，得以特定多数采取一切旨在制止这些歧视的决定。”②

“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共六章及若干附件。条约规定“原子能共同体”的任务是：“通过建立使核子工业迅速形成和增长的必要条件，对成员国中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与其他国家的交换作出贡献。”③也要设置议会、理事会、委员会和法院等机构。

至此，西欧便有了三个共同体——煤钢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各有自己的执行机构，实际上都是本着同一原则成立的。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三个共同体合并为一个执行机构。

从这些情况介绍来看，罗马条约是一种经济合作条约，目的是发展各成员国的经济，在某些领域里实行共同的经济政策，其出发点是六国在经济领域里的共同需要。当然，成员国的协定对

---

① 《国际条约集（1956—1957）》，第340—341页，译文略作修饰。
② 《国际条约集（1956—1957）》，第342页。
③ 《国际条约集（1956—1957）》，第458页。

于"第三国"就不能不带有排他性，所以，共同体就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集团保护主义的成分。

从共同体建立到七十年代初期，正是西方经济相对迅速发展的时期：能源价格较为低廉，货币基本稳定，国际贸易大有进展，生产增长幅度比较大。共同市场的建立适应了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六国之间在一九六八年七月就完全取消了关税，比罗马条约规定提前一年半建成了关税联盟。同时，六国经过激烈的斗争和讨价还价，于一九六八年八月实行了共同农业政策，原来分散的六国市场联成了一个统一的共同市场。这种高度统一的经济联合体，只能出现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西欧，也只能产生于这些国家经济向上发展的时期。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扩大了六国的销售市场，促进了六国生产部门的专业化分工。六国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二年的贸易额增加九倍之多，对共同体外的贸易只增加三倍。六国都是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共同体成立之初，六国互相之间的出口只占它们出口总额的35.3%，至七十年代初，已上升为54.5%。如果按国家划分，更可以看出六国之间在对外贸易方面的互相依赖已达到了何种程度。在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三年的十年间，共同体国家经济年增长率为4.6%，这不能不部分地归功于共同体的建立。

共同体内部贸易在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百分比

	进口		出口	
	1958	1973	1958	1973
联邦德国	33.6	52.2	34.5	47.1
法国	26.1	55.4	28.0	56.1
意大利	29.0	48.9	31.3	50.1
比、卢	54.6	70.7	52.8	73.1
荷兰	50.0	61.0	56.5	72.5

资料来源：30 Jours d'Europe，1982年2月。

除了建成关税联盟之外，欧洲六国的另一大成就是执行了共同的农业政策，这项政策主要是通过对共同体内部生产的农产品实行价格保证和提供补贴，对外国农产品提高税收等办法保护六国内部农业生产，排斥来自别国的农产品进口。这一政策大大促进了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一年，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8.8%，实现了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共同体内部农产品自给率显著提高，至七十年代中期，除蔬菜、水果、玉米等少数产品外，其余各种谷物、奶品、肉类等主要产品均已完全自给和自给有余，而农业劳动力（按九国计算）却由一九五八年的一千九百万人下降为一九七五年的八百五十万人。共同农业政策是带有高度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是造成英国与六国关系困难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美国与欧洲共同体在对外贸易上的一大矛盾。七十年代以后，这一政策引起了共同体农产品生产日益过剩的问题，成为它内部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

（二）"空椅子危机"前前后后

围绕罗马条约展开的政治上的矛盾和斗争，是从一九五八年戴高乐在法国再次上台开始的。前面说过，戴高乐有自己的"欧洲观"，与任何"超国家"的思想或联邦主义的思想都是不相容的。

罗马条约虽然还不是"超国家"的条约，但它的倡导者的想法却是要通过共同的农业、财政、能源等政策来实现"一体化"。戴高乐则以"祖国的欧洲"为出发点于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三日正式建议六国就政治问题举行定期磋商，一九六〇年夏，戴高乐再次提出讨论建立欧洲政治联盟问题。一九六一年二月，六国首脑原则上同意建立政治联盟；同年七月十八日，六国首脑在波恩会议上决定举行定期政治协商，并委托以法国大使富歇为首的委员会起草方案。

然而，戴高乐提出的政治联盟，与联邦主义的"一体化"并不是一回事。法国提出此议是为了贯彻它的主权国家之间实行联合的原则，与比利时、荷兰等拟借此推动进度较大的"一体化"的意图，是合不上拍的。一九六一年二月，荷兰外交大臣伦斯在巴黎举行的六国首脑会议上，就已提出建立一个具有"超国家"性质的、有英国参加的欧洲。同年十月，富歇委员会提出了第一个建立政治联盟的计划，基本反映戴高乐的观点和主张；比、荷仍强调欧洲联合必须有"超国家"性质，而且主张立即邀请英国参加讨论。一九六二年一月，富歇委员会提出政治联盟计划的修改稿，基本精神未变。比利时和荷兰明确表示，只有接纳英国参加共同体，才准备讨论富歇方案。①但是，法国在当时对英国加入共同体问题是持反对意见的，这在本章的下一节将专门论述。

在富歇计划上的两种对立的观点，比利时外交大臣斯巴克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在给比利时驻外使节的通报中说得很明白：

诚如所见，以法国为一方和以其他五国为另一方的鸿沟，丝毫没有填平；成员国一直分歧的三个主要问题是：

"联盟（指戴高乐建议的政治联盟）的权限：法国人认为，经济问题应在联盟的权限之内（斯巴克认为联盟的财权应属共同体，戴高乐的主张在于削弱共同体的权力）。

"共同防务：在这方面，法国的伙伴们力争能对加强北约组织有若干保证（法国坚持联盟的防务应独立于北约）。

"总的看法：在这方面，应从此时此刻起就对未来的进展提出适当的保障措施。

"会议显然并不是浪费时间，因为它使我们得以向法国说清楚这样的事实：对于签署一项看来目标不明、对未来不

---

① 〔法〕莫利斯·顾夫·德默维尔：《一种对外政策，1958—1969》，法国普隆出版社，1971年，第372页。

见得有希望，而且对已经存在的各个欧洲共同体的活动包蕴着若干危险的公约，法国的伙伴们为什么这样犹豫不决。……”①

此外，问题还与当时接纳英国加入共同体问题联在一起，斯巴克在四月发出的另一封给比利时驻外使节的通报中这样说：

“比利时立场的核心因素是：假如进入拟议中的政治联盟，那么小国希望能取得两项可能的保证——或者规定对共同体成员国有约束力的议事规则，或者接纳英国作为一种平衡力。法国的计划则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一项保证。法国报界竭力表示，要求立即和同时实现一种超国家的欧洲和英国参加（共同体）是不合逻辑的。我同意，在目前状况下，希望同时实现这两项目标，或许过分乐观了。然而，比利时确认，必须在两项目标当中实现其中的一项。法国的政策意在剥夺我们取得一种超国家政治联盟的任何希望。为此，比利时起码也要争取英国成为（共同体的）成员。既然两者都拿不到，我只好待以异日。”②

分歧点是十分明白的。在争论中，其他五国的观点大体一致，与法国态度尖锐对立的是比利时和荷兰，意大利和卢森堡也反对戴高乐的立场。联邦德国的态度比较特殊。当时法、德正在为进一步和解相互接触，这对于两国都至关重要，联邦德国必须在法国、美国和共同体其他成员国之间确定自己的立场。因此，联邦德国在富歇报告问题上，不象其他国家那样明朗，既表示支持法国，又要设法冲淡富歇报告中排斥盎格鲁-撒克逊的色彩。实际上，联邦德国不可能采取法国那种独立于美国和北约的立场，在共同体问题上也是与其他成员国近似的。所以斯巴克说，他对

① 保罗-亨利·斯巴克：《不间断的战斗，一个欧洲人的回忆1936—1966》，英译本，伦敦，1971年，第443—444页。

② 保罗-亨利·斯巴克：《不间断的战斗，一个欧洲人的回忆1936—1966》，第445—446页。

于施罗德的“长期目标”和所使用的“方法”，感到“大惑不解”。[①]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二日，戴高乐和阿登纳签署了德法条约。五月十六日，联邦议院在通过这个条约时增加了一个“前言”，指出，德法条约并不废除联邦德国对北约承担的义务和同美国的关系，并且保证一个统一的欧洲将会向英国和其他非共同体国家敞开大门。[②]西德以这种方式表明西德不可能在法国和美国之间作倒向任何一边的断然选择。

富歇委员会提出的方案终因其他成员国的反对而作罢。斯巴克说，“我们希望要的东西都没有；我们最不喜欢的东西却都在里面了。”[③]富歇报告的辩论告一段落，但法国坚决要削弱共同体的“超国家”性质，仍是共同体内的重大争论问题。一九六五年七月起法国因共同体农业政策上的分歧而暂时退出共同体各种会议的所谓“空椅子危机”，便是争论尖锐化的表现。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共同农业政策”，是罗马条约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各国都是以本国利益来决定各自在农业价格、税收、补贴等各方面政策的，很难有一项使各成员国都满意的共同农业政策。本来在罗马条约签订时，六国就已互作了妥协，特别是联邦德国和法国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法国向西德工业品开放市场，西德则为法国农产品打开大门；六国还协议建立一项援助法属非洲的“发展基金”，共五亿八千万美元，法、德各摊两亿美元。

下面把所谓“空椅子危机”事件简略介绍如下：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日，由哈尔斯坦担任主席的共同体委员会向部长理事会提交了一份《一九六四年创议》，主张加快“共同

---

① 保罗-亨利·斯巴克：《不间断的战斗，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936—1966》，第441页。

② 《纪事年鉴——1963》，第23卷，第387页F3。

③ 保罗-亨利·斯巴克：《不间断的战斗，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1936—1966》，第440页。

体体制各阶段”的进程，其中包括提前废除成员国之间所有工农业关税和建立统一的对外税率，即从罗马条约规定的一九七〇年七月一日提前到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按罗马条约第八条规定：“共同市场应在十二年的过渡时期内逐步建立。”“过渡时期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为期四年。”①）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戴高乐在全国广播讲话中指出，无论是什么样的经济或货币体制，只要是“在超国家、或一体化、或大西洋主义的名义之下”，“就会在事实上把我们置于我们所熟知的霸权之下”。他说，法国必须“在政治、经济、金融和防务等领域内成为自己的主人”。②

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共同体委员会再次向部长理事会提出一项关于共同体于六七年七月一日提前全面控制农业政策的计划。这项计划包括：（1）共同体基金将负担共同体农业规划的全部用费；（2）农业进口税全部直接纳入共同体基金；（3）从非共同体国家的工业进口关税应有一定比例直接纳入共同体财库，至一九七二年全部关税归共同体；（4）共同体议会有权监督共同体的财经状况。③

同年六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六国部长理事会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在会议上，法国外交部长顾夫·德默维尔重提他在半月前提出的继续执行六二年一月十四日通过的临时农业方案，直至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反对共同体委员会——实为西德、意大利、荷兰等国——提出的提前实行全面控制共同体农业的计划。根据临时农业方案，成员国的剩余农产品将由共同体购买；共同体成员国的农产品向外输出农产品时，可得到出口补贴（因为世界市场价格低于共同体农业市场）；从共同体以外的进口的农业

① 《国际条约集（1956—1957）》，第342页。
② 《纪事年鉴——1965》，第25卷，第46页C3。
③ 《纪事年鉴——1965》，第25卷，第252页A3。

品征税应纳入有关国家的财库。① 意大利外长范范尼反对法国意见，并建议出口补贴从七月一日起暂停一年。荷兰外交大臣伦斯支持意大利意见。其他国家也不支持法国建议。双方坚持不下。七月一日凌晨，顾夫·德默维尔宣布，协商失败，会议休会；法国决定暂不参加共同体的会议；预定七月十三日召开的煤钢共同体部长会议和十九日的财政部长会议，法国都没有参加。从此开始了为时半年的所谓“空椅子危机”时期。

在“空椅子危机”期间，法国事实上居于矛盾的支配方面。问题终于基本上按照法国的意图实现某种妥协，这就是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七日——十八日六国部长理事会通过的“卢森堡协议”。

卢森堡会议是半年来第一次六个成员国外长会议。会议开始时，顾夫·德默维尔代表法国政府就改进共同体委员会的工作方式提出了十点建议，其中有委员会在采纳成员国提出的建议之前应征求各成员国的意见和各成员国政府可以对共同体预算实行监督等。法国还提出修改共同体的表决办法，建议不再提多数通过原则，指出委员会主席无权接受非共同体国家大使的国书，等等，以严格限制共同体委员会的权力。② 一月二十八日——三十日，六国外长达成协议，会议公报说，在共同体根据多数表决原则作出决定的条件下，如一国或数国认为这一决定涉及其重大利益时，部长理事会应在“适当时间内”努力谋求一项全体成员都能接受的“一致协议”；如果仍达不成协议，就承认分歧，同时不妨碍共同体的工作按“正常程序”进行。公报还说，非共同体国家派驻共同体总部的大使应同时向部长理事会和委员会主席呈递国书。③

卢森堡协议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削弱了罗马条约的“超国家”因素，等于承认了各成员国拥有“否

① 《纪事年鉴——1965》，第25卷，第252页D1。
② 《纪事年鉴——1966》，第26卷，第22页A1。
③ 《纪事年鉴——1966》，第26卷，第44页B2。

决权”；共同体的任何重大决议都需取得成员国的一致通过。

从富歇报告到“空椅子危机”，争论的焦点是“超国家”与“民族国家”之争；完全的“超国家”是不可能的，因此争的是究竟要赋予共同体以多大的“超国家”成分。卢森堡协议表明这场争论基本上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争论的经过就足以说明，“超国家”的性质只能在一定领域内有所体现。当经济困难加剧的时候，“超国家”安排就更困难；西欧毕竟是“民族国家”的西欧。

（三）英法矛盾——英国加入共同体的波折

英国与六国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既反映了法国和其他成员国的不同立场，而且也曲折地反映了法国同美国的矛盾。联系到戴高乐在核武器和北约领导体制问题上的立场，更可想见英法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实已超过两国关系的范围。

从法国的角度来说，英国由于同美国有“特殊关系”，所以在处理对外关系的问题时总要首先考虑英美关系，因此，英国加入共同体之后势必将反映美国的利益和意图。当时舆论曾有戴高乐视英国为“特洛伊木马”之说。此外，英国与英联邦国家有广泛的多方面的传统联系。法国认为，英国不可能因加入共同体而牺牲与英联邦国家的联系，而法国利益却会因而受到损害。

戴高乐在六十年代初谈到英国对外政策的特点的时候说，英国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一劳永逸地接受“美国的霸权”，即从现在起，用“顺从”的态度换取核机密，换取美国帮助它维持同前“领地”的经济联系；另一条路则把英国引向欧洲。① 戴高乐说这些话的时候，正是法英两国在英国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发生激烈争执的时候，也是英国为取得美国在核武器方面的援助同美国

①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233页。

反复磋商的时候。

戴高乐在同麦克米伦的一次会议中直截了当地讲了这样一段话：

> “从经济上看，你们英国人主要是依靠美国的大规模贸易以及和英联邦的优惠贸易，你们真的能够同意和欧洲大陆国家一起实行统一的关税，不怕严重地损害你们和美国的贸易，并且排斥你们的自治领和从前的殖民地么？你们一直吃的是廉价的加拿大小麦、新西兰羊肉、爱尔兰牛肉和马铃薯、澳大利亚的牛油、水果、蔬菜，牙买加的糖等等，现在你们愿意购买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的——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么？”①

戴高乐给麦克米伦提的是些不易回答的问题。麦克米伦当然不可能放弃原有的优惠条件而屈就法国。戴高乐的法国坚决抵制了英国的申请；不管其他成员国如何主张接纳英国，戴高乐的法国还是两次否决了英国的申请。第一次是在肯尼迪——麦克米伦签订了“多边核力量”条约之后的一九六三年，第二次是在法国已从北大西洋公约军事组织撤出之后的一九六七年。

从英国的立场看，英国从跟六国欧洲唱对台戏到申请加入，说明英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有了重大变化。现在就来看一看英国政策的变化。

从罗马条约的问世，英国感觉到了一个很明显的信号：丘吉尔在战后一再鼓吹的“统一欧洲”真的搞起来了，而且是颇具经济实力的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组成了对外实行关税壁垒的共同市场。一个贫困、萧条的欧洲固然会拖住英国的后腿；大陆上的西欧国家真的联合起来，英国却也会感到一种竞争和压力。

所以，英国对于罗马条约的第一个反应，是采取反措施。本

①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236页。

来还在西欧六国正在酝酿筹组共同市场时，英国政府就已于一九五六年十月提出了所谓“G”计划，企图用一个包罗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内的“工业自由贸易区”把拟议中的六国共同体“化”掉，结果“G”计划在一九五八年被反对掉了。于是英国又把罗马条约以外的国家组织在一个欧洲自由贸易区里，所谓以“七国”(即英国、挪威、瑞典、丹麦、瑞士、奥地利和葡萄牙)对“六国”。英国因而处于同西欧六国对立的地位。但是“七国”并不一致，实际上都各自同共同体发展了贸易关系。英国的“七国贸易区”计划没有实现，英国也因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了打击。

英国对罗马条约作出的第二个反应，是从“对立”转为“申请”加入。麦克米伦政府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九日正式提出了“申请”。

这个举动本身的意义并不在于英国决定要参加曾经加以抵制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而是反射出英国对外关系方面的变化：战时形成的英美“特殊关系”受到了戴高乐的抨击，美国也不能仍象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那样对英国另眼看待，因为美国需要更广泛地关注整个西方联盟。而且英联邦能够提供给英国可以依赖的优厚条件也越来越少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因英国无力顾及而求助于美国。战后澳、新、美签订军事防御条约，英国完全被排斥在外。丘吉尔抱怨工党政府不曾力争，然而当保守党再次执政时也不能不接受这种既成现实。至于加拿大，则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乃至防务上与美国的联系都多于英国。英联邦成员国对英独立倾向日著，对外政策、经济关系均远超出英联邦范围。诺塞芝说：“英联邦足以构成独特的特惠区的观念……愈来愈少有说服力。”又说：“英联邦虽然仍在英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有30%，但已是正在萎缩中的单位，在贸易中多限于较老的制造行业，较新的制造行业较少；因此英联邦成员国之间

的通商反逊于与非联邦国家之贸易。”① 弗兰克尔说："证诸英国在英联邦内的出口比重，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一年之间由50%降至39%；而向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输出之比重则由25%提高到32%。”②

这种情况表明，休说战前英帝国的状况，就是战后丘吉尔、艾登、艾德礼心目中的英联邦形象都已大大改观。弗兰克尔认为，英联邦在英国对外政策中地位的根本动摇，约始于一九五六年苏伊士战争，而"一九六七年决定从苏伊士以东撤退、一九六九年的邓肯报告，以及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之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则是帝国终结的三个主要的合乎逻辑的正式体现。”③

麦克米伦下面一段话充分表达了英国面临抉择的心情：

> "我们会不会被夹在敌对的（至少是愈来愈不友好的）美国和矜夸的、强大的'查理曼帝国'之间呢？这个帝国现在虽然在法国支配之下，但以后必然是要受德国控制的。难道因此就要'加入'共同市场（如果我们能够被接受的话），并放弃（1）七国、（2）英国和（3）英联邦吗？这是一个不易作出的抉择。”④

麦克米伦曾这样提出问题："（英国）是应置身于欧洲联合运动之外，还是为促进这个运动而尽我们的责任呢？是应保持我们在新世界中的影响，还是在现代世界的巨大的结盟面前听任我们本身的政治与经济力量相对地萎缩下去以削弱我们的影响呢？孤立的英国对英联邦盟友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我相信他们是明白这一点的。”⑤

---

① F·S·诺塞芝：《英国政策的调整》，见他主编的《大国的对外政策》，伦敦，第197页。

② 约瑟夫·弗兰克尔：《英国对外政策，1945—1973》，伦敦，第224页。

③ 约瑟夫·弗兰克尔：《英国对外政策，1945—1973》，伦敦，第223页。

④ 麦克米伦：《指明方向》，中译本，第381页。

⑤ 《麦克米伦回忆录（6）从政末期》，中译本，第19页。

这就是说，麦克米伦是在"G"计划和"七国贸易区"方案都行不通之后才下决心向罗马条约靠拢的。

英国政府第一次提出申请之后作为英方谈判首席代表的爱德华·希思一九六一年五月在下院的讲话可与前引的麦克米伦的话相表里。他说："我们今天在欧洲看到一个正在有力地发展的国际团体（指欧洲经济共同体），它的力量从其规模就显示出来：它有一亿七千万人以上的人口，相比之下，英国的人口只有五千万，整个'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人口也不到九千万。他们的人力资源是非常巨大的。"① "他们的工业生产增长率是很高的。一九六〇年六国的内部贸易提高了百分之三十，相比之下，七国的内部贸易才增长了百分之十六。"② 希思说，这个"新集团的实力和规模"表明六国共同市场"已经立定了脚跟"，"并且所有迹象都表明它未来也将获得成功"。③

从政治上看，希思说："今天，我们看到在我们对面的欧洲大陆有一个大集团。在规模上只有美国和苏联可以与之比较，而且随着它的经济力量的增长，它的政治影响也必将增长……"④ 他甚至说："谈判（指英国同共同体六国就英国申请加入共同体的谈判）的主要目的是政治性的。"⑤

总之，罗马条约是一个征候，说明英国可以活动的地盘正受到共同市场的排斥。英国要么继续同西欧六国竞争，那英国便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处于美、苏、西欧大陆以次的地位，势单力孤，将极不利；要么参加进罗马条约来，那英国就不得不牺牲英联邦在农产品方面的若干优惠条件。二者必居其一，英国需要作

① 转引自（英）乔治·哈钦森：《爱德华·希思》，中译文，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6页。

② 转引自（英）乔治·哈钦森：《爱德华·希思》，中译文，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7页。

③④ 转引自（英）乔治·哈钦森：《爱德华·希思》，中译文，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7页。

⑤ 爱德华·希思：《旧世界，新前景，英国，欧洲和大西洋联盟》，哈佛大学，1967年版，第26页。

出抉择。

用希思的话来说，英国从与共同体“对立”到申请加入，“在英国的对外政策中是一个历史性的发展”，“在我们的历史中是一项重大的决策，是一个转折点。”①

这种“历史性的发展”的趋势，到六十年代后期对英国说来就更加逼人了。希思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更大的决心。为什么呢？

希思一九六九年在《英国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一文中写道，今天，西方世界的货币困境，比一九六一年至六二年，甚至比六七年，更为显著了；在一九六七年，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英镑的孱弱和英镑收支平衡的不稳定。希思认为，前者导致英镑的贬值，英镑贬值又给英镑体制一个打击，于是，英镑收支平衡问题更加严重；一九六九年的贬值则是由于美元地位的动摇而引起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了抛售美元和以美元兑换黄金的风潮，所以，这次英镑贬值是和美元的信任危机连在一起的。希思说，英镑的这次贬值更危险，因为美元的日子也很不好过，英国的困难不可能再象一九四九年那样依靠美国的支撑来缓解。而“必须为这个问题找出一个欧洲的解决方案”。②所谓“欧洲的解决方案”就是同西欧大陆靠得更紧些，因此必须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但要这样做，英国就需要果断地不以英美关系妨碍英国同西欧大陆的关系；而且还要逐步放松帝国特惠制和不再坚持英镑在英镑区的特殊地位，不以英联邦排斥欧洲经济共同体。希思说：“我们的各项政策是建立在对英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进行清醒的、新的和现实的估计的基础上的。”③

正是由于这种逼人的形势，保守党年会、工党年会和参众两

---

① D·C·瓦特选编：《国际事务文献汇编，1962年》，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牛津，1971年版，第510页。

② 爱德华·希思：《英国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1969年10月美国《外交季刊》。

③ 爱德华·希思1971年10月16日在保守党年会上的讲话。

院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虽然争辩激烈，但终于还是赞成英国政府向欧洲共同体的申请。

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这件事，前后用了十年功夫，其间三次提出申请，前两次都因法国的否决而未能加入。

英国历史学家F·S·诺塞芝概述英国与欧洲共同体的关系时曾说："以欧洲为一方和以英联邦和'英美特殊关系'为另一方（对英国）形成了方向相反的引力，因此英国的神经极度紧张。由于西欧的一体化在一九五二年成立煤钢共同体以后向前发展了，因此英国的内阁大臣们便置身于这样的十字路口：或者仍希望人们基本上把英国看作一个欧洲国家，那么他们早晚总要切断联邦的纽带；或者不得不和新的欧洲维持某种联合性的关系，那么就会给象比利时政治家斯巴克那样的欧洲人以口实，硬说'我们宁愿不跟英国在一起而有所作为，也不愿跟英国在一起而一事无成。'"①（其实，斯巴克是主张吸收英国加入共同体的，在辩论富歇报告时已说明了；当法国否决英国的第一个申请后，斯巴克也是对法国的否决表示最强烈不满的人。）

法国反对接纳英国的立场到一九六九年有了松动。戴高乐辞职后，继任总统的蓬皮杜五月九日表示当条件成熟时将"促进欧洲的扩大"；十五日又明确说："英国应该进入欧洲。"②

一九七〇年，爱德华·希思出任英国首相，七一年共同体就英国加入共同体的第三次申请进行谈判。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英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签署了接纳英国为共同体成员国的条约。不久，爱尔兰、丹麦也加入了共同体——"六国欧洲"扩大为"九国欧洲"。挪威则因公民投票没有通过而未参加。

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欧洲经济共同体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历程，从六国发展为九国。英国等国加入共同体对"六国欧

---

① F·S·诺塞芝：《英国政策的调整》，见诺塞芝主编：《七国对外政策论文集》，第189—190页。

② 《纪事年鉴——1969》，第29卷，第312页A3，D3。

第三部分
七十年代以来的西欧国际关系

内容提要

七十年代上半叶，美苏两国领导人互访，签订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第一阶段），四大国签订了柏林问题的协议，联邦德国与苏联、东欧签订了一系列“东方条约”，中欧裁军的“马拉松”谈判揭幕，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首脑会议发表了《最后文件》。欧洲出现了“缓和”势头。

但，形势在七十年代下半叶出现逆转，热点剧增，东西方关系重新紧张起来。欧洲中程导弹问题的争论和摊牌宣告美苏的核军备竞赛进入新的一轮。

在这一时期，西欧和美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里的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大西洋联盟内部在对苏战略等重大问题上论战日烈，分歧日深；欧美关系在继续调整。

处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西欧，在坚持欧美联盟的前提下，日益强烈地要求摆脱“两极”格局，争取“多极”世界；力争在国际事务中“用一个声音说话”，发挥独立作用；继续执行“防务加缓和”的对苏政策，致力于缓和东西方关系和实现“低水平”核均衡。西欧政治上的“同一性”和独立倾向进一步发展。

西欧在多种压力面前，联合意识和联合趋势不断加强；西欧联合虽然需要克服种种困难，但总的趋势不会倒转。本世纪内，西欧各国都将在迎接安全和发展的双轨挑战中，决定和调整其国际政策。当然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策特点；西欧的一般政策和各国的具体政策，将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第十三章·

七十年代上半期的欧美关系

(一) 金融危机中的欧美矛盾

进入七十年代以来，国际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推动西欧进一步认真考虑自己应该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才更符合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戴高乐第一个从五十年代后期起不停顿地向美国的"领导地位"挑战。联邦德国不是法国，勃兰特也不能象戴高乐那样做，但是新东方政策的实践确实使联邦德国根本改善了它在东西方关系中的地位；在西方联盟内部，联邦德国的发言权大大增加了，在大西洋联盟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份量。新东方政策从联邦德国的现实出发，就象戴高乐的"缓和、谅解和合作"的政策一样，吸引了东西双方的注意力。六十年代出现的戴高乐主义和新东方政策不应只看作是法国和联邦德国的事情，而是表明，西欧没有理由再象五十年代那样把自己同美国拴得那么紧了。

蓬皮杜在戴高乐以后开始对戴高乐的某些

政策作了调整，他觉得使英国同西欧大陆结合在一起，可能比戴高乐的作法更符合法国的利益。如果联邦德国以及其他西欧小国把英国看作是平衡西欧内部关系的力量，法国何尝不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也把英国看作是对联邦德国的平衡力量呢？一个扩大的西欧联合在同美国的结盟中，岂不具有更加有利的地位么？

近十年来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在许多重大国际事件中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尼克松在七十年代初比十年前的肯尼迪更有同苏联改善关系的条件。肯尼迪上台后把美国越来越深地卷进了侵越战争，而且逐步升级；尼克松则是要在美国被越战拖得筋疲力竭的狼狈处境中寻求出路。经过四年漫长的巴黎谈判，终于在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七日签定了停战协议。尼克松先去了中国；七二年二月，著名的中美“上海公报”发表，美国政府第一次承认“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一致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三个月后，尼克松访问了苏联，结束了一九六九年开始的削减战略武器第一阶段谈判。七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美苏双方签署了《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和《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此外还有一项“议定书”。双方还决定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开始第二阶段的谈判，以拟定一项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永久性条约”。希图这些谈判和条约对局势的实际缓和能有多大作用，无异于缘木求鱼；美苏两家都不过是要通过这些条约的签订表示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实质上是两个超级大国在战略核武器上的一场全球性的交易，是另一种形式的争夺。尼克松说：“我们两国中的每一国都具有单靠自己就能毁灭人类大多数的力量。……正是这一事实和双方全球性的利益，造成了某种共同的看法，即：为了生存而相互依赖。尽管我们相互竞争，然而我们的冲突不允许用正统意义的胜利来解决。我们看来是被迫地要共存下去。我们有建立和平结构的不可逃避的共同责任。”① 这是美国第一次承认它是在“均势”的基础

① 《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

上、而不是在“优势”的基础上同苏联谈判的。[①]十年以前，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时还自认为掌握着“优势”；十年以后，尼克松则确认美国已失去这种“优势”。问题的实质正在这里。

美国在战略武器领域的地位从对苏“优势”到美苏“均势”的变化，自然对西欧造成深刻的心理影响；而美国在经济上的困难则更加直接地影响着西欧的切身利益。

近十年来，美元在西方世界的霸主地位动摇了。七十年代初，美国国债高达四千多亿美元，创了美国历史纪录。当时在西欧金融市场的“欧洲美元”已达五百亿以上，而且继续增加。已受到经济危机袭击的西欧各国纷起采取措施。欧洲经济共同体六国财政部长一九七一年四月在汉堡举行会议。联邦德国提议欧洲货币联合浮动，法国要求提高黄金官价，把美元贬值。西方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较坚挺的西德马克等货币，联邦德国政府不得不下令关闭外汇市场，抵制美元涌进；其他西欧国家银行也停止买进美元。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六国商定六国货币的比价不变，成员国在有限时期内实行浮动汇率。七月三十日，伦敦黄金市场金价涨至每盎司四十二点五五美元，美元与黄金比价失控，西方金融市场出现新的动荡。

八月十五日，美国政府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暂停外国银行按每盎司三十五美元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冻结全国工资和物价；减少对外援助百分之十；征收百分之十的进口附加税。美国宣布“新经济政策”等于向其他国家转嫁经济危机，西欧自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由于停止美元和黄金的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崩溃。

七十年代初期的金融货币危机使西欧和美国的利益尖锐对立起来。西欧各国在七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紧

---

① 威廉·R·凯洛尔，《二十世纪的世界——一部国际史》，牛津，1984年，第342页。

急会议上，对美国的“新经济政策”纷纷提出强烈抗议，抨击美国征收进口附加税。法国总统蓬皮杜在九月二十三日记者招待会上提议建立针对美国“新经济政策”的“共同战线”，重申西方货币采取同黄金挂钩的固定平价制度。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马尔法蒂（意大利人）提出，在美国征收附加税问题上，欧洲共同体应该步调一致。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九国部长于十一月五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也要求美国停收进口附加税。

在这次经济危机和金融货币危机中，欧洲经济共同体一再呼吁美国取消进口附加税；调整各国货币币值；恢复固定汇率制度；逐步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以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欧洲共同体六国于七一年二月就成立“欧洲经济货币同盟”问题达成协议；七二年三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六国的外交、财政、农业部长在布鲁塞尔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了实施“经济和货币同盟”的第一阶段措施，决定六国中央银行更多地使用六国的货币，以削弱美元的作用；采取共同措施，防止美元游资对西欧的冲击；加强六国财政和经济合作。同年十月，共同体九国（包括将从七三年一月一日起成为共同体成员国的英国、爱尔兰和丹麦）进一步决定建立欧洲货币合作基金，作为建立经济货币同盟的重要措施。虽然西欧有关国家在建立欧洲货币体系问题上各有看法和打算，但是要摆脱美元的控制则是一致的。

西欧还通过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成立的“巴黎俱乐部”，即“十国集团”会议（美、英、法、西德、意、日、荷、加、比、瑞典）向美国施加压力。七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至十八日，“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华盛顿史密森学会举行秘密会议，就调整西方货币兑换率等问题达成协议。最后，美国被迫宣布取消进口附加税，并把美元对黄金的比值贬值百分之七点八九，黄金官价从每盎司三十五美元提高到三十八美元，同时规定各国货币汇率上下波动幅度为平价上下各百分之二·二五。

但是，这些人为的措施并没有解决问题，美元比价继续下

跌，金价继续上升，各地仍屡有抢购黄金的风潮。七五年一月，黄金每盎司最高达到一百八十美元，相当于七三年二月官价的四倍多。

七十年代初期以美元危机为诱发点的西方金融货币危机，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固定汇率制度结束了，浮动汇率制度开始了，西方金融体制在无政府的市场规律中充满着更加激烈和错综复杂的矛盾。但是，金元帝国余威犹在，它仍在西方外汇市场上冲来冲去。斗争是无法调和的："现在，我们与其说存在一个体系，不如说是一套'混合安排'。因为同二十年代相比，今天的汇率安排是七拼八凑、五花八门的，不是那种几乎囊括所有国家的固定汇率制了。"①

言其影响深远，是因为它把欧美经济矛盾推上了一个新水平，并将无止境地传下去。当人们谈起七十年代末美国高利率使西欧深受其害时，还总要联想到七十年代初的情景。言其广泛，是因为它不仅是一种经济范畴里的问题，而是必然跨出这个界限，影响及于欧美之间在国际政治领域的一致性。没有人怀疑，经过六十年代经济跃进的西欧在一场世界经济危机中不会对美国的经济压力逆来顺受。这种经济利益的冲突同政治上的要求总是相表里的：有什么样的经济条件，自会有相应的政治要求。几乎是六国共同体正在向九国共同体扩大的同时，政治上也必定要有西欧自己的要求。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九日，欧洲共同体九国首脑在巴黎举行会议，声明决心在七十年代末把欧洲共同体建成"欧洲联盟"，加强政治与经济的联合。在一项意向性的政治声明中，九国表示将协调彼此的"对外政策目标"。② 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在七三年一月二日庆祝英国加入共同体的宴会上说，九国应该制定"共同的对外和社会政策"，他说，(共同体的) 目标必须是使

---

① 瓦尔特·S·萨兰特：《一九二九年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哪些变化》，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世界经济形势与经济危机》，时事出版社，1983年版，第 137 页。

② 《纪事年鉴——1972》，第32卷，第841页 A 8。

欧洲成为“美国的名符其实的伙伴”。①

美国尼克松政府感到，西方联盟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二）“欧洲年”——“痛苦的调整”

西欧成熟了。过去把六国共同体称作“小欧洲”，扩大为九国以后，情况便大不相同了：以人口论，九国人口是二亿六千万，美国是二亿一千万，苏联是二亿四千九百万；以国内生产总值论，九国总额几乎是苏联的两倍，与美国的总额不相上下。这样的实力，加上共同的对外政策，在大西洋联盟内部本该具有相应的政治份量，是可以不言而喻的。

美国尼克松政府对于西欧政治、经济动向及其对欧美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是深有察觉的。它感到，欧美关系从六十代以来就不断发生问题，与战争结束后那种美国说了算的局面大不相同了。因此觉得美国必须特别注意西欧的形势，有必要对欧美关系中的问题作一番全面的考察。尼克松政府把一九七三年称作“欧洲年”，就反映了欧美关系的这种重要变化。

“欧洲年”这个词是基辛格在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美联社编辑年会上第一次提出的。基辛格在这次讲话中说：“把一九七三年作为欧洲年，因为一代人以前的决策所形成的时代行将结束。”还因为，“西欧的复兴已成定局”、“东西方军事战略平衡已经从美国的优势转到接近均势”、“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性增加了”、目前“正处于紧张关系缓和时期”、“一代人以前未预见到的问题出现了，需要新型的合作行动”。基辛格提出，根据新的形势，欧洲应该比过去同美国分担更多的义务，为此，美国和西欧应该制定一个“新大西洋宪章”。②

---

① 《纪事年鉴——1973》，第33卷，第2页C8。

② 《基辛格回忆录——动乱年代》第一册，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94—195页。

尼克松七三年五月三日向国会提交的题为《七十年代美国对外政策——缔造持久和平》的长篇报告，进一步发挥了基辛格的想法，报告以相当的篇幅在第三部分“加强伙伴关系”中着重分析了“欧洲和大西洋联盟”问题。

这是一份研究欧美关系新发展的重要文件，从美国的立场出发比较全面地涉及了欧美关系中的若干根本问题，直到今天还有它的现实意义。所以，应该略多作些介绍。

尼克松在报告中把一九七三年称为“欧洲年”，他说：“这一年之所以将成为欧洲年，是因为国际环境，尤其是欧洲发生的变化，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新的机会。”

有哪些变化“影响美国同欧洲关系的新趋向”呢？尼克松认为：第一，“战后时期的两极对抗不再支配国际关系。欧美联盟关系与日益变化的国际关系同时并存。大西洋两岸都不得不承认世界上新的均势将向我们的团结提出挑战”。第二，在欧洲，战争的危险减少了，因此“转变了的战略环境产生了全新的威慑和防御问题”。第三，欧洲共同体的发展和扩大，“使欧洲成为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而且“在经济一体化之外又增添了新的政治方面”。

尼克松的《报告》根据这些变化得出结论，“美国同新欧洲的关系非改不可”。尼克松说，过去美国曾以为“一个高度团结的西欧将使美国解除许多负担”，现在看来，“我们这种设想也许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报告》从经济、防务和外交三个方面进一步分析欧美关系。

在经济方面，欧洲共同体“制订了保护其本身的特殊利益的政策”，从而“在欧洲内部形成比较关闭的贸易制度”，“美国却在发生越来越大的国际收支逆差。”《报告》指责西欧各国“一直奉行经济上的地区主义”，因而欧美之间“存在着经济冲突的因素”。美国提出必须同西欧进行全面谈判，美国的目的是“研究侵犯美国具体利益的具体问题”，并且“商定解决这些问题的综合的办法”，以便“制止逐渐走向大西洋两岸实行经济保护主义的趋势”。

在防务方面，近十多年来的力量对比趋势表明，"西方不再象过去那样占有核优势"，美苏之间出现了新的战略平衡；因此在六十年代西方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灵活反应的原则"，用以取代"直接的、巨大的核报复办法"；在新的情况下，"以常规部队防卫西欧的能力，其关系之重大远远胜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尼克松在这里提出了肯尼迪在十年前曾提出的老问题，即要求西欧盟国承担加强北约常规部队的责任，"准备花更多的钱购置装备，来改进它们自己的部队并使之现代化"。尼克松《报告》直截了当地提出："欧洲部队的改进，是分担防务负担的最重要的方面。因为所有的欧洲防务开支几乎都是同北约组织直接有关的，所以，欧洲方面努力的增加，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分担部分的减少。"尼克松要求西欧盟国接受美国提出的"共同安全概念"，并在以下"三条平行的道路上"作出努力：第一，提高"灵活反应原则所要求的水平和质量"。换句话说，美国控制和发展核战略武器，西欧盟国分工发展"保卫西欧"的常规武器。第二，"重新研究一旦必须进行核防御时的战略选择"。第三，"在联盟内部准备一种把防御计划与谈判共同均衡裁军的外交活动结合在一起的军政结构"。

在外交方面，欧美需要在"目的方面取得基本协调"。《报告》说，"个别欧洲国家同苏联、也同华沙条约的其他成员国建立双边关系的情况，近年来多起来了。"西欧很关心美苏关系的发展，而且希望影响美国同苏联的关系来巩固它们自己的安全。尼克松抱怨说，西欧国家往往极力主张美国同苏联打交道的态度应比较灵活；但在其他时候，西欧却批评美国同苏联的关系操之过急或走得太远。《报告》解释说："美国不会使联盟的关系从属于苏美关系。"尼克松认为，西欧应该在基本安全结构问题上与美国协调，并取得一致意见；只有如此，西方联盟内部才会有"相互信任"。①

① 《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这份报告很长，这里只极概要地介绍了有关欧美关系的一些主要观点。

当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在尼克松向国会提交这份报告的同一天，也向新闻记者说，美国的西欧政策是要鼓励盟国“在世界上承担与其经济实力和政治活力相适应的责任”。基辛格说，当前在欧洲和日本都存在着强烈的“经济地方主义”的倾向，需要以“更广泛的政治目标加以抵销”。他说，如果这种地方主义得不到制止，那么，在大西洋两岸就会经常发生冲突，每次谈判都要变成“实力的角逐”，迟早会“损及其他方面的关系”。①

五月二十六日，美国政府通过美国驻法使馆向法国递交了一份题为《尼克松总统和蓬皮杜总统冰岛会谈拟议的成果》的备忘录，为尼克松和蓬皮杜将于三十一日在雷克雅未克举行两国首脑会谈作准备。这份备忘录把美国建议在七三年底签署“新大西洋宪章”的内容通报法国。备忘录提出，美国希望在七三年底尼克松访问欧洲时与西欧各国草拟“大西洋关系准则”，然后把这些准则“包含在一个以北大西洋联盟和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签署的宣言形式发表的文件里”。美国建议，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内容，如“大西洋国家遵循的准则和分享的广泛利益的声明；确定七十年代战略条件下的共同安全利益和目标；对东西方关系和对第三地区关系的基本方针；在环境、能源供应、技术交流等共同的问题方面的合作原则，对经济关系包括贸易谈判和改革国际货币体制工作的基本方针”等等。②

“欧洲年”、“新大西洋宪章”等的内容大体就是如此。可以看出，美国深深感觉到，美国已经不那么容易控制西欧了，“马歇尔计划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一旦欧洲在经济上强大起来，在政治上联合一致，北大西洋合作便不可能是美国说了算了，不可能主要商讨美国的意向了”。美国和西欧的关系需要“进行痛苦的调整，需要耐心，需要敏感”。③美国政府想怎样

---

① 《纪事年鉴——1973》，第33卷，第359页A8。
② 《基辛格回忆录——动乱年代》，第一册，第2?6页。
③ 《基辛格回忆录——动乱年代》，第一册，第170页。

“调整”呢？这就是，美国和西欧结成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在全球性问题和经济问题上协调政策；美国要尊重西欧的主权，西欧则要克服“地方主义”，美国继续对西欧实行“核保护”，并在欧洲保留一定驻军，同时西欧也要在常规防务上分担责任。美国希望和西欧在这些问题上取得相互谅解，形成文件，把美欧关系的新格局定下来。

“痛苦的调整”，诚然如此。一进入七十年代西欧实现的一件最有影响的业绩，就是英国、丹麦和爱尔兰三个国家加入了欧洲共同体。这件事本身说明，无论西欧各国之间有什么矛盾，毕竟在西欧联合问题上迈出了极重要的一步。这件事与美元危机的冲击、美国被迫撤出越战、美苏削减战略武器第一阶段会谈条约的签订以及四国柏林协议等事件先后发生，西欧各国从不同角度感到，西欧必须首先巩固自己刚刚取得的成果，使共同体的建设朝向西欧联合和西欧“用一个声音说话”的目标迈进，因此，并不急于同美国谈大西洋的伙伴关系问题。西欧对美国的政策还有不少问号。基辛格概括当时欧美关系的状况时认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孤立主义情绪浓厚的美国和内向的、保护主义的欧洲共同体存在着发生严重冲突的危险”。① 其实，实质问题并不在此，而在于美国在新的条件下想尽可能多地保住美国对西欧的影响，而西欧则要求有尽可能大的独立决策权。

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被称为英国保守党内的“欧洲派”，一向主张英国必须向西欧大陆靠拢。英国第一次申请加入共同体被法国否决时，希思是英方首席谈判代表，他在六三年一月二十九日最后一次谈判会议上说，英国政府申请加入共同体的决定，“在英国对外政策中是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是一项伟大的决策，一个历史的转折点”。② 十年后，在希思出任首相时，英国终

---

① 《基辛格回忆录——动乱年代》，第一册，第183页。

② D·C·瓦特选编：《1962年国际事务文件汇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1971年版，第510页。

于从七三年一月一日起成为欧洲共同体的正式成员，希思把这一天称作“宏伟的时刻”。他说，他将作为“把英国带进欧洲的首相”在历史上留下一页。① 在欧洲联合问题上，希思的调子同蓬皮杜、勃兰特是比较接近的。在英国刚刚加入欧洲共同体的当口，希思首先考虑的自然是欧洲问题，所以对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新设想，起码是不积极的。据基辛格记载，希思同意尼克松的意见，认为“在大西洋关系中，采取行动是必要的”，但涉及到具体怎样做的时候，“他（希思）主张欧洲的组织机构在取得进一步进展以前，建立伙伴关系的事先搁一搁”。基辛格语含讥讽地说：“希思在下诊断方面贡献之大，或者在开药方时用词之含糊，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② 基辛格说希思是把欧洲作为一个单位来考虑问题的，因而“决心避免英美之间的任何勾结”。③ 希思认为，欧洲应该扮演主角，而不只是充当一名华盛顿的有名无实的配角，“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④

英国取得共同体正式成员的资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蓬皮杜虽然不象戴高乐那样毫无妥协余地，而是看到继续拒绝英国将对法国不利，但是，对于英国的抉择并不就此完全信服了。就在英国七二年一月二十二日签署加入共同体的协议以后，蓬皮杜竟突然在三月十六日宣布将把英国加入共同市场一事作为一件重大问题，在法国人民当中进行一次公民投票。这一决定一时在英国引起一片疑云，特别是公民投票的日期同英国女王将访问的日期（五月）相当接近。两天后，蓬皮杜与希思会晤，据说，两人对于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后欧洲未来该是什么样子，取得了广泛的

① 伊维森·马卡达姆主编：《1973年世界大事年鉴》，隆格曼斯，格林出版社1974年，第24页。

② 《基辛格回忆录——动乱年代》，第一册，第183页。

③ 《基辛格回忆录——动乱年代》，第一册，第184页。

④ 《基辛格回忆录——动乱年代》，第一册，第180页。

一致看法。①

在这样的情况下，希思对于美国把大西洋关系放在优先地位的建议，持审慎态度，就不难理解了。

勃兰特七三年五月一日到了华盛顿，这时勃兰特的东方政策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勃兰特需要把同东方缓和的势头保持下去。所以，在同尼克松会晤时，他闭口不谈美国关于"新大西洋宪章"的建议。在尼克松举行的国宴上，勃兰特特意讲了这样几句话："我们（指欧洲共同体各国）中间谁都不可能只以本国代表的身份同你会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已经是欧洲共同体的代表了。因此，我来这里，不是作为欧洲的唯一发言人，而是作为欧洲的一位代言人。"② 意思很明白，勃兰特不准备接受美国的建议，两国的联合声明也没有提"新大西洋宪章"。

美国的建议能不能行得通，最重要的还是法国的态度。美国政府在雷克雅未克会谈之前寄出的备忘录，始终没有得到法方的回音。蓬皮杜就任总统以后对美国的态度比戴高乐松动多了，但是坚持法国的独立自主没有变，坚持"欧洲人的欧洲"观念，也没有改变。五月三十一日尼克松和蓬皮杜的会谈是很不顺利的，在这之前，基辛格与法国外长若贝尔也进行了多次谈判，都没有在美国的建议上取得任何结果。

意大利的态度也不比其他国家更积极些，基辛格说："在关于大西洋政策的新倡议问题上，安德雷奥蒂（意大利总理）只是泛泛地表示他的好意和支持。我们可以指望得到善意的谅解，但意大利政府却不肯在新倡议中带头。"③

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欧洲年"问题上煞费苦心，开展了大量外交活动，然而收效甚微，到七三年下半年，"欧洲年"之议就

---

① 伊维森·马卡达姆主编：《1972年世界大事年鉴》，隆格曼斯，格林出版社1973年，第9页。

② 《基辛格回忆录——动乱年代》，第一册，第200页。

③ 《基辛格回忆录——动乱年代》，第一册，第193页。

消声匿迹了。围绕着“欧洲年”的频繁活动反映了一种不可遏制的动向：西欧对于国际政治的立场和政策将千方百计地摆脱美苏关系的影响；西欧认为，欧洲的问题、欧洲以外其他地区的问题，都不应该纳入苏美争夺的轨迹，因此西欧无需按照美国的意图行事，而应该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制订自己的安全政策。这诚然是困难的课题，所以行程是曲折的；然而，西欧必定要朝这个方向去做。七月二十三日，欧洲共同体九国外交部长在哥本哈根举行了会议，会后，共同体部长理事会向美国通报了会议的结果，既回避了“欧洲年”问题，也没有提到尼克松年底对欧洲的访问问题。“欧洲年”云云，也就不了了之了。

（三）“西欧要用一个声音说话”

不久，欧美在中东阿以“十月战争”和“石油危机”问题上发生了公开分歧。

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埃及、叙利亚军队和巴勒斯坦游击队反击以色列侵略的“十月战争”爆发。战争开始时，埃叙军队进展顺利，埃及军队迅雷不及掩耳地越过了苏伊士运河，从七日起在西奈半岛向前推进；叙利亚部队也迅速收复了六七年“六五战争”被以色列侵占的戈兰高地。但从八日起，战局陡然逆转，以色列依仗美国军火的优势猖狂反扑，重新侵占了戈兰高地，跨过运河，把战火推向埃及领土。二十二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338号决议，要求交战双方执行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六月通过的242号决议：以色列撤出占领地区，双方就地停火。

“十月战争”在西欧引起的反应与六七年的“六日战争”有所不同。过去，西欧国家一般持偏袒以色列的立场，法国在六七年阿以战争期间是唯一谴责以色列侵略的国家。这次则转变为采取有利于阿拉伯的立场，从而与美国的立场相抵触。其主要原因是与战争相联系的所谓“石油危机”问题。

"十月战争"爆发后，生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及其他一些产油国家，纷纷以石油为武器，采取石油减产、禁运、提价、国有化和增加本国控制权等措施，向美国和其他支持以色列的国家施加压力，决定立即把原油价格提高70％，从七四年起再提高128％，即把阿拉伯标准原油标价从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1.651美元。依靠石油进口的西方主要工业国家遭到了沉重打击。这些国家的生产大幅度下降，国际收支极度恶化，通货膨胀加重，失业人数激增，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最严重、为时最长的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阿拉伯国家在使用"石油武器"方面态度很团结一致，后来其他地区的石油输出国也采取了相同的立场。

西欧对于阿拉伯石油的依赖性很大，受到石油危机的打击最大、最直接。这个因素对西欧在阿以冲突中应取何态度有决定性影响。西欧很明白，继续和美国一起支持以色列，就意味着自己动手把石油来源切断；一个没有资源的西欧是无法生存和发展的。美元危机加深了西欧同美国在经济利益上的鸿沟，石油危机则加强了西欧在政治上取独立姿态的决心。欧美的不同立场从西欧国家的两个重大举动中亮出来了。

第一，西欧许多国家禁止美国向以色列运送军火的船只在本国港口停靠。据十月二十四日《纽约时报》报道，希腊、土耳其、西班牙、意大利等地中海国家公开表示不许美国军火船只通过它们的港口；据传，英国也准备采取相同的态度。① 第二天，联邦德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不同意美国利用西德领土向以色列转运武器，西德将保持"严格中立"的态度。②

第二，欧洲共同体九国对阿以冲突采取了大体一致的立场。法国总统蓬皮杜十月三十一日给欧洲共同体其他成员国政府首脑写信，建议在七三年底举行九国首脑会议，就中东和其他问题交换

---

① 1973年10月24日《纽约时报》。

② 《纪事年鉴——1973》，第33卷，第882页A2。

意见、协调政策。① 蓬皮杜在同一天举行的法国内阁会议上说："根据最近的事态发展，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中东）停战和为举行和谈而进行的尝试都是在欧洲没有以任何名义参加的情况下筹备和进行的。"他表示反对由美苏两家包办中东事务的作法，认为这"不符合欧洲国家应该起的作用，基于历史、地理和同地中海国家由于重大经济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各种联系，欧洲国家与近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②

蓬皮杜基本上反映了西欧各国领导人的想法；他们担心美苏两国排除西欧、在中东问题作出不利于西欧的交易；同时由于石油资源的缘故，也不愿意支持美国的亲以色列政策从而损害自己同阿拉伯的关系。

十月二十五日，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霍姆，针对苏联提出的由美苏监督中东停火的建议，在下院说，派到战场去的任何联合国军队不应听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的摆布。三十一日他在下院外事辩论中发言时还说，英国和其他国家能够在中东问题上发挥作用。③ 联邦德国外交部长谢尔二十八日也对记者说："最使我感到苦恼的是，欧洲人在整个（中东）冲突中再一次不能施展影响。"他说："我们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必须就下面这一点达成谅解：如果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发生冲突，联盟伙伴彼此之间将采取什么态度。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联盟伙伴互相进行协商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欧洲方面产生激怒情绪首先是由于没有一个联盟伙伴被告知关于美国在近东冲突事件上的意图和决定，这就引起了激怒情绪并会导致误解。"④

蓬皮杜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共同体其他成员国的赞同。英国首相希思办公室官员说，蓬皮杜的建议同希思十月十三日在英国保

---

① 《纪事年鉴——1973》，第33卷，第900页B2。
② 据法新社10月31日报道。
③ 据新华社1973年11月2日讯。
④ 据新华社1973年11月2日讯。

守党年会提出的西欧“共同市场”成员国政府首脑需要定期聚会的建议是一致的。① 希恩在保守党年会上建议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可以每年开一至二次，目的是给共同体的对内对外政策制定战略性的指示。② 他问道："仅在几年前，谁会想到：英国、法国、德国（指联邦德国）、意大利和我们的其他伙伴在共同的欧洲同一性问题上能够意见一致，其结果是制订出对我们的主要盟国——美国的一项欧洲共同政策？"③

联邦德国政府发言人三十一日在波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联邦政府欢迎法国总统提出的定期举行欧洲共同体成员国最高级会议的建议。意大利总理莫鲁尔也向法国驻意大利大使表示，意大利对促进“共同市场”九国政治联盟的一切动议都表示赞成。④ 丹麦首相耶恩森十一月二日也表示支持蓬皮杜的建议，并提供哥本哈根作为会议的地点。⑤

十月六日，共同体九国外交部长在布鲁塞尔举行两天会议后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以色列“结束从一九六七年冲突以来所保持的领土占领”，指出，任何和平解决方案都必须“考虑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⑥

十二月十四日至十五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欧洲共同体九国首脑会议，在共同体的历史上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是趁着英国加入共同体的势头显示西欧团结的一次会议；由于当时正值欧美关系在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都出现争论的时候，所以，这次会议比较全面地检阅了这些问题，并且提出了“用一个声音说话”这个著名的口号。虽然共同体内部问题很多，但是这次会议

---

① 据新华社巴黎1973年11月1日电。
② 《纪事年鉴——1973》，第33卷，第874页D2。
③ 据新华社伦敦1973年10月13日电。
④ 据新华社巴黎1973年11月1日电。
⑤ 据新华社哥本哈根1973年11月20日电。
⑥ 《纪事年鉴——1973》，第33卷，第919页D3。

作为西欧联合的一个发展标记，是应该肯定下来的。

这次会议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发表了欧洲共同体九国外交部长通过的关于"欧洲同一性"的文件。文件说："目前的国际问题是九国中的任何一国难于单独解决的。国际上的事态发展以及权力和责任日益集中于数量非常少的大国手中一事，意味着欧洲必须团结起来，并且必须越来越用一个声音说话，如果它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要在世界上发挥适当作用的话。"所谓"用一个声音说话"在对外关系方面就是"九国应该在对外政策方面逐步确定共同的立场"。① 会议闭幕式上通过的声明重申了十一月六日九国外交部长会议的立场。可以说，九国在中东问题的立场是共同体"用一个声说话"的第一个表现。

在欧洲共同体九国首脑会议举行期间，阿尔及利亚、苏丹和突尼斯的外交部长以及阿布扎比的代表来到哥本哈根，在十四日晚上同九国外长就中东局势和能源问题举行了会谈，他们向九国外长说明了上个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的立场。第二天，欧洲共同体现任主席、丹麦首相耶恩森代表九国首脑同他们进行了会晤。这些会晤对于促进西欧国家发展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促使西欧在阿以冲突上采取有别于美国的立场，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西欧各国在中东问题比较鲜明地有了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七四年三月四日，欧洲共同体九国外交部长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探讨与阿拉伯国家开展在经济、技术和文化方面的合作的途径。西欧国家认为，作为开始可以考虑"前三步"：阿拉伯国家派出代表在波恩与共同体理事会主席、联邦德国外交部长瓦尔特·谢尔进行外交会晤；建立联合工作小组，讨论可以进行合作的领域；如有可能，还可以举行共同体与阿拉伯国家的部长级会

---

① 据新华社哥本哈根1973年12月14日电。

议。[1] 应该顺便提到，一个月前，美国曾倡议在华盛顿举行有十二个石油消费国参加的会议，美国的想法是把石油消费国联合起来作为一方同石油生产国的另一方进行谈判，这样势必造成石油消费国和石油生产国的对立，并形成僵持局面。法国当时就持反对意见，而且也没有派代表参加会议（西欧参加会议的有比利时、英国、丹麦、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和联邦德国）。

三月四日共同体部长会议显然同美国的倡议相抵牾，等于宣布不同美国一起搞对付阿拉伯国家的联合阵线。共同体在美国政府正急于修补大西洋联盟的裂缝而在西欧积极活动的时候作出这样的决定，在美国看来不啻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当时，基辛格正在西欧活动，试图搞一个美国和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声明，欧洲共同体事先不曾征求美国的意见；美国保留对阿拉伯国家采取同共同体采取的行动相类似的措施。[2]

美国方面对共同体最强烈的反应，也许要算尼克松在三月十五日在芝加哥一次电视讲话中说的几句话，他说："欧洲人总不能两样都要。他们不能既在安全方面要求美国的参与和合作，又要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与美国唱对台戏和持对立态度。"他说，如果西欧继续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立下去，那么美国"在安全方面就不可能继续在欧洲保持目前水平的存在"。[3] 三月十九日，尼克松又说，他本人并不主张削减美国的在欧驻军，他是想说，如果西欧继续跟美国对立下去，国会可能拒绝批准与欧洲安全有关的防务拨款。[4] 尼克松的这些话同一年前提出"欧洲年"时的语言大不相同了，不仅有抱怨，有气恼，而且语近要挟了。

---

① 《纪事年鉴——1974》，第34卷，第158页B3。
② 《纪事年鉴——1974》，第34卷，第159页A1。
③ 《纪事年鉴——1974》，第34卷，第210页A2。
④ 《纪事年鉴——1974》，第34卷，第210页E2。

六月十日，共同体九国外交部长在波恩举行了两天会议，决定向二十个阿拉伯国家提供“经济、技术和文化方面的合作”，如果进展顺利再举行欧阿双方的部长级会议。会议还协议，在具体有关问题上举行美国与共同体之间的磋商。[①] 第二天，基辛格和联邦德国外交部长会晤，基辛格对欧阿部长级会议表示保留，说美国不赞成“在不十分明确讨论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召开这样的会议。[②]

进入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欧的关系在哪些问题上出现了麻烦，观察家们已经看出眉目来了；而且在这些问题上的争执注定要持续下去。西欧各国将继续奋力使自己的货币少受美元波动的冲击。它们感到，布雷顿森林体系曾经奠定了美元霸权的统治地位，固然使西欧的货币处于被动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西欧仍不免受到美元暴升、暴降的威胁。石油危机表明，西欧需要自己的中东政策；西欧觉得西欧在东西方关系中是属于同美国同一营垒的，然而把任何国际问题——特别是欧洲以外地区的问题——都纳入美苏关系的轨道，却对西欧不利。西欧有自己的利益，西欧在六十年代没有卷进越战，对七十年代的中东战争，西欧便进而采取了与美国不同的立场。即便是在东西方关系上，西欧也认为，与美国结盟与跟着美国亦步亦趋，完全是两回事，更何况越战失败后的美国、美元地位失控的美国、与苏联签订了削减战略武器协定的美国，早已不是北大西洋公约签订时的美国了呢！当尼克松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西欧不能不提出西欧该怎样做的问题。西欧曾经推动美国同苏联缓和紧张空气，但美苏绕过西欧的任何交易，却不会使西欧放心。十多年前西欧已隐隐约约地担心欧美会不会因核均势的出现而“脱钩”，现在，美国则公然以“脱钩”来威胁西欧了。以下几章的叙述都多少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

---

① 《纪事年鉴——1974》，第34卷，第494页B3。

② 《纪事年鉴——1974》，第34卷，第494页D3。

·第十四章·

所谓"缓和势头"

（一）两个会议的时代背景

进入七十年代以来，欧美关系当中的矛盾和利害冲突更深化了，但东西方关系却出现了明显的缓和趋向。这两种国际现象几乎平行地在欧洲舞台上出现。

似乎欧美关系的不洽、西欧对美国离心倾向的增长，与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从现象上看是成正比的。这看来似是而非，但确实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这个内在联系就是西欧要求摆脱、或少受超级大国争夺或妥协的制约，独立自主地发展同东欧的来往。西欧主张不把东西欧关系纳入美苏全球关系的轨迹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有了变化，不应要求东西欧之间的关系也跟着变化。

当然，美国松动同苏联的关系、松动同中国的关系，对于西欧早就想缓和东西欧关系的打算，可以提供有利的国际气氛。因为，东西欧关系毕竟不能不受美苏关系的影响；如果美苏关系没有明显的松动，东西欧改善关系总要受到限制。五十年代末，麦克米伦接替艾登出

任首相时曾一度对于东西方在中欧地区脱离接触的设想——如波兰外交部长腊巴斯基一九五七年提出的"中欧非原子武装计划"和第二年提出的中欧分两阶段裁军的计划等——表示有兴趣。但是，很快就退回去了，因为美国坚决反对，当然联邦德国也感到这类方案将损及它自己的利益。到七十年代初，搞脱离接触区虽仍然是不现实的，但东西欧要求相互接触，相互来往，却已有不可阻挡的势头了。这个势头之终于能这样发展起来，从根本上说固然是因为欧洲内部有此内因，美苏关系之发生变化，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美国总统尼克松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访问了苏联。这次访问被看作是美苏缓和的重要标志。在访问期间，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完成了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开始的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装会谈（SALTI），签署了"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和"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及其补充"议定书"。

根据这些文件，美苏双方只能在各自的两个发射场上各设置一百枚反弹道导弹截击器；五年内（期满时得以"永久性协定"代替之）冻结双方战略进攻导弹的数目。例如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可部署1054枚，苏联1618枚；关于潜艇弹道导弹发射器，美国不能超过710件，现代弹道导弹潜艇不能超过44艘；苏联限额分别为950件和62艘。文件还规定禁止把轻型洲际弹道导弹体系改装成重型导弹、禁止对导弹库藏进行任何重大扩建，等等。①

在尼克松的这次访问中，美苏双方还签定了包括十二条的"关于苏美相互关系准则的声明"。声明说："在核子时代，（两国）除了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处理它们的相互关系之外，没有其他途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不应妨碍在"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的正常关系"。声明表示，

① 全文见《纪事年鉴——1972》，第32卷，第396页—397页。

双方要尽一切可能防止"军事对抗"和"爆发核战争"，要通过"协商"和"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声明还说，美苏领导人应继续进行必要的接触，两国将在经济贸易、科技交流等领域发展关系。①

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原则上达成协议，作为相互交换条件，苏联倡议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和西方倡议的中欧均衡裁军会议平行进行。

第二年六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勃列日涅夫回访美国。在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关于防止核战争的协定"，内容包括：双方重申"避免军事对抗"，消除"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协议不向对方和对方的盟国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万一发生"核冲突"或有发生"核战争"的危险，双方应立即进行"紧急磋商"，并且"作出避免这一危险的一切努力"。②

双方在二十五日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宣称，中欧裁军会议将于十月三十日在维也纳举行；同时提出，如果将于七月三日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进展顺利，则有可能举行一次欧洲、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元首的最高级会议。③

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的这一来一往，以及他们签署的这些协议，为美苏关系蒙上了一层从未有过的缓和气氛。"关于两国关系的准则"则等于向世人宣告，美国和苏联都认为不能再用五十年代的办法来对待两国关系中的问题。这份文件使用了西方一向拒绝使用的"和平共处"一词。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条约和防止核战争的条约，虽然谁都知道这些纸上的东西对于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根本起不了任何实质性的"限制"作用，但它反映了一种两个最大的核国家需要达成某种妥协的政治气候。六十年代使苏联的核力量同美国的核力量之间的差距缩小了：古巴导弹危机

① 全文见《纪事年鉴——1972》，第32卷，第396页A 1。
② 全文见《纪事年鉴——1973》，第33卷，第530页E 1—G 2。
③ 《纪事年鉴——1973》，第33卷，第529页G 2—530页A 1。

发生时，美国拥有294枚洲际弹道导弹，苏联只有75枚；到一九六九年，苏联已发展到1,050枚，美国为1,054枚。潜艇弹道导弹和远程轰炸机，美苏已趋均衡。这表明，苏联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美国，因此在谈判中居于有利地位。这就是导致美苏关系和缓的实力基础：双方的核均势使双方都不敢不计后果地动用这种武器。因此，双方确认，在“核子时代”，除了“和平共处”之外别无其它选择。

西欧对于缓和紧张局势的看法，与美国有不同的侧重点，更着重欧洲本身的安全问题和改善东西欧关系。为此，西欧希望以推动美苏和缓来推动欧洲的和缓；它既需要美国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继续承担义务，也需要美国参与欧洲缓和的进程。

然而，希望美国参与欧洲缓和的进程，绝不意味欧洲局势的缓和进程要由美国来决定。西欧认为，欧洲国家自己才是欧洲和缓进程的主人。戴高乐和勃兰特在整个六十年代所作的，都是这件事情，都是朝着使欧洲成为“欧洲人的欧洲”这个大方向作出努力的。戴高乐表现得更激进一些，索性把法国军队从北约的军事司令部撤出来；勃兰特则在宣布新东方政策时一再宣称联邦德国属于西方联盟。但是，殊途同归，都是要达到强调欧洲“同一性”的目的，使欧洲成为一个独立于美国和苏联的欧洲。这样一种“欧洲观”到七十年代已成为西欧政治家和学者相当一致的观念了。

对于联邦德国来说，和缓还有另一层意义，涉及到与德意志民族更为切身的问题，就是需要保持和发展战后成为两个主权国家的特殊关系。正象勃兰特说的，在欧洲统一问题解决以前，德国的重新统一是很难设想的。他认为，东西欧关系的持续缓和，必将有利于东西德之间改善关系和增进来往。

从这一观点出发，西欧国家力主首先就北约和华约的军事力量最密集的中欧地区的安全和缓和问题，举行谈判，把双方的武装力量裁减到尽可能低的水平。这就是北约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二

十五日提出的“相互和均衡裁减军备”的建议。同样也是从这一观点出发，西欧国家对于苏联早在一九五四年第一次提出的召开全欧安全会议的建议，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对于西欧来说，中欧裁军建议是出于保障欧洲安全的考虑，而召开一次有东西欧国家代表参加的全欧会议也有利于促进东西欧之间的广泛而持久的接触。

欧、美、苏想法有了接近，动机却各有不同。苏联提出召开全欧安全会议的首要目的，是通过全欧会议从政治上把雅尔塔会议以来的现状肯定下来，第二是开展东西方贸易。西欧对东西方贸易也有兴趣，同时希望从欧洲的历史传统的“同一性”出发，促进东西欧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人员来往，通过长期接触促进东欧的所谓“和平演变”。美国起初对欧洲安全会议问题有些迟疑，后来在西欧的推动下，以召开中欧裁军会议为条件同意平行地举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并且在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七二年五月的一揽子会谈时，与签署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一起确定下来。

于是，中欧裁军谈判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便成为七十年代上半期欧洲缓和进程中的两大重要议题。这两件事不管结出什么样的果实，都表明西欧决心要把欧洲的稳定、和缓和安全问题抓在手里——这是进入七十年代以来西欧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动向。

（二）中欧裁军会议

一九七二年九月，基辛格访问苏联，美苏双方商定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和互相裁减军备会议的时间表。欧安会的筹备会议定于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举行；中欧裁军会议的筹备会议定于七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举行。

十月二十三日，北约成员国就北约方面将有哪些国家参加中欧裁军谈判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在属于“裁减区”内驻有武装

力量的国家都是参加国，因此，在北约组织方面，美国、加拿大、英国、联邦德国、荷兰、卢森堡和比利时都应派正式代表出席；法国由于已撤出北约的军事一体化组织，声明将不参加会议。北约的南北翼国家各作为一个集团，各派一名观察员与会。十一月十五日，上述北约将参加会议的国家向苏联、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发出了邀请信，邀请它们出席将于七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举行的中欧裁军会议筹备会议。在磋商过程中，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列入了观察员名单，匈牙利则拒绝参加。

七三年一月，勃列日涅夫和蓬皮杜在明斯克举行会谈，勃列日涅夫坚持法国必须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会议，遭蓬皮杜拒绝。蓬皮杜说，两个会议的时间表是美苏两国商定的，法国未得与闻，因此不准备参加中欧裁军会议。

直到筹备会议举行的时候，会议参加国的范围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一月十八日，华沙条约组织表示，凡对于会议有“正当兴趣”的欧洲国家均可参加，会议不应在集团对集团的基础上进行。

筹备会议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从一月三十一日至五月十四日，仍讨论和确定会议的参加国和观察员名单。第二阶段从五月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八日，讨论会议要达到的目标和应遵循的原则。

第一个问题直到五月十四日才达成如下妥协：正式参加国有：英国、联邦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美国、加拿大；苏联、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北约所有侧翼国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匈牙利与会问题，仍没有达成协议。华沙条约国家表示，只有在“具备了适当条件”的情况下，才能考虑匈牙利参加会议的问题。这里所说的“适当条件”是指意大利也作为正式成员国参加。既然北约坚持意大利不属于“裁减区”，因此华约方面便决定匈牙利不参加会议。

关于会议参加国的争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因为，

既然叫做“中欧”裁军会议，那就要划定哪些国家属于这个范围：凡划在里面的国家就属于“裁减区”，这个国家的外国驻军和本国军队的裁减问题便应在讨论之列。这就是匈牙利和意大利是否作为会议正式参加国的症结。

第二阶段筹备会议要讨论的，简单地说，就是中欧裁军会议要做什么。

筹备会议结束时发表了一项公报，提出，中欧裁军会议将讨论“互相裁减在中欧的武装力量和军备以及有关措施问题”；会议的目的是“致力于在欧洲实现更加稳定的格局和巩固和平和安全”；裁减的范围和时间都将“审慎地加以制定”，以便使裁减的结果“在各个方面和在每一点上对于任何一方都符合不削弱安全的原则”。①

从公报的措词来看，北约方面最初建议的“均衡裁减”的“均衡”（balanced）不见了。

这反映了双方的一种原则性的争论，焦点是北约坚持的“均衡”裁减和华约坚持的“对称”裁减之间的争论。

何谓“均衡”裁减呢？北约国家一方认为，华沙国家驻在中欧地区的武装力量多于北约国家在中欧的驻军，只有把双方的武装力量裁减到同样水平，才能作到“均衡”。所以，从裁减人数看，华约方面应该比北约方面多裁减，因此，双方裁减的数量应是“非对称的”（asymmetrical）。

何谓“对称”裁减呢？华约一方认为，双方力量大体是相等的，根据“不使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削弱”的原则，裁减必须是“对称的”（symmetrical），即双方按同等数量或同等的百分比裁减武装力量。

会后，北约与会国发言人、荷兰代表团团长凡·乌弗尔德在

---

① 弗朗斯·A·M·阿尔廷·冯·格骚主编，《不确定的和缓》，荷兰西托夫和努德霍夫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页。

一次对记者发表的声明中说，“均衡”一词的实质内容在公报中已有反映，“均衡”裁减就是要保持双方“军事力量的较低水平”，以促进稳定，不削弱任何一方的安全。① 华约方面当然不同意这种解释。

从上述情况已经可以断定，中欧裁军会议必定是马拉松式的。说到底，都是要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谈判裁减的逻辑总是保持或争取优势的逻辑。

问题的症结既已十分瞭然，双方从开会伊始提出的方案便注定是无法调和的。直到本书结稿之日，中欧裁军会议断断续续地、一曝十寒地进行了十二、三年，双方依然站在会议开台时的地方；双方在开始时各自提出的方案至今没有突破。现在，在十多年后重新把双方最早提出的方案作一简要回顾，对于了解谈判的若干细微之处，或许是有帮助的。

一九七三年十月三十日，中欧裁军会议在维也纳举行。华约参加国于十一月八日提出了华约的第一个中欧裁军条约草案。华约方面建议，会议双方参加国依据同等数量和百分比的原则裁减军备，裁减以不损害缔约国各方的安全为原则。

根据华约国家提出的条约草案，双方的地面武装力量以及空军力量，包括它们拥有的核武器，都在裁减之列；其相应部分的军事装备和设施也要裁减。裁减分三批实行：

——一九七五年，作为第一批裁减，双方各裁减二万人。

——一九七六年，双方再各裁减 5 %。

——一九七七年，双方再各裁减10%。②

根据伦敦战略研究所的估算，一九七五年至七六年北约在“裁减区”的地面和空军武装部队共1,010,000人，华约为1,100,000人

① 弗朗斯·A·M·阿尔廷·冯·格骚主编：《不确定的和缓》荷兰西托夫和努德霍夫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页。

② 弗朗斯·A·M·阿尔廷·冯·格骚主编：《不确定的和缓》，荷兰西托夫和努德霍夫出版社，1979年版，第106页。

人。[①]按照这个数字计算，裁减的结果，北约还有841,500人，华约918,000人。北约地面部队将从777,000人减为644,000人；华约从925,000人减为775,000人。美国驻中欧的武装部队将从193,000人减为161,000人；苏联从460,000人减为382,000人。

这样裁减的结果不符合北约坚持的“均衡”裁减原则，因为结果仍是华约占优势。而且华约有地理之便，苏联撤走的军备随时可以再运回来，因此，华约提出的条约草案，北约不能接受。

北约参加国在十一月二十二日也第一次提出了一项两个阶段的裁减建议：

在第一阶段，美国和苏联各自裁减其在“裁减区”的15%的地面部队。即美国撤走29,000人（包括部分后勤部队），苏联撤走68,000人（包括一个坦克部队，计1,700架坦克）。

在第一阶段的裁减完成以后，双方再就第二阶段的裁减——裁减欧洲有关国家的部队——进行谈判，北约和华约在中欧地区的限额定为各七十万人。这样，北约裁减48,000人，华约裁减157,000人。[②]

北约建议的意图显然是要把它认为的华约方面的强点裁减掉，即实行“非对称的”裁减原则。这当然是华约一方所不能接受的。

在以后的漫长会谈中，双方建议虽然曾有些变动，但实质都没有变。例如，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五日，华约国家提出把现有驻军“冻结”起来的建议，北约一方即认为这等于把有利于华约一方的军备“不平衡”状态“冻结”起来，所以不能同意。

中欧裁军问题在七十年代初期提出，从西欧的角度出发有两大政治上的考虑：

第一，西欧认为，西欧必须把裁军问题同本地区的利益结合

---

① 《军事平衡1975—1976》，伦敦战略研究所，1975年版，第102页。

② 弗朗斯·A·M·阿尔廷·冯·格骚主编：《不稳定的缓和》，第112页。

起来，西欧需要参与裁军问题的谈判。美苏因核均势而担心发生“相互确保毁灭”的结果，于是寻求某种欧洲人没有发言权的妥协。但这种妥协不但保证不了西欧的安全，而且会使西欧担心自己的利益因超级大国的交易而受到损害。因为美苏的核均势必然使威慑理论——首先是第一次核打击的威慑理论失效，那时，北约对西欧的安全意义就将大成问题。西欧认为，必须通过某种渠道，让美国对西欧的安全承担义务。

第二，西欧认为，中欧地区的安全是西欧最应密切关注的问题，因为这里聚集的双方军队最多，相互最靠近；两个德国和敏感的柏林地区都在这里。所以在推进缓和进程的同时，需要有一个稳定的中欧；如果中欧局势是稳定的，欧洲两部分改善关系就有较好的条件。

中欧裁军谈判，象所有其他裁军谈判一样，不可能谈出什么实质性的结果来，谁也不会做使自己处于劣势的事情。但是，它之所以能够举行，却在政治上反映了一种动向，即东西欧要求相互接触、关心欧洲地区安全的趋向。这在本世纪七十年代是一种带有全欧意义的趋向。

（三）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是苏联等华沙条约国家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一次提出的。当时，法国国民议会刚刚否决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布鲁塞尔条约刚刚把联邦德国和意大利扩大进去，组成西欧联盟，并通过这个渠道使西德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国。在这样的条件下，西方国家拒绝了苏联召开全欧会议的建议。

其实，苏联的建议同西欧希望沟通东西欧关系的主张，本是有汇合点的。戴高乐在同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会谈时就提到过东西欧交流的必要性和现实性。但是在集团之间只有对立、没有沟通的“冷战”时期，这样的会议是不可能召开的。五十年代没

有这种气氛，七十年代的国际条件便比较成熟了。因此当华约国家于一九六九年三月、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于七月重提这项建议时，西欧就作出了积极的响应。法国、联邦德国、英国、意大利等西欧大国分别对召开一次全欧性的会议表示有兴趣。西欧的中小国家——无论是中欧地区国家，还是南北侧翼国家；是北约集团的成员国，或是中立的、不结盟国家——更加希望欧洲局势长期稳定和缓和。比起较大的国家来，它们更加感到，在一个全欧会议上可以提出反映它们特殊利益的问题，能够发挥平常发挥不了的作用。因此，西欧的中小国家对于召开一次专门讨论欧洲安全问题的会议抱有明显的兴趣。

美国对于欧安会建议的反应不象西欧那样积极，在筹备阶段几乎是被西欧国家推着走的。美国感兴趣的，是单独同苏联就全球问题打交道；争夺也好、妥协也好，对象都是苏联；并且坚持东、西欧关系问题应放在美苏两家政治的轨迹上。但是，在欧洲出现要求改善东西欧关系的强大潮流面前，美国又绝不愿意置身于全欧会议之外。

所以，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之终于能在七十年代初举行，是水到渠成的事。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七三年六月八日，大使级欧安会筹备会议在赫尔辛基举行，会议讨论了会议的议程，起草了《赫尔辛基最后建议蓝皮书》，决定将讨论欧洲安全、经济合作、人员和文化交流和续会等四方面问题，通常称为“四个篮子”的问题。欧安会的全过程，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各国外交部长参加的会议，原则通过议程，于七月三日至六日在赫尔辛基举行。第二阶段是专家会议，于九月十八日至七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日内瓦举行，历时将近两年，关于议程的实质性辩论都是在专家会议上展开的；专家会议共开了二千多次，经过反复讨价还价，草拟出《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所以，专家会议应该是欧安会的主体部分。

第三阶段为首脑会议，于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一日在赫尔辛基举行，由与会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代表出席；通常简称的欧安会一般指的就是这次首脑会议。首脑会议的主要内容只是通过文件，各国领导人作些表明立场的公开发言，目的是造成气氛，昭告世界。三十五个参加国是：爱尔兰、奥地利、保加利亚、比利时、冰岛、波兰、丹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法国、梵蒂冈、芬兰、荷兰、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列支敦士登、卢森堡、罗马尼亚、马耳他、美国、摩纳哥、南斯拉夫、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塞浦路斯、圣马力诺、苏联、土耳其、西班牙、希腊、匈牙利、意大利、英国。

会议通过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并不是一个条约性的文件，它不象条约那样对签字国有约束力，与会国可从中各取所需。然而这样规模广泛的会议在战后以来还是第一次，对于促进东西欧的关系、推动西欧在东西方关系上协调观点和立场，具有一定作用。它无论如何是"缓和进程"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记号。同时也应看到，既然文件是妥协的产物，它就必定包蕴着和预示着复杂而尖锐的分歧和斗争。妥协是一种现象，还应看到现象下面的实质。

《最后文件》主要内容有：

（一）关于欧洲安全问题的《与会国之间关系的指导原则宣言》。宣言列了十项原则，即：（1）"主权平等，尊重主权本身所固有的权利"；（2）"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3）"边界的不可侵犯性"；（4）"国家领土完整"；（5）"和平解决争端"；（6）"不干涉内部事务"；（7）"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道德、宗教或信仰自由"；（8）"各国人民的平等权利和自决"；（9）"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包括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合作；（10）"忠实履行国际法规定的各项义务"。①

---

① 《纪事年鉴——1975》，第35卷，第566页A1—A8。

（二）《建立信任措施以及有关安全与裁军的某些问题》。文件规定各国在距离同其他与会国共有边界二百五十公里的地区以内举行有二万五千人以上军队参加的军事演习时，应在二十一天前通知有关国家，并邀请它们派观察员出席。① 欧安会没有专门讨论裁军问题，因为中欧裁军会议正同时在维也纳举行。

（三）《经济、科学、技术和环境方面的合作》。文件说，"与会国将促进尽可能广泛的多边基础上的贸易"，"努力减少直至逐步消除发展贸易的各种障碍"；② 此外还规定与会国需在"对等"的基础上在签证、旅游、最惠国待遇等方面互相给以方便。③

（四）《人道主义和其他方面的合作》。文件对人员接触、旅行、通婚、新闻记者的活动、文化和教育交流等作了具体规定；提出，与会国将促进个人的和集体的自由交流和接触，不论是属于民间的或是官方的。④ 与会者保证将尊重包括思想、宗教信仰等在内的"基本自由"。⑤

（五）《地中海的安全和合作》。文件提出，与会国将与地中海地区非欧洲国家发展良好的关系，并致力于减少这个地区的军事力量和维护这个地区的安全。⑥ 在专家会议期间，马耳他代表坚持《最后文件》应包括要求美国和苏联从地中海地区撤走其武装力量的条款，这样的措词是妥协后的结果。⑦

（六）《关于欧安会续会》。会议决定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欧安会的续会，讨论《最后文件》的执行情

---

① 《纪事年鉴——1975》，第35卷，第566页B 8—第567页A 2。
② 《纪事年鉴——1975》，第35卷，第567页A 2。
③ 《纪事年鉴——1975》，第35卷，第566页F 2。
④ 《纪事年鉴——1975》，第35卷，第567页B 2。
⑤ 《纪事年鉴——1975》，第35卷，第566页F 1。
⑥ 《纪事年鉴——1975》，第35卷，第566页F 2。
⑦ 《纪事年鉴——1975》，第35卷，第508页C 1。

况，并决定是否举行下一次续会。[①]

这些文件包罗万象，把东西方打算通过欧安会公诸于世的主张都兼容并蓄地写进去了，每一个与会国都可以找到自己可以利用的东西，都可以按自己的意图去解释，都可以用此一条来抵销或反对彼一条。因此，包括了美、苏、英、法等大国在内的三十五个国家通过了这份文件，这本身就是一种各方妥协的产物。所以，西欧各国把欧安会得以开成，连同这个作为缓和象征的《最后文件》看作是几年来推行缓和政策的成果。

然而，如同前面说过的，妥协和缓和势头的前提都是因为存在着矛盾、分歧和对立；同时又由于主客观都不存在诉诸公开冲突的条件，才有了妥协和缓和的可能。

《最后文件》主要反映了东西方在两个问题上的斗争和妥协，这两个问题之同时纳入文件意味着一种条件的交换。即：第一，苏联一贯坚持的欧洲各国边界的“不可侵犯性”；第二，西方坚持的“尊重人权”、“人员和文化交流”。

第一，关于“边界的不可侵犯性”。

确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形成的欧洲分治的政治格局——即战后初期形成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是苏联建议召开欧洲安全会议的首要政治目的。苏联在欧安会上在其他问题上作出让步，终极目的都是为了换得会议确认战后形成的格局，使战后的现状合法化。这就是苏联提出欧洲边界“不可移易”的真谛。苏联的论点是，“边界的不可侵犯性这一条原则是欧洲安全的基石”，有了这一条，西方就不能对东欧的西部边境轻举妄动。为此，文件中的第二条原则规定，会议的所有参加国“互相保证它们的所有边界以及所有欧洲国家的边界是不可侵犯的，无论是现在或在将来都不试图违犯这些边界”；“它们保证不对另一国家的全部领土或部分领土提出任何要求或施加任何控

① 《纪事年鉴——1975》，第35卷，第567页C8—D8。

制”。第四条原则提到各国领土完整时规定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改变领土现状。实行这几条原则，就必须：尊重每一个与会国的主权平等和选择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自由（第一条原则）；禁止以军事手段或其他手段——即直接或间接地使用武力——对另一国实行占领（第四条原则）；谴责对属于别国的内外事务进行“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单独或集体的干涉”（第六条原则）；重申每个国家有权充分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决定自己的“内外政治地位”，不受外来干涉地致力于本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这些内容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东西方都互相保证不以武力或武力威胁改变欧洲的现状。这里的边界现状的不可移易性，指的是（一）东西欧之间的分界，波兰的西部边界，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几次大国会议反复商讨确定下来的边界是不可变动的；（二）泛指欧洲各国之间的边界。但主要指的是第一种边界。欧安会的文件作了这样的规定，就等于参加会议的三十五个国家共同保证战后欧洲一分为二格局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说，欧安会是一次扩大了的“雅尔塔会议”。

西欧对于这一条本是有严重保留的。西欧并不想改变战后的欧洲现状，但如此这般地写进三十几个欧美国家举手通过的国际会议文件中去，就等于自己甘愿接受分裂的局面，而且等于承认美苏“两极体制”的持续性。在西方的坚持下，加了一条限制性的话，即有关国家根据协议并通过和平方式可以对它们的边界作某些调整。①

此外，其他有关主权完整，不干涉内政以及每个民族都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制度等等，则可以各有自己的解释和用途。西方可用以抵销苏联坚持确认欧洲现状的影响，矛头针对勃列日涅夫的“主权有限论”；苏联则可用以抨击西方国家干涉东欧的内部

---

① 《纪事年鉴——1975》，第35卷，第566页A 1—A 3。

事务。

第二，关于"尊重人权"、文化和人员交流问题，

即属于"第三篮子"中的问题。这是西方十分坚持的。它涉及的范围极广，举凡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思想、宗教、新闻、文学、艺术、教育等等均在此列。《与会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宣言》的第七条和《关于人道主义和其他方面的合作》都是专门讲"第三篮子"问题的。西方是以"第三篮子"作为接受"边界不可侵犯性"的交换条件的。苏联深知，所谓"第三篮子"实际上是向东欧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以促其"和平演变"，因此是抵制的。最后苏联之终于作了让步，是因为不如此，关于边界不可移易的文件就通不过。

从东西方关系发展的态势看，尤其是从东西欧关系的发展态势看，赫尔辛基欧安会可称是一、二十年来欧洲形势发展的一个总结。虽然，象历史上一再出现的国际会议一样，宣言并不能终结争论，而几乎无例外地成为尔后争论的依据；但是，欧安会也象中欧裁军会议一样，将作为缓和势头中的一种体现，在七十年代欧洲局势发展的史页中写上一笔。

（四）不稳定的缓和

欧安会赫尔辛基首脑会议可以算是几年来缓和进程的"高潮"。但是国际形势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缓和不可能是稳定的，赫尔辛基会议以后不久，缓和的热度就开始下降了。这表现在：

（1）西方借苏联、东欧的某些内部问题，如萨哈洛夫问题、捷克"七七宪章"等，攻击苏联等国违反"人权"原则，苏联和东欧则反击西方干涉内政。双方都援引了赫尔辛基会议《最后文件》的有关条文。为此一九七七年贝尔格莱德欧安会续会陷入相持不下的争论之中，无结果而散。

（2）葡萄牙局势发生极大震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达到尖锐对立的程度。葡萄牙共产党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多次几乎夺取了政权；葡萄牙社会党等政党则在西方的支持下，同葡共反复较量，东西方在葡萄牙问题上相互抨击，伊比利亚半岛气氛紧张，影响到欧洲的安宁。

（3）在欧洲以外的中近东、东南非、中非等地区，由于两个超级大国插手，出现了十分复杂的动荡局面；除了两个超级大国之外，法国和比利时也曾卷进扎伊尔沙邦地区的冲突。西方感到，苏联和古巴的影响在非洲的东南地区急剧发展，西方则处于被动态势，反应不力。

（4）苏联在苏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以后在核武器方面的发展速度继续超过美国；苏美第二阶段条约所规定的运载工具的限额实际上略有利于苏联，美国参议院终于没有批准这个条约。美国的洲际反弹道导弹(ICBM)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八〇年保持在1,054枚的水平，苏联则从六八年的858枚发展到八〇年的1,398枚，美国的潜艇发射的反弹道导弹（SLBM），从六八年到八〇年稳定在656枚，苏联则从六八年的121枚发展到八〇年的1,028枚。① 第一阶段条约于一九七七年届满，第二阶段的条约实告夭折。特别是苏联在这期间抢先在欧洲部署了SS-20中程导弹，在欧洲掀开核军备竞赛的新的一页。

（5）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苏联在八〇年的马德里欧安会续会上成为西方国家谴责的对象。

（6）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波兰实行军事管制法，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强烈抨击。

在这种局势下，两次欧安会续会就再不见有赫尔辛基首脑会议那样的盛举了。

从形势的特征看，七十年代后半叶与前半叶几乎截然不同；

---

① 根据伦敦战略研究所：《军事平衡，1978—1980》。

前半叶的总趋势是走向缓和，到七五年发展到了顶点；后半叶则急转直下，国际局势和东西方关系出现了新的紧张。西方舆论认为，局势发展的这种曲线标志着缓和进程受到了“挫折”。有的竟说新的“冷战”又来了，于是引出到底对前一段的缓和怎样看的问题。西欧和美国的政界和学术界都卷进了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初期关于局势和政策的广泛而激烈的辩论，集中暴露了大西洋两岸在对苏战略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深刻分歧，反映了欧美关系中在国际政治中的利益矛盾。

·第十五章·

多种矛盾的并发——大西洋两岸的新一轮论战

战后四十年来，欧美关系的发展，有一个规律，就是政治的分歧和经济上的矛盾是纠合在一起的。这一点在五十年代还不明显，从六十年代起即逐渐显现出来。在七十年代的头几年里，美元贬值对西欧经济的冲击和石油能源危机，同欧美在中东问题上的不同立场、西欧对美苏交易的疑虑、西欧对美国核保护的进一步动摇等等交织在一起。七十年代中期，即欧安会举行的那几年，欧美关系配合得比较好，然而卡特政府的上半期在对苏政策上却使西欧感到困惑。其例之一是在第二阶段限制核武器会谈中没有把中程导弹算在里面。其例之二是一九七七年透露出一个美国总统“十号备忘录”，根据这个备忘录，一旦在欧洲爆发战争，美国政府便准备放弃部分西欧领土。联系到从“大规模报复战略”转变为“灵活反应战略”，又联系到“新曼斯菲尔德主义”，西欧担心，美欧“脱钩”的危险始终存在。如果“十号备忘录”真的成为事实，西德便将属于

被“放弃”的那部分西欧领土，所以西欧——特别是西德——对此格外敏感。然而，卡特政府的后期却又来个一百八十度的突变：由对苏缓和转为对苏强硬；于是西欧又担心缓和进程要走回头路。西欧感到这一时期的美国对苏政策变幻莫测：起初表现得出奇的软弱，突然又过份强硬。大体上从这时起，欧美之间进入了新一轮的论战。政治和经济矛盾综合并发，以更加猛烈的形式把大西洋两岸的分歧引向深入。

（一）欧、美、苏在欧洲中程导弹问题上的立场

一九七五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召开，一向被认为是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进程达到了高峰。也正是在这一年，苏联的SS-20导弹研制成功，并从七六年起开始部署。当时美苏限制战略核武器第二阶段的谈判正在进行，但是SS-20导弹并没有包括在谈判的范围之内。西方舆论一直认为这是美国卡特政府的一种疏漏或错误，使苏联得以放手发展中程核武器。SS-20导弹是一种新型的陆基中程导弹，机动性很强，射程达五千公里，误差不超过三百米，弹头当量为十五万至五十万吨，一枚导弹可携带三个弹头。据西方情报机构公布的数字，苏联至一九八三年底已部署了三百六十九枚SS-20导弹，其中在欧洲地区部署了二百四十三枚，在亚洲地区部署了一百二十六枚。

苏联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直接受到威胁的是西欧。西欧认为，在欧洲的军事力量对比，华约本来就已占有优势，再加上中程核武器，形势就更加不利于北约一方，从而使中欧裁军谈判失去意义。苏联在举行欧安会以后突然部署SS-20导弹，棋先一着，使西方处于被动，欧洲安全问题一下子被提到突出地位。在这种背景下，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于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提出，如果不能在限

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会谈中解决欧洲地区的均势问题，北约就必须采取措施实现欧洲的战区核力量的平衡。施密特在这篇演讲中关于“武器控制的必要性”一节中集中阐述了保持东西方各种类型力量“低水平均势”的理论，坚持欧美“挂钩”、战略武器谈判和战术武器谈判“挂钩”的主张，这不仅是施密特本人的意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欧国家执政者在安全问题上的观点。施密特在这篇演讲中提出的看法，被认为是两年后北约在中程核武器问题上双重决定的基础。施密特的主要观点是：

——“政治和军事平衡是保证我们的(即西方的)安全的必要条件”；“它不仅对于我们的安全，而且对于东西方缓和的富有成果的进展，都是必要的条件”。

——均势的原则必须是“一切限制和控制武器的谈判应努力实现的目标”，“它应该适用于一切类型的武器”。

——“两个超级大国关于限制和削减核战略武器的谈判应当进行下去并达成一项持久的协议”。核大国在这方面具有特殊的最大责任。

——但是，问题是，美苏两国进行战略武器谈判，是为了“从它们的关系中排除发展战略武器的威胁”。“如果不能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进行的同时也排除在欧洲的军事力量的不均衡，那么，限制了美国和苏联的战略武器就将不可避免地损害西方联盟的欧洲成员国面对苏联在欧洲的军事优势的安全问题。”

——所以，只要欧洲还没有实现这种均势，就必须设法争取“全面威慑战略的平衡”；越是有“东西方的战略核均势”，就越是同样需要常规力量的平衡。所以应该把战略核武器的均势和战术核武器及常规武器的均势结合起来，把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中欧均衡裁军谈判结合起来。而当中欧均衡裁军谈判尚无切实进展之前，西欧仍需要“有效的威慑力量”，包括作为威慑战略手

段的中子弹。①

一九七八年五月，北约首脑华盛顿会议作出了加强防务、实行战区核力量现代化的决定，并委托北约核计划小组制定北约战区核力量现代化计划。六月，美国政府发表了第38号"总统科研备忘录"（President Research Memorandum—38），提出为在欧洲部署中程核武器进行研究。但是，西欧所大力争取的，是通过美苏谈判实现一种"低水平均势"。特别是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普遍担心如果在西欧部署美国导弹，就必然会影响缓和局面和新东方政策的继续推行。施密特和国防部长汉斯·阿佩尔都表示，适当的防务努力是缓和政策的主要因素，西方对苏联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作出反应，是必要的；同时，他们也坚持任何军备现代化的决定都必须与"保证一项包括中程武器的军备控制协议的努力同时进行"。联邦德国政府对于欧洲战区核力量问题的主要考虑，是尽量避免使西德处于"某种特殊的地位"，因为美国研制的欧洲导弹，首先就要部署在战略地位十分敏感的西德。②所以，西欧——特别是西德——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大力促成美苏在欧洲中程导弹问题上进行谈判，而这是截至那时为止任何类型的裁军谈判都没有涉及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北约核计划小组在七九年秋提出了部署和谈判的两手准备方案。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北约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法国和冰岛除外）在布鲁塞尔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有名的"双重决定"，敦促美国和苏联尽快就控制中程核武器问题进行谈判，如果到一九八三年底仍达不成协议，西欧就将部署美国潘兴Ⅱ式导弹108枚和地面发射的巡航导弹464枚，

① 施密特77年10月28日在伦敦战略研究所纪念已故所长阿拉斯泰尔·布昌学术讲演会上的讲话，沃尔夫拉姆·F·汉里德主编：《施密特演说集——政治学前瞻》，威斯特维欧出版社，1982年，第25—28页。

② 保尔·布待：《北约组织内的核磋商政治，1965—1980》，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67页。

共计572枚。其中在西德部署222枚、英国172枚、意大利80枚、比利时和荷兰各50枚。全部中程导弹都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

北约"双重决定"在原则上是一致通过的，但需要作两点说明。第一，欧美双方对决定的理解并不完全一样，侧重点大相歧异：美国从全球范围与苏争夺优势出发，把部署放在首位，西欧则从自身安全和与东方缓和关系出发，把谈判放在首位。欧美双方用的劲头不一致。因此，第二，西欧国家接受双重决定是有相当程度的保留的。荷兰表示两年后根据谈判的情况再决定是否接受部署。比利时表示六个月后再决定是否接受部署；一九八〇年九月，比利时政府又发表声明说，比利时将根据美苏谈判的结果作最后决定。当然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联邦德国的立场，提出均势理论的是联邦总理施密特，但要在西德部署美国导弹则也要遇到阻滞：西德由于地理上、战略上的脆弱处境，由于柏林的敏感地位和德国的分裂状态，特别需要欧洲的局势——尤其是中欧地区——能保持持续的缓和；而每当东西方关系出现紧张时，必定首先表现在中欧地区，因此西德不愿意因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美国导弹而承担更大的压力；西德表示它不愿意独自充当美国中程导弹的"东道主"，这就是说西德要求起码需有另一个欧洲大陆国家接受部署。从这个角度出发，荷兰和比利时的立场就增加了份量。① 所以，北约双重决定一方面显示了北约成员国在表态上的一致，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双方战略上的不一致。

因此，西欧国家极力推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就欧洲中程导弹问题直接谈判，以期争取"低水平均势"。为了进一步了解西欧这种要求实现"低水平均势"下的"和缓"的心理状态，下面把美苏日内瓦谈判的始末作为背景简略介绍一下。

美苏日内瓦中程核武器谈判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开始，历时两年，没有取得任何协议。两年当中，美国和苏联的代表会谈一

---

① 参阅保尔·布特:《北约组织内的核磋商政治,1965—1980》,第173—174页。

百多次，提出的各式各样的“建议”和“反建议”十多个，但谁也没有从自己的立场后退一步，都以保持均势为借口争取自己的优势。

美国方面提出的建议，概述如下：

一、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美国总统里根提出“零点方案了”：苏联拆除其全部SS-20和SS-4、SS-5陆基中程导弹，美国不在欧洲部署潘兴Ⅱ式导弹和巡航导弹，双方的中程导弹都是零。“零点方案”是美国立场的基础，其实质是把苏联在欧洲的核优势拉下来，这也是美国参加谈判的目的。

二、一九八三年三月三十日，里根提出“临时方案”，主张美苏签订“临时协定”：美国大幅度减少它计划在欧洲部署的导弹数量；苏联在全球范围内把中程导弹减至与美国同样的水平。

三、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六日，里根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出，如果对美国和苏联全部中程导弹弹头规定同样的限额，美国将减少它在欧洲部署的导弹数量，并把中程轰炸机列入谈判之内。

四、十一月十四日，美国建议把两国的中程导弹弹头限制在420枚以内。

苏联方面先后提出了五个建议：

一、一九七九年六月，勃列日涅夫提出建议：北约取消在西欧部署美国导弹的计划；苏联削减其在西部地区的中程导弹数量。这一条是苏联立场的基础，即千方百计阻挠美国导弹在西欧部署。

二、一九八二年三月，勃列日涅夫表示苏联准备单方面暂停部署SS-20导弹，美国也表示同样的诚意，即取消部署的计划。

三、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安德罗波夫提出“同等削减”的建议：北约不部署美国导弹；苏联把它在欧洲的中程导弹削减到与英国和法国现有导弹总数相等的水平（苏联的这一建议

立即遭到西方，特别是英、法两国的强烈反对。密特朗在十一月十六日的电视谈话中重申反对把法国核力量纳入美苏谈判的主张时说："如果把我们的潜射导弹包括在中程核力量之内，那么就会出现两个外国讨论我们的潜艇、而对苏美的潜艇却可以不管的怪现象。"① 英国也一再声明，英国核武器是独立的，不能纳入日内瓦谈判的轨道）。

四、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安德罗波夫提出：美国不在西欧部署导弹；苏联把从欧洲地区裁减下来的SS-20导弹销毁，而不是东移。

五、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安德罗波夫建议：苏联把SS-20导弹减少到140枚；美国不在西欧部署导弹。②

不难看出，双方建议，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变些花样。西欧不是谈判一方，但谈判内容却与西欧的关系最直接、最密切。西欧的想法是，当然"零点方案"是上策，但苏联不可能把已经到手的优势丢掉；完全不部署美国导弹，西欧将处于"不设防"的境地，也不现实。因此西欧一直希望达成一个"美国少部署一些、苏联减少一些"的妥协方案。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英国国防大臣宣布第一批美国巡航导弹已运抵英国。接着，欧洲议会和其他几个有关的西欧国家的议会也重申支持北约双重决定。十一月二十三日，苏联代表退出日内瓦谈判，并宣布无限期中止谈判。不久，削减战略武器谈判和中欧裁军谈判也相继中辍。美国和西欧各国政府纷纷发表声明，对苏联中止核谈判表示遗憾。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于二十三日举行会议，对苏联中止谈判表示遗憾，并要求苏联尽早恢复谈判。

二十四日，安德罗波夫发表声明说，"在联邦德国、英国和意

---

① 《人民日报》，1983年11月18日。

② 参见陈特安：《美苏中程核武器裁军建议何其多》，《人民日报》，1983年11月18日。

大利领土上开始部署美国中程导弹。这样，在欧洲大陆出现美国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已是既成事实。”对此，作为一种“反措施”，苏联“在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协商以后，将加速进行已经宣布并于不久前开始的在这两国领土上部署射程较远的战役战术导弹的准备工作。”①

至此，美苏核竞赛进入一个新的紧张阶段。

西欧有关各国虽然在表态上支持北约双重决议，即支持部署美国导弹，但在行动上是迟疑的，而且更加激起西欧反核运动的持续发展。

（二）欧美经济矛盾的激化

当西欧和美国在中程导弹问题上因利益不同而有不同的侧重，以至产生意见分歧的同时，大西洋两岸在经济方面的利害冲突也加剧了。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并没有直接的内在联系，但都带有必然性，对欧美双方的总关系都不能不产生严重影响。这一时期表现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主要是美国高利率问题，欧美“钢铁战”，争夺世界粮食市场。双方在对苏贸易问题也有严重分歧，不仅有经济问题，也有对苏政策问题，故放在下面一节另述。

（1）美国高利率的冲击。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美国从一九八〇年开始提高利率，同年十二月美国利率达到创纪录的21.5%，至一九八二年六月仍徘徊在16%上下，减去通货膨胀率7%，实际利率为9.5%，比西欧的2%到4%的实际利率要高得多。如果从一九八一年初里根总统就任之日算起，美元对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十五种货币至一九八二年六月上升了近2.2%。

西欧把美国实行高利率看作是万恶之源，认为美国以邻为壑，加重了西欧的经济危机，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一，美元汇

① 《人民日报》，1983年11月26日。

价上升，美元坚挺，西欧等其他西方国家货币疲软；于是这些国家纷纷抢购美元。美国实行高利率大大地扰乱了国际货币和欧洲货币体制的稳定。二，美元汇价上升增加了西欧国家的进口费用，并且使西欧通货膨胀率上升。因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支付中有75%是用美元结算的，特别是西欧进口石油等能源都是用美元定价的，美元汇率过高，使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严重恶化。三，美元汇价上升，把本来可以在西欧修建工厂、创造就业机会的资金吸引走了，并且迫使西欧各国为了制止或减少资金外流而提高利率，其结果是使国内投资不振，失业问题不仅更难解决，而且因而激增。

（2）欧美间的所谓“钢铁战”。从七十年代以来，西欧钢材大量涌入美国市场，至一九八二年外国钢材已占美国国内消费量的20%左右。特别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的美国出口的钢材逐年增加，一九八〇年向美国出口量是三百八十万吨，一九八一年为六百万吨，增加了近60%。一九八二年美国特种钢总消费量为九十万吨，其中二十万吨是进口的，在进口特种钢中近一半来自欧洲共同体国家。而一九六五年以前，美国进口钢所占比重从不超过10%。主要原因是西欧采取了新的炼钢法，因此西欧钢材得以以较便宜的价格涌入美国市场，特别是特种钢的进口增加很多，这就冲击了美国的当时仍基本上采取旧式的平炉炼钢的钢铁业。同时美国认为，西欧国家对钢铁业实行了超额补贴。一九八二年一月，美国钢铁企业界上诉法院，控告西欧的钢铁企业界使用了政府的补贴，向美国倾为销。为此欧美进行了谈判，美国要求欧洲共同体国家自动限制向美国出口钢产品，提出限额为美国消费量的4.3%，即减少四分之一。双方就限额进行讨价还价。美国在谈判破裂后宣布，如果西欧钢铁出口国不限制钢产品的出口，美国就将从十月二十一日起对西欧钢材征收相当于其所得补贴的“反倾销税”。欧洲共同体国家勉强同意把钢产品出口限额定为占美国消费量的5.7%、钢管限制在5.9%。

但是，钢铁战并未平息，一九八三年六、七月间，正当欧洲共同体国家因钢铁工业严重亏损、并因削减钢产量的配额反复争论时①，美国政府于七月五日突然宣布将实行一项为期四年的限制特种钢进口的决定，将对进口的特种钢材征收关税和实行限额，从而使一九八二年持续十个月的钢铁战又热闹起来。

伦敦《泰晤士报》说，由于欧美钢铁战正好与美国对苏联天然气管道实行禁运同时发作，所以"这场贸易战如果发展下去，就会给大西洋联盟带来一个非常糟糕的时刻"。②

（3）欧美争夺粮食市场。美国强烈抨击西欧国家对农产品出口实行补贴的政策，曾就此威胁说，如果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不改变现行的出口补贴制，美国就将发动一场"补贴战"。法国农业部国际事务负责人说，其实，美国已经这么搞了。他说："美国人搞了一种私人贷款和政府贷款混合的制度，私人贷款是由商品信用公司保证的，而政府贷款可以提供三至五年的资金，利率为7.5%"。实际上，美国政府已经增加了农业补贴，以利于美国的农业企业家争夺世界农业市场。③

欧美经济矛盾问题很多，也很深刻，而且由来已久，这里只涉及与当时欧美政治分歧同时存在的比较表面化的几个方面。就是这几个方面的矛盾也不是时过境迁就可以缓解的。

（三）欧美在东西方贸易问题上的分歧

如上面曾提到的，欧美在东西方贸易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尤

---

① 欧洲经济共同体因钢铁工业面临销售市场的困难被迫于83年7月决定从83年8月起至85年12月止削减2,673万吨产钢能力。各国应根据这一决定分配一定的削减份额，这就要关闭一批工厂，但这样做就会加剧失业问题。因此欧洲共同体国家就分配削减额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讨价还价。

② 伦敦《泰晤士报》1982年7月29日社论：《调停钢铁战》。

③ 法国《新经济学家》1982年第363期文章《贸易保护战》。

其是政治问题。这和上一节的单纯经济利益问题，是不一样的。但它们都同时跨进了欧美矛盾的范畴，并且相互影响。

美国是一向把对苏贸易关系问题纳入东西方关系轨道上的，认为西欧积极开展同苏联、东欧的经济关系会增强苏联的实力，而且会使西方失去警惕，不利于对苏斗争。西欧则认为，开展东西方贸易是对双方有利的。根据赫尔辛基欧安会的精神，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是天经地义的。西欧经过缓和时期大大发展了同苏联、东欧的贸易关系，这是美国同这些国家的贸易关系所不能比拟的。东欧实际上已成为西欧的重要贸易伙伴。如一九八〇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十国同苏联的贸易额达二百五十九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对苏贸易额的十三倍。如果象美国所要求的那样，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和波兰事件发生之后西欧和美国一起对苏联实行“经济制裁”、紧缩贸易关系，西欧就要承受很大的经济损失，这对于处于危机中的西欧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欧美在东西方经济关系上的争论最激烈的是天然气管道问题。

西欧一些国家（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通过补偿贸易形式，同苏联进行天然气交易从六十年代末就开始了：奥地利与苏联于一九六八年签定协定，意大利于一九六九年、西德于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二年、芬兰于一九七一年、法国于一九七二年先后与苏联签订协定。根据这些协定，苏联从西欧取得了美元贷款，购买了大口径钢管和其他天然气管道设备，先后于六八年、七三年、七四年和七六年向奥地利、联邦德国、芬兰、意大利和法国输送天然气。

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机爆发后，西欧增加了天然气的消费量。苏联对西欧的天然气供应量逐年增加。到一九八〇年，西德每年获得一百〇七亿立方米，占西德天然气消费量的17％，能源总消耗量3％。意大利七十亿立方米，在天然气消费量和能源消费量中各占23.5％和3.7％。法国四十亿立方米，各占15％和2％。奥

地利二十五亿立方米，占天然气消费量的53.2%。芬兰十四亿立方米，全部由苏联供气。一九八一年，西欧从苏联进口的天然气已达二百七十亿立方米，占西欧天然气消费量的9%，西欧能源总消费量的2.2%。

随着西欧对苏联天然气的需求不断增加，苏联需要铺设新的管道干线，把西伯利亚亚马尔半岛的乌连戈伊，经乌日戈罗德，通过捷克，至奥地利和联邦德国，同西欧天然气网连接起来，全长五千五百公里，为此，苏联从一九七九年春天起开始同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进行新的谈判，以取得长期、大量、低息贷款，用来购买西方的技术和设备；作为偿还手段，苏联从一九八四年起，每年可向西欧输送四百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经过继续谈判，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联邦德国和苏联签订了长期供气协议；一九八二年一月法苏、意苏也签订了新的协议。后来，奥苏、英苏都签订了新的协定。根据这些协定，苏联得到西欧的低息贷款和机器设备，西欧则得到苏联的天然气。据估计，到一九九〇年，联邦德国消费的天然气将有30%来自苏联，占能源总消耗量的5.5%。法国为32—38%，占能源总消耗量的5%。意大利为35%，占能源总消耗量的6.5%。就整个西欧论，苏联天然气将占西欧天然气消费量的25%和能源总消耗量的5%。①

美国对于西欧和苏联的天然气交易，一直持反对态度。引起大规模激烈争论的天然气管道问题即由此展开了。尤其是新一轮的更大规模谈判大部分是在苏联侵略阿富汗和波兰事件以后进行的，因此美国要求西欧中断这些谈判，美国认为，这些协定将使西欧在能源方面依赖苏联，一旦有事，苏联只要割断管道、停止供气，就会使西欧陷于被动，而且新的低利贷款和技术会有助于苏联增强实力。美国指责西欧作了养虎贻患的错事，西欧则坚持这

---

① 以上根据唐卫斌、孙巧成：《举世瞩目的西欧——苏联天然气交易》，《国际问题研究》1982年第4期。

是西欧奉行独立政策的一部分。

法国总统密特朗在法苏天然气管道协定签字后于八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主持内阁会议时说:"法国已经制定了一条执行独立政策的道路，这是它的安全的保障，是它从事争取和平与自由活动的条件；任何事情都不能使法国偏离这条道路。"他还说:"法国的独立和安全取决于承担掌握自己经济的能力，在于自己在防务上所作的努力、对盟国的尊重和欧洲集体安全的建议。"①

天然气管道协议给西欧带来的经济利益是可观的。在西欧经济遇到困难的情况下，这些协议可以使联邦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的有关企业得到约合三十亿美元的订货合同，提供二千万个工作小时的劳动就业机会。

因此，西欧决定不理睬美国的警告。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美国里根政府采取了一个进一步激化矛盾的措施；它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向苏联出口能源设备。八二年六月十八日，里根政府宣布，这条禁令也适用于美国在西欧的子公司生产的设备和持有美国公司许可证的西欧公司所生产的设备。这条禁令固然是对苏联发的，但是同苏联签订了协定的西欧国家却因此受害，因为修建天然气管道所需的设备都是与美国公司有关的，或者是美国公司或美国子公司生产的，或者是欧洲公司享有美国专利制造的。据一九八二年七月五日合众社报导中举出的例子，英国工程公司——约翰·布朗公司与苏联签订了一项提供二十一台输气涡轮机的近两亿美元的合同，这家公司必须依靠美国的通用电器公司供货。西德通用电气公司——卡尼斯公司将向苏联提供四十七台涡轮机，价值二亿六千余万美元；意大利努奥沃·皮尼约内公司提供十九台涡轮机，它们都受到了美国政府禁令的影响。

美国这条"经济制裁"牵动了美、苏、欧三角矛盾。在这个

① 法国《世界报》1982年1月29日。

问题上，西欧和苏联却找到了汇合点。西欧有关国家强烈抨击美国损害盟国利益，纷纷加以抵制。

法国政府命令法国管辖下的公司不理睬美国的禁令，照样履行天然气管道合同。英国也要求英国有关公司不要牵就“与现行合同相抵触的意图”，说美国的禁令是“把美国治外法权作了令人不能接受的延伸”，“是与国际法相抵触的”。①联邦德国经济部长奥托·格拉夫·拉姆斯多尔夫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西欧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实行美国政府决定中的治外法权原则，对我们说来是不可能接受的。它损害了我们的主权，所以，我们不能不摒弃它”。②西欧国家还通过欧洲共同体、七国首脑会议同美国政府论争，欧美间的争吵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四）联盟内部的关于战略问题的意见分歧

欧美政治上的分歧，一见于对七十年代的缓和有不同的估价，实际上涉及欧美在对苏战略上的不同观点，二见于大西洋两岸的联盟关系中的问题，即如何处理欧美伙伴关系问题。两个问题集中到一点，是西欧要求有更大的独立自主权。

（1）对于缓和和缓和政策的不同观点。从七十年代后半叶以来，欧美双方对于七十年代上半叶出现的缓和局面一直存在着不同的估价。

一种意见是，七十年代推行的对苏缓和政策，对西方说来是失算的，理由有四：第一，欧安会和欧安会通过的“最后文件”，确认了战后雅尔塔格局，等于在国际上承认了东西欧边界的现

① 1982年8月8日《华盛顿邮报》连载文章：《美国和西欧的联系遇到麻烦——争吵使大西洋联盟关系紧张》。

② 奥托·格拉夫·拉姆斯多尔夫：《德国关于天然气管道问题的观点》，《华盛顿邮报》，1982年7月28日。

状；这是西方向苏联作了重大让步。第二，缓和使苏联趁机大力发展战略的和战术的核武器，SS-20导弹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研制并部署的；因而使力量对比有利于苏联。第三，因缓和而大大发展了的东西方贸易，使苏联得到大量低利贷款、尖端技术，增强了苏联的实力，增加了西方对缓和的幻想。第四，缓和给苏联提供了向欧洲以外地区扩张的机会，例如东南非地区。因此，缓和对苏联有利，而对西方不利。这种意见在美国比较流行。卡特政府在后期的对苏政策态度转趋强硬，里根政府则更明确对苏持对抗态度，认为必须依靠军事上的优势，特别是核军备上的优势来压倒对方，并且认为国际上的任何重大事务都要服从美国对苏全球战略的全局，因而要求西欧同美国紧密配合。

另一种意见在西欧比较流行，认为，缓和并不只对一方有利，算总帐对西方利更多些。理由有三：第一，缓和是欧洲安全的保障，赫尔辛基欧安会确认欧洲战后的边界现状不过是承认了现实，加以确认就保证了东西欧关系可以相安无事，特别有利于中欧地区的安宁。第二，缓和促进了东西方贸易，对于西方扩大市场、缓解能源危机、刺激生产和就业等有很大好处。第三，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可以促进东西方的文化、思想和人员来往，以利于向东欧渗透，促进后者的“和平演变”和“离心倾向”。这第三条理由说明西欧把缓和政策看作一种长期政治考虑、战略考虑，赫尔辛基会议“第三篮子”议题的“妙用”，说到底就在于此。为此，西欧认为，必须保持住缓和势头，特别是欧洲局势的缓和，不要把其他地区的问题干扰欧洲的缓和进程。西欧认为，维持军事上、尤其是核军备上的均势是必要的，但这不是唯一的出路，其他途径，如外交、经济、文化等领域，往往更能有效地争取和维护国际形势、特别是欧洲局势的稳定与安宁。他们不同意把世界各地的问题都纳入东西方关系的轨道，认为缓和是可以分割的；其他地区出现紧张局面，欧洲不一定也跟着紧张起来。

当然在现实中并不是整整齐齐的两种意见，这只是大体上的

概括。对于缓和的争论，从七十年代后期已经开始，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争辩更烈。

西欧从自己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出发认为必须坚持推行同东方的缓和政策，而缓和政策最具体的体现就是保持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交往，特别是经济贸易关系。密特朗出任总统以来，法苏政治关系一直是“低调”的，英国撒切尔政府同苏联的关系也是冷淡的。但是，英国和法国都没有堵塞对话的通道：撒切尔夫人一九八四年访问匈牙利，把同东方对话的渠道重新沟通，后又借参加安德罗波夫葬礼之机亲自访问了苏联；在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访问苏联之后，戈尔巴乔夫访问了英国。法苏关系也有新的动向，密特朗总统、谢松外长都分别访问了莫斯科。在东西方关系、阿富汗问题、印支局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西欧与苏联的立场都是针锋相对的，但法苏、英苏贸易都没有因近几年的政治气候而停止发展。科尔就任联邦德国总理之日起，就表示将延续前任总理施密特的对外政策，继续保持和发展同东欧的贸易来往。科尔在就职后发表的第一次对外政策讲话中提到，他的政府将继续支持北约双重决定，把发展同东欧的经济关系看作“整个东西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①] 科尔在谈到同华沙条约各国保持联系和合作时又说：“这种对话不能代替世界大国之间的会谈；但是，这是对世界大国对话的一种补充，一种必要的，特别是从欧洲人角度来看绝对必要的补充。目前仍就存在着在欧安会过程中把一系列有益合作的领域恢复起来的机会。

对于缓和问题的争论是不可能有结论的；它反映了大西洋两岸因处境和利益的不同而在对苏战略上具有不同的观点。

（2）关于如何处理大西洋联盟内欧美伙伴关系问题。这也不是到八十年代才提出来的新问题。事实上，任何一种伙伴关系都不能避免矛盾，只是矛盾越来越掩盖不住，也越来越不可能从

---

① 《纪事年鉴——1982》，第42卷，第773页B1。

根本上缓解了。曾任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主席的克里斯多芬·索姆斯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欧洲和美国的意见分歧，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任何问题都很难通过在一起交谈和在必要时提出公平裁决的方式来逐个地、依据其自身意义来解决。我们已经走到了这样的地步，任何一个特定的问题都必须作为以下这个最基本的问题的一部分来对待，这就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使大西洋联盟继续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①

认为战后诞生的北约已不能适应时局的需要、必须加以改革，持这样意见的人愈来愈多了；当欧美对于欧洲防务问题不能取得一致看法时，当美国的"领导"地位发生动摇时，北约向何处去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一九八四年三月，基辛格在《改造北约计划》一文中说，现在北约正面临四大难题：一，"没有一项一致同意的、可靠的战略"。北约至今仍执行六十年代制定的"灵活反应战略"，但这项战略具有"致命的弱点"：由于北约的常规地面部队不能胜任反击苏联常规力量的进攻，所以在执行"灵活反映战略"的初级阶段时就需要倚靠核武器的支持，但，"战略核均衡已使战略核战争的威胁的可信性大为减少"，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极小，于是西方将处于进退维谷的处境。因此虽然手里有核武器，但从心理上已经解除了武装。二，欧美对"中程武器和武器控制"的态度不一致。诚然，日内瓦会议失败后，西欧表态欢迎美国导弹。但是，西欧只把部署美国导弹看作是"过渡性"的，对于美国导弹就象"一位主人对待不受欢迎的客人"一样；有的人认为美国在西欧部署导弹意在把一场核战争"局限在欧洲"。三，欧美在东西方关系上有分歧，即在对付苏联的态度上有分歧。四，在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上，欧美态度各异，西欧不赞成美国把中东、非洲和中美洲的事态都同苏联挂起

① 克里斯多芬·索姆斯：《美国和欧洲：这种伙伴关系能够得救么？》，《华盛顿邮报》，1982年8月5日。

钩来。在这种情况下，基辛格说，大西洋联盟需要服一剂“烈性良药”，对它的“结构、理论和作用”重新进行考虑。具体地说，基辛格认为应该从四个方面加重西欧在联盟内的责任：

一，到一九九〇年左右，欧洲应承担常规地面防务的主要责任。

二，一直由美国人担任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职务由欧洲人担任。

三，北约秘书长由美国人担任，基辛格认为北约秘书长负有政治协调责任，以美国人充当为宜。

四，凡涉及在欧洲土地上驻军的谈判，应由西欧人负责；中程核武器谈判和中欧共同均衡裁军谈判“应尽快地‘欧洲化’，代表团由欧洲人任团长，美国人副之”。①

基辛格文章中提到的四大难题，都是切实存在的。他提出需要改进北约内欧美盟国关系，西欧也是有同感的。然而西欧所强调的是在大西洋联盟中有一个“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抨击美国不顾西欧的立场和利益强行在北大西洋联盟中推行美国的对苏战略。所以可以说，基辛格文章的这一部分反映了欧美关系的现状。问题是基辛格提出的四条建议，都是西欧所不能接受的。

例如，关于要求西欧加强常规军备以提高“核门槛”问题，西欧有两点不放心：其一是，一旦西欧受到常规武器的攻击，西欧将以常规武器进行尽可能长时间的抵抗，以避免挑起核战争的危险。这就意味着美国手中的“核保护”同西欧的常规力量“脱钩”的老问题又出现了。其二是，根据欧美防务分工，让西欧的常规军备发展到足以抗衡华约的常规力量，需要西欧大大增加军事预算，这在西欧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是绝对办不到的。尤其使西欧反感的，是基辛格以美国撤军为要挟，提出如果西欧不愿加强常规力量，那就意味着从冲突一开始就要依靠核威慑力量，因此，

① 基辛格：《改造北约计划》，美国《时代》周刊，1984年3月5日。

美国就要逐步撤走目前驻欧地面的一半。

再如，基辛格提出的由西欧人出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和由西欧人充当两个裁军谈判的代表的主张，也同样是行不通的。首先核武器掌握在美国总统手里，西欧人怎么能够指挥西欧既不拥有、也不能控制的美国核武器呢？至于中欧裁军问题，西欧同样不可能代替美国来决定美军的裁减问题。所以让西欧人当裁军谈判的西方代表团团长云云，无非是一句空话。

基辛格在欧洲中程导弹摊牌以后发表这篇长文章，承认大西洋联盟需要改革，确实反映了欧美矛盾的尖锐程度。

从联盟内部论争的历史来看，西欧在对苏战略上虽然必须与美国配合，支持美国的对苏政策，但出自其本身的特殊考虑，西欧的对苏政策必定带有自己的不同于美国的特色；无论形势如何紧张，西欧都要设法保持同苏联和东欧的对话渠道不受到堵塞。

在联盟内部关系上，西欧在继续承认美国在联盟中的领导作用的同时，尽量争取独立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并且对美国的决策施加尽可能大的影响，是完全符合战后西欧国际政治的必然逻辑的。

（五）西欧独立防务问题

欧洲中程导弹问题提出以来，西欧时时感到需要考虑一项西欧自己的安全和防务政策。北约显然不是讨论西欧独立防务问题的地方。于是重振西欧联盟的话题在八十年代初又被提出来了。因为西欧联盟无论如何是现成的、没有美国参加的西欧军事联盟的组织，只是自它成立之日起就被淹没在北约组织里，不曾起过独立的作用，一直“沉睡”了三十年。随着美苏争相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西欧为了摆脱“核人质”的处境便愈来愈感到西欧应该有自己的防务；美苏在日内瓦谈判期间，西欧在防务问题上的联合意识大大地发展了。西欧独立防务问题固然是西欧的问

题，但问题的背后时刻都有欧美关系的身影，因此在谈到大西洋两岸的关系时，不能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一和二十二日，法国和联邦德国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会谈的中心内容便是西欧的安全和防务政策问题。年底，两国确定了国防部长会晤制度，成立了协调军事政策的"安全和防务委员会"。当欧洲中程导弹的日内瓦谈判临近摊牌的时候，密特朗和科尔又在十一月的波恩会谈中再次就西欧防务问题交换意见。十二月初，法国国防部长埃尔尼在西欧联盟议会的讲话中，也强调了发展西欧各国军备合作和"深入研讨"欧洲防务问题的必要性。一九八四年二月，密特朗和科尔在会谈中又讨论了加强两国合作问题。接着法国建议最终取消西欧联盟组织对联邦德国生产常规武器的限制（一九八〇年西欧联盟已取消了对联邦德国军舰制造吨位的限制）。五月二十三日，密特朗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上发表讲话，建议西欧在罗马条约之外签订新的条约，逐步建立西欧的政治联合，把西欧各国的合作从经济推进到政治、军事领域。五月三十日法国和联邦德国领导人举行第四十三次会晤，除在减免两国进出口工业品关税、科技交流等问题上确定长期合作项目外，决定在宇航领域里进行合作，两国将联合发射观测卫星和电视卫星。观察家认为，密特朗和科尔的这次会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1）在这次会晤中，密特朗关于建立"政治的欧洲"的建议取得了科尔的支持；（2）宇航合作当然具有军事合作的意义；（3）两国在关税方面的协议意味着两国关税同盟的组成。所以有人认为，密特朗和科尔的这次会晤是戴高乐—阿登纳时期、德斯坦—施密特时期法德良好关系的第三次高潮。①

六月十二日，西欧联盟七国外交部长在巴黎举行会议，讨论"恢复防务联盟的活动"，以使它"获得新的生命"，并成为

① 《费加罗报》，1984年5月30日。

"北约组织内的主要欧洲国家之间在防务方面加强合作的一个论坛"。[①]会议决定在十月间，为纪念西欧联盟诞生三十周年举行七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联席会议。根舍对记者说，这次会议原则上同意了法国提出的一项改造该联盟的建议。他说："我们在西欧联盟中看到了加强大西洋联盟中的'欧洲支柱'的可能性。这并不是说美国在该联盟中太强，而是说欧洲太弱。"[②]根舍还说，联盟七国正在集中探讨以下四个基本问题：（1）估计苏联及东欧盟国对西欧构成的军事威胁的性质；（2）在控制核武器和制造武器等问题上加强美国同欧洲的关系的必要性；（3）北约组织中的欧洲成员国用什么办法在建立"和谐的武器系统"和加强欧洲的军事工业联合体方面加强合作，以便同美国防务承包商进行竞争；（4）为改善同不结盟国家的政治关系作出努力。[③]

法国对外关系部部长克罗德·谢松主持了这次会议，法国也是重振西欧联盟的倡导者。谢松说，西欧联盟将成为专门讨论欧洲防务问题的一个论坛，以加强西欧在安全和防务方面的作用。[④]参加会议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说，这次外长会议是恢复西欧联盟的一个"积极的、但是审慎的开端"，其"最终目的是加强大西洋联盟的'欧洲支柱'，增加欧洲对西方防务的贡献。"[⑤]

紧接着，西欧联盟议会于六月下旬在巴黎举行，历时四天。会议建议：（1）西欧联盟部长理事会每年举行两次，并在北约部长会议召开之前举行，国防部长每年至少参加其中的一次会议；（2）调整北约结构，"以正确反映欧洲关于防务需求的意见和加强它的效能"；任命一位欧洲人担任北约欧洲力量总部的总司令和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特别助理；（3）欧洲保持其仅次

---

① 路透社巴黎1984年6月12日英文电。
② 美联社巴黎1984年6月12日英文电。
③ 美联社巴黎1984年6月13日英文电。
④ 合众国际社巴黎1984年6月13日英文电。
⑤ 美联社巴黎1984年6月13日英文电。

于美苏两国的“第三个空间大国”地位；（4）呼吁各成员国政府尽一切力量促使超级大国通过谈判达成一项禁止变空间为军用的协定，并恢复中断了的削减核武器会谈；（5）重申取消西欧联盟条约中关于禁止西德生产某种武器的条款。①

十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西欧联盟七国外交和国防部长在罗马举行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是以使西欧联盟重振旗鼓为标志而召开的，由于多年来，西欧国家没有如此集中地讨论欧洲防务问题，所以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密切关注。会议通过了《罗马宣言》，决定加强西欧的共同防务、协调联盟各国有关武器生产与控制的意见、发挥欧洲在北约中的作用。会议决定取消西欧联盟条约中关于禁止西德生产常规武器的条款。这次会议实际上把两年来围绕恢复西欧联盟活动的意见，具体化为正式文件了。

会议结束后，法国《世界报》这样评价了会议的意义：“这次会议无疑只能就大陆的安全交换一下情报和想法，还并不是重振流产了的欧洲防务共同体。虽然在西欧联盟内部大家一致承认，七国防务政策上的统一并不是马上可以实现的，但是面对苏联超级武装，西欧各国共同考虑自己安全的要求，空前强烈。令人奇怪的是，一些国家之所以有这么强烈的要求，是由于大规模反对部署大西洋联盟的欧洲导弹而受到振动；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认为，如果所说的导弹不是美国的而是欧洲的，那么和平运动的影响也许会小一些。”② 十二月十六日，密特朗在电视讲话中再次强调，欧洲的政治联盟必须加强，他认为目前西欧联合的困难在于缺少“政治意志”，而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没有实现某种政治意志的手段”。这些手段便是必要的机构和程序。③

---

① 据法新社巴黎6月21日英文电。

② 贝尔纳·布里古莱文章：《在巴黎协议三十周年之际，巴黎和波恩希望重新推动西欧联盟的活动》，1984年10月27日《世界报》。

③ 见奥利维尔·沃尔姆塞，《密特朗先生的欧洲》，法国《快报》，1985年1月11日。

这一时期西欧防务问题也不仅限于意向性的或外交上的活动；在具体合作项目上也是有进展的。例如，法国、英国和联邦德国决定共同研制第三代反坦克导弹；法国和联邦德国决定共同研制四百架反坦克直升飞机；比利时等国倡议七国实行武器设计、生产和采购的合作，等等。但是这毕竟只是一些具体的双边或多边的合作项目，离作为整体概念的西欧防务，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至于西欧联盟这个组织，虽然近两年来所表现出来的趋势是极活跃的，但从目前情况和相当一段时期以内来看，还不可能是一个足以承担西欧防务的实体，仍是一个为显示西欧在安全问题上的“同一性”而鼓吹、呐喊的论坛。就象法国国防部长夏尔·埃尔尼说的，“西欧联盟有它自己的特点，它是西欧各国可以讨论军备政策的场所。由于还不存在一种欧洲防务，所以有一天它应该产生出一种欧洲安全的概念”。①

上面所说的，是八十年代以来欧洲防务问题的一个值得重视的动向，是西欧联合意识在美苏核武器竞赛条件下的新发展。也是属于西欧在政治上和安全上的“同一性”的体现。低估这个现实的意义，就会对西欧牵制霸权主义的作用视而不见。

但同时，西欧防务一体化又必定是十分遥远的事。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梯埃里·蒙布里亚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三个“理论上”的欧洲防务方案，这就是：

——建立一种纯粹欧洲的、一体化的——即没有美国参加的——防务体系；

——协调法国和英国的核力量，使之为欧洲服务；

——扩大法国核威慑的范围，使之为邻国，首先为联邦德国所用。

---

① 埃尔尼答记者问：《同美国在一起的集体安全》，法国《价值》周刊，1984年12月31日。

但是，作者自己就接着否定了这三个方案。

他说，这三条的任何一条都不能不遇到巨大的障碍；低估这些障碍，不是郑重的态度。第一，当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离现实太远。第二，英法过去的关系已表明把两国核力量协调起来极少可能，因为英法的核合作就意味着英国必须放弃装备美国火箭，这是不现实的。第三，法国核威慑用于保卫西欧，看来没有什么困难；但深究起来，则问题不少。首先，要有效地扩大法国核威慑力量，必须在质量上和数量上成倍地提高技术水平；其次，如果扩大使用核威慑范围，法国舆论会担心既使法国本土不受直接威胁也难免遭到毁灭性的报复。他说："事实上，以弱者威慑强者的理论同过于强调威慑的扩大是相互排斥的。核武器——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不可能通过某种法术包办整个西欧安全问题。"准此，蒙布里亚的结论是："重要的是，专家们和政治家们应该讨论所有这些问题，思想的成熟将会使事物的演变成为可能；不过这些演变在今日似乎还不在视界之内。"①

具体地说，主要有两类问题不易解决：

第一，拟议中的西欧防务，从长远看是由西欧承担起美国在西欧驻军和支持常规部队的核打击力量。据估计，如果美国从西欧撤军，西欧就必须自己补充三十万地面部队，而如果要同华沙条约的部队拉平，西欧就需要部署五十万地面部队。②施密特也估计，"如果法国和德国在战争动员时共有三十个师可供使用，那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就会大大减少"。③这就提出了谁来负担这笔经费的问题，这意味着各国的国防预算需增加一倍，西欧各国政府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来。如果使用英国和法国的核武器来支

---

① 梯埃里·蒙布里亚：《一致的终结》，法国《世界报》，1983年10月1日。

② 见英、德、法、意、荷五国国际问题研究所1983年报告：《欧洲共同体：进步或衰落?》，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1983年版。

③ 施密特答记者问：《施密特对自由世界的冷静分析》，法国《费加罗报》，1985年1月11日。

持这些常规军备，其用费也必须由有关欧洲国家分担。近几年来，美国一再要求北约的西欧成员国增加军事预算，以减轻美国的负担，西欧各国政府一直采取抵制态度；至于承担全部西欧防务的费用，当前的物质条件就更不具备了。

所以现实地说，西欧防务仍离不开美国的合作，西欧联盟的几次会议也表明，西欧的防务合作并不排斥大西洋联盟，特别是英国和联邦德国的领导人不止一次说，重振西欧联盟只是为了加强北约组织中的"欧洲支柱"。杰弗里·豪表示，英国政府不允许西欧联盟成为"一个特殊的俱乐部"。[①]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西欧各国越来越希望在防务问题上找到一种'欧洲的声音'或'一致性'，同时又避免给人留下反美的印象。"[②] 法国国防部长埃尔尼说："我认为，在最近几个月，特别是在关于潘兴导弹的辩论之后，欧洲人已经意识到必须改善他们的安全条件和增加防务努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不认为欧洲安全可以没有美国的核保护。因为，目前美苏之间的关系使人无法设想欧洲人可以独自保障自己的安全。"他认为："至少在二十年内，全面的核威慑仍将保护着法国和欧洲。"[③]

第二，西欧各国之间有不同的要求。西欧共同防务体系首先要求西欧在政治和经济上达到相当程度的一体化，才能有整体的防务观念和防务政策。而法、英、联邦德国的"三角关系"如何，又是起关键作用的因素。现在西欧在加强西欧的独立作用只有共同点，但具体的政治、经济等条件，正如蒙布里亚所说，是并不具备的。这次恢复联盟的活动，法国和联邦德国比较积极，两国领导人都一再强调法德合作在西欧联合中的核心作用；尤其是法国，推动最力。但英国却是有保留的，杰弗里·豪说，一方

---

① 见合众国际社罗马10月26日英文电。

② 英国《金融时报》1984年10月26日文章：《欧洲就防务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其声音是试探性的，然而很坚定》。

③ 埃尔尼答记者问：《同美国在一起的集体安全》，法国《价值》周刊，1984年12月31日。

面促进欧洲联合，另一方面又排除英国，是“不可思议的”；把英国“撇在一边”，等于在欧洲造成“山羊和绵羊之间的新分裂”，那是“毫无意义的”。①英、法之间传统的芥蒂并未减少，法、德合作当然也是有条件的，法国率先提出取消对联邦德国生产常规武器的限制，但绝不主张联邦德国发展核武器，联邦德国对于核武器问题的敏锐性亦深有所感，因此宣布联邦德国将不生产战略武器；但西德也不可能以法国的“核保护”取代美国的“核保护”，联邦德国不可能在美国和法国之间作出断然抉择。而且，联邦德国任何较大的政策动向从来都是法国所密切关注的：五、六十年代法国不愿意联邦德国同美国拉得太紧，怕因此妨碍西欧的独立作用；七、八十年代，法国又担心联邦德国偏离大西洋轨道而偏向东方，从而危及法国的安全。法、德的结合是一种既相互利用、又相互牵制的结合。英国虽然表示支持恢复西欧联盟的活动，但是由于英国同美国的关系与其他西欧国家同美国的关系不同，因此比较侧重于西欧联盟不应妨碍北约的防务计划，更加不愿意看到西欧离开大西洋体系太远，这是英国在西欧联盟的会议上所一再提起的。

总之，西欧安全和防务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从五十年代后期当西欧发现美苏核力量差距在缩小时起，就已感到把西欧安全拴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上，不是一个可靠的战略。经过战略核武器会谈、“大规模报复战略”转变为“灵活反应战略”等等，西欧愈来愈感到美国的“核保护”是靠不住的。因此，这一次重提西欧联盟的促发外因并不是新东西，只是表现得要紧迫得多而已。

西欧防务问题今后还会一再提出；只要有美苏的争夺，只要欧美在战略上有不同的侧重和不同的考虑，西欧独立防务问题就总要摆在西欧政治的议事日程上。

---

① 见法国《世界报》1984年5月28日。

·第十六章·

欧洲共同体在发展中的特点

(一) 发展、问题和妥协

进入七十年代以来西欧政治舞台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就是拖延了十年之久的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不再象戴高乐那样持否定态度，而是认为把英国纳入欧洲共同体内，将会有利于西欧国家联合起来争取同美国的平等地位，并且还可以对联邦德国的愈来愈增长的影响起一些平衡作用。英国、爱尔兰、丹麦、挪威加入共同体的谈判于一九七〇年六月开始，一九七二年一月签订了条约。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欧洲共同体由六国发展为九国，跨越了英吉利海峡。(挪威因条约未在公民投票中通过而没有加入)欧洲共同体的扩大说明西欧联合的进程在向前发展，西欧在国际事务中的份量大为增加。

美国对于欧洲共同体的发展，从来是有疑虑的。它感到，六国欧洲共同体一诞生就与为了落实"马歇尔计划"而组成的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根本不同；那时曾是美国的受援者，这

时则已成为美国的竞争者。在政治上，共同体与流产了的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性质也很不相同。欧洲防务共同体主要是为了增强抗苏的力量。而后来的欧洲共同体，按照基辛格的理解，则将“坚持一种特别的欧洲观点，即对美国在大西洋政策方面的霸权提出挑战”。

欧洲经济共同体扩大后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以一九七七年的情况为例，九国的欧洲人口达2.59亿，国内生产总值为15,811亿美元（美国20,949亿美元，苏联10,340亿美元），出口贸易为3,775亿美元（美国1,190亿美元，苏联 452 亿美元），黄金外汇储备为892亿美元（美国118亿美元）。[①] 九国在以上几个方面的总合，几乎赶上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极富实力的经济集团。一九七二年十月，九国首脑巴黎会议，决定在一九八〇年建成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并且要在政治上建成欧洲联盟。巴黎会议还决定要把共同体的一体化领域扩大到罗马条约未曾规定的地区政策、环境政策和能源政策等方面去。西欧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了，联合的范围也扩大了。

继英国、爱尔兰和丹麦加入共同体后，希腊也于一九七九年与共同体签订了加入共同体的协议，从八一年一月起成为共同体的第十名成员国。其后，西班牙和葡萄牙也酝酿加入共同体。经过长期谈判，共同体和西、葡两国于八五年三月达成协议，决定两国从八六年一月起成为共同体的正式成员国。

应该说，欧洲经济共同体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在经济领域里、特别是在流通领域内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体化”，由各国行使的一部份权力，“让渡”给了共同体：对外关税的征收、货币兑换的控制、煤钢生产和价格的调节、农产品价格的规定、同共同体以外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进行经济贸易谈判，等等，共同体都发挥了一定的统筹作用和协调作用。例如在八十年代初，共同体成

① 《世界经济》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6页。

员国曾进行了一项各国货币比值的调整，协调了各国的货币政策；因生产过剩而需压缩钢材生产的分配额，也是在共同体内商定的。因此，欧洲经济共同体已成为一种联合程度较高的国际组织，体现了各成员国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和相互配合的关系。所谓“超国家”的意思就是各成员国通过谈判和妥协把自己一部分主权“让渡”给共同体，并换取相应的补偿。三十多年来，西欧“一体化”的总趋势是发展的，增强了抵御外来危机压力的能力，不同程度地缓和了经济危机中成员国之间在贸易和货币金融方面的矛盾。

但是，共同体的扩大与西方经济形势的恶化是同时存在的。从七十年代以来西欧没有一年得免于经济危机连绵不断的袭击。一九七一年西方发生了严重的货币金融危机，美元的贬值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西欧金融货币受到沉重打击；一九七三年爆发第四次中东战争和能源危机，以石油为主要能源的西欧陷入严重困难；七四年、七五年整个西方世界陷入以滞胀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接着七九年至八三年，西方又陷入一场更加深刻的经济危机之中：西方各国货币金融体制混乱不堪，石油价格十分动荡，通货膨胀持续加剧，生产停滞甚至下降，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在危机当中，西欧各国首先关心的是自己面临的问题，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全力以赴地应付眼前的危机，实行各种有利于自己的保护性措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这种时刻愿意放弃或者减少自己在制定政策上的自主权，去同别的国家进行“协调”。共同体成员国之间互相限制，在共同市场上以各种名目设置障碍，以保护本国市场，限制别国进口。关税联盟曾经是欧洲经济共同体一大支柱，也是一项具体成就。但是为了保护本国市场、限制别国倾销，都纷纷采取花样翻新的办法，绕过关税联盟的优惠规定，设置许多非关税保护措施。一时“冻鸡战”、“黄油战”、“牛奶战”、“葡萄酒战”纷纷扰扰，西欧各国之间的利益矛盾因经济困难而空前加剧。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各国货币汇率无法协调和稳定下来，打算在八〇年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计划也就无从谈起。一九七九年，共同体建成了一部分成员国参加的欧洲货币体系，但七二年提出的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的问题已没有人再提起了。关于扩大一体化的领域，实行地区发展、社会发展、能源、运输等方面的共同政策问题，由于共同体缺乏必要的资金，各自有不同的利益，也不可能取得显著进展。

欧洲经济共同体于六十年代曾制定了一项共同农业政策，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包括鼓励出口的各种补贴，并用“保证价格”收购过剩农产品的政策刺激了当时发展不力的西欧农业，对于西欧各国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被视为是共同市场的一大成就。但是这项共同农业政策一直是共同体内部争执不休的问题。农产品价格补贴上的支出和其他支持农业的支出逐年增加，竟占去了共同体每年预算的三分之二以上，造成了农业的盲目生产，过剩的农产品无法处理，而农业补贴仍不断提高，于是农产品越多，农业开支也越大，形成无休止的循环。八二年农业开支超支30%，占用了地区发展政策、社会政策等方面的资金，以致影响了共同体的总体发展；本来是一项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如今却拖了整个共同体经济发展的后腿。八三年七月，共同体委员会不得不宣布冻结农业补贴。工业出口比重大的国家认为，这样的政策使它们不得不为那些农业出口国的农业补贴付出代价，损害了它们的利益。联邦德国、英国、荷兰等国于八三年十二月共同体雅典首脑会议以前便提出削减农业开支、限制农业生产的主张；而法国、意大利等“农业国”则力主提高增值税提成，反对削减农业开支。一时被称为共同体内的“南北矛盾”。

与共同农业政策相联系的，还有个英国对共同体预算摊款问题。按照共同体现行办法，英国、联邦德国等被列为工业比重较大的国家，是农产品进口国，它们必须向共同体上缴它们征收的农产品进口差价税，上缴的数额大大超过了它们从执行这项政策

中得到的收益。也就是说付出净摊款过多。这个问题是从英国加入共同体起就是一直悬而未决的老问题。一九七五年，英国和共同体曾重新谈判英国加入共同体的条件，作为一种妥协方案，共同体同意给英国一定“回扣”。但是多年来，英国由于经济困难，八〇年又进行了半年的谈判，共同体决定继续给英国“回扣”：从八〇年至八二年，英国得到了总额为37亿美元的“回扣”。

于是，有两个问题纠合在一起：一方面共同体需要成员国（包括英国）多摊款，这对于财源濒于枯竭的共同体来说，是迫切需要的。当时，西欧经济危机严重，回升乏力，八三年十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仅为0.5%，法国、比利时、希腊等国甚至是负数增长。共同体成员国拥有的市场加在一起，相当于日本的两倍，与美国拥有的市场相差不多，任何一个单个的西欧国家是无法与美国和日本竞争的。特别是在新技术革命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的八十年代，西欧国家也需要把资金集中起来使用，以利于共同应付美国和日本的挑战。这就非提高成员国的摊款额不可。然而，另一方面，英国坚持改革预算和农业政策，从根本上解决“回扣”问题；否则就不同意提高摊款额。英国要求“回扣”的数额大于共同体其他成员国所能同意的数额，长期达不成协议（英国坚持要求共同体给12.5亿欧洲货币单位，约11亿美元；九国只同意给10亿欧洲货币单位，约8.6亿美元）。因此，农业补贴、提高摊款额和英国“回扣”三个问题就这样交织在一起，到了非寻求“一揽子”解决的办法不可。其尖锐的程度不仅影响共同体正常工作的进行，而且使共同体内部关系，特别是英法关系，空前紧张。特别是八三年十二月共同体十国首脑雅典会议和八四年三月布鲁塞尔会议的失败使共同体面临着几乎难以为继的危机。

妥协方案终于在八四年六月的枫丹白露十国首脑会议上通过：从八六年起，成员国的摊款额从本国增值税（VAT）的1%提高到1.4%；九国同意给英国的“回扣”为十亿欧洲货币单位，从一九八五年起，“回扣”额按“比例制”计算，这样英国每年可

以从上缴的增值税与从共同体受益的差额中拿回66%的“回扣”（英国本要求拿回75%的“回扣”）。差额越大，“回扣”也越大。争执了好几年的问题暂时总算告一段落，从总的情况看，仍是联邦德国出大头，稍次是法国。英国负责外交和联邦事务的国务部长马尔克姆·里弗凯恩德在枫丹白露会议以后撰文说：“严格分析一下我们的经济利益，这笔交易对英国来说是合算的。但并不止此。我们已经解决了曾有损于从我们加入（共同体）以来的同其他共同体国家的关系的争端。现在我们应该和它们一起集中和协调主要力量去建设我们的各国的经济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我们终于把共同体的财政置于一种健康的基础上了。”① 情况当然并不象里弗凯恩德说的那么如意，但持续了几年的争吵暂时可以平息几年。

（二）政治合作的进展

扩大后的欧洲共同体在政治合作方面的进展，是不应忽视的。为了把问题说清楚，有必要把有关政治合作方面的重大事件回顾一下。

六十年代初期，戴高乐打算组织欧洲政治联盟，没有成功。一九六九年十二月，蓬皮杜在六国首脑会议上再次倡议进行政治合作的谈判，会议委托以达维尼翁为首的委员会就此起草报告。

一九七〇年十月，六国外长通过关于发展政治合作的达维尼翁报告，规定合作的目的是协调成员国的外交政策，办法是进行磋商，交流情况，在可能情况下采取一致行动。

一九七三年七月，九国外长会议通过关于发展政治合作的第二个报告，报告规定进行政治磋商的目的是要谋求在具体问题上执行共同政策，凡涉及欧洲利益的问题，在未进行磋商之前，成

① 英国《泰晤士报》，1984年6月29日。

员国不作最后决定。报告还规定，九国外长每年至少集会四次，由各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组成政治委员会，为外长会议服务；另成立外交政策专家小组，研究中、长期的较为长远的问题。

同年十二月，共同体在哥本哈根举行成员国首脑会议，决定共同体九国力求在国际事务中"用一个声音说话"。这一年，共同体国家由于在石油问题上有求于阿拉伯国家，在中东战争问题上支持了阿拉伯国家对安理会242号决议的解释。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共同体在巴黎举行首脑会议，决定组成"欧洲理事会"，讨论有关共同体的问题和政治合作问题。会议委托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就推动欧洲联合问题提出报告。

七六年一月七日，廷德曼斯报告问世，报告提出，如果共同体成员国能在经济、货币、防务、外交等各方面实现合作，则一九八〇年左右可望建立欧洲经济和政治联盟；报告提出了一个分类发展的合作方案，即英国、意大利和爱尔兰实力较弱的国家（在九国中占三分之一）另行安排它们的经济和货币计划，其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可以走得快些，并帮助发展较慢的国家赶上来；报告建议九国制定一项共同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在对苏联执行缓和政策、调节欧美关系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等问题上采取一致立场。廷德曼斯报告还建议讨论共同体的共同防务政策。① 但廷德曼斯的报告没有被通过。

七六年十一月，九国首脑在海牙开会，通过了建立欧洲联盟的原则声明。

一九七九年，共同体第一次举行欧洲议会的直接选举。

一九八一年十月，共同体十国外长伦敦会议（希腊自八一年一月一日起已成为第十个成员国）宣布政治合作已成为成员国外交政策中的关键因素，但十国在世界上尚未起到与它们的联合力量相应的作用，十国将竭力影响形势的发展，而不只限于作出反

① 《纪事年鉴——1976》，第36卷，第20页C 2。

应。它们将越过协调政策的阶段，使政治合作表现为行动。

八三年六月，十国首脑斯图加特会议，通过了《关于欧洲联盟的宣言》，表示共同体十国将加强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合作，并且要把安全政策（军事方面除外）包括在政治合作范围内，再次说，十国要为建立"欧洲联盟"而努力。

十年来，共同体国家的政治合作涉及许多方面：

在欧安会的历次会议上，共同体成员一直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活动：在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签订、促进七十年代中期东西方所谓缓和进程等方面，西欧国家协调彼此的立场，采取了大体一致的态度，起了很大作用。对于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事件，共同体成员国在表态上虽然分寸不尽相同，但欧洲共同体仍作出了集体反应，谴责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对于波兰国内发生的事件，欧洲共同体也采取了有别于美国的立场，拒绝了美国关于对苏、波实行军事制裁的要求。

西欧石油供应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来自中东。在中东，西欧国家有着同两个超级大国不同的利益，因此它们也力求通过西欧各国的联合行动来发挥自己独立的作用。一九八〇年六月，十国首脑发表了有关中东问题的威尼斯宣言，第一次公开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主张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中东和谈进程，表示了同美国不同的态度。此后，共同体又不断派代表去中东活动，酝酿"欧阿对话"，比十年前共同体开始同阿拉伯代表接触的状况大大前进了。

从上面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七十年代以来，共同体成员国的政治合作是有很大发展的。煤钢共同体是欧洲联合从一种思潮、一种运动的阶段过渡到组织化、结构化的起点；欧洲共同体把联合的内容更发展了，政治性更增强了；共同体的扩大则把欧洲一体化运动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国际事务中西欧国家作为一个集体出现（虽然是松散的集体），来捍卫它们自己的利益，总的说来，是有利于打破两个超级大国对国际事务的垄断、推动世

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的。

西欧政治合作，如同经济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体化"一样，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假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没有出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的形势，西欧象今天这样的政治合作也许是不可能的。事实是，战后以来，美苏两国的关系无论取对峙的姿态，还是取妥协的姿态，都不能不影响西欧局势，西欧各国谁也不能完全摆脱这种后果；西欧竭力寻求一条自立的道路，在与美国结成同盟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独立作用，正是为了不受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制约，以捍卫自己的权益。在这里，西欧各国之间有共同语言、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即有政治上的"同一性"。因此，作为"第二世界"国家，西欧各国在东西方关系上势必需要执行某些相似或一致的政策。对例如哈尔默尔"缓和加防务"的报告、对赫尔辛基欧安会、对北约的双重决定等等，西欧都与美国有不同的侧重面，更加强调缓和、裁军，保持和发展同苏联、东欧的政治经济关系。西欧认为，维护欧洲安全，除了需要增强实力以维持力量平衡之外，其他非军事对峙手段——如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人员来往等属于欧安会"第三篮子"的渠道——起码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西欧各国要求和平与稳定、致力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它们的团结和合作，必定成为战争力量的制约因素，国际和平和安全的重要因素。

然而，西欧在政治上的"同一性"代替不了它的"多样性"。欧洲共同体归根结底是西欧各个民族国家的松散的集合体；"欧洲联合"也必定是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联合。所以，政治合作无论何等密切，也象在经济领域里的合作一样，都以不能损害本国的利益为度。欧洲共同体在政治合作的进程中经历了法国否决英国的第一次申请和因此暴露出来的法国和其他五国的意见分歧，还经历了富歇计划的提出和搁浅，经历了是采用多数决定制还是一致决定制的争论（争论的实质是对一体化的理解问题）等等。至于设立政治合作的常设机构（秘书处）问题，由政治协商向制定

共同的外交政策过渡的问题都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历次首脑会议对于加强政治合作一般多限于发宣言、表决心，实际措施相对说来是比较少的。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国首脑会议发表关于加强政治合作的宣言，也只是强调在磋商的基础上扩大政治合作，并没有提到制定和执行共同政策的高度。政治合作，可以表现为两方面：第一，在重大国际事件发生后相互磋商，在能够达成一致或意见接近的情况下表明共同体的立场，如苏联入侵阿富汗、中东局势等问题；第二，对于成员国的某些对外政策表示道义性的声援，如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等。这种政治合作，同各国在对外关系上的决策是两个范畴的事；政治合作不能干预成员国主权范围内的决策问题。

（三）西欧与第三世界

西欧与第三世界的联系从七十年代以来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五十年代，包括六十年代的上半叶，第三世界的广大地区还主要是争取民族独立；西欧的前殖民国家同这些第三世界的国家的关系处在一种“蜕变”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冲突还是很激烈的，不少地区发生了暴力对抗，殖民地人民被迫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夺取独立与自由。在这以后，西欧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从总体上看发生了质的变化，殖民时期结束了，在政治上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建立起来了。这不仅对于曾是殖民地的国家说来是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就是对于曾在长期历史中占有大片殖民地的国家来说，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是欧洲共同体与第三世界发展关系的重要政治前提。

英国等参加共同体后，也为共同体扩大同第三世界的联系，提供了有利条件，六十年代《雅温德条约》只侧重同西非和中非各国的关系；一九六九年的《阿鲁沙协定》的范围就扩大到了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多哥首

都洛美签订的协定和七九年十月签订的第二个《洛美协定》，则先后把合作的范围扩大到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近六十个国家。从八三年十月起，共同体又同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国家就签订第三个《洛美协定》进行磋商和会谈。八三年底，参加《洛美协定》的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国家已增加到六十三个。

几个《洛美协定》，都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之后签订的，因此《洛美协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三世界在世界事务中的份量大大增加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在贸易优惠、保证第三世界国家部分初级产品出口收入的稳定、增加财政援助等方面都作了若干让步。例如在实施第一个《洛美协定》以后，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国家四十六国向共同体的出口额由七三年的六十二亿欧洲计算单位上升到七九年的一百四十三亿，增加约一点三倍，占全部出口贸易的二分之一。四十六国出口收入损失得到了约一亿六千万美元的补偿。当然距离彻底改变历史形成的不等价交换状况、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还很遥远。

重要的是，从七十年代以来，西欧许多政治家愈来愈从战略的角度重视南北关系，认为“南方”的发展不仅对北方的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会影响东西方关系的发展。西欧的政治家们感到，加强西欧同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有助于抵制两个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的渗透与扩张，从而有利于提高西欧国家的国际地位。因此，西欧所要求的南北战略是一项既有利于西欧经济发展，又有利于加强西欧政治影响的综合战略。从经济联系入手，取得政治上的成果。这是西欧在新形势下的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政治动向，这个动向表明，西欧在进行两个层次的思考：（一）西欧在第三世界出现了那么多新兴民族独立国家之后需要制订一项不同于殖民时期的、新的第三世界政策，这也就涉及到需要建立一种新国际经济关系的问题，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二）进一步把南北的全球谈判问题提到全球发展战略的高

度。新时期的国际社会内的各种因素日益交融和交错，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之间也将日益互为发展的条件；一个贫困落后、负债累累的“南方”不可能不影响“北方”的发展。

一九七九年底，以维利·勃兰特为主席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简称勃兰特委员会）发表的第一份研究报告，题为：《北方和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诞生的。

维利·勃兰特在《报告》的导言里指出，南北关系问题与反对军备竞赛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是本世纪未来的年月中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① 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取得民族独立，标志着“人类的历史的确开始了一个新时代”。② 这些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一直在争取平等的发展机会”，它们要求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成为“自己的主人”，掌握本国资源，增加“在国际商品生产和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③ 但是，现行的国际机构体系还是战争刚结束时的状况，因此，“在跨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门槛时，关于发展问题的国际性辩论谈到的已不只是‘救济’和‘援助’，而是有关新的结构的问题。当前摆在议事日程上的是调整国际关系，建立新的秩序和发展问题采取一种新的全面作法。”④

《报告》的主体详细论述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各方面情况和问题，并提出了建议。本书不打算详细介绍和评论勃兰特委员会报告，只是想指出这份报告的产生的确反映了西方对第三世界政策的一种新探索。在勃兰特委员会的十八位各国政治、经济界知

---

① 《争取世界的生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关系研究》，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2页。

② 《争取世界的生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关系研究》，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2页。

③ 《争取世界的生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关系研究》，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3页。

④ 《争取世界的生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关系研究》，第13页。

名人士当中，西欧地区除勃兰特本人外，还有英国的爱德华·希思、瑞典的奥洛夫·帕尔梅和法国的埃德加·皮萨尼（曾任法国参议员、农业部长，在欧洲共同体内是共同体委员会成员和欧洲议会会员）。所以《报告》的主要倾向在西欧是有代表性的。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二十二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墨西哥坎昆城举行了关于合作与发展的国际会议。这是第一次讨论南北关系问题的高级会议。西欧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虽然没有具体成果，而且在坎昆会议以后南北会谈的进展微乎其微，但是南北全球问题从此已成为国际政治生活中不能避而不谈的问题了。

一九八三年二月，勃兰特委员会发表了关于南北合作问题的第二个文件：《共同危机——南北合作争取世界经济复苏》，继续在开展南北合作关系问题提出建议。

在这几年当中，讨论南北问题的国际会议是很多的，特别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等。但都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勃兰特委员会两次《报告》只是反映了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这种觉悟在西欧是有深远意义的，在过去殖民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它意味着，彻底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几百年来形成的同这些辽阔而有潜力的新兴地区的旧关系模式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但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需要持续的努力和时间。诸如"洛美协定"之类的条约、西欧各国的同第三世界合作的政策、勃兰特委员会《报告》、各式各样为此而举行的国际会议，等等，都将纳入南北关系这个总题目之下，起各自的一份作用。问题刚刚开始，并将不断展开，但是，西欧与第三世界的关系已确定无疑地跨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四）前进与坎坷

总之，七十年代以来的欧洲共同体已经长大成人了：不但西欧形势的发展不能离开欧洲共同体的发展，就是谈到世界局势的总发展时，也不能忽视它。它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实体，但如果共同体的成员国决心在某一件事情上采取共同立场和行动时，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可观的；当然，当共同体发生严重的分歧的时候，它也就不可能发挥有意义的影响。近十五年来，欧洲共同体在它成长的历史当中显示出以下三大特点：

一、欧洲共同体扩大了。共同体六国创始国都集中在西欧大陆的中欧和西欧。英国、爱尔兰和丹麦的加入使共同体向北扩展了，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成为共同体的正式成员国，则使共同体的活动范围扩展到欧洲的东南角和西南角。虽然三次扩大都经历了长期的复杂谈判，但从六国发展为十二国、共同体包容的面积更大了、人口更多了、经济实力也越雄厚了。

欧洲共同体同共同体以外的西欧国家也建立了密切联系，同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贸易关系，同第三世界发展了关系，同苏联、东欧也有了贸易往来。欧洲共同体日益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和广泛联系的西欧国际组织。

欧洲共同体的国家在一些直接与西欧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国家会议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讨论西欧防务问题的西欧联盟的七个成员国都同时是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共同体成员国在北约"欧洲支柱"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法国固然不是北约军事组织的成员，但这个"欧洲支柱"不能不把法国的力量计算在内）；在一年一度的七个最发达工业国家首脑会议中，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会议上，共同体成员国总是西欧利益的代言人。

共同体的各种体制已经建立起来，并已形成制度，有起决策

作用的首脑会议、各种部长理事会（如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工业部长、财政部长、农业部长会议等等），有直接选举产生的共同体议会和共同体法院等。

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加强政治合作，是七十年代以来共同体的一大成就，虽然一直没有建立起组织上的政治联盟，但是遇事磋商已经制度化了。这主要是由于形势使然，由于美苏力量对比基本形成均势，国际形势复杂动荡，西欧需要表示自己的立场，维护自己的利益；西欧越来越不愿意在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全球争夺和交易当中充当筹码。它们既反对美苏核竞赛升级，也不愿因美苏妥协而出现牺牲西欧利益的美欧"脱钩"现象。可以肯定，西欧的政治合作越发展，越将对世界走向政治和经济的"多极化"起推动作用。

二、与共同体的扩大借来的，则势必也发展了国与国之间的"保护主义"，在经济困难时尤其如此。欧洲共同体一直是受着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约制的，因此，共同体越是扩大，矛盾也便越多、机构便越松散。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经济危机不断、金融货币一再受到美元波动的冲击、美日尖端科技向西欧提出挑战，因此，共同体内部的政策需要经常调整和调节，而每一调整又必定牵动有关成员国的利益。原来曾起过积极作用的农业政策已成为影响共同体正常发展的消极因素；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税联盟不断受到干扰，设置了许多看不见的"关税壁垒"；财源短缺，赤字沉重，预算制度找不出一劳永逸的办法。

这已是一个规律——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各国之间的"保护主义"就必然盛行，"一体化"、"超国家"安排就有更大阻力。一九八四年五、六月间，法国总统密特朗在加强与联邦德国的联系的同时，多次提出发展合作的"两种速度"问题，即共同体的一部分成员国可以制定经济合作项目，另一部分成员国可以不参加这些合作——按"两种速度"推进欧洲联合事业。这令人联想起七六年一月廷德曼斯提出的方案，廷德曼斯在当时已经涉及不同速

度的发展问题了。但密特朗则进一步切实在法德之间实行了一种合作的"速度",并取得了联邦德国的赞同，这样，法国和联邦德国的"联合"就要大大地走在了整个共同体的前头。对此，英国是有明显保留的。

三、欧洲共同体已成为欧洲联合的体现物，也是欧洲联合事业的核心。今后西欧联合的事业只能通过共同体、或在共同体的基础上来进行。从理论上讲，欧洲联合应该比共同体的含义更广泛，其长远目标是在西欧范围内（欧洲联邦主义者甚至设想在全欧范围内）建立某种联邦式的或邦联式的体制，成为扩大了的瑞士或扩大了的联邦德国。然而它的现实性如何，各方议论纷纭，但一般都觉得在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因素的条件下，欧洲共同体已是迄今为止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的联合了。虽然共同体概括不了欧洲联合的各个方面（例如防务问题还需借助西欧联盟这个讲坛),但是讨论欧洲联合的问题是不可能绕过共同体的。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欧洲共同体已不只限于讨论经济方面的问题，现实已逼着共同体讨论现实的政治问题（七十年代以来至今不乏其例)。

今后的欧洲共同体将越来越把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结合起来。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和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不可能消失，然而当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总又会找出一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使共同体得以存在和发展下去。一九六六年一月的"卢森堡协议"是在法国"空椅子危机"之后达成的一次妥协。这次妥协维护了共同体的团结，但把"超国家"的设想推得更遥远了。八四年六月枫丹白露会议暂时解决了摊款和英国"回扣"问题，是继雅典会议和布鲁塞尔会议两次失败后达成的又一次妥协。

这一次妥协再次维护了共同体的团结，同时也考验了英吉利海峡两岸的所谓"欧洲意识",即无论争论达到了如何白热化的程度，共同体的成员国从已往的切身经历中总结了如何在分歧中找

到并维护共同体的胶合力，总要设法使共同体这架机器得以运转。换言之，这种妥协一方面反映了成员国之间存在着利益矛盾；另一方面也说明成员国利益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因而需要维护西欧的团结和合作。同时为了对付西欧各国的共同竞争者美国，为了使西欧在世界上占据一席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能小觑的地位，也需要这种团结和合作。这种团结在抵制美国高利率、美元比价上涨、钢管出口等问题上都有表现。欧洲共同体的各个成员国没有一个想拆散或削弱共同体，因为如果没有共同体，任何西欧国家都无法抗拒世界性的政治和经济挑战；同时又都希望共同体能尽可能多地代表自己的利益，并在这个前提下加强它。这是共同体诞生以来至今的全部发展史所一再表明的；今后的共同体以及西欧联合仍将在曲折中（甚至时时是在坎坷中）前进。

·第十七章·

八十年代的苏美争霸与西欧

进入七十年代以来，世界局势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透过这些变化，人们可以愈来愈清晰地看出与西欧局势直接有关的两条规律，它们既可概括既往，也可据此观测未来，起码八十年代将循此演进。

第一，美苏之间的力量对比既然已呈大体势均力敌之僵持状态，则它们的关系必定是对峙与对话交替出现，争霸的态势没有变。

第二，西欧联合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在两霸僵持的局面下，西欧政治上的“同一性”愈趋明显，竭力要摆脱两极羁绊，争取多极世界。

第一条规律表现为世界格局和局势的紧张和缓和问题；第二条规律表现为西欧在美苏争霸的条件下所处的地位。

(一) “两极”乎？“多极”乎？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从西欧所处的战略地理位置来看，西欧局势的发展没有一

刻离开过美苏争霸的总态势。这种局面自战后以来没有根本改变。

当然，今天绝不是昨天的简单、机械的延续。今天的东西方关系与四十年前的情况比较大不相同了，就是与十年前比较，也有很大不同，出现了不少新的因素和新的问题。对欧洲来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和苏联都不能再象五十年代那样控制自己的盟国。西方比东方变化更大、更多、更快，以至大西洋两岸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尖锐。美国“核保护”的可信性和美国在西方盟国中的“领导地位”大大动摇了，（西）欧美在对苏战略问题上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分歧，欧美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日益加深，西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问题从而产生。今天欧美关系在经历着一种不稳定的、缓慢而持续的变化，有人把目前所处的时期叫作“过渡阶段”。“过渡”到哪里去？“过渡”成什么样子？在今天还是专家学者们热烈探讨的问题，他们为此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设想。这些设想的总的倾向是，先是西欧，随后和东欧一起，逐渐脱离美国和苏联的控制，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欧洲。其实这类想法并不自今日始，是个欧洲历史上的老问题。本书前几章曾讲过，从战后看，各种欧洲联邦主义运动、邦联主义运动、欧洲“一体化”运动以及戴高乐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构想等等，都是着眼于欧洲的未来的。也就是法国学者皮埃尔·勒鲁士所谈的未来的“欧洲体制”。他认为，今天的欧洲正处于这个从“削弱了的大西洋体制”走向还属于“萌芽状态”中的“欧洲体制”的“过渡期”。[①]用联邦德国学者皮特·本德尔的说法，欧洲已走上“欧洲的欧洲化”的漫长道路。至于设想中的“欧洲体制”或“欧洲的欧洲化”成型以后的欧美苏关系该是什么样子，那就更是遥远未来的问题了，现在还难于触摸得到。但是，立足于现实以及今

---

① 皮埃尔·勒鲁士：《八十年代的欧洲安全导言——总结和展望》，见勒鲁士主编《八十年代的欧洲安全》论文集，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1980年版，第67页。

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起码在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估计西欧（更不用说东欧）不大可能发生足以影响所谓“雅尔塔格局”的变化；“雅尔塔格局”虽然不那么牢固，而且仍将时时受到冲击和震撼，然而替代它的新格局却更多地只有理论上的意义。换言之，这些新的因素还不足以改变美苏争夺是世界动荡不安的总根源这个基本事实，“两极”格局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国际局势的基本特点。

至于西方国际问题研究者常用的“极”这个字，本来是没有科学的、严谨的定义的，可以作很灵活的解释。起码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广义的。譬如说，西欧、日本在经济上强大起来了，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的作用突出了，第三世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崛起了，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牵制和削弱了两霸的争夺；于是便说，世界已经出现了“多极”现象。再一种解释可以叫做狭义的，认为既然叫做“极”，那么名符其实的一“极”就应当与其他的“极”在军事实力上大体相当，并以自己的份量左右国际形势的走向，否则，就不能构成一“极”。这样探讨问题，似乎有一些思辨味道，各有各的道理。然而，最重要的还是立足于实际力量的对比及其切实影响。因此如果说紧张局势的根源不在别处，而在美苏两家的激烈争夺，那么，我们就不妨确认，当今之世堪称为“极”者说到底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这种看法的前提是，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主要看军事实力。“多年来，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一直把最大的赌注押在实力的较量上”，它们两家的核弹头占了世界现有核弹头的97%[①]。所以它们两家的核堆积才构成了对世界安全与和平的严重威胁。西欧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是无法与美苏相比拟的。所以不能单纯用经济发展来估量一国在国际事务表现出来的实力，在讲实力对比时，首先是体现为军事实力的对比。尼克松在七十年代说世界上

---

① 《人民日报》评论员：《实现核裁军的正确途径》，《人民日报》，1983年11月30日。

出现了五个政治中心，他这样说仍是从在同苏对抗中可能联合哪些力量的角度出发的，并不是说世界已是“多极”，在尼克松的战略中，实际仍是“两极”。基辛格当时针对欧洲的作用时说，美国负担的是全球责任，而欧洲负担的是地区责任。他也是从“两极”的观点出发的。

美国学者A·W·德波尔特说，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局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十年中固然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都没有对世界基本体制（即前面说的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他认为，一九五五年时的世界体制没有改变，仍然是两个比各自的盟国强大得多的超级大国统治下的体制；德国仍然是分裂的，继续分属于东西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他还说，在一九五五年以前或以后，有人估计今后只有三个国家（美国、苏联和统一后的德国）的发展和变化有可能改变战后的体制，但事实上谁也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美国的西欧盟国确实有较多的“选择自由”、“更大的主动权”、能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但是，欧美之间的联盟关系比起它们的分歧来还是基本的、主要的。因此，德波尔特认为，由于美国和苏联在欧洲大体上还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军事实力上的均势，而它们两国又远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或欧洲各国合起来的潜力强大得多，所以，美苏关系——无论是相互争夺时的美苏关系，或是相互接近时的美苏关系——都对国际形势、尤其是欧洲形势具有压倒优势的影响。①

我们和德波尔特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不同的立场，但他这段叙述却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战后历史告诉人们，世界局势的紧张，首先或最终表现为美苏之间的紧张；世界局势的“松动”也首先或最终表现为美苏之间的“松动”。它们之间的关系或紧

---

① 参见A·W·德波尔特：《超级大国之间的欧洲——持续的均衡》，耶鲁大学1979年版，第166—168页。这本书与西德皮特·本德尔的《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欧洲的欧洲化》在对世界格局问题上有不同的分析和观点，都是西方研究战略问题的有影响的著作。

张、或“松动”都具有全球影响。地区性的冲突，尤其是没有美苏插手的某些地区性冲突，即使再激烈、再尖锐，也不会引起全球性的波动。

战后历史证明了这一分析。“冷战”理论的创始人是英国的丘吉尔，他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发表富尔敦讲话时，美国还很少有人象他那样分析国际局势。但是从理论到“遏制”政策的行动、并使“冷战”具体化的却是一九四七年美国推行的“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东、西欧从此以集团的形式截然对立，领头的是美国和苏联，面积不大的欧洲成为两大军事集团兵力部署最集中的所在。后来在六、七十年代，戴高乐主义和勃兰特的东方政策大大推动了欧洲的缓和进程，但东、西欧之所以能相互接近，首先又是美国和苏联先有了“松动”的要求和行动：一九五九年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的“戴维营会谈”掀起了一阵东西对话的喧嚣；第二年美苏在U-2飞机事件上的怒目相视又使局势紧张起来；一九六二年古巴危机一度造成一触即发之势，但两个超级大国的交易却导致了“冷战”的所谓“解冻”，并在以后进一步实现了象一九六三年签订莫斯科三国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那样的“美苏合作”。七十年代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之所以能够举行，同样是因为美国当时有了尼克松—基辛格的对苏政策和欧洲政策，美苏“缓和”先于欧洲的“缓和”。西柏林协议和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可算是明显的例子。

赫尔辛基会议使“缓和”的进程达到了高峰。物极必反，没有多久就轮上了紧张气氛的回潮，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终于宣告了“缓和”时期的结束。在这之前，苏联已经在欧洲出现“缓和”的同时在南部非洲、曼德海峡一带连连得手；更重要的是，苏联利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没有包括中程导弹放手发展SS-20，并抢先在一九七六年在东欧部署。卡特政府提出对苏联实行新的“遏制”，决定在西欧部署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卡特在阿富汗问题上虽然反应乏力，西盟各国锣齐

鼓不齐，但是“缓和”的势头确实从此刹了车，东西方关系陡然紧张起来。八十年代初，里根接替了卡特，美苏关系进一步僵持；延续至今的欧洲中程导弹问题，使美苏在欧洲争夺核优势的争斗发展到了新水平，使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一九八三年被称为“导弹年”。

所以，只要粗粗回顾一下紧张和“缓和”的交替过程，就不能回避这个现实：左右国际局势的、使国际局势如此不得安宁的，只能是美苏的争夺。

“两极”格局还有一个与美苏争霸相关联的含义，指的是战后以来欧洲分成东、西欧的现状，一九七五年赫尔辛基会议的“最后文件”实质上是在法律上确认了三十年前雅尔塔会议的安排。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当选为法国总统以前曾多次强烈抨击这种安排，指出，凡是爱国的西欧人都只能有一个想法，就是“摧毁雅尔塔（格局）”，但他立刻又说，走出雅尔塔并不是不冒风险的。① 他当选后也说过类似的话。联邦德国则明确认为只能尊重现实。一九八〇年波兰宣布军管后，关于格局问题的讨论在西方又热闹了一阵，但一般都认为这种“分治”的欧洲格局还只好维持下去，打破它就会出现危机。法国《费加罗报》在一篇社论中说，西欧和美国根本不想把事情搞僵，这就是说不打算坚持使波兰“摆脱社会主义制度”，不想最终与苏联对抗；在长时期内，“雅尔塔的结局”将仍然会保持下去。② 因此，由于东、西方集团各自出现了内部分歧和“裂痕”，出现了“离心倾向”，便说以东西欧分治为标志的“两极”格局已经开始崩溃，肯定是为时过早的。

以上说的是现状，即目前现实的情况。然而，存在着的并不就是合理的。“两极”是客观存在的，但它并不是合理的。“两极”

---

① 弗朗索瓦·密特朗：《此地和此时》，法国法雅尔出版社，第241页。

② 法国《费加罗报》1982年1月6日社论。

的含义是争霸，争霸则使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受到干扰和威胁。所以世界人民要求维护和平，就必定要反对霸权主义，反对美苏的争夺。

同时也要看到，今天的“两极”与五十年代的“两极”已大不相同。从西欧方面说，不仅改变了同美国政策亦步亦趋的状况，而且经常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以独立自主的声音形成某种制约力量，对两个超级大国施以影响和压力，争取以“多极”格局代替“两极”世界。

（二）持续的紧张、间歇性的缓和

八十年代头四年的局势仍是相当紧张的。里根上台以后强化了卡特政府后期的对苏政策。皮埃尔·勒鲁士说，八十年代一开始就面临四件令人注目的大事，这就是：（1）苏联入侵阿富汗；（2）因阿富汗事件引起的欧美紧张关系（包括美国对苏联的制裁措施、东西方贸易、欧美经济矛盾等等一系列分歧，以及欧美对苏战略的大争论）；（3）波兰问题；（4）两伊战争。① 其实还应该再加上两件：欧洲中程导弹和黎巴嫩战争。印度支那、马尔维纳斯、格林纳达、乍得、朝鲜半岛等还没有计算在内。这些问题，特别是与欧洲安全直接有关的欧洲中程导弹问题，到一九八三年年底，把局势搞得极其紧张，美苏在欧洲的对垒空前尖锐，在各种国际问题中非常突出。

现在，欧洲中程导弹问题暂告一段落了，美苏两家摊牌的结果是：经过两年多讨价还价，双方的建议一个接着一个，但谁也没有从原来的立场后退一步；美国的“零点方案”终于没有实现，苏联拚命要打掉美国部署导弹的目的也没有达到，于是美国开始

---

① 皮埃尔·勒鲁士：《八十年代的欧洲安全导言——总结和展望》，见勒鲁士主编《八十年代的欧洲安全》论文集，第16—17页。

部署，苏联立即采取了反部署措施，美苏核竞赛进入了新的一轮。

八十年代的后一半，美苏争夺的态势如何呢？概括而言就是：

一、美苏继续紧张对峙，进入新一轮核军备竞赛，不可能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协议。美国政府提出“战略防御倡议”(SDI)后，各方议论纷纭，观察者认为，如果“战略防御倡议”得以实施，势必引起军备竞赛发生质的变化。这样，除了争夺陆上、海上和空中的核优势之外，航天领域的争夺也将激烈起来。在欧洲核力量大体平衡的情况下，常规军备将受到重视，常规军备竞赛也将加剧。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将继续是美苏争夺的战略重点。但是，由于东欧与苏联的关系比西欧同美国的关系紧密得多，美苏在西欧的争夺比在东欧更容易显现出来和更加复杂；西欧和美国的关系、西欧和苏联的关系将更加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至本书付梓之日，世界其他地区的热点问题还是一个也解决不了：柬埔寨和阿富汗的局势将继续拖下去；波斯湾不可能平静，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气氛没有缓解的迹象；阿拉伯、以色列的冲突势必旷日持久，这个地区的局势还有出现“失控”的危险；南部非洲最近表面平静，局势有所松弛，但可能孕育大的风暴；在拉丁美洲的争夺也不会限于目前的水平和规模。这些地区之所以会长期动乱不止，是因为动乱的根子没有消除，而且一个超级大国或两个超级大国总要以不同方式插手。因此，持续的紧张对峙是八十年代局势的基本特点，然而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实力大体平衡以及其它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和平因素的增长日益超过战争因素，因此不大可能爆发全球性的冲突。

二、局势的紧张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有时会有间歇性的“松动”和“缓和”。例如，目前欧洲中程导弹问题告一段落，美国既需要迎合国内舆论，也需要安抚西欧，苏联领导交班不久，内部困难也不少，双方在紧张对峙了一阵之后都需要调整，

因此出现一段短暂的缓和"间歇"是可能的。然而，客观局势摆在那里，缓和的周期不会太长，七十年代的"缓和"势头不可能再现。

美国和苏联是两个超级大国，都推行全球霸权主义政策，它们之间的争夺是绝对的、基本的，而间歇性的缓和则是一时的、相对的，是适应两个超级大国调整战略和策略的需要的。因此，"缓和"只是在一定时期、另一种形式的争夺，是争夺优势的一种手段。所以，即使美苏恢复了对话，也不可能取得戏剧性的成果。

持续的紧张和间歇性的"缓和"相交替，对峙与对话相交替，这是战后近四十年来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下国际形势的发展规律，也是欧洲局势的发展规律；只要有大国的对峙和争夺，这个发展规律就是有效的。

（三）超级大国之间的西欧

在美苏争霸紧张对峙的情况下，西欧的处境是怎样的呢？

一言以蔽之，在整个八十年代，西欧将继续处在美苏争夺的夹缝当中；尤其是由于美苏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后形成面对面对峙之势，西欧处在两国导弹短兵相接的威胁之下，西欧的脆弱性、复杂性和被动性便更加突出。它至今承受的四个方面的压力，不会减少。

首先是来自苏联的压力。今天苏联对西欧的政策仍然是包围政策，华约的部队密集地部署在东欧；苏联的舰队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象一把钳子形成了对西欧大陆的合围之势。特别是苏联的SS-20中程导弹把西欧放在直接射程之内，一旦发生战争，开始部署美国中程导弹的西欧就会成为一个核战场。诚然，现在并没有苏联直接发动对西欧武装进攻的迹象；在东西方军事实力大体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核武器时代，双方对于发动军事冲

突，都不能不持审慎的态度。但是，苏联坚持凭借优势的军事力量对西欧施以强大的政治压力，离间欧美关系，以最终取得不战而胜的结果的战略方针始终没有改变。

西欧受到的另一个压力来自美国。美国与苏联的对抗是全球规模的。随着欧洲中程导弹问题的发展，美国将更不愿放弃西欧这块东西方关系中的关键阵地，更要设法控制西欧、防止它任何滑向"中立主义"的迹象；同时西欧在防务上归根到底也离不开美国。但是，西欧和美国在对苏战略上的意见分歧又是十分尖锐的，西欧的"独立倾向"日益发展，西欧对美国的任何涉及西欧利益的重大决策都抱有一种不信任感：既怕美国不平等地施加控制，强迫西欧屈就，也担心万一"新曼斯菲尔德主义"成为现实，出现一次"核敦刻尔克"，西欧就将被置于一场欧洲核战争的危险之中。因此西欧对美国时时疑信参半，忐忑不安。在欧洲导弹危机中的欧美关系将更加微妙而复杂。

西欧还有自己本身固有的困难，这是西欧很难摆脱的第三个压力。这方面的问题十分复杂，使西欧夹缝中的困难处境更加沉重。首先是西欧固有的问题很难找出彻底解决的办法。"欧洲一体化"的呼声喊得越响，内部矛盾就越多；欧洲共同体的进程已经表明了问题的复杂曲折：共同体越扩大，结构便越松散；结构的松散和贸易保护主义互相助长。从根本上说，在民族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因素的条件下，任何"一体化"的设想和任何"超国家"的安排都只有相对的意义。在经济困难时尤其如此。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为一项集体的欧洲政策牺牲自己的利益。

同时，欧洲导弹危机也给西欧防务出了难题。如前面所说，欧洲导弹不仅没有改变美苏在欧洲正面对抗的基本态势，更改变不了西欧的艰难处境，而且增加了新的不安因素，使西欧在作出反应时更加踌躇、更加困难。西欧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回旋余地是有限的。为了寻找出路，最近建立欧洲防务之说甚嚣尘上。建立欧洲的共同防务体系，本来是战后多次提出的，但收效甚

微：五十年代提出的“欧洲防务共同体”，未问世便夭折了；美国主持的“多边核力量”也半途而废。西欧联盟是战后唯一的西欧防务组织，但它只在过渡到北约组织时起过跳板作用，几乎没有在防务合作上有什么建树，西欧提出欧洲防务的起因，每每是由于西欧对美国核战略狐疑甚多，试图找一个西欧自己的防务战略。然而，要搞西欧防务，首先就要靠法、英、西德三个西欧大国的合作，否则西欧防务便是空话一句。但是，把法英德的防务联结在一起，其困难起码不会少于它们在经济上的合作。英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根子是丘吉尔的“三环外交”，第一要保住“岛国”——超乎西欧大陆以外的世界大国的特性。英国在同西欧大陆搞任何一项共同事业时都是要三思而行的。诚然丘吉尔在野时倡导过欧洲运动，鼓吹“联合起来的欧洲”，但是英国政府（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反对任何超国家性质的欧洲联邦主义，坚决维护英国的主权。英国不卷进“欧洲防务共同体”的理由之一，就是因为它有“超国家”性质，认为把英国与西欧大陆国家同等地属于一个欧洲防务集团，英国的突出作用就被淹没了。再者英国也绝不能放弃英美的“特殊关系”，英国那一点点核武器起初还是靠英美“特殊关系”、在排斥法国的情况下搞起来的；英国更新核武装自然仍要靠美国，而不会靠法国。联邦德国觉得美国“核保护”既靠不住，又危险，但更不能接受法国的“核保护”。法国则希望通过法德防务合作从联邦德国得到技术、资金方面的好处，以改进常规武器，但绝不想用自己的核武器去“保护”西德。西德如果要自己制造核武器，法国又肯定会第一个表示反对，其它西欧国家也不会赞成。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所谓西欧的防务合作只能圈限在有限的领域里，不可能替代美国的“核保护”。

总之，西欧不是一个统一的实体，而是一个由各个民族国家组成的多样化的半个大陆，各国条件不同、需求歧异。如果把西欧作为一个单位来看（如说欧美关系、欧苏关系等），也是从它

的一般共性而言。西欧在安全和防务上，还没有形成西欧的共同战略。

还有第四个方面的压力，就是西欧的发展在能源、原料、市场、资金等各方面对第三世界的依赖极大。第三世界的发展越来越成为西欧发展的重要因素。西欧为此对南北全球谈判在理论上表现得一时比较积极，但行动上则舍不得现存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因此南北关系的谈判裹足不前（当然美国是南北谈判的主要障碍，这里只讲西欧的作用）。发达国家几年来向第三世界转嫁危机，增加了第三世界的负担；而今天第三世界的困难必定反过来对西欧经济复苏起迟滞作用，因而也不利于西欧顶住各方面的压力。

此外，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尖端技术的发展——使西欧面临美国和日本两个科技大国的挑战，也形成了一种压力，使西欧有一种必须赶上去的紧迫感，否则难免被甩在后面，从而损及西欧的国际地位。

以上种种压力，主要是前三个压力合在一起，决定了西欧的处境是困难的，因此，西欧的决策和行动往往有一定被动性，不能不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东西方关系上必须左顾右盼，瞻前顾后。

还有一点，在观察西欧问题时，必须特别重视西德政局的动向。由于西德战略地位的突出重要性和它在安全问题上的敏感性，西德最容易感受到东西方关系的那怕是微小的变化；西德政局的动向也必定有牵动全局的影响。西德的对外政策（其安全、防务政策亦如之）有其符合这种敏感性的特点，它的任何幅度的摇摆都会引起美国、苏联以及欧洲各国的密切注意。西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海尔加·哈弗滕多把西德对外政策的特点概括得十分形象："既要使华盛顿高兴，又要同巴黎合作，又不要刺激莫斯科——在谴责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动、不断加强防务和继续推行缓和政策之间保持某种平衡的姿态——这就颇类似于要解一道把圆

圆变成方形那样的题目。但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欧洲安全的根本利益出发必须生活在这种矛盾交织的处境之中。舍此，别无其它选择。"① 西德政策的这种特点从勃兰特提出东方政策以来就已存在，这一政策的原则基本上为西德几大政党所接受，是有延续性的。科尔政府也基本延续并发展了东方政策的精神。与此相联系的法德关系动向也值得注意。法国和西德之间需要相互配合、相互利用，但是又向来互有戒心、互有疑虑。例如，德国对统一的丝毫向往，法国都很警觉。在一九八四年一段时间，西德政府对于发展东、西德关系非常热心，科尔出任总理后不止一次谈东、西德的关系，许多政界人士纷纷访问东德，两个德国在各方面的接触显著增多，对于这些动向，敏感的法国舆论很快就有反应，说要留神德意志的"俾斯麦化"。这里引一段密特朗的话是饶有兴味的，他说："……欧洲的形成和解体都是围绕着德国的……我以我的朋友们的名义提个问题：德国在什么问题上使我们担心呢？它如果回到帝国的行列，怎么能不使用帝国的语言和不作帝国的梦呢？德国是随着我们欧洲的萎缩而膨胀的。"② 可见德国问题对于法国说来敏感到何种程度。所以西德政局的动向如何，将继续对东、西方关系、对西欧产生影响。

以上讲的都是西欧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困难一面，然而也正是这种客观处境决定性地促进了西欧的"联合意识"，推动西欧各国为了自身的生存、进步和繁荣而在联合中寻求自立之道。这就又回到了前一章讨论过的问题。西欧越来越牢固地意识到，单独一个欧洲国家，即使是比较强大的国家，也不易应付安全和发展这两大挑战；而一个联合起来、掌握自己命运的欧洲，则可以凭借自己结合起来的实力，充分发挥优势，在国际社会上成为某种平衡力量，在东西关系和南北关系中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

① 海尔加·哈弗滕多：《联邦德国和欧洲安全的自相矛盾》，见皮埃尔·勒鲁士主编：《八十年代的欧洲安全》论文集，第211—212页。

② 弗朗索瓦·密特朗：《稻草和谷粒》，法国弗拉玛里翁出版社，第182页。

总之，在历史的长河中，尤其是在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西欧联合已势所必然成为一种顺应客观发展规律、符合本地区人民愿望，并且对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起促进作用的历史潮流。尽管它还需不断抵御和摆脱来自外部的压力，克服各国之间因各自的特殊利益而产生的种种矛盾，但是一定会缓慢的、曲折的、小步子地向前迈进。

·结束语·

战后西欧国际关系的演变

战后，欧洲因战局和大国的安排一分为二，新的对峙局面使西欧大多数国家同美国结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关系。这样的局面至今已经四十年了。

然而，战后四十年来，西欧一直在调整着同外界的关系和对外政策。西欧从一开始就觉得它在世界上的位置不合适，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美国起着西方的代言人的作用，西欧必须服从美国的战略要求，西欧只能在枝节上、在局部上表示些不同的意见，而在总体上的发言权很有限，基本上没有战略上的决策权。例如，法国国民议会曾不顾美国的压力于一九五四年否决了欧洲防务集团的方案，然而美国却很快通过巴黎条约把北约扩大到联邦德国，欧洲防务集团的实质还是照美国的意图保持下来了。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末，发生了震动及于全球、影响及于尔后的大事，即戴高乐向美国的"领导"提出了挑战，接下来是勃兰特制定了新东方政策；两个西欧大国在六十年代的一头一尾突破了五十年代的樊篱，向苏联、东欧推行缓和和对话政策。及至七十年代，对美国的"独立倾向"便游荡于几乎整个西欧，其表现是欧美龃龉蜂起——以美元危机冲击西欧经济为起点，中经美苏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签定、"欧洲年"和"新大西洋宪章"的提出、对中东"十月战争"和石油危机的不同反应……到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期欧洲中程导弹的辩论、关于北约作用的论战、美国高利率诱发出来的欧美金融货币战、钢铁战等等。反映在对苏战略上，西欧抱怨里根政府漠视西欧盟国的利益，率尔使"缓和"的车轮倒转；西欧对里根政府不尊重西欧的处境和意见，感

到不快、不满，对美国的决策以不同方式加以抵制。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西欧国家谴责苏联，却拒绝响应美国对苏联的“经济制裁”，不管美国的软硬兼施照样同苏联达成关于天然气管道的协议。西方舆论说，东西方之间的每次争论，莫不引起“西西方”的争论。七九年十二月北约双重决定是针对苏联的SS-20中程导弹而一致通过的。但是，从决定通过之日起，大西洋两岸对于这个决定从来没有一致的理解——各自的不同侧重反映了欧美各自不同的对苏战略。

七十年代以来的欧美大辩论，熔政治、经济、战略等各方面分歧于一炉，综合并发，其深度和广度都非前二十年可比。不过，激烈的辩论必定孕育着政策的调整。欧美双方由于分歧之难于克服，反倒更清楚了彼此应该保持怎样的距离；对于把濒于失控的钟摆调节到多大尺寸才不妨碍时钟的运行，双方都心中有数了。基辛格曾把马歇尔计划时期称作欧美关系的“黄金时代”，这样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但要重返到七十年代中期“缓和”局面也不容易。一九八三年的威廉斯堡七国首脑会议和一九八四年的伦敦七国首脑会议，把前几年摆动过大的幅度拉回来了一些。西欧一方面对美国高利率进行抨击，另一方面又同意美国在欧洲部署潘兴Ⅱ导弹和巡航导弹。伦敦七国首脑会议通过的关于所谓“民主价值”的声明，不仅表示西方国家有相同的哲学，更重要的是借此向世人宣告，西方各国无论如何是一个体制下的不同部分。西欧和美国都在总结同对方打交道的经验，在它们的关系中，有相互制约的因素，有相互排斥的因素，同时也有相互需要、相互吸引的因素。最近关于所谓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的讨论，使美国和西欧再次为彼此的关系动了脑筋。虽然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但究其根本，没有人否认：没有西欧，美国就不成其为超级大国；而没有美国，西欧也将是另一种样子。一时的议论或可表明某些动向或苗头，却不足以据此判断时势的基本特征。

一九八二年二月，伦敦《泰晤士报》辟了一个专栏，笔谈大西洋两岸关系，总题目是："麻烦的盟国"，特约美国的布热津斯基、联邦德国的勃兰特、法国的德姆维尔和英国的卡拉汉各写了一篇文章。他们的共同看法是，欧美联盟是需要的，然而欧美关系是必须调整的。核心是美国必须平等地对待西欧盟国。德姆维尔文章的标题深入浅出："我们需要美国人，可是我们同样也是成年人。"《泰晤士报》在二月十六日发表这组文章的同时，写了一篇社论说，美国现在感到自己在欧洲是"不讨人喜欢和不受欢迎的"，长期积累的欧美分歧"无法克服"；不过，社论还说到问题的另一面："欧美利益的交融仍然极其密切，欧洲的均势仍然十分有赖于美国的存在，它们的分歧依然可以在追求共同目标的努力当中通过谈判来解决。"看来，这个专栏的标题——"麻烦的盟国"——起码将继续适用于本世纪的最后十五个年头。

四十年来，西欧与苏联、东欧的关系变化也是很大的。缓和和对话的政策，早已不仅仅是戴高乐和勃兰特的主张。西欧根据赫尔辛基欧安会的经验确认：雅尔塔格局还要遵守，缓和政策必须坚持。诚然，西欧并不喜欢雅尔塔格局，因为它意味着对西欧发言权的忽视和剥夺。最近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和美苏新一轮的日内瓦裁军谈判，就使西欧担心出现所谓"太空雅尔塔"。问题是需要创造条件，用一种新的格局来代替雅尔塔格局。然而西欧感到，在没有新格局之前，还只好接受雅尔塔格局这个现实。密特朗在当选总统时曾提出"必须打碎雅尔塔(格局)"，后来则与施密特取得一致看法，认为目前还没有取而代之的途径。西欧无例外都接受了赫尔辛基欧安会关于不使用武力改变边界现状的协议，就是明证。

至于缓和政策，西欧认为这是符合西欧的根本利益的，除了经济上有利之外，缓和还可以换来欧洲的安宁。西欧认为，既然目前看不到在欧洲发生战争的可能，既然各种裁军谈判都主要是政治斗争而又不可能有重大突破，既然两个欧洲的局面不知道将

延续多久，既然“从什切青到的里雅斯特”一线两边的欧洲人都有开展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愿望和需要，那么，实现政治上的缓和不是对欧洲的安宁大有好处吗。这当然并不排斥西方必须发展防务，而且西欧也一向把防务看作支持其缓和政策的后盾。一九六七年哈默尔关于“防务”加“缓和”的报告，实际上概括了西欧的东方政策。卡特政府后期和里根上台以后，曾有缓和势头刹车的议论，然而西欧执行同苏联、东欧对话的政策、发展经济、文化各方面联系的政策，仍是时代的趋势。东西欧两部分的欧洲人相互来往、推动缓和进程的要求肯定会愈来愈强烈；当然毋庸讳言，困难是很多的，不可能一帆风顺。

四十年来，西欧联合的趋势加强了。西欧联合从舒曼计划提出开始，已不仅是一种政治思潮、一种政治理论，而是有了切实的体现。从总的趋向看，西欧的共同要求和客观形势促进了共同体国家对美国的“独立倾向”，以中东“十月战争”和石油危机为契机，共同体成员国决定在对外政策上“用一个声音说话”，彼此互相商量，相互照应。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大势一再给西欧上课：西欧各国之间的相互支持与配合，对每个国家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撒切尔夫人在一九八四年六月欧洲议会选举时概括了如下两句话：“英国需要欧洲，欧洲也需要英国。”其实，其他成员国也未始不可以这样概括自己同西欧联合的关系。尤其是新技术日新月异、美日遥遥领先的今天，西欧更不能单枪匹马地去迎接挑战。西欧人喜欢说，西欧人的“联合意识”这几年是大大发展和加强了。

当然，联合的道路是曲折的。煤钢共同体成立后的几年相对说来比较顺利。六十年代的六国共同体发展很快，但问题也多起来了：英国两次申请、两次被拒之门外；在农业政策和表决制度等问题上，六国无法妥协，一度出现法国退出会议的“空椅子危机”。卢森堡协议使法国同其他五国的立场得到妥协，但罗马条约的“超国家”因素却肯定无疑地大大减少了。七十年代初英国

等加入了共同体，曾使西欧联合声威大振，西欧的腰杆子更硬了。然而，英国加入共同体的第二年就开始了艰难的“再谈判”，共同体扩大了，组织机构也更松散了。

西欧是民族国家组成的地区，本国的利益仍是考虑问题的基本因素，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和经济上的保护主义仍不免时时对联合起抵销作用。事物是复杂的，以为谈联合便无斗争，谈斗争便无联合，是一种失之于简单化和机械片面的看法。

四十年来，西欧与第三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西欧，不少国家有过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取得了民族独立。西欧与这些地区的国家来往的内容和形式都与前不同了。所谓“宗主国”的概念过时了。取得政治上独立的国家和人民有条件自主地提出反映自己利益的新的国际关系准则：五十年代中国、印度、缅甸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十年前的万隆亚非会议提出了和平相处十项原则，六十年代亚非拉国家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倡议。七十年代初，阿拉伯国家以石油为武器同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斗争；西欧国家审时度势，提出了“以对话代替对抗”的方针，一时欧非对话、欧阿对话十分频繁；欧洲经济共同体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有了不同深度的交流。洛美协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签订的。勃兰特委员会的两次报告、密特朗提出“第三世界主义”，逐步地把同第三世界的关系问题提到南北关系的战略高度。虽然从一九八一年十月坎昆合作与发展会议以来，南北全球谈判有重重阻难，南北关系问题如治丝而棼，但是南北全球问题应该放在国际事务的议程当中，是没有任何力量能抹掉的。对于西欧来说，西欧有没有一个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第三世界主义政策，是关系到西欧的世界地位的重大问题。西欧不少有识之士还多次谈到，西方工业先进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归根结蒂对自己有利。现在问题仍在于，西欧是否准备接受一种与旧传统决裂的、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西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四十年来的发展是迅速的。五十年代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只有少数几个西北欧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英国和荷兰在当时同中国还只是建立了代办级的关系。六十年代，法国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西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七十年代以来，几乎所有西欧国家都陆续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英国和荷兰也同中国交换了大使。十年前，根据协议，中国向欧洲经济共同体派驻了大使；从此，中国不仅与西欧国家发展了双边关系，而且同西欧的联合组织有了正常的、富有潜力的关系。

西欧与中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来往，比它们之间的外交关系开始得更早些，从总的趋势上看，是向前发展的。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在西欧引起了广泛的兴趣，预示着西欧与中国的经济技术来往前景更加广阔而灿烂。

还不应忽视，西欧和中国对保卫世界和平都肩负着重大责任。西欧对于这一现实的认识，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普遍、更加深刻。一九八三年六月西欧联盟议会第二十九届例会关于“中国与欧洲安全”的报告说，从西欧联盟与中国的关系得出的“第一个结论”，“首先关系到世界平衡的性质”。它说：“欧洲既不希望这种世界平衡由一个大陆霸权统治着，也不希望它仅仅由目前的两极（也就是说美苏关系的现状）来确定。在亚洲一支独立力量的发展只能使欧洲更具有份量，如果欧洲能足以联合起自己的力量来确定一项政策的话。”

综合起来看，战后四十年来，西欧给世界一个怎样的形象呢？

可以说，四十年来，西欧一直在各种挑战和压力中——特别是在来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挑战和压力中——探索自立的道路。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有些西欧政治家曾笼统地提出，西欧应该成为美国和苏联以外的“第三种国际力量”，同时，由于欧美联盟又是西欧安全政策的支柱，所以这“第三种力量”并非

不偏不倚——西欧是在坚持欧美联盟的前提下谋求"多极"格局的。这诚然在概念上和在实践上都会产生矛盾，但西欧恰恰必须在矛盾的处境中制定一种适应战后西欧现实的政策原则。经过不断调整，西欧已经大体上确定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和相应的政策方针。

（一）在东西方关系上，力争尽可能稳定的缓和局面，为此要竭力争取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的"低水平均势"。在"均势"基础上的"缓和"，是西欧指导东西方关系的理论基础。

（二）在同美国结盟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争取自己的发言权和平等的伙伴关系、发挥独立作用、竭力影响美国的决策朝向有利于西欧的方向发展。

（三）坚持"防务加缓和"的方针，在任何情况下（包括关系紧张和谈判破裂的时候）都不放弃同苏联、东欧改善关系的机会和努力，不堵塞对话的通道。

（四）保持西欧联合的势头，推进一体化的进程和程度，以加强西欧作为大西洋联盟的"欧洲支柱"作用。西欧联合的程度愈高，西欧在美苏间的地位愈不容轻视。只有如此，才能在保持欧美伙伴关系的同时，顶住美国的压力；只有如此，才有较多的抗衡苏联的本钱。

（五）千方百计扩大自己在第三世界的各方面的联系和影响，尽可能使第三世界的事务同美苏关系脱钩——西欧要力争在第三世界有"自己的声音"（密特朗语）。

同时，还应该加上，在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鼓舞下，西欧正在形成自己的积极的对华政策。西欧不把同中国的关系放在一般的南北关系轴线上，也不简单地把中国放在东西方关系的范畴里。中国在西欧的心目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西欧认为，中国可以作为它的政治和经济伙伴——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中国，是国际上的一支平衡力量，不仅对西欧安全没有任何威胁，而且有利于西欧的独立发展。

总之，西欧已逐渐为自己找到了同各方面的政策距离。国际形势从来不是静止的，因此任何政策不可能一成不变，“微调”是经常进行的，必要的重大调整也不可免。根据恩格斯关于历史运动规律的理论，西欧这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今后仍将不断地被融合进历史事变的“总的平均数”，即“总的合力”当中去，从而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起着不可忽视的牵制作用。

附录1：

战后西欧国际关系大事简记

（1943—1984）

1943年

11月28日—12月1日　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第一次三国首脑会议。会议讨论了盟军在法国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以加速击溃德国法西斯和安排战后和平与合作问题。

1944年

6月6日　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

7月1日—22日　四十四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布雷顿森林会议）。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亦称布雷顿森林协定），决定筹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7月6日　戴高乐非正式访问美国。

9月11日　罗斯福同丘吉尔举行第二次魁北克会议，商讨处置德国的方针。

10月9日　美、英、苏三国代表经过一个多月的协商会晤，举行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建议成立联合国组织这一永久性国际机构。

12月10日　戴高乐访问苏联。法苏签订二十年同盟和共同安全条约。

1945年

2月4日—11日　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三国首脑会议，会议讨论了战后德国问题和欧洲问题、联合国问题，以及苏联对日作战等问题，并达成了相应协议。会议发表了公报，签署了《雅尔塔协定》。

4 月12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副总统杜鲁门继任为美国第33任总统。

4 月25日—6 月26日　《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旧金山会议）。共有五十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会议制定并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规约》，创立联合国。

5 月 8 日　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德国的战争胜利结束。法西斯德国军队统帅部代表凯特尔等在柏林苏军总司令部，面对盟军统帅部代表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5 月18日　法国临时政府外长皮杜尔在华盛顿同杜鲁门总统会谈，杜鲁门拒绝了戴高乐参加下一次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的要求。

6 月 5 日　艾森豪威尔将军、蒙哥马利元帅、朱可夫元帅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完全接管德国。按1937年底的德国疆域划分四个占领区，分别由美英法苏四国占领。

7 月17日—8 月 2 日　杜鲁门、丘吉尔（后为艾德礼）、斯大林在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三大国首脑会议（波茨坦会议，亦称柏林会议）。会议讨论了占领德国原则、赔偿、战争罪犯，以及对待其它轴心国成员政策问题，并决定设立外长会议来处理有关问题。会议签订了"会议议定书"，发表了公报。

8 月 6 日　美国在日本广岛投第一枚原子弹。

8 月 8 日　苏联对日宣战，红军攻入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防线。

8 月 9 日　美国第二枚原子弹投于长崎。

8 月10日　日本内阁决定投降，9 月 2 日正式签署投降书。

12月 9 日　意大利成立新联合政府，天民党领袖加斯贝利任总理兼外长，社会党领袖南尼任副总理。

1946年

1 月10日—2 月14日　第一届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伦敦举行，安理会同时举行会议。大会通过挪威外长特里格夫·赖伊为第一任秘书长。

1 月20日　戴高乐辞去法国临时政府主席职务。

2 月11日　美、英、苏三国同时公布雅尔塔秘密协定。美苏双方就协定涉及日本千岛群岛归属问题发生争执。

3 月 5 日　在杜鲁门陪同下，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城威斯特

敏斯特学院发表演说（富尔敦演说），被视为战后西方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反共“冷战”信号。

7月1日　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巴黎外长会议上正式提出合并德国占领区的建议。英国接受，法国拒绝。

9月19日　丘吉尔在苏黎世发表关于欧洲联合的演说，主张建立欧洲联邦，“重建欧洲大家庭”。

12月2日　美英两国的德国占领区正式签订经济合并协定，1947年元旦生效。美英两国同时邀请苏联和法国参加这一协定。

12月19日　法国殖民军进犯河内，越南人民开展抗法救国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开始。

1947年

3月4日　英、法在敦刻尔克签订“英法同盟互助条约”。为期五十年，9月8日生效。

3月12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致国会咨文，即所谓“杜鲁门主义”。

6月5日　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要求实施由欧洲国家出面创始，以美援为后盾的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此后约有18个欧洲国家或地区接受了这一计划，到1951年止，马歇尔计划共支出125亿美元。

10月29日　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建立关税同盟。协议从1948年1月1日起实施。协议规定从三国以外进口货物将采用同一税率，三国之间进口不再征税。

12月4日　继10月5日法国在萨尔举行议会选举，基督教人民党获胜后，萨尔议会通过宪法，建立自治政府，经济上划归法国。

1948年

3月17日　英、法、比、荷、卢签署布鲁塞尔条约，为期五十年，以加强集体防御和合作。

3月20日　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举行会议。苏联要求美英法通报2月23日—3月5日就筹建西德问题而召开的六国伦敦会议内容，遭到拒绝。苏联决定退出会议，从此，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停止了活动。

4月6日　苏芬两国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规定共同防御德国或其盟国对芬兰或经由芬兰向苏联的进攻；在“双方协议”下，苏军可以进

入芬兰；芬兰奉行中立政策，不参加反苏同盟。

4月16日　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签署国在巴黎举行会议，签署“欧洲经济合作公约”，成立常设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1961年9月该组织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代替。

5月7日—10日　欧洲统一运动首届大会在海牙召开，出席会议的有21个国家近800名代表，许多政界著名人士参加了大会，丘吉尔为大会名誉主席。大会讨论了成立欧洲联邦的问题，并发表“告欧洲人民书”。

6月7日　西方六国伦敦会议发表“伦敦议定书”，决定西方三占区更紧密合作，起草西德联邦宪法，公开了筹建西德的计划。

6月18日　西方三国宣布实施西德币制改革，在西占区单独发行货币。

6月24日　苏联对西柏林和西方占领区之间的水陆交通实行“封锁”。西方国家对西柏林大规模空运物资。

10月9日　丘吉尔在英国保守党年会上发表政策演说，阐述了“三环外交”政策思想

1949年

1月25日　苏联与东欧五国（保、匈、波、罗、捷）代表在莫斯科宣布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

4月4日　美、英、法、加等12国在华盛顿签订“北大西洋公约”。

5月23日　西德各州议会批准“基本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布成立，首都设在波恩。9月，阿登纳出任总理。

10月7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宣布成立，威廉·皮克担任总统。

1950年

5月9日　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提出“舒曼计划”，要求西欧（特别是法德）煤炭与钢铁工业一体化。

6月6日　民主德国同波兰达成协议，承认奥得——尼斯河为德波间的最终边界，引起西德强烈抗议。

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7月7日，在美国操纵下，由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武装干涉朝鲜内政。

8月11日　丘吉尔发表关于建立欧洲军的演说。

10月21日　公布关于欧洲军的普列文计划。

1951年

2月21日　英国工党政府反对美国让西班牙加入北约组织的建议。

4月18日　西欧六国根据舒曼计划在巴黎签订了“欧洲煤钢联营条约”。这是欧洲共同体的前身，是欧洲经济一体化决定性的一步。

10月25日　英国工党在大选中失败，保守党获胜。丘吉尔再任首相兼国防大臣，艾登任外交大臣。

1952年

1月25日　法国政府决定以外交使团代替驻萨尔高级专员办事处，引起西德不满。阿登纳要求西方国家在萨尔问题上考虑德国人的愿望。

5月27日　西欧六国在巴黎召开会议，签署欧洲防务集团条约。英国虽然同美国共同表示给予安全上的保证，但不参加该集团。

1953年

1月20日　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第三十四届总统，尼克松任副总统。

3月5日　斯大林逝世。马林科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兼政府首脑，3月20日，赫鲁晓夫继马林科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5月20日　法国同萨尔签订一项协定，给萨尔自治权，但经济上要同法国保持联系。

10月8日　的里雅斯特危机。

12月4日—7日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英国首相丘吉尔、法国总理拉尼埃在百慕大会谈。

12月14日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建立欧洲军一事向北约欧洲成员国施加压力，表示如不尽快成立欧洲军，美国政府将重新考虑其基本政策。

1954年

1月12日　由于侵朝战争的失败，美帝国主义不得不重新制定全球军事战略。国务卿杜勒斯在演说中宣称，美国要对“侵略者”采取“大规模报复”战略。

3月13日—5月7日　越南人民军发动奠边府战役，全歼法军1万6千多人，扭转了印度支那战局，为恢复和平起了重大作用。期间，美国拒绝法国的请求，不肯动用空军为法军解围。

4月26日—7月21日　日内瓦会议。会议最后签订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美国拒绝签字，表示既不受条款约束，也不想推翻这些条款。

6月28日　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8月30日　法国国民议会拒绝讨论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建立一支欧洲军的计划失败。

10月20日—23日　北约外长级会议在巴黎召开。会议签署《巴黎协定》，决定结束对西德的军事占领，但仍驻留盟国军队，接纳西德参加北约。修改了1948年的“布鲁塞尔条约”，吸收西德和意大利参加，将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改为西欧联盟。这是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失败后，西方国家为重新武装西德而采取的变通措施。

11月1日　阿尔及利亚战争开始。

1955年

4月18日—24日　二十九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万隆开会（万隆会议亦称亚非会议）。会议讨论了国际形势和有关亚非国家人民共同利害关系的问题。会议所反映的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增强各国人民间友谊的精神，称之为“万隆精神”。

5月7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废除与英、法两国的友好条约。

5月14日　作为西方国家接纳西德参加北约的一项反措施，八个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签订华沙条约。

6月3日　西欧六国在意大利墨西拿开会，决定创建欧洲经济共同体。

7月18日　苏、美、英、法四国首脑召开日内瓦会议，讨论欧洲和德国问题，并决定召开四国外长会议。

7月22日　西德制定重新武装法案，授权立即征召官兵六千名，作为将来成立五十万陆军的骨干。

9月9日—13日　西德总理阿登纳访问莫斯科。两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苏联允诺释放德国战俘。

1956年

2月14日—25日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

6月28日　波兰波兹南发生骚乱。

7月26日　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将实行国有化。英国内阁考虑军事干涉。

10月20日　波兰事件。

10月—11月　匈牙利事件。

10月27日　法德签订关于萨尔问题的协定，作为萨尔划归西德的补

偿，法、德和卢森堡就莫泽尔河运河化达成协议。

10月29日　　苏伊士危机。以色列军队突然侵犯埃及，向苏伊士运河进军。

10月30日　　英法联军武装干涉埃及，拒绝美国在联合国提出并得到苏联支持的停火建议，轰炸开罗和运河区。

1957年

1月5日　　艾森豪威尔致国会对中东政策特别咨文，即以排挤英法势力、填补中东真空为目的的“艾森豪威尔主义”。

1月9日　　由于苏伊士危机中的政策失败，艾登辞职，麦克米伦继任英国首相。

3月25日　　西欧六国签署“罗马条约”。

7月28日　　美、英、法、西德签署柏林宣言，要求成立一个“自由和重新统一的”德国，认为这是欧洲和解方案必不可少的条件。

12月19日　　北约组织在巴黎召开最高级会议，决定在欧洲设置导弹基地。

1958年

1月1日　　罗马条约生效，西欧共同市场正式成立。

5月29日　　法国因阿尔及利亚问题陷入危机，为摆脱困境，科蒂总统提名戴高乐将军出任总理。

9月14日　　戴高乐同阿登纳举行首次会晤，宣布法德合作“是欧洲建设的基础”。

9月17日　　戴高乐致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备忘录，要求成立“三国指导机构”，共同分享西方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权，遭到拒绝。

9月28日　　法国公民投票通过第五共和国宪法，10月5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正式成立。

11月27日　　苏联照会美、英、法三国政府，要求结束四国占领柏林现状，如果半年内达不成协议，苏联将同民主德国单独达成协议。

1959年

1月8日　　戴高乐就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任期七年。10日，德勃雷任政府总理。

3月14日　　法美围绕北约军事力量问题矛盾开始激化。法国拒绝将地中海舰队的三分之一交付北约指挥，并拒绝美在法储存核武器，美决定从法

国基地撤出200架飞机到英、德基地。

5 月11日　　关于柏林和德国问题的日内瓦四国外长会议开始。

8 月26日　　艾森豪威尔总统开始对德、英、法进行为期12天的访问。

9 月15日—27日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在戴维营同艾森豪威尔会谈。“戴维营精神”。

11月20日　　为同欧洲共同市场竞争，英国等七国草签“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条约”。

12月19日—21日　　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戴高乐和阿登纳举行巴黎会议，宣布邀请赫鲁晓夫参加即将举行的巴黎首脑会议。30日，赫鲁晓夫接受邀请。

1960年

3 月15日　　东西方十国在日内瓦召开裁军会议。

3 月23日　　赫鲁晓夫访问法国。

5 月 1 日　　苏联击落一架入侵的美制U-2高空侦察机。赫鲁晓夫就此拒绝同巴黎首脑会议合作，并取消对艾森豪威尔发出的访苏邀请。

5 月16日　　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夭折。

9 月　　美国同欧洲共同体国家举行被称为“狄龙回合”的相互削减关税谈判。直到62年 3 月才达成工业品关税各减20％的协议，但未达成农产品减税协议。

11月 8 日　　肯尼迪在大选中当选为美国总统。

1961年

1 月 8 日　　法国举行公民投票，75.3％的投票人同意戴高乐给阿尔及利亚以最后自决权的方案。

2 月10日　　欧洲共同体六国在巴黎举行首脑会议，商讨政治联盟问题。

5 月31日　　肯尼迪访问法国。

6 月 4 日　　苏联提出备忘录，要求同民主德国、西德签订和约并使柏林成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遭到西方三国拒绝。美国增加西柏林驻军。

8 月10日　　英国政府正式申请加入西欧共同市场。

8 月13日　　为阻止非法越境，民主德国政府封锁柏林分界线，并于15日起修筑“柏林墙”。这是1948年封锁和1958年赫鲁晓夫最后通牒之后的第

三次柏林危机。

10月26日　　因美方人员进入东柏林问题，双方将坦克开赴跨界点对峙。

10月31日　　关于欧洲政治联盟的“富歇方案”送呈欧洲共同体各国政府讨论。

11月8日　　英国就加入共同市场问题同六国谈判。

12月7日　　欧洲共同体各国同意吸收18个非洲国家为“联系国”。

1962年

1月18日　　关于欧洲政治联盟的“富歇方案”第二稿，被其他国家代表拒绝。

3月5日　　法国外交部宣布，法国政府不参加14日在日内瓦召开的18国裁军会议。

3月18日　　法国同阿尔及利亚签订埃维昂协定，承认阿尔及利亚有权自决和独立。

5月4日—6日　　北约组织理事会在雅典举行，美国提出“灵活反应战略”以代替“大规模报复战略”。

7月1日　　西欧共同市场开始实行共同农业政策。阿尔及利亚进行公民投票，90%的人参加投票，其中99.97%的人赞成独立。7月3日，法国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

8月5日　　英国加入共同体的谈判因英联邦同共同市场关系而中断。

8月8日　　西德外长施罗德指出，波恩将同任何赞成民主德国同苏联单独签订和约的国家断绝外交关系。

10月22日—28日　　因发现古巴设有苏制导弹，美国对古巴实行封锁，苏联被迫撤出导弹。古巴危机。

12月18日—21日　　肯尼迪同麦克米伦就核武器问题在拿骚会谈达成协议。

1963年

1月14日　　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反对英国在目前加入欧洲共同体，拒绝接受“多边核力量计划”和美国提供北极星导弹。

1月22日　　法德合作条约在巴黎签订。

1月29日　　在布鲁塞尔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上，法国的正式否决中

断了英国参加共同体的谈判。

2月4日　西德经济部长艾哈德表示拒绝法国的欧洲政策，主张与能打开欧洲僵局的美国进行谈判。

6月21日　法国决定从北约撤出驻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的海军力量。

8月5日　苏、美、英三国正式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中、法等国拒绝参加，谴责核垄断。

10月15日　阿登纳引退，艾哈德继任西德总理。

10月19日　麦克米伦因病辞职，霍姆被任命为英国首相。

11月22日　肯尼迪遇刺，约翰逊宣誓就任美国第36届总统。

1964年

1月27日　中法两国建交。

3月16日　戴高乐访问墨西哥。

4月13日　在东南亚条约组织马尼拉会议上，法国提出南越"中立化"问题，主张政治解决，同美国发生分歧。

5月4日　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会议上，美国同共同体国家正式开始贸易谈判。"肯尼迪回合"。

法国从北约组织海军司令部撤出法国军官。

7月23日　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明："当前的问题是欧洲必须成为欧洲人的欧洲"。

9月20日—10月16日　戴高乐长期出访南美十国，强调拉美各国独立自主，反对外来干涉。

10月14日　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就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0月15日　英国工党大选获胜，威尔逊就任英国首相。

10月30日　法苏第一个长期贸易协定（1965—1969）在巴黎签订。

12月4日　苏联通过波兰外长腊帕茨基在十九届联大会议上建议召开欧洲安全会议。

1965年

1月19日　法德两国领导人会谈，双方商定改善一度冷淡的两国关系。

1月24日　丘吉尔病逝。

2月4日　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主张取消以美元为中心的金汇兑

本位制，恢复金本位制；认为德国问题首先是欧洲问题，应由欧洲人来解决。

3月2日　西欧六国决定合并共同市场、煤钢联营和原子能联营三个机构。

4月27日　戴高乐发表电视演说，重申法国奉行独立政策，反对“两个霸主瓜分世界”。

7月1日　法国因共同农业政策分歧退出欧洲共同体布鲁塞尔会议达半年之久。“空椅子事件”。

12月19日　戴高乐在选举中击败密特朗，再任法国总统。

1966年

1月17日　欧洲共同体六国卢森堡会议。

3月　西德艾哈德政府照会东欧国家和苏联，提议就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条约）问题互相交换声明，但此照会未提交给民主德国，即等于不承认民主德国合法政府。

3月7日　戴高乐致函约翰逊，宣布要退出北约军事机构，但保留北约组织成员资格。要求限期从法国撤出北约所有基地、总部。

4月25—30日　法国外长德姆维尔访问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5月18日—21日　德姆维尔访问波兰。

6月20日—7月1日　戴高乐访问苏联。

8月—9月　戴高乐访问非洲和亚太地区，在金边发表演说，要求美国从越南撤军。

10月1日　法国退出北约军事委员会。随后，北约总部迁往布鲁塞尔。

11月30日　西德总理艾哈德辞职。

12月1日　基辛格任西德大联合政府总理。

12月13日　西德总理基辛格在施政纲领演说中表示，在不损害西德在北约组织中立场的情况下，愿意重新加强同法国的关系并试图改进同东欧国家的关系。

1967年

1月31日　西德同罗马尼亚建交。这被视为“新东方政策”的第一项成就。

2月6日—13日　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英国，在下院发表演说，要求签订英苏友好互不侵犯条约。

4 月19日　　西德前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去世，终年91岁。

5 月11日　　英国再次申请加入欧洲共同市场，丹麦、爱尔兰、挪威同时提出申请。

5 月15日　　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历时三年之久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六次关税减让谈判，在日内瓦达成原则协议。“肯尼迪回合”。

5 月16日　　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拒绝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申请，认为英镑问题是英国加入的主要障碍之一。

6 月5 日　　第三次中东战争（“六·五战争”）爆发。法国戴高乐政府表示反对以色列人的侵略行动。

10月10日　　“七十七国集团”会议筹备会议在阿尔及尔举行，通过第三世界经济权利阿尔及尔宪章。

11月27日　　戴高乐再次拒绝就英国加入共同市场问题进行谈判。

1968年

2 月28日　　西欧出现抛售美元、英镑，抢购黄金风潮，形成资本主义世界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货币危机。

3 月29日　　“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议，同意创立“特别提款权”。但法国表示不同意见，拒绝在公报上签字。

5 月3 日　　法国“五月风暴”开始。

5 月13日　　越美谈判在巴黎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

5 月14日　　戴高乐访问罗马尼亚。

6 月24日　　北约组织部长理事会在雷克雅未克举行，发表宣言认为，同华沙条约组织“相互均衡地”在欧洲裁军是可取的。

7 月10日　　在连续几个月的国内危机中，法国总理蓬皮杜辞职，顾夫·德姆维尔继任。

8 月20日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华沙条约组织（罗马尼亚除外）20万军队武装侵入捷克，遭到捷克人民的抵抗和世界舆论的谴责。

11月6 日　　尼克松当选美国第37任总统。

11月14日　　由于传说马克升值、法郎贬值，欧洲出现抢购马克和黄金风潮，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西欧外汇市场纷纷关闭。

1969年

1 月6 日　　法国禁止再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和飞机。

2 月23日　　尼克松总统开始访问欧洲。

3 月17日　华沙条约国在布达佩斯会议上，重新建议召开欧洲安全会议。由于捷克事件，西方国家不予理睬。

4 月28日　戴高乐辞职，参议院议长阿兰·波埃就任法国临时总统。

6 月15日　蓬皮杜当选为法国总统，沙邦·戴尔马出任总理。

7 月11日　蓬皮杜总统表示，法国原则上不反对英国参加欧洲共同市场。

7 月25日　尼克松总统在关岛发表谈话，提出所谓“新亚洲政策”，被称之为“尼克松主义”或“关岛主义”。

9 月　施密特的《均势战略》一书出版，西方舆论认为这是一本反映西德社会民主党对外政策思想的重要著作。

10月21日　维利·勃兰特接替库尔特·基辛格任西德总理，组成联合政府，宣布推行“新东方政策”。

11月17日　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在赫尔辛基开始。

12月1日—2日　欧洲共同体在海牙举行首脑会议，决定加速六国在政治上的合作统一，并同英国等国就申请加入共同市场问题重开谈判。

1970年

1 月18日　英国大选工党失败，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任首相，道格拉斯·霍姆任外交大臣。

2 月6 日　欧洲共同市场同南斯拉夫缔结一项贸易协定。这是同东欧国家缔结这类协定的开端。

2 月9 日—11日　西班牙外长拉沃到法国进行30年来的第一次访问。

2 月23日—3 月3 日　蓬皮杜总统访问华盛顿，并在美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这是法国总统十年来第二次访美。访问期间，蓬皮杜断然拒绝美国要在法国重新驻扎美军的要求。

3 月19日　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和民主德国总理维利·斯多夫在埃尔富特举行分裂25年来的首次会谈，虽未取得实质性结果，但标志着重大转折。

5 月27日　北约组织部长理事会在罗马举行，要求同苏联和华约组织各国就减少驻中欧地区部队问题进行讨论。

8 月11日—13日　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苏联。12日，签订西德——苏联条约。条约承认战后欧洲各国边界的不可侵犯性，苏联不反对德国以和平

方式最终实现统一，西德愿同苏联加强经济、科学与文化方面的联系。这个条约是东西方关系中的新的转折。

9月27日—10月5日　尼克松总统出访欧洲（意、南、西、英、爱尔兰）。

10月6日　蓬皮杜总统访问苏联。法苏发表联合声明并签定一项议定书，决定加强两国间的政治和文化、经济协商和合作。

10月　根据欧洲共同体执行委员会决定，以卢森堡首相兼外交大臣维尔纳为首的一个小组，提出了实现“欧洲经济货币同盟”的具体计划，准备从1971—1980年分阶段实行。

11月9日　戴高乐逝世。毛泽东主席致戴高乐夫人唁电，称戴高乐为“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

12月7日　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签订西德——波兰条约。西德有条件地承认奥得——尼斯线为波兰西部边界，波兰允许德裔公民返德。但同西德——苏联条约一样，只有待西柏林地位问题解决后才予以批准。

12月14日　波兰但格斯克等港口城市发生骚动，与军警产生冲突。

1971年

2月19日　欧洲共同体六国部长会议决定建立“欧洲经济和货币同盟”，分阶段实行。

5月21日　希思首相和蓬皮杜总统在巴黎会谈后宣布，尽快就英国加入共同市场问题“达成一项协议是可能的”。

7月14日　冰岛宣布将关闭北约在冰岛的军事基地，要求四年内撤走基地的美国军队。

8月15日　美国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引起西方金融市场一片混乱，除纽约和东京外，各国的黄金和外汇市场纷纷关闭。

8月19日　欧洲共同体六国财经部长紧急会议，就美国“新经济政策”要求美国将美元贬值和取消进口附加税。

9月3日　苏、美、英、法四国在西柏林签署柏林协定（关于西柏林问题的四方协定）。

9月18日　阿富汗、南斯拉夫等30国发表联合声明，要求美国赔偿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给这些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

9月23日　蓬皮杜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谴责美国的“新经济政策”，主张欧洲共同市场建立“共同战线”，对美国不能过分让步。

10月5日　欧洲共同市场执委会主席意大利人马尔法蒂，就美国“新

经济政策"向美驻共同市场大使提出抗议书。

10月9日　　欧洲共同市场六国外长会议决定联合起来，对付美国分裂六国的企图，反对美国考虑单独对西德取消10%的进口附加税。

12月17日　　西方"十国集团"华盛顿会议，决定重新调整各国货币兑换率，会上美国宣布美元贬值并取消进口附加税。

1972年

1月21日　　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

1月22日　　欧洲十国正式签署接受英、丹、爱、挪（后退出）四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条约。

2月10日　　蓬皮杜总统同勃兰特总理在巴黎会谈，双方同意重新推行关于建立西欧经济和货币同盟的计划。

3月　　勃列日涅夫表示承认欧洲共同体的"现实"。

5月15日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是10年来英法关系中的一个转折，表明英国有意建设"欧洲人的欧洲"。

5月23日—30日　　尼克松总统访问苏联。美苏签署"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条约。即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

法国总理沙邦——戴尔马发表声明，主张建立一个独立的"欧洲人的欧洲"。

6月3日　　苏、美、英、法四国外长签署关于西柏林问题协定的最后议定书。

7月22日　　欧洲十七国签署关于建立欧洲自由贸易区的协定，1973年1月1日生效。

8月14日　　西德同波兰建交。

9月24日　　挪威举行公民投票，多数否决参加欧洲共同市场。

10月19日　　西欧九国首脑会议在巴黎举行，声明决心把欧洲共同体在七十年代结束前建成欧洲联盟，加强政治与经济的联合。

11月8日　　民主德国和西德草签关于两国关系基础的条约。

11月22日　　欧安会预备性会议在赫尔辛基举行。

1973年

1月1日　　英国、爱尔兰、丹麦正式加入西欧共同市场；西欧十六国开始建立欧洲自由贸易区。

1月2日　英国首相希思发表电视讲话，强调西欧国家必须制定一个"欧洲对外政策"，以便用"一个声音讲话"。

1月27日　《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在巴黎签订。

4月6日　欧洲共同市场各国为加强合作，在卢森堡成立欧洲货币合作基金组织。

7月3日—7日　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第一阶段会议在赫尔辛基举行。30多个欧洲国家和地区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的外交部长出席会议。

9月11日—17日　蓬皮杜总统访华，发表中法公报，双方声明反对任何霸权。

10月6日　埃及、叙利亚军队和巴基斯坦游击队反击以色列侵略的十月战争爆发。22日安理会通过338号决议，要求就地停火。

10月　中东主要石油出口国大幅度提高原油价格并减少对支持以色列侵略政策的国家的石油出口，西方石油进口国遭到沉重打击，爆发了战后情况最为严重，时间最长的世界性经济危机。

10月30日　中欧裁军谈判在维也纳开始。

11月13日　第一届法国——非洲国家首脑会议在巴黎举行。

11月16日　蓬皮杜总统同希思首相在伦敦会谈，表示从各方面加强和发展共同体，以一个声音发言是重要的，反对超级大国对世界实行"共同统治"。

12月11日—12日　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签署相互关系条约，正式宣布慕尼黑协定无效，发表了建交公报。

12月14日　欧洲共同体九国首脑会议在哥本哈根举行。九国决定进一步加强政治合作，加速共同市场各方面的发展，以便在1980年前建立"欧洲联盟"。

1974年

4月2日　法国总统蓬皮杜逝世。

5月7日　西德总理勃兰特因"纪尧姆间谍案"辞职。16日，施密特当选西德总理。

5月19日　吉斯卡尔·德斯坦当选为法国总统。28日，希拉克任政府总理。

6月1日　施密特总理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会谈并发表公报，强调维护西欧团结，在经济，货币和对外政策上均应采取共同立场。

6月10日　欧洲共同体九国外长在波恩就共同体国家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加强同美国的磋商问题达成协议。

6月26日　北约组织15国政府首脑布鲁塞尔会议，正式签署《北大西洋关系宣言》。

7月18—19日　英国首相威尔逊访问法国，双方就制造协和式飞机问题达成协议。

8月8日　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辞职，副总统福特接任。

11月23日　勃列日涅夫同福特在海参威签署一项有关限制战略武器的"原则"协定。

1975年

1月29日—2月17日　英国首相威尔逊访问加拿大、美国、苏联。

5月4日—11日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副主席索姆斯访华。8日，中国同欧洲共同体建立正式关系。

5月12日—18日　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法国。

6月5日　英国举行公民投票，赞成英继续留在欧洲共同体内。

6月12日　希腊正式提出参加欧洲共同体的申请。

7月30日—8月1日　历时三年之久的欧安会在赫尔辛基结束。除阿尔巴尼亚外的所有欧洲国家，加上美国和加拿大，共有35个国家的元首或其代表，签署了《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

10月14日—18日　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向列宁墓献花。两国表示应召开一次裁军会议。

11月15日—17日　法国倡导的西方六国（美、英、法、日、西德、意）首脑会议在法国朗布依埃举行，通过宣言。主要是为了应付危机所带来的严重萧条而寻求对策。

12月7日　福特总统在檀香山发表讲话，提出美国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政策纲领，即"新太平洋主义"。

12月10日—15日　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访问埃及，签署法埃友好合作条约。

12月16日　19个发展中国家同8个发达国家和集团在巴黎召开国际经济合作会议，"南北对话"开始。

1976年

3月16日　英国首相威尔逊辞职。

4月1日　欧洲共同体九国同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46个发展中国家签订的“洛美协定”正式生效。

4月5日　英国工党新领袖卡拉汉出任首相。

美国国务院发表国务院顾问索南费尔特1975年12月的一次讲话，具体阐述美国对苏联和东欧的政策，称为索南费尔特主义。

6月27日—28日　西方七国首脑经济会议在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市举行。会议讨论了西方经济复苏、国际收支和贸易、货币、投资、能源，以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东西方之间的经济关系。会后发表联合公报。

7月12日—13日　欧洲共同体九国首脑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就以直接投票方式选举欧洲议会的议席分配达成协议。

7月14日—15日　欧洲共同体、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部长理事会在布鲁塞尔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建立一个“工业合作委员会”和一个“发展工业中心”。

11月2日　吉米·卡特和蒙代尔分别当选美国正副总统。

11月15日　欧洲共同市场外长例会拒绝了与“经互会”展开全面贸易联系的建议。

1977年

1月23日—2月1日　美国新任副总统蒙代尔出访西欧和日本。

2月9日　苏联同西班牙恢复自1939年起中断了的外交关系。

4月5日　欧洲共同体九国外长会议，一致同意接受葡萄牙参加共同体的申请。

5月7日—8日　西方七国首脑经济会议在伦敦举行，一致认为最紧要的问题是失业和通货膨胀，但会议并没有制定出促使经济回升的有效措施。

6月20日—22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法国。

7月1日　欧洲共同体九国完全实现关税同盟，同时取消了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大部分工业品和部分农产品的进出口关税，形成了欧洲十六国的自由贸易区。

7月28日　西班牙正式提出加入欧洲共同体的申请。

10月4日　欧安会第一次续会在贝尔格莱德举行。35个签字国的大使级代表出席，由于美苏操纵会议，未取得有效成果。

11月21日　葡萄牙总理苏亚雷斯访问西班牙，两国签订友好合作条约。

11月24日　西班牙加入欧洲委员会。

1978年

6月1日　欧洲共同体宣布，将对参加“洛美协定”的最贫困的不发达国家提供1.85亿美元的“特别援助”。

7月16日—17日　西方七国首脑经济会议在波恩举行，就经济增长等问题达成战略协议。

9月17日　美国、埃及同以色列在戴维营签署协议。

11月29日　东、西德在波恩签订关于两国边界走向的议定书。

12月4日—5日　欧洲共同体的比、荷、卢、丹、法、西德六国首脑在布鲁塞尔开会，决定从1979年1月1日起创立“欧洲货币体系”。

12月29日　因欧洲共同体内关于农产品补偿金等问题同西德发生分歧，法国宣布暂不参加“欧洲货币体系”，使原定于1979年元旦生效的“欧洲货币体系”被迫宣告推迟实行。

1979年

1月1日　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月5日—6日　美、英、法、西德四国首脑在法国海外省瓜德罗普岛举行。

3月12日—13日　欧洲共同体九国首脑会议继续讨论“欧洲货币体系”问题。法德两国取得妥协，决定从13日起“欧洲货币体系”正式生效，但英国暂不参加。

3月16日　有“欧洲之父”之称的让·莫内逝世。

4月28日　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在莫斯科访问结束时，签订了一份十年合作计划。

5月3日　英国大选保守党获胜，5日撒切尔夫人组阁任首相。

6月15日—18日　卡特同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会谈并签署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美国国会内因批准该条约问题分成两派。

6月27日　欧洲共同体同57个参加“洛美协定”的国家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同意制定一个新的五年贸易条约，以取代原来的“洛美协定”。

6月28日—29日　西方七国首脑经济会议在东京举行，通过能源宣言。

7月17日—20日　欧洲议会举行直接选举后的第一届会议。

9月16日　阿富汗发生政变，阿明首相推翻塔拉基总统。

10月6日　苏联宣布从东德撤出2万名苏军和1千辆坦克，并以此要求北约放弃在欧洲布署“战区”导弹计划。

10月31日　欧洲共同体九国同57个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签署第二个“洛美协定”，为期五年。

11月29日—30日　欧洲共同体九国首脑会议在都柏林举行，讨论1980年度共同体预算问题。英国同其它成员国发生争执，未达成协议。

12月12日　由于对苏联军事力量增长的担忧，北约决定在西欧部署新式中程导弹。

12月17日　长达5年多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七次关税减让谈判（“东京回合”，“尼克松回合”）结束。

12月18日　欧洲共同体同东盟五国原则上达成一个经济与商业合作协定。

12月27日　苏联出兵侵略阿富汗，推翻阿明政府，扶植卡尔迈勒政权。

1980年

1月1日　北约理事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并研究了西方可能采取的措施。

1月2日　苏联拒绝西方国家关于就减少欧洲中程核导弹问题举行谈判的建议，说只有北约改变加强欧洲战区核力量的决定，苏才愿意讨论欧洲裁减军备问题。

1月2日—14日　西欧国家纷纷发表声明或谈话，谴责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先后发表声明与谈话的有：挪威首相、西德外长、英国外交大臣、荷兰首相、葡萄牙外交部、奥地利总理、瑞士政府、瑞典外长、希腊总理、卢森堡政府、比利时政府等。

1月4日　为抗议苏军入侵阿富汗，卡特总统宣布对苏实行制裁，特别是实行粮食禁运。法国总统德斯坦对记者发表谈话，认为苏联军事干涉阿富汗也许不是预谋的，而是阿富汗内部形势所引起的。

1月5日　意大利共产党发表声明，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

1月7日　欧洲共同体采取措施，以支持卡特对苏采取的经济制裁。

1月9日　法国政府声明，“在阿富汗发生的事件是与指导国际生活

的基本原则和法国的政策相抵触的。

1月13日　英国共产党声明"不同意"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敦促撤军。

1月14日　联合国大会以100票对18票通过决议，要求"立即无条件地从阿富汗撤出一切外国军队"。

1月15日　欧洲共同体九国外长会议声明，要求苏联撤军，重申支持美粮食禁运。法国外长蓬赛表示，苏联必须撤军，但法国决不采取能恢复冷战的主动行动，无意利用贸易关系为政治目的服务。

1月22日　苏联强行流放物理学家萨哈罗夫，西方国家领导人或政府就此纷纷表示谴责。

3月1日—10日　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访问中东六国，在同科威特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法国第一次正式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

4月21日—22日　欧洲共同体九国外长会议在卢森堡举行，讨论美国要求对伊朗进行经济和外交制裁以帮助美国人质获释，会议决定对伊朗分两个阶段实行制裁。

4月23日—25日　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问法国，这是阿富汗事件后苏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西方国家。

5月9日　卡特总统在费城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对外政策讲话，阐述美国对外政策的五大目标。

5月19日　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勃列日涅夫在华沙会谈，在法国和西方国家引起强烈反应，德斯坦总统的行动受到的指责多于赞同。

6月22日—23日　西方七国首脑经济会议在威尼斯举行，重点讨论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问题。

6月30日　西德总理施密特访问苏联并发表联合公报，表示加强经济合作，但在阿富汗问题和欧洲中程导弹问题上各持己见。

7月7日—11日　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访问西德，这是18年来法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西德。

7月21日　西欧联盟理事会声明，同意取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西德制造军舰的限制。

7月21日—22日　欧洲共同体外长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讨论了中东政策和恢复欧阿对话，以及扩大共同体等问题。

8月14日　波兰格但斯克工人罢工，并迅速波及到其它地区。

10月15日—21日　　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访问中国。

11月5日　　施密特再度当选西德总理。

11月11日　　根据1975年欧安会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精神，欧安会(续会)在马德里开幕。这是继1977年贝尔格莱德续会后另一次续会。

12月1日—2日　　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卢森堡举行。会议公报就波兰局势强调尊重各国自决权，本着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精神反对以各种方式干涉波兰。

12月11日—12日　　北约部长理事会在布鲁塞尔发表会议公报强调：如果苏联入侵波兰，北约将作出坚决的反应。连日来，英、法、西德、意等国领导人相继发表讲话，警告苏联不得干涉波兰。

1981年

1月1日　　希腊正式成为欧洲共同体第十个成员国。

1月20日　　美国总统里根宣誓就职。

2月9日—16日　　密特朗率法国社会党政治代表团访问中国，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正式关系。

3月2日　　英国工党出现50年来最严重分裂。26日，英国社会民主党在伦敦成立。

3月30日　　美国总统里根遇刺受伤。

4月8日—11日　　美国国务卿黑格访问西班牙、英、法和西德。

4月15日—25日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印度、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和卡塔尔。

5月10日　　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21日就职任命莫鲁瓦组阁任总理。

6月9日—21日　　日本首相铃木善幸访问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英国、荷兰和法国，就国际形势和日欧关系同各国首脑会谈。

6月23日　　法国组成第二届莫鲁瓦内阁，其中有四名共产党内阁部长，这是34年来法共首次参加政府。

7月12日—13日　　密特朗总统同施密特总理会谈，对在西德部署新型导弹抗衡苏联的意见完全一致。

7月13日　　欧洲共同体外长会议发表声明，坚持召开阿富汗问题的国际会议。

7月20日—21日　　西方七国首脑经济会议在渥太华举行，会议发表政治声明和经济宣言。

8月28日　墨西哥和法国政府就萨尔瓦多局势发表联合声明，承认民族解放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是有代表性的政治力量，应参加解放萨尔瓦多政治危机的谈判。

9月26日—28日　密特朗总统访问沙特阿拉伯，重点讨论了沙特提出的中东和平计划。

10月10日　西德和平主义者约30万人在波恩示威，要求和平与裁军，反对东西方进行核军备竞赛。继后，西欧许多国家爆发同类性质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

10月17日—19日　密特朗总统访问美国，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在中美洲和南北对话问题上的分歧。法国表示支持美国加强西方防务。

10月22日—23日　22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或其代表在墨西哥坎昆城举行合作与发展的国际会议，就全球谈判以及改善南北关系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和磋商。

11月18日　美国总统里根向苏联提出欧洲战区核谈判四点建议，如果苏联拆除SS-20导弹，美国在西欧就不部署新型中程导弹，苏联立即予以拒绝。（即"零点方案"）

11月20日　苏联与西德签署一项每年向西德提供105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合同。22日，勃列日涅夫访问西德。

11月30日　美苏在日内瓦开始举行限制欧洲中程核武器的谈判。

12月11日　西德总理施密特访问东德，与昂纳克会谈并发表公报，表示要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

12月13日　波兰政府宣布全国进入战时状态，禁止集会、罢工，实行宵禁，封锁边界，华沙民警包围团结工会。

12月18日　欧安会马德里续会宣布休会。

12月29日　里根总统指责苏联对波兰事态恶化负有重大责任，决定立即对苏实行经济制裁。

1982年

1月3日　法国外长谢松在埃及访问时说，巴解组织应参加中东和谈。

1月4日　欧洲共同体十国外长布鲁塞尔会议，表示不赞成对波兰施加压力，警告苏联和华约组织不要干涉波兰。

1月8日　法国国防部长埃尔尼宣布，法国在技术上已经能够制造中

子弹。

1月12日　去年12月7日休会的美苏限制欧洲中程核武器谈判在日内瓦复会。

1月22日　法苏签定为期25年的天然气供应合同，规定苏从1984年起每年向法提供80亿立方米天然气。

1月29日　施密特总理和莫鲁瓦总理在波恩会谈，不同意美对苏波实行的制裁政策。

2月15日　欧洲共同体十国财政部长会议，一致要求同美国讨论高利率问题。

2月26日—27日　密特朗总统访问意大利，讨论对付美国高利率造成的影响和重振欧洲联盟的新计划。

3月3日　密特朗总统访问以色列，主张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以方强烈反对。

3月12日　密特朗总统对美国进行闪电式访问，为西方七国首脑经济会议作准备，并就缓和美欧分歧进行磋商。

欧安会马德里续会举行全体会议，因波兰问题东西方国家相互指责。

3月16日　勃列日涅夫提出核裁军新建议，以暂停布署SS-20导弹为条件，要求西方不在西欧部署新型导弹，遭到西方国家拒绝。

4月2日　阿根廷军队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登陆，英国同阿根廷断交。5日，英国皇家海军舰队启航开赴马岛。

4月8日　美国充当马岛事件调解人。比、法、西德、荷兰对阿根廷实行武器禁运。

4月4日—6日　第十三次日美欧委员会在东京举行，三方在贸易问题上互相攻击，美欧要求日本开放市场，日欧指责美高利率政策。

4月9日　西德、英、意等西欧国家数十万人举行和平示威，要求裁减军备并反对在西欧部署美国新型导弹。

4月30日　美国在"马岛事件"中放弃中立，对英提供物质援助，对阿根廷实行制裁。

5月3日　欧洲共同体曼谷办事处发表新闻公报，表示在越军撤出柬埔寨之前，拒绝给越南一切发展援助。

5月10日　法国外长谢松说，法国政府不承认苏联对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吞并。

5月12日　西班牙教士费尔南德斯·克龙在葡萄牙的法蒂玛谋杀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未遂。

5月17日　密特朗总统访英，同撒切尔首相就西方七国首脑经济会议及"马岛事件"进行会谈。

5月18日　欧洲共同体农业部长会议不顾美国反对，决定提高1982—1983年度农产品价格10.5%。

5月19日—26日　密特朗总统出访非洲。

5月27日　拉美国家决定中断同欧洲共同体的对话，以抗议该组织延长对阿根廷的制裁。

5月30日　西班牙完成了加入北约的最后程序，正式成为北大西洋联盟第十六个成员国。

6月2日—11日　里根总统访问法、意、英、西德和西柏林。

6月4日—6日　西方七国首脑第八次经济会议在凡尔赛举行。会议公报表明，美国同其它六国在西方共同经济政策和东西方经济关系等问题上达成了部分协议。

6月5日　西欧近日又爆发大规模群众示威集会，要求裁减核军备。

6月8日　欧洲共同体同阿拉伯经济统一委员会在布鲁塞尔签订一项技术和管理合作协定。

6月9日　里根总统在西德联邦议会发表演讲，重申美国恪守对西欧的防务义务。

6月10日　北约组织16个成员国首脑会议在波恩举行。会议通过《波恩宣言》、《关于北约军事一体化》、《关于军备控制和裁军》等三项文件。会议表明北约将建立"强大的防务"，同时寻求与苏联进行"建设性对话"。

6月18日　美国决定对向苏联出口用于输气管的石油设备的美国公司所属国外子公司实行制裁。

6月24日　法—苏宇航员第一次乘坐"联盟—T"飞船作宇宙飞行。

6月28日—29日　欧洲共同体布鲁塞尔首脑会议发表公报，就美国对其欧洲子公司的制裁要求同美紧急对话，并强烈谴责以色列侵略黎巴嫩，暂停向以色列出售武器和签订财政协定。

7月13日　西德银行财团同苏联签订信贷协议，提供大批贷款帮助苏联铺设天然气管道。

7月—8月　欧美之间因苏联天然气管道设备问题发生激烈争吵。除比利时推迟同苏签订协定外，欧洲主要国家不顾美国制裁坚持同苏联签订和履行合同。

10月1日　西德联邦议会通过对施密特政府的不信任案，4日，科尔就任西德总理。

10月5日　密特朗总统同科尔总理在巴黎会谈，商讨加强合作问题。21日—22日，又在波恩举行例行会晤，决定加强军事合作。

11月9日　法国国防部长埃尔尼证实，法国制造中子弹成功。

11月10日　勃列日涅夫逝世。12日，安德罗波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

11月13日　美国就西欧国家同苏联的经济关系问题同西欧国家达成协议，美国停止制裁。

12月10日　英外交大臣皮姆同西班牙外交大臣费尔南多·莫兰会谈直布罗陀问题。

12月12日　西欧诸国又爆发群众示威和集会，抗议部署新型导弹计划，要求建立无核区。

12月20日　西德政府就东西德关系基础条约签订十周年发表声明，重申政府的任务是减轻德国分裂的后果和维护德国统一。

12月30日　为加强日美欧团结，日本决定参加北约非军事方面的协商。

1983年

1月2日　法国总统密特朗表示将继续保持一支独立的核威慑力量，拒绝苏联把法拉入美苏核裁军谈判的要求。

1月18日　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问西德与科尔总理会谈。科尔重申支持“零点方案”，葛罗米柯表示苏联决不接受“零点方案”，主张日内瓦谈判必须把英、法的导弹计算在内。

1月20日　法德两国举行庆祝活动，纪念法德条约签订20周年。密特朗总统和科尔总理分别到对方国家参加活动。

1月29日　在希特勒上台50周年之际，西德各地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反对法西斯活动，表示决不许纳粹势力重新抬头。

2月1日　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批准给英国预算摊款回扣的折衷方案。

2月4日　　撒切尔首相与科尔总理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再次表示“零点方案”是解决欧洲导弹问题的最佳方案。

2月16日　　西德、法、英三国签署研制第三代反坦克导弹的联合协议。

2月21日　　法国外长谢松访问苏联（16日）与葛罗米柯会谈，并会见安德罗波夫。两国签订了1983—1993年科技合作协定，但在欧洲安全等国际问题上仍严重分歧。

3月8日　　撒切尔首相同外交大臣、香港总督、驻华大使以及政府要员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高级磋商。

3月15日　　欧洲共同体十国外长布鲁塞尔会议，提出以美在西欧部署一部分新导弹来换取苏联减少在欧战略导弹数目的折衷建议。

3月22日　　欧洲共同体十国首脑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就中东问题声明，要求一切外国军队撤出黎巴嫩，重开中东和谈，确认“里根方案”和“非斯宣言”是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基础。

3月29日　　英国工党公布竞选纲领，主张英国退出共同体，阻止在英部署美导弹，并使英国成为无核国家。

3月30日　　西德、英、意、法、西等西欧国家政府以及北约理事会（31日）声明支持里根关于美苏就削减欧洲中程核武器达成临时协议的建议。

3月31日　　英国驱逐2名苏联外交官，西班牙驱逐4名苏联外交官。

4月5日　　法国驱逐47名苏联外交官、记者和侨民。

5月3日　　安德罗波夫表示愿意同西方就欧洲核潜力均衡达成协议，但要把英法相应武器考虑在内。

5月3日—7日　　密特朗总统访华。

5月19日　　法国国民议会通过1984—1988年军事纲领法。

5月24日　　西德总理科尔就西方七国首脑威廉斯堡经济会议答记者问，表示西德不打算充当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

5月25日　　英外交大臣皮姆说，在苏联同意大幅度削减战略武器的情况下，英国可以考虑将其独立的核力量纳入美苏裁军谈判。

5月28日—30日　　西方七国首脑经济会议在美国威廉斯堡举行。会议公布了《威廉斯堡经济问升宣言》，发表了《为发展和稳定而加强经济合作》的文件，并就核裁军问题发表了声明。

5 月31日—6 月 2 日　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公报重申如美苏裁军谈判失败，北约将如期在欧洲部署美制导弹，但希腊和丹麦持保留态度。

6 月 7 日　西欧联盟议会第29届会议通过《中国与欧洲安全》建议书，要求西欧国家加强同中国的关系，取消对华贸易限制。

6 月15日　欧洲共同体十国首脑签署一项"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宣言。

6 月16日　由法、德等西欧国家联合研制的"阿丽阿娜"火箭发射成功。

6 月17日　英法拒绝苏联提出的关于五个核大国一起"从数量和质量上"冻结核武器的建议。

6 月19日　欧洲共同体十国首脑斯图加特会议结束，未能找到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对英国预算摊款问题达成折衷方案，签署了有关欧洲联盟的声明。

6 月23日　西德总理科尔向联邦议院作《关于被分裂的德国的国情报告》。对德国分裂的原因、现状以及对统一的立场作了阐述。

7 月14日　密特朗总统国庆电视讲话，重申反对把法国核力量纳入美苏日内瓦谈判。

7 月15日　欧安会马德里续会就最后文件达成临时协议，规定将召开关于欧洲裁军、人权等一系列会议，对人权和安全问题提出了新的条款。9 月 9 日通过最后文件。

7 月25日　法、英、意、西德的四家公司签署联合生产多用火箭筒协议。

8 月 7 日　西德前总理勃兰特要求美国在同苏核会谈中采取灵活态度，支持苏联关于将英法核力量纳入谈判的条件。

8 月18日　法国约有2500人在乍得和中非参加"大鳐鱼"训练和威慑行动。

8 月25日　密特朗总统对《世界报》记者谈乍得危机，说法不会直接介入乍得。

8 月27日　安德罗波夫表示，如果美放弃在欧洲部署新式导弹，苏联将把部署在本国欧洲部分的导弹减少到与英法导弹数量相等的水平并全部销毁减下来的导弹。29日，就此建议安德罗波夫致函西欧各国领导人。

9月1日　法国对外关系部就苏联核裁军新建议发表公报，重申反对把英法核力量纳入美苏谈判。

9月2日　苏联远东防空部队击落一架南朝鲜客机，西方国家纷纷抗议并采取制裁措施，但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拒绝制裁。

10月7日　法国和西班牙第一次签署防务合作协定，两国将密切合作。

10月14日　北约组织按照“双重决定”开始在欧洲部署新导弹。苏联反应强烈，表示要中断日内瓦核裁军谈判。

10月26日　法国、西德、西班牙、瑞典等西欧国家谴责美国入侵格林纳达。

11月18日　安德罗波夫致信西德总理科尔，重申把英法核力量纳入美苏会谈的要求，警告西德如部署美新式导弹必须承担后果，但苏德关系还不致于破裂。

11月　欧洲部署美制新式导弹问题在西欧国家内部引起争论，丹麦议会、西德社会民主党、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西欧大多数共产党和社会党均表示反对。

11月23日　由于开始在欧洲部署美制新式导弹，苏联无限期中断关于中程核武器的日内瓦谈判。

11月29日　西欧联盟议员大会建议取消限制西德制造远程武器规定。

12月6日　欧洲共同体首脑雅典会议结束，在财政和农业政策问题上争论不休，未达成协议。

12月8日　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在日内瓦无限期中断。

12月16日　西德、法、西、意、英五国签署联合制造800架双发动战斗机军事协议。

1984年

1月9日—12日　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访问埃及、沙特阿拉伯、叙利亚等国。

1月17日　欧洲三十三国外长以及美国和加拿大代表，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欧洲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和裁军会议。

1月24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会见由克洛德、埃斯蒂埃率领的法国国民议会代表团。　一百多名苏联和法国著名社会活动家在莫斯科举行苏法裁军和加强和平讨论会。

中法建交20周年，李先念主席、密特朗总统相互致电祝贺，胡耀邦总书记就中法建交20周年向法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

1月27日　　欧洲议会对外关系委员会通过对华关系报告。

2月3日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对法国进行为期五天访问。法苏签订1985—1990年经济、工业和技术合作协定。

2月4日　　撒切尔首相结束对匈牙利的三天访问，与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和拉扎尔会谈东西方关系等问题。西方有人称此行为撒切尔夫人“新东方政策”的开始。

2月14日　　欧洲议会通过建立欧洲政治和经济联盟的条约草案。

2月28日　　欧洲共同体在布鲁塞尔通过一项旨在打破美国和日本优势的《欧洲信息技术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预算费用13亿美元。

3月14日　　西德总理科尔在联邦议院作报告，认为德国的任务是在一个统一的欧洲里通过自由的自决实现德国的统一和自由。

3月23—24日　　密特朗总统访问美国同里根总统会谈。密特朗强调法国是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有必要同东方保持对话，但不会做特别让步。

4月9日　　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举行首次部长级会议，决定加强合作以对付美日竞争，从85年起，两集团之间将完全取消工业品关税。

4月22日　　意大利外长安德雷奥蒂访问苏联，同苏外长葛罗米柯会谈国际问题。

5月20日　　维利·勃兰特重新当选为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

5月24日　　密特朗总统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就2月份通过的欧洲政治与经济联盟条约草案建议举行预备性会谈。

6月6日　　欧美8国领导人在法国犹他海滩庆祝盟军诺曼底登陆40周年。

6月7日　　西方国家7国首脑经济会议在伦敦举行，会议通过四个政治宣言和声明，并发表《伦敦经济宣言》。

6月12日　　西欧联盟外长会议在巴黎举行，会议原则上同意法国关于恢复西欧联盟活动的一揽子建议。这是多年来第一次没有美国参加的欧洲国家防务会议。

6月16日　　赵紫阳总理结束从5月30日开始的对法国、比利时、欧洲经济共同体、瑞典、丹麦、挪威和意大利的正式访问。

6月17日　欧洲议会第二次直接选举结果揭晓，法、英、西德席位减少，意大利共产党击败天民党。

6月20日　法国总统密特朗应邀访问苏联，西方认为这打破了法国社会党执政以来法苏之间僵持的政治关系。

6月2　日　西德总理科尔访问匈牙利，同拉扎尔总理会谈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

6月24日　因反对政府改革私立学校计划，巴黎爆发百万人大示威。

6月25日　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法国枫丹白露举行。会议讨论了东西方关系和西班牙、葡萄牙参加共同体问题，争论多年的英国预算摊款问题达成协议。

6月27日　西欧联盟常设理事会通过了议员大会建议取消限制西德制造远程武器和制导武器的禁令的提案。

7月1日　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访问苏联，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举行会谈，双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意见不一。

7月17日　法国莫鲁瓦内阁辞职，19日原工业和研究部长法比尤斯组阁，法共宣布不参加法国新政府。

7月18日　英国和阿根廷就马岛问题举行1982年以来的首次正式会谈。但次日阿根廷宣布中断谈判。

9月13日　意大利外长安德雷奥蒂在罗马关于将来仍应存在两个德国的讲话，在波恩反应强烈。16日，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写信给西德总理科尔，声明意大利政府仍将尊重联邦德国宪法原则。

9月25日　法国政府宣布，法国和利比亚驻乍得部队同时开始全面撤军。

9月26日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及其三个附件在京草签。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在同日把香港交给中国。

10月16日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书记卡达尔结束对法国的三天访问，同密特朗总统就东西方关系和世界和平等问题举行会谈，双方表示要为争取欧洲和世界和平作出努力。

10月27日　在罗马，为纪念西欧联盟成立三十周年，为期两天的西欧联盟各国外长、国防部长以"重振西欧联盟"为中心议题的联席会议结束，会议发表"罗马宣言"，就加强欧洲防务和欧洲联合问题作出政策性声明。

10月29—30日　　密特朗总统和科尔总理举行法德首脑第44次会晤，双方就恢复西欧联盟的步骤取得一致意见，并希望美总统选举后美苏恢复对话。

11月12日　　李先念主席对西班牙、葡萄牙、马耳他进行正式访问。

11月25日　　密特朗总统宣布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明年将访问法国。

11月28日　　法国总统密特朗结束对叙利亚为期三天的访问，这是四十多年来法国总统首次访叙。

12月3—4日　　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就接纳西班牙和葡萄牙问题达成协议，西、葡两国将于86年正式加入共同体。

12月19日　　中英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字。

12月21日　　应英国议会邀请，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结束对英国的一周访问。

12月27日　　法国总统密特朗在法电视台谈法国对外政策，认为法对外政策的三个主要支柱是欧洲、第三世界和东西方关系。

附录 2：

主要参考书目

文献资料

《世界事件编年辑览》（"The Annual Register – World Events", Longman.）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编：《国际事务文件汇编》（Watt, D.C. ed.："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R.I.I.A.）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编：《国际事务概览》（"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R.I.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美〕阿瑟·施莱辛格主编：《世界强权动力学——美国对外政策文献史》（Schlesinger, Arthur M. Jr. ed.："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5 Vols., Chelsea House, 1973.）

〔美〕《纪事年鉴》（"Facts on File Yearbook", 42 Vols., Facts on File, Inc., New York.）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汇编》（"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World Peace Foundation.）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国际条约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纪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苏〕萨纳柯耶夫、崔布列夫斯基编：《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商务印书馆

著作（以作者姓氏英文字母为序）

迪安·艾奇逊：《在创世的现场，我在国务院的岁月》（Acheson, Dean："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W.W. Norton and Company. Inc. New York, 1969.）

斯蒂芬·安布罗斯：《上升为全球主义——1938—1980的美国对外政策》（Ambroise, Stephen E.："Rise to Globalism –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8—1980", Penguin Books, 1980.）

安东尼·艾登：《全程》(Eden, Anthony; "Full Circle, the Memoirs of the Rt. Hon. Sir Anthony Eden", London, 1961.)

雷蒙·阿隆：《回忆录》(Aron, Raymon; "Memoirs", Juilliard, 1983.)

约翰·贝克：《分裂德国的决策》(Backer, John H.; "The Decision to Divide Germany",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78.)

托马斯·贝雷：《美国人民外交史》(Bailey, Thomas A.;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1964.)

彼特·宾德：《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欧洲的欧洲化》(Bender, Peter; "Das Ende des Ideologischen Zeitalters Die Europaisierung Europas", G.F.R., 1981.)

大卫·宾德：《另一个德国人——维利·勃兰特的生活和时代》(Binder, David; "The other German – Willy Brandt's Life and Times", Washington, D.C., 1975.)

保尔·比努：《欧洲的先驱者》(Binoux, Paul, "Les Pionniers de l' Europe", Paris, 1972.)

查里斯·波伦：《历史的见 证，1929—1969》(Bohlen, Charles E.; "Witness to History 1929—1969", W.W. Norton and Company, Inc., New York, 1973.)

维利·勃兰特：《人民和政治》(Brandt, Willy; "People and Politics; the Years 1960—1975",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6.)

保尔·布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核协商政治》(Buteux, Paul;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Consultation in NATO, 1965—198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温斯顿·丘吉尔：《演讲全集》(Churchill, W.; "His Complete Speeches, 1897—1963", 8V. New York, 1947.)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Churchill, W; "The Second World War", Cassell, London, 1964.)

丘吉尔·罗斯福：《罗斯福和丘吉尔，他们的战时秘密通信集》(Churchill, W.L.S., Roosevelt, F.D.;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Their Secret Wartime Correspondence", London.)

夏尔·戴高乐：《战争回忆录》，(De Gaulle，"Memoires de Guerre"，Plon，1959.)

夏尔·戴高乐：《希望回忆录》(De Gaulle："Memoires d 'Espoir"，Plon，1970.)

夏尔·戴高乐：《战争期间演讲通信集》(De Gaulle："Discours et Messages pendent la Guerre"，Plon，1970.)

莫里斯·顾夫·德默维尔：《一种对外政策，1958—1969》(De Murville，Maurice Couve："Une Politique Etrangère，1958—1969."，Plon，1971.)

A·W·德波特：《超级大国之间的欧洲——持久的均势》(DePorte，A.W.："Europe Between the Superpowers，The Enduring Balanc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

让——巴普蒂斯特·杜罗塞尔：《历史中的欧洲思想》(Duroselle，Jean-Baptiste："L' Idée d' Europe dans l' Histoire"，Denoel，1965.)

赫伯特·费斯：《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他们进行的战争和探求的和平》(Feis，Herbert，"Churchill-Roosevelt-Stalin，the War They waged and the Peace They Sought"，Princeton，1957.)

D·F·弗莱明：《冷战及其根源，1917—1960》，(Flemming，D.F.："The Cold War and its Origins，1917—1960"，2V.，London，1961.)

安德烈·封丹：《同床异梦，"缓和的历史"1962—1981》(Fontaine，Andre："Un Seul Lit pour Deux Reves，Histoire de la Detente 1962—1981"，Fayard，1981.)

约瑟夫·弗兰克尔：《英国对外政策，1945—1973》(Frankel，Joseph："British Foreign Policy，1945—1973"，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弗朗斯·A·M·阿尔廷·冯·格骚：《不稳定的缓和》(Geusau，Frans A.M. Alting Von："Uncertain Detente"，The Netherlands，1979.)

阿尔弗莱·格罗斯：《戴高乐时期的法国对外政策》(Gross，Alfred："French Foreign Policy under De Gaulle"，Little，Brown and Company，Boston and Toronto，1967.)

爱德华·希思：《旧世界，新前景，英国，欧洲和大西洋联盟》(Heath, Edward, "Old World, New Horizons, Britain, Europe, and the Atlantic Alliance",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L.S.卡普兰和R.W.克劳温主编：《三十年代后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Kaplan, L.S. and Clawoon, R.W. ed., "NATO after Thirty Years",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Wilmington, Delaware, 1981.)

乔治·凯南：《回忆录，1925—1950》(Kennan, George, "Memoirs 1925—1950", Boston, Toronto, 1967.)

威廉·R·凯洛尔：《二十世纪世界——一部国际史》(Keylor, William R.,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皮埃尔·勒鲁士主编：《八十年代的欧洲安全》(Lelouche, Pierre ed.: "Sécurité Européanne dans les Années 80", IFRI, Paris, 1980.)

沃尔特·李普曼：《冷战——对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份研究报告》(Lippmann, Walter, "The Cold War — a Study in U.S. Foreign Policy", Harper and Row, Pub., New York, 1947.)

沃尔特·米里斯主编：《福莱斯托日记 —冷战内幕历史》(Millis, Walter ed., "The Forrestal Diaries-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Cassell and Company L.T.D., London, 1952.)

弗朗索瓦·密特朗：《稻草和谷粒》(Mitterrand, François, "La Paille et le Grain", Plon.)

弗朗索瓦·密特朗：《此地此时》(Mitterrand, François, "Ici et Maintenant", Fayard, 1981.)

罗杰·莫尔冈：《美国和西德，1945—1973，关于联盟政治的研究》(Morgan, Rog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 Germany 1945—1973, a Study in Alliance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H.G.尼柯拉斯：《英国和美国》(Nicholas, H.G.: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1963.)

F.S.诺塞芝：《列强的对外政策》(Northedge, F.S.,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Powers", Faber and Faber, London, 1974.)

F.S.诺塞芝：《英国的对外政策：1945—1961的调整过程》(Northedge) F.S., "British Foreign Policy, the Process of Readjustment

1945—1961", London, 1962)

F.S.诺塞芝，《实力的衰落，英国的对外政策，1945—1973》(Northedge, F.S.："Descent from Power,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45—1973", London, 1974.)

赫尔穆特·施密特，《实力均衡——德国的和平政策和超级大国》(Schmidt, Helmut："The Balance of Power – Germany's Peace Policy and the Super Powers", William Kimber. London, 1969.)

赫尔穆特·施密特，《政治问题透视》(Schmidt, Helmut："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Westview Press, 1982.)

格兰.T.西伯尔格，《肯尼迪、赫鲁晓夫和禁止试验》(Seaborg, Glenn T.："Kennedy, Khrushchev, and the Test Ban", Berdeley, Los Angeles, London, 1983.)

保尔-亨利·斯巴克，《不间断的战斗——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录，1936—1966》(Spaak, Paul-Henri："The Continuing Battle, Memoirs of a European 1936—1966", London, 1971.)

C.L.索尔兹伯格，《一长串烛台的逝去——回忆和日记，1934—1954》(Sulzberger, C.L.："A Long Row of Candles-Memoirs and Diaries 1934—1954",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9.)

D. W. 厄尔温，《一九四五年以来的西欧》(Urwin, D. W.："Western Europe since 1945", Longman, 1983.)

皮埃尔·维昂松—彭特，《戴高乐共和国的历史》(Viansson-Ponte, Pierre："Histoire de la Republique Gaullienne", Fayard, 1970.)

威廉·瓦莱士主编，《英国在欧洲》(Wallace, William ed.："Britain in Europe", R.I.I.A., 1960.)

白修德，《历史的探索——一份个人的经历》(White, Theodore："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nal Adventure", Warmer Books, 1978.)

哈罗德·威尔逊，《工党政府，1964—1970，一份个人的记录》(Wilson, Harold："The Labour Government-1964—1970, a personal Record",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and Michael Joseph, 1971.)

哈罗德·威尔逊，《政治斗争的目标》(Wilson, Harold："Purpose in Politics",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64.)

附录3：

部分人名中外文对照表

（按字母顺序排列）

Acheson, Dean 迪安·艾奇逊
Adenauer, Konrad 康拉德·阿登纳
Ambroise, Stephen E. 斯蒂芬·E·安布罗斯
Andreotti, Giulio 朱利欧·安德雷奥蒂
Apel, Hans 汉斯·阿佩尔
Aron, Raymond 雷蒙·阿隆
Attlee, Clement 克莱蒙·艾德礼

Bailey, Thomas 托马斯·贝雷
Bahr, Egon 埃贡·巴尔
Benes, Eduard 爱德华·贝奈斯
Bevin, Ernest 恩内斯特·贝文
Bidault, Georges 乔治·皮杜尔
Bierut, Boleslaw 波莱斯瓦夫·贝鲁特
Binder, Peter 皮特·本德尔
Bismarck, Otto von 奥托·俾斯麦
Blum, Léon 莱翁·勃鲁姆
Bohlen, Charles 查里斯·波伦
Bourget, Ivon 伊冯·布尔热
Briand, Aristide 阿里斯蒂德·白里安
Bullitt, William 威廉·布利特
Brandt, Willy 维利·勃兰特
Byrnes, James 詹姆士·贝尔纳斯

Callaghan, James 詹姆士·卡拉汉
Carter, Jimmy 吉米·卡特
Cheysson, Claude 克罗德·谢松

Churchill, Winston S.温斯顿·丘吉尔
Clark-Kerr 克拉克-凯尔
Clay, Lucius 吕西奥斯·克莱
Clayton, William 威廉·克莱顿
Clifford, Clark 克拉克·克里弗德
Coty, René 勒内·科蒂
Cromwelle, William 威廉·克伦威尔
Crossman, Richard 里查德·克罗斯曼
Coudenhove-Kalergi, Charles 查里·考当霍夫-卡莱吉
Cyrankiewiez, Josef 约瑟夫·西伦凯维茨

D' Argenlieu, Georges T. 乔治·达让里约
De Gaulle, Charles 夏尔·戴高乐
Delmas, Chaban 沙邦·戴尔玛
De Murville, Couve 顾夫·德穆维尔
D' Estang, Giscard 吉斯卡尔·德斯坦
DePorte, A.W. 德波尔特
Dillon, Douglas 道格拉斯·狄龙
Dönitz, K. 邓尼茨
Doulas, William 威廉·道格拉斯
Dulles, Allen 阿伦·杜勒斯
Dulles, John Foster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Duroselle, Jean-Baptiste 让·巴普蒂斯-杜罗塞尔

Eden, Anthony 安东尼·艾登
Eisenhower, Dwight David 德怀特·大卫·艾森豪威尔
Erhard, Ludwig 路德威格·艾哈德

Fanfani, Amintore 阿明托雷·范范尼
Faure, Edgar 埃德加·富尔
Foch, Ferdinand 费尔迪南·福煦
Ford, Gerald 格拉德·福特

Fouchet, Christian 克里斯蒂安·富歇
Forrestal, James 詹姆士·福莱斯托
Frankel, Joseph 约瑟夫·弗兰克尔

Gaillard, Félix 费利克斯·加亚尔
Garcia, Harold 哈罗德·加西亚
Genscher, Hans-Dietrich 汉斯-迪特迪奇·根舍
Grosser, Alfred 阿尔弗莱·格罗赛

Halftendorn, Helga 海尔加·哈弗滕多
Hallstein, Walter 瓦尔特·哈尔斯坦
Hammarskjöld, Dag 达格·哈马舍尔德
Harmel 哈尔默尔
Harriman, Averell 阿弗莱尔·哈里曼
Hawe, Geoffrey 杰弗里·豪
Heath, Edward 爱德华·希思
Hernu, Charles 夏尔·埃尔尼
Herriot, Edouard 爱德华·赫里欧
Herter, Christian 克里斯蒂安·赫脱
Himmler, Heinrich 恩里希·希姆莱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Home, Douglas 道格拉斯·霍姆
Hopkins, Harry 哈里·霍布金斯

Jobert, Michel 米歇尔·若贝尔
Johnson, Lyndon 林登·约翰逊

Kasavubu, Joseph 约瑟夫·卡萨武布
Kennan, George 乔治·凯南
Kennedy, John 约翰·肯尼迪
Kennedy, Robert 罗伯特·肯尼迪
Kiesinger, Kurt Georg 库尔特·G·基辛格

Kissinger, Henry A. 亨利·基辛格
Kohl, Helmut 赫尔穆特·柯尔
Kreisky, Bruno 布鲁诺·克赖斯基

Laniel, Joseph 约瑟夫·拉尼埃尔
Leahy, William 威廉·李海
Leclerc, Jacques P. 雅克·莱克勒克
Leighton, Steward 司徒雷登
Lelouche, Pierre 皮埃尔·勒鲁士
Lemnitzer, Lyman 莱曼·莱姆尼茨
Lippmann, Walter 瓦尔特·李普曼
Lloyd, Selwyn 塞尔温·劳埃德
Lovett, Robert 罗伯特·洛维特
Lumumba, Patrice E. 帕特里斯·卢蒙巴

Macarthy, Joseph 约瑟夫·麦卡锡
MaCloy, John 约翰·麦克洛伊
Macmillan, Harold 哈罗德·麦克米伦
Malfatti, Francs Maria 弗兰克斯·马利亚·马尔法蒂
MacMahon, William 威廉·麦克马洪
Mansfield, Mike 麦克·曼斯菲尔德
Marshall, George 乔治·马歇尔
McDonald, Malcom 马尔克姆·麦克唐纳
McNamara, Robert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Mendès-France, Pierre 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
Mobuto, Sese Seko 塞塞·塞科·蒙博托
Mollet, Guy 居伊·摩勒
Monnet, Jean 让·莫内
Montbrris', Thierry de 梯埃里·德·蒙布里亚
Murphy, Robert 罗伯特·墨菲
Mussolini, Benito 本尼托·墨索里尼

Napoléon, Bonapart 波拿巴·拿破仑
Nasser, Gamal Abdel 加麦尔·阿布戴尔·纳赛尔
Nehru, Jawaharlal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Nixon, Richard 里查德·尼克松
Norstad, Lauris 洛里斯·诺尔塔德
Northedge, F.S. 诺塞芝

Palme, Olof 奥洛夫·帕尔梅
Pearson, Lester B. 莱斯特·皮尔逊
Pineau, Christian 克里斯蒂安·皮诺
Pleven, René 勒内·普利文
Pompidou, George 乔治·蓬皮杜

Ramstov, Otto Geraf 奥托·格拉夫·拉姆斯多夫
Rapacki, Adam 亚当·腊帕斯基
Reagan, Ronald 罗纳德·里根
Reynaud, Paul 保尔·雷诺
Rogers, William 威廉·罗杰斯
Roosevelt, Franklin Delano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Rostow, Walter 瓦尔特·罗斯托

Sandys, Duncan 邓肯·桑迪斯
Saragat, Giuseppe 朱塞佩·萨拉盖
Scheel, Walter 瓦尔特·谢尔
Schlesinger, Arthur Jr. 阿瑟·施莱辛格
Schlesinger, James 詹姆士·施莱辛格
Schmidt, Helmut 赫尔穆特·施密特
Schröder, Gerhard 格哈德·施罗德
Schumacher, Kurt 库尔特·舒马舍
Schumann, Robert 罗伯特·舒曼
Seaborg, Glenn T. 格兰·西伯尔格
Segni, Antoni 安托尼·塞尼